

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

福斯特等著

楊延生譯

(供)



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

福斯特等著

楊延生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William Z. Foster, etc.
MARXISM-LENINISM
VS. REVISIONISM
New Century Publishers, New York, 1946.

根据美国新世纪出版社 1946 年纽约版译出

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

(美) 福斯特等著

楊延生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9\frac{3}{8}$ · 插頁 2 · 字數 206,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900 定價(七) 1.00 元

統一書號 3002·76

目 次^①

- 序 言..... 馬克斯·魏斯 (1)
- 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 威廉·澤·福斯特 (6)
福斯特 1944 年 1 月 20 日給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
- 論美国共产党的解散..... 雅各·杜克洛 (27)
从法国共产党理論刊物《共产主义手冊》1945 年 4 月号
轉載。
- 論修正主义問題 威廉·澤·福斯特 (51)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
举行的會議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 我們的政策和任务的若干方面..... 尤金·丹尼斯 (68)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
举行的會議上所作的报告。
- 为了重新建立我們馬克思主义的先鋒队
..... 約翰·威廉遜 (91)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
举行的會議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威廉·澤·福斯特 (97)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1945 年 7 月 26—28 日举行的特
別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这次大会重新建立了美国共
产党。

① 原书的目次同正文标题不完全一致, 譯文完全依照原文。——譯者

共产党的重建.....約翰·威廉遜 (119)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1945 年 7 月 26—28 日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目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任务..... (134)

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決議, 1945 年 7 月 28 日通过。

为了一个战斗的共产党!.....威廉·澤·福斯特 (157)

在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11 月 18 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附 录

德黑兰: 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埃尔·白劳德 (167)

序 言

为反对和摈棄白劳德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所作的斗争，构成美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自从1945年7月26—28日举行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坚决拋棄白劳德的政策并重新建立美国共产党以来，一个整个时期已經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生活本身增添了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白劳德修正主义政策的完全破产，同时充分证实了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共产党全国委员会1945年11月16—18日會議进一步加以发展的政策的正确性。

在这个时期中，人們所看到的是大規模罢工斗争的发展，而不是白劳德所預見的階級和平与协调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人們所看到的是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必将导致一次新的周期性經濟危机的一切因素的日益成熟（虽然生产有可能短期上升），而不是白劳德所預言的美国資本主义經濟不断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人們所看到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站在反动的蔣介石方面武装干涉中国，是英国和荷兰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实行血腥的武装镇压，而不是白劳德所預見的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安排来解放殖民地。这个时期已經表明：德黑兰協議並沒有改变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的本性，而作为持久和平支柱的三大强国的团结，如果要使它維持下去，如果要制止并糾正一切像在倫敦會議上那样同它背离的情形，那

就必須为它进行斗争。

如果白劳德的修正主义政策沒有被擯棄，如果共产党沒有重新建立起来，那它就不能在当前的經濟和政治斗争中，在团结群众来建立一切民主力量的广大联盟以便在两大政党以外进行政治活动中起到它現在所起的重大作用。

但是共产党对白劳德主义的完全擯棄，並沒有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或是它的深刻教訓归入这样一类有趣的现象之中：它只是作为过去的历史来供人們从学术上加以研究。

根除白劳德修正主义的一切殘迹的斗争，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斗争。这是我們党使自己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的共产党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我們今天在一切战线上的战斗，并且是胜利地进行这种战斗的先决条件。

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得的教訓，並沒有蒙上灰尘，成为仅仅与过去有关的东西。对今天来說，以及对明天来說，这些教訓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文件、文章和演說，总结了共产党党员們在1945年7月全国特別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整个时期內以最自由的方式进行的，而在这次大会上达到最高峰的異常丰富的討論的主要之点，这次大会除了埃尔·白劳德自己的孤零零的一票之外，擯棄了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論和政策，重新建立了共产党。

对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文件、文章和演說进行仔細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所擯棄的修正主义理論和政策体系的性质和要点。而对这些文件、文章和演說是必須这样来研究的，因为它们是从今以后对一切想要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进行教育和启迪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白劳德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不限于一两个个别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个整个的思想体系，不过其各个不同的方面有的在理論上得到了較大的發揮，有的則發揮得比較少。

这个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各种要素：

1. 否认馬克思主义階級斗争的理論，而代之以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間利益协调的观点；取消階級斗争，贊成階級合作和階級和平的政策。

2. 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垂死的資本主义的分析，鼓吹帝国主义时代已經終結、壟断資本主义已經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进步力量的理論。

3. 否认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濟发展規律、特别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危机不可避免性的分析，拥护凱恩斯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

4. 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國家的理論，以至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加以理想化，把托拉斯和壟断組織同法西斯主义发展間的真实关系加以歪曲。

5. 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这表现在放棄黑人有自决权的原則，鼓吹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安排来使殖民地获得自由的理論。

6. 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階級是現代社会中最起决定作用的和领导的力量这种思想，使工人階級从屬於“自由的”資產階級，宣称后者是現代社会中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7. 否认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而代之以自由的資產階級烏托邦。

8. 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而代之以唯意志論、实用主义的观点；放棄在理論战綫上进行反对敌对

的和異己的思想影响的斗争，同时对理論与实践間的关系大加歪曲。

9. 解散共产党，这表示完全放棄了全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有必要成立工人階級先鋒队——共产党以及关于这个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教导；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采取官僚主义作为工人階級先鋒政党的工作制度。

从这一切看得很明白：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虽然有它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来自于国际上和美国国内特殊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他的修正主义体系就是在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从它的基本要点来看，正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和洛夫斯东的修正主义在新条件下的繼續和进一步发展。

使得以白劳德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趋势得以产生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是今天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共产党生活和斗争的环境中所固有的。这从白劳德的政策对美国以外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压力在美国表现得特別厉害，首先，是因为整个“罗斯福十年”的影响，第二，是因为在普遍被削弱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

但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体系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支配了美国共产党的政策，則是因为美国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掌握和彻底融会貫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所造成的。

因此，从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結論：必須在工人階級現在进行的、共产党在其中起着重大而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巨大斗争过程中，为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而斗争。

对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材料的研究，必須在加强学习和反复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和著作的基础上来进行，特别是列宁論修正主义的文章（現由国际出版社在其“列宁小图书馆丛书”中出版一个专集），斯大林的《掌握布尔什維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論》，斯大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这部經典著作。

用这种知識武装起来之后，我們就能够并且一定要向着更迅速地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的共产党，一个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加在它肩头的一切重大責任的共产党前进。

馬克斯·魏斯

福斯特給全国委员会的信

1944年1月20日提出

致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們，

亲爱的同志們：

在白劳德同志在全国委员会最近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报告（这已被采納为我們党的政策）中，我认为有許多严重的錯誤，必須予以糾正。白劳德同志的报告我在事前只看过一部分，听了全文之后，我就在发言人名单上签了名，要回答他所作的提議。但是有几位政治委员会委員力劝我不要发言，他們认为这会在党内造成混乱，并且說在政治委员会的进一步討論中将会使局势澄清。因此我当时沒有提出反对意見，只声明留待在政治委员会中去解决。我认为白劳德同志的錯誤非常严重，所以觉得自己有責任向全国委员会表白自己的意見。

白劳德同志企图把德黑兰會議的决定应用于美国，他在报告中描繪了这样一幅全国团結的前景，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包括美国財政資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在内的全国团結将会順利实现；这种团結会使（引证《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中的話，他必首肯）“可怕的战争創伤得到迅速医治”，并且会在所有各阶级的和平合作下，在“悠久的年代”中无限期地繼續下去。在这幅图画里，美国帝国主义簡直是消失了，阶级斗争的痕迹都很难找到了，而社会主义則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白勞德同志在他的橋港演說中曾經說過：“作為在這個新世界中尋找我們的道路的指南，陳舊的公式和古老的偏見對於我們行將毫無用處。”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由我看來，白勞德同志對資本主義的相當樂觀的看法是從兩種錯誤產生的。第一種錯誤是，對戰爭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日益深刻化估計不足。在政治委員會討論中當面被質問時，白勞德同志同意資本主義已為戰爭所嚴重削弱；但他的報告傾向於包含一種相反的意思。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資本主義不知怎樣已經返老還童，並且現在正在進入一個擴大和成長的新時期。獨特之處是，他說，大家都同意這一點，即“沒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同樣的（美國的。——福斯特）經濟，包括農業在內，不能使生產維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即戰時的水平。——福斯特）；而任何一種不從這個前提出發的計劃都是不值得考慮的。”我要說，同這幅繁榮的、易于恢復的資本主義圖畫相反，現實是一個嚴重地削弱了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它的削弱在戰後美國也一樣會感覺到。在我國，特別是在被破壞的歐洲，復興的問題必然規模巨大，而且從長遠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解決的。但這並不是說，在戰後某些國家的經濟中不可能出現暫時的繁榮，生產力也不可能有所增長。然而這的確是說，戰後的復興問題卻是嚴重的，決不能認為會像白勞德同志似乎意味着的那樣，可以輕易得到解決。

白勞德同志報告中的第二個基本錯誤是這樣一種想法：美國財政資本的主要部分現在已經納入或可以納入以民主和進步的精神執行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所必需的全國團結之中。誠然，白勞德同志對於在壟斷資本中，究竟有哪幾部分他能夠希望它

們會到民主陣營中來共同在國際方面和國內方面實現德黑蘭的決定，有時估計是很審慎的。例如，他說，“即使將來發現我們在那裡找不到同盟者，然而這樣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還是正確的。”但他顯然是在制定一種要求在兩大階級，即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建立新關係的政策。從許多迹象（包括白勞德對他自己和摩根握手這個象徵的重視）來看，以及從他看不出在他所瞻望的將要經歷“悠久的年代”的和平合作中大資本會有嚴重反對這一事實來看，顯然他是認為可以贏得絕大部分財政資本贊同他所擬定的建議的。

對於大企業會在支持戰爭和解決復興問題中採取進步立場的這種大樂觀主義，是毫無根據的。要把德黑蘭的決定在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完全付諸實行，就要求有最廣大的全國團結，在這個團結中必須有工人、農民、自由業者、小工商業主以及所有忠實擁護這個綱領的資產階級分子參加。但認為這一類資本家，即使把威爾基的擁護者也包括進去，將構成財政資本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或者可以擴大到把財政資本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包括進去，那就是懷抱一種危險的幻想。事實是正如我下面將詳細闡述的，美國財政資本中大部分人現在遵循的路綫是和對德黑蘭協議作民主和進步的解釋截然相反的，並且十之八九他們還會繼續這樣作。

只有在同民主地實現德黑蘭協議不相容的基礎上，才能同美國財政資本的主要勢力達成全國團結，在戰後時期尤其是這樣。這種全國團結必然處於大資本的操縱之下，從長遠看，它是不能實現德黑蘭會議所定下的路綫的。不能信賴美國大資本會同工人以及其他階級合作去實行德黑蘭的決定，更不能信賴他們會領導全國去這樣作，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我們決不應當忽視。

白勞德同志的錯誤，正在於他虛妄地假定可以這樣信賴他們。他認為（橋港演說）大資本家屬於“世界上的明智人士，英國、美國和蘇聯的聯合的道德力量”的範圍，他們在為一個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而奮鬥。同他在自己的報告中所作的正確的說明——工人是德黑蘭協議擁護者的主要基礎相反，他作了種種的提議，似乎都在期待壟斷資本家發揮進步的領導作用。這可以，例如，從他贊揚美國製造商協會的戰後計劃，從他對大資本家會提出在戰後時期使工人的工資加倍的計劃寄以希望看得出來。這還可以從他和美國製造商協會在對外貿易問題上的一致看法看得出來：“在這一方面，政府不應比從事出口的資本家本身所要求的做得更多，”——這會使壟斷資本家完全控制這件重要的事情。他還說，他不想對壟斷資本家比他們自己認為需要的加以更多的抑制，——這誠然是壟斷資本家們的理想的處境。

白勞德同志關於壟斷資本在戰後時期起進步作用的錯誤觀念，還從這一點上表明出來：他阻止工人們採取主動去制訂並提出政府的經濟政策，反而期待大企業主提出方案，“他們必須找出辦法，來使他們的工廠開工。”還有，他對兩黨制坦然接受，對究竟是什麼力量構成美國的反動勢力態度不明確，對全國選舉的鬥爭重視不夠，對整個社會主義問題草草地一帶而過。白勞德同志在敘述如何達成一個全國經濟方案的方法時，把資本家放在首位，把工人放在第二位，這可以作為他的壟斷資本進步性——如果不是它的實際領導作用——的新概念的特徵。他說，這種方案必須是，“至少說從兩個最起決定作用的集團方面引起的反對最小：第一是商業家，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以及他們的經理們，這些人實際上指導着全國的經濟；第二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勞動者和農民。”這是本末倒置。

这一整个观点的危險性是，当我们热切覓取“德黑兰”的支持者时，我們可能誤入圈套，企图和“德黑兰”的敌人合作，甚至墮入他們的掌握之中。尾随大資產階級之后乃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錯誤，我們必須对这一点加强警惕。因此，我們的任务不在于追求一个虛妄的計劃，去造成一个包括壟斷資本集团在內的全国团结，而在于懂得：为要实现德黑兰的計劃和希望，我們在現在，在战时，就要团结大多数人民群众去抵抗大資本的势力，而在战后时期，我們还要大大地削弱他們的权力。这种政策，是使“德黑兰”及其对世界所意味着的一切得到成功的根本条件。当罗斯福和华莱士单独提出壟斷資本家来加以抨击时（他們常常这样作），他們不独表达了群众的心声，而且确定了正确的調子。

壟斷資本和德黑兰的决定

德黑兰決議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包含下列各項：（1）开展全面的联合战争，爭取对敌人的完全胜利；（2）确定方針，建立一个最后的各国人民的民主性世界組織，以維持国际和平与秩序；（3）隱含着要制訂一个基本的經濟綱領，来处理严重的战后复兴問題。无数的經驗和明白的现实告訴我們，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美国財政資本真是最不願和美国大多数人民合作的，更不要談它会成为他們的进步領袖了。

首先来看全面的軍事政策。在这方面美国壟斷資本至今不曾有过任何起带头作用的爱国行动，也不能使人相信他們在将来会这样作。反之，已經起爱国主义的領導作用并且将会繼續起这种作用的，是主要团结在罗斯福势力周圍的那些拥护全国团结的成分。若就大部分的財政資本而論，它从战前的綏靖行为开始，在整个战争期間，一直追求暴利，常常公开地消极抵抗

全国作战方案的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特别是国内部分。虽然这些分子显然不希望美国在战争中失败，但他们肯定地不是促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积极捍卫者。大体说来，他们设想的令人满意的战争结局，是一种和德国反动势力协商取得的和平，一般地说，要造成一种情势，使欧洲的一切民主发展受到压抑。所有这一切依然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严重障碍。只有和这些分子作斗争，才能实现德黑兰所定下的谋求真正胜利的政策；在实现这种政策时，肯定不容易同他们合作，更不能由他们来领导。

至于建立一个维持战后和平的世界性组织，像在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所大致规划的那样，美国财政资本家大体上也是同样不可信赖的。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们浸透了反英和反苏的倾向。只是由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他们才勉强赞同德黑兰协议。他们也可能接受某种维持和平的战后世界组织，但肯定不是德黑兰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签字人所设想的那种组织。最多也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预期不会干扰他们心中有数帝国主义积极操纵。在美国，至今为止，为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各国联合组织所施的真正压力和发挥的领导作用，不是来自财政资本的主要势力，而是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理由假设，这种情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改变。

在制订战后世界经济复兴合作方案时（“德黑兰”显然预期能制订这种方案），美国财政资本也是像脆弱的芦苇一般，不可倚靠。虽然我国大资本家可能会接受鼓励世界贸易的一些初步方案，也可能会提供一种鄙吝的紧急救济方案，他们的指导原则却是尽可能地攫取世界市场。他们对开辟新时代的“德黑兰”所赋予的全部意义，大致如此。设想他们会提出一个以我国和全世界的真正利益为基础的广泛的经济计划，那是徒劳无益的。

美国不像捷克斯洛伐克或希腊。它甚至也不像英国。虽然它受到了战争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要比从表面上看起来严重得多，它却会成为战后世界中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着美国的实业巨头不会对人民的利益作出让步，像一些被占领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后者甚至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内阁。美国财政资本没有受到战争的严厉惩戒。它不认为：这次战争是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失败（事实无疑是这样），在此以后，它的任务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采取负责的态度，并和民主势力一道定出一个进步的內政纲领来。它是强大的，贪婪的，侵略成性的。

当美国资本主义瞻望战后世界前途时，它大抵会看到，它的重要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遭到了战争的严重损伤，因而它的帝国主义食欲一定会得到促进。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終了时都将疲惫不堪，英国亦将大为削弱。美国的大资本主义虽然极端畏惧社会主义，但是它认为苏联面临着国内复兴的巨大问题，对它的帝国主义扩张计划不会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总起来看，这儼然是一个攫取市场和战略据点的诱人的机会，我们可以相信，华尔街大亨们是不会忽视这个机会的。德黑兰会议决没有消灭美国帝国主义。战后一届罗斯福政府将同现在一样，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略为受点自由主义控制的政府罢了。然而，如果垄断资本所选定的政党——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美国就将是一个远远更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白劳德同志說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学会和平共处，說（在他的桥港演說中）“英国和美国从前希望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朝一日行将消失不見，它們現在已經把这种希望最后地永远地放棄了，”他真是走得太远了。要想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表现这样一种态度，全看

为拥护“德黑兰”及其前景而集結的民主力量达到怎样强大的程度。

我在《新群众》1943年12月14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扼要地描述了在战后时期，当共和党竞选胜利加强了财政資本的控制时，我們能从后者期望什么。那会危及德黑兰的整个布置和計劃：

一个共和党政府会鼓舞全世界的反动勢力。飞揚跋扈的美国帝国主义重新上馬，会削弱联合国家的基础，播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这样一个政府不会坚持敌人无条件的投降，它不会在欧洲消除法西斯主义，或建立民主政府；它不会忠实地和苏联或英国合作；它会使我們在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退化变质。……如果威尔基当选总统，他也不能在实质上改变共产党的这个根本反动的路綫，即使他想要这样作的話。

拥护溫德耳·威尔基的重要資本家集团在实行德黑兰政策的国际方面稍稍有点倾向自由主义，虽然威尔基在波兰問題上的立場不能令人希望很多。然而，这些集团同大部分的财政資本基本上是一丘之貉，願意奉行后者的主要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这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們对罗斯福怀着共同的强烈仇恨；如果威尔基不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时，他們实际上肯定会拥护任何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除非那是一个露骨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像麦考密克上校之流。在对待威尔基一派勢力的态度上，我們自己的弱点是：太強調了他們的比較表面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对于他們是反动陣营的一部分，他們經常在設法引誘工人离开罗斯福的进步路綫，引誘他們走进共和党的圈套这种更为基本的事实則重視不足。威尔基一派的人会接

受类似胡佛、塔夫脱和杜威之流的反动路线，他们不会和人民大众联合起来跟这些反动分子作斗争。

上述一切表明，在以进步的精神来实现德黑兰的决定时，不能信赖垄断资本的大部分会忠实合作，或起领导作用。只有在民主群众的压力之下，它才会向这个方向让步。反之，我们必须依靠现在主要组织在罗斯福阵营内部和周围的广大民主人士，他们是全国团结的真正骨干。白劳德同志报告中的根本缺点是，他不但没有将这个基本形势阐述清楚，反而倾向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现在在美国历史上最尖锐的一场阶级斗争中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些彼此敌对的力量，即绝大部分的大资本同全国的各个民主阶层，在现在以及在战后时期，都能够而且应当融洽无间地一道工作。

选举中的全国团结

白劳德同志认为垄断资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不但已经是在“民主进步的阵营”中，或者可以吸引到这个阵营中来，去实现德黑兰的决定，而且可能成为这个阵营的领袖；根据这个论点逻辑地推演下去，他对现在正在展开的总统选举中的激烈斗争自然就不予重视。因为，如果美国垄断资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都是忠实地拥护德黑兰决定的，并且可以带头来实现全国的团结，那末，关于选举的结果肯定是没有什麼值得忧虑的。不论哪一方胜利都没有关系。关于选举，白劳德同志不曾提出任何的警告。他不曾以战斗的精神警告美国人民，如果共和党胜利，会带来严重的危险。反之，他在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把两个主要政党差不多看成是半斤八两，而在他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中，在向群众提出党的路线时，对于选举这个重大问题只不过用了

十二行字。就他的一般立場邏輯地推演下去，他對於以無所不包的全國團結的名義去消弭兩個鬥爭着的政黨之間的分歧，比對於喚起全國的偉大民主力量——使德黑蘭的希望變成現實的唯一可靠的人們去從事勝利的鬥爭來，似乎更加感到興趣。

讓我們略為仔細地考慮一下選舉問題。簡單說來，形勢是這樣：在羅斯福當政的十一年間，壟斷資本自然仍舊居于統治地位；它的利潤一直在上升，它的集中程度和實力也極大地增加了，特別是在戰爭時期。然而，壟斷資本覺得羅斯福政府是一個障礙。這個政府事實上（如果不是正式的話）是工人、中等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中比較帶自由主義色彩的階層（由於民主黨在南方的特殊處境）的聯合政府。當1933年頭幾個月的緊急情勢過去以後，絕大多數大資本家開始痛恨羅斯福政府。他們特別攻擊羅斯福政策的國內方面。羅斯福在開頭時從財政資本得到的支持，現在已經大部分失去了。這是因為他的政府對大資本的追求無限制的權力給予了一定的限制。壟斷資本家恨羅斯福政府，因為它不是毫無保留地立刻執行他們的命令的工具；他們恨這個政府，因為它制訂了一些社會立法，還因為它威脅着在第四屆任期中再要制訂一些這樣的立法；他們恨這個政府，因為它為把一千萬工人組織在工會內提供了便利，這就削弱了他們在基本工業中實行“開放工廠”^①政策的強大堡壘；他們恨這個政府，因為他們認為，總的看來，它的戰爭政策和對外政策所包含的民主內容未免太多了。

因此，這一次選舉鬥爭的實質是，壟斷資本企圖破壞羅斯福的自由主義者和勞工聯盟。這是財政巨頭們的一種企圖，要消

① 工會工人和非工會工人都雇用的工廠。——譯者

除在“新政”下使他們感到如此苦惱的政府的和工会的障礙，以便自由伸張，實現他們所懷抱的積極的帝國主義統治。他們在惡毒地進攻羅斯福，企圖從他自己黨內利用他們的法爾利之流和南方的人頭稅納稅人來擊敗他，如果達不到目的，他仍被提名為第四屆總統候選人，那就提出一個共和黨候選人來擊敗他。大資本家在進攻羅斯福時，表現了驚人的團結。儘管他們在確定自己的候選人上還有困難，可是他們在反對羅斯福上是團結一致的。百分之九十的日報以及所有主要的僱主聯合會和保守派農民組織都在斷然地反對羅斯福，這個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在這次嚴重的選舉鬥爭中財政資本的立場是什麼。財政資本的勝利在全世界都會理解為反動派的勝利。美國和國外的法西斯分子 and 所有“德黑蘭”的其他敵人都會歡呼，這次勝利就是他們自己的勝利。

自1864年以來關係最為重大的這次選舉中，作為一個共產黨，我們的責任是擺得很明白的。我們必須全力爭取羅斯福政策的繼續推行，以此作為對德黑蘭決定——包括它們在國內和國際方面的含義——實行有效支持的唯一方法。我們必須明確地告訴人民，誰是他們進行鬥爭的敵人——有組織的大資本——；並動員我們的一切力量，幫助他們在鬥爭中取勝。我們必須喚醒他們注意反動派將要取得勝利這種嚴重的危險，指出資產階級分子的大動員，在軍隊中所進行的有系統的反對勞工的惡毒宣傳，以及對擁護羅斯福的工人和勞動農民所進行的嚴重挑撥。

在政治上動員勞工的力量，並使他們和所有其他擁護“德黑蘭”的民主的、爭取戰爭勝利的力量聯合起來，在選舉中取得對反動派（它的主要堡壘是共和黨）的勝利，這應當成為我們全國

委员会的貫穿一切的任务。但事实上絕對不是这样。根据白劳德同志关于全国团結的新看法，我們反而有在选举中去消弥彼此間分歧的趨勢。这的确会使我們犯下严重的錯誤，即在这次偉大而重要的斗争的火热进行中企图說服美国人民：同在这次选举中他們正在对它作斗争并且必須将它打败的那种势力，即壟断資本家，是有可能达成进步的团結的。

讓我們不要犯下这个严重的錯誤吧——不要以无所不包的然而虛妄的全国团結（同大資本家的团結）的名义，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这些彼此正在斗争的势力的中間人。我們必須明确了解：进步的全国团結的基本力量，主要是集結在罗斯福旗帜下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为帮助他們扩大范围、加强內部团結而斗争。从最近汽車工人會議出席代表选举的剧烈竞争中，我們也許可以吸取一次教訓：由于我們以工会团結的名义采取了中立的立場，以致危險的社会民主派华尔特·路德几乎从争取战争胜利的力量手中赢得了对會議的控制。我們党在全国选举中的影响可以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团結目前陷于混乱状态的劳工群众方面；决不可以采取任何中間的、半中間的或超然于斗争之外的立場，使这种影响归于消失。

战后时期的全国团結

在我国，我們可以期望的战后前景将是怎样？依我判断，那将和白劳德同志所看到的截然不同，他看到的似乎是一个阶级和平合作和社会进步的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壟断資本家实行进步的合作。战后世界建設問題的重大（我国亦将感觉到），及其所包含的阶级利益的尖銳矛盾，不容許有这样一种和諧的进步。

誠然，現在有許多大資本家領袖和組織正在流利地籠統地

談論他們在战后将要創設的优美的經濟条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結束时他們所作的热烈的諾言记忆犹新，全部沒有实现，現在我們不妨把他們的許多乐观的預言坦然地打个折扣，洞察一下他們的真实政策究竟如何。归根到底，这些輕諾寡信的人正在追求一个关系重大的目的，即完全控制美国政府，如果他們能够用狡猾的煽动伎俩来欺騙人民，那就是一笔利市百倍的投資。

实际上，我国大資本家所探求的，主要是建立在复兴工作和新兴工业自发地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对新的国际市場攫夺基础上的长期的战后工业繁荣。虽然遇到危机时，这些分子会迅速地請求国家援助，但是他們一般說来，十分輕視并反对任何试图預先拟訂一个联邦政府計劃来使工业开工和群众受雇。對他們來說，这依然是过多地为了救济失业工人来兴办沒有价值的事业，是对于“自由企业”神秘运用的干預。他們的真正希望，几乎完全寄托在沿着过去所习惯的道路进行的私人所有的企业上，这可以从他們沒有在国会中提出任何的战后經濟方案或将其公布全国一事得到证明。迄今为止，从“四个自由”的一般口号出发，对全国資源計劃委员会的經濟复兴綱領所作的每一个进步的建議，“华格納—莫萊社会保險法案”，重新安置复員軍人的立法，以及总统最近宣布的建筑 34,000 英里公路的計劃和他的新的“权利法案”，都是从拥护政府的力量这个陣营中提出而为壟断資本的主要势力所反对的。

情形将会繼續是这样。在国内，也像在国际範圍內一样，进步的領導不会来自壟断資本。影响深远的經濟綱領，包括为使我們国家不遭受比 1929 年更慘的經濟崩潰所必需的政府对工业規模空前巨大的干預在內，要出自一个真正进步的陣营，即由

工人群众、农民、各个中等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集团所组成的阵营。而要把这些纲领付诸实施，不是靠同垄断资本家很容易地取得一致，像白劳德同志似乎相信的那样，而是靠积极地对他们施加压力。

因此，让我们考虑一下，由于选举的结果，我们面临的情势将是怎样？首先，如果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并力图推行一个进步的纲领，包括德黑兰决定的国际方面，以及在他最近“对全国的报告”中所列举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具体说来，即是他的新的“权利法案”，那末，他肯定会和绝大部分美国财政资本中有势力的集团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现在对这一类措施的激烈反对不会突然冰释，转而采取亲切和合作的态度。既然即使在战争的严重压力下，我们现在尚且远远未能实现全国的团结，难道当这个促成团结的压力消逝以后，我们可以希望得到更多的团结吗？美国大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迹象显出他们是这样来解释德黑兰协议，即从今以后，他们必须自愿地在美国采取进步的纲领。他们依然只是对国内方面或国际方面施加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压力加以应付。在战后的罗斯福政府之下，拥护全国团结的进步民主力量应当、而且必定会设法就他们认为必要的经济纲领尽量扩大同意者的范围，并且还要一般地为我国国家有秩序的进步发展而工作，但是这种愿望并不能使他们避免同财政资本的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

反之，如果杜威、塔夫脱或布里克之流当选，或者甚至是满口自由主义的威尔基先生当选，那末我们可以预料，新政府肯定会企图牺牲人民来使垄断资本更加自由地放手行事。如果成功，这只会造成加强反动势力并危及我国经济前途的结果。这样一个政府的国内经济纲领，最多也不过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上

的一种綱領：期望得到繁荣，并只在重大的压力下，才以最慳吝的方式扩大政府对工人的补助。美国的財政資本不久即将表明：通过战争和“新政”时期，他們所学得的具有进步的經濟性的东西是很少的。大資本家纵然对工会还不曾公开地进攻，却很可能会企图誘騙有組織的劳工参加为資本家自己的利益設計的而不是为劳工和全国的利益設計的加强階級合作的方案，从而使这些有組織的劳工陷于軟弱无力。資本家沒有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們这样做給劳工运动和全国人民带来了如此重大損害的方式。还要考虑到，今天的大企业还保留着对过去十二年中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和劳工联盟的痛苦記憶，他們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这种使他們痛恨的經驗的重演。此外，在大企业主中間，法西斯的精神正在增长，他們也从希特勒学得了一些陰謀詭計，因此，可以預料，壟断資本家在必要时，会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来削弱劳工的力量，并防止任何孚众望的、进步政府再度当政。

在我們全国委员会的會議上，有的代表并非不合邏輯地把白劳德同志的报告解釋为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在战后时期，工会应采取不罢工的政策。有一位代表說（并沒有人去糾正他）：“在战后的长时期內，我們的前景是繼續合作，采取不罢工的政策，沒有階級冲突。”自然，这是无稽之談。这会使工会在它們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德黑兰會議並沒有取消美国的階級斗争。工人們如果在这一类虛妄的前景之下来确定自己的方向，那的确是愚蠢的。面对着战后时期，工会的方針是：从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團結自己的队伍，組織起千百万依然还没有組織的工人，扩大自己的联合政治行动的运动，以便使自己成为民主联盟中的一支真正的力量，同所有其他的民主集团和階級結成最广

泛的聯盟，在未來的全國選舉中擊敗反動勢力，準備好戰後時期的經濟建設方案並為其勤懇地工作，並且一般地加強自己隊伍的力量，隨時準備捍衛自己的組織和自己的生活水平，來抵抗實力雄厚的宿敵——壟斷資本的任何的和全部的進攻。如果我們的黨對於勞工對這些要作的事情的警覺性稍稍有所削弱，就會造成重大的損害。

“自由企業”的口號

白勞德同志說，我們不必就反動派的“自由企業”口號進行爭辯，這從本屆選舉中問題不在贊成還是反對私人所有制企業這種意義來說，他是對的。但當他說，“這樣，‘自由企業’的問題不論從任何意義來說，都不是當前為爭取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控制美國政策而鬥爭的問題，”那就不對了。恰恰相反，“自由企業”是壟斷資本家的主要口號，在這個口號的背后，還有他們一整套的方案。我們不能只是說，“如果任何人想把美國的現存資本主義制度描繪為‘自由企業’，我們覺得也沒有什麼，”從而把這個口號棄置不問。

在強調他們的“自由企業”這個主要口號時，壟斷資本家自然是在企圖把他們毫無根據地指摘羅斯福政府在實行社會主義的話說得娓娓動聽。但他們也力圖作得比這更多一些。在這個口號裡面，包含着他們要重新獲得對政府無限制的控制、削弱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和一般地使壟斷組織放手行事的全部決心。

這個口號的經濟實質是：主要依靠長期的工商業繁榮來解決我們的國民經濟問題，把臨時擬訂的政府工程計劃和對於工人和農民的補助只看作是緊急措施。這樣，參議員塔夫脫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說：“實質上，充分就業必須

通过自由企业去恢复和維持，政府的援助只能局限在证明为絕對必要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說，只有当經濟危机在我們头上爆发以后，我們才可以期望得到殘缺不全的和非常吝啬的政府工程和救济計劃。“自由企业”的口号正像“新政”一样明确地代表着一个具体的方案。因此，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口号，在群众心目中就意味着接受还是不接受在它背后的那个方案。

因此，很明显，我們不能仅仅把大企业的“自由企业”这个主要口号推到一边，把它看作只不过是一种煽动而置之不理。反之，我們除了暴露这个口号的煽动作用以外，还必须揭露它的反动的經濟内容和政治内容。只有在提出进步势力的方案的基础上，才能办到这一点。在提出这种方案时，不能把社会保險和政府刺激工商业的問題当作只是在危机时期应用的紧急的权宜措施。如果我們想要保证自己不致在势不可当的經濟危机中惨遭复灭，如果我們对現在人人都在那样流利地談論着的充分生产和全体就业問題即使只不过是提出一种着手来解决的办法，我們也应当把这些作为主要的步驟来提出。进步的、贏得战争和贏得和平的力量所提出的对抗反动的“自由企业”口号（或反动派的无限制的壟断方案）的方案，現時并不包含对銀行、铁路或其他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要求，在战争剛剛結束以后的情势下也不会包含这种要求。但在这次战后，全世界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也不例外）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肯定会終于使这种要求成为必要，并得到广泛支持。

* * *

在两党制問題上，我认为白劳德同志只談“两党制的森严壁垒”，也把这个問題太輕易地放过了。他同意“全国的一般意見，认为这个‘两党制’为在基本上保持民主权利提供了充足的渠

道，”因此留下了这种印象：共产党人不再超出现有的两党陣綫以外来看問題，甚至到最后也不会改变。

依我看来，在这种表述中对人民民主群众的政治主动性估計过低了，而对他們会长期接受两大政党的资产阶級领导則估計过高了。虽然在美国形成一个新政党的时机还远远沒有成熟，但决不是永远沒有这种可能性。我宁取菲利浦·墨萊在最近一期《美国杂志》中的提法，他說，美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不容許組織一个第三党。

社会主义問題

像白劳德同志那样提出对我们党作这样一种路綫上的根本改变时，我以为他关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問題的态度应当有更充分的說明。白劳德同志說，在美国，社会主义不是战时的問題，也不会成为紧接战争之后这个时期的問題，因此，現在提出这个問題只会使贏得战争胜利和一般地实现德黑兰决定所必需的全国团結的基础变得狹窄，他这样說是对的，虽然如此，对社会主义仅仅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还有所不足。我們还必须闡明我們积极的立場。

我們不可忘記，虽然社会主义不会成为战后初期美国的政治問題，它却将要成为一个对群众是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兴趣、对群众发生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問題。其所以是这样，除了欧洲有些国家在战争結束时可能采行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苏联在这次战争中表现了使全世界震惊的社会主义威力和成就。被紅軍从希特勒暴政下拯救出来的世界各族民主人民怀着惊愕、感激和极端好奇的心情来看待这种偉大的表现。他們第一次开始透过这許多年来如此用心地

建筑起来反对苏联的偏見长城看事物。他們怀着极大的兴趣，并且抱着日益客观的态度，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偉大的、嶄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强国。現在已經有一批对苏联表示友好态度的新书出版，这是群众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感到兴趣这件新事的最初的象征。随着战后复兴时期的发展，我們可以預期苏联会表现出跟它現在在軍事方面的表现同样偉大的“奇迹”，因而群众的这种兴趣一定是会增长的。战后群众会对社会主义感到巨大兴趣的第二个根本理由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的严重破坏，将要有这样的明确趋势：所有各国人民都要向苏維埃制度学习，并把他們从显然已經成功并正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苏联所能学到的那些特点应用来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在新的世界情势之下，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一整个問題将被提出来进行新的討論。

有鉴于这一切，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显然不能只是抱着消极的态度。我們必須教育工人們，使他們了解我們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以及这种发展和美国的关系。當我們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我国現在的問題时，我們还必须表明：它却是我国困难的唯一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如果我們不这样作，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自由自在地冒充社会主义的政党，其結果会有損于我們的党，有損于贏得战争胜利、贏得和平的力量的整个斗争。

* * *

显然，白劳德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問題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表明他根本离开了我們过去的关于全国团结的看法。在代表大会前夕的討論（这种討論現在正在开始）中，这些問題是值得加以深思熟虑的。战争震撼着全世界，摆在我們面前的

战后問題又是如此龐大和复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們党在拟訂自己的政治路綫时，必須加倍地审慎。我个人深信，如果我們对已由全国委员会採納的白劳德同志的报告給以这样密切的注意，我們会看出，必須大体依照这封信内所提出的几个要点来对它加以改变。

你們的同志，

威廉·澤·福斯特

威廉·澤·福斯特附注

上面这封給全国委员会的信，已被政治委员会在1944年2月8日举行的扩大会議拒絕接受，出席这次會議并投票的，約有40个負领导責任的党员。白劳德同志不是把根据我这封信来重新审查政治方針作为这次會議的主要問題，而是提出保全党的团結来作为这次會議的主要問題。經過一天的討論以后，除了达西和我自己以外，所有出席的人都投票反对我这封信。

遭到了这次严重的挫折，并且看到白劳德同志已明白地决定压制一切公开的反对，他的这种态度又由于政治委员会扩大会議絕大多数投票反对我的信而更加强硬，我得出結論，如果我在当时試圖向党员們提出这个問題，那是愚蠢的。因为这样作时，会削弱我們支援战争的一般工作，破坏我們当时的大規模征求党员的运动，严重地妨害我們重大的全国选举运动的开展，也許还会造成使我們党分裂的結局。

因此我决定把我的反对只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們中間提出，我在以后的一年半中遵循这个方針，作出了无数的批評，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建議，写出了許多篇文章，如此等等，一切均

以消除白劳德同志的机会主义錯誤为宗旨。我深信，政治情勢的发展和我們領導机关所受的共产主义的訓練，最后必定会使我們党回到一个健全的政策路綫上来。

将会看到，在我給全国委员会的信里，沒有討論到解散共产党或将其改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問題。

当白劳德同志提出这个办理結束的步驟时，政治委员会有几个委員表示反对，我自然也反对，并投了反对票。虽然有这种反对，白劳德同志还是能够使它通过了。当我把这封信送到全国委员会去的时候，事情已經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我认为把党改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实际上已是既成事实了。这已經公开宣布，并在全国委员会的一月會議上得到批准，事实上党已处在改組的初步阶段。因此，我觉得进一步討論这个問題暂时是沒有希望的，那只会在我們的队伍中造成无謂的斗争和混乱。因此在我給全国委员会的信中根本就沒有提这个問題。我当时认为，我当前的任务，是在帮助使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事实上繼續成为共产党，如果在名义上不是这样的話。

論美国共产党的解散

雅各·杜克洛

从法国共产党理論刊物《共产主义手册》

1945年4月号轉載。

《共产主义手册》的許多讀者要求我們对美国共产党的解散和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創立加以解釋。

关于这个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我們已經得到一些情报，因此我們能够就提出来证明解散共产党确屬必要的那些政治上的考虑，十分直率地表示我們的意見。

在美国解散共产党和在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中采取“新方針”的理由，已在美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及其前任書記埃尔·白劳德的某些演說中列举出来。

埃尔·白劳德在他1943年12月12日在桥港所作并在《共产党人》杂志1944年1月号刊登的关于德黑兰會議的結果和美国的政治局勢的演說中，第一次討論了改变美国共产党方針的必要性。

白劳德以德黑兰會議为出发点，形成了他的贊成改变美国共产党方針的一套想法。他強調德黑兰會議对贏得反法西斯德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这是对的，然而他却从會議的决定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这种結論决不是从对局势作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

得出来的。埃尔·白劳德变成了关于一般社会发展方式、而首先是美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一种錯誤观点的倡导者。

埃尔·白劳德实际上宣布了，在德黑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經开始找到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他还說，德黑兰在共同政策方面的協議同样包含了一种共同的努力，使得在解决各国的內部問題时，要把力量对力量的斗争和对抗方式减到最低限度，或完全禁止不用。

这(德黑兰宣言)是在我們的时代使文明繼續存在的唯一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接受、拥护和相信德黑兰宣言，并把它变成我的关于我国和世界問題的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在康涅狄格州桥港的演說，1943年12月12日。)

从德黑兰會議的决定出发，埃尔·白劳德作出了关于世界問題，特别是关于美国內部形势的政治結論。其中有一些是主張，美国內部政治的主要問題在将来必須完全用改良的方式去解决，因为“預期将发生无限制的內部冲突，这也威胁着德黑兰所提供的国际团结的前景。”(《德黑兰和美国》，第16—17頁。)

德黑兰協議对埃尔·白劳德意味着，苏联以西的絕大部分欧洲大概将在资产階級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法西斯资本主义或苏維埃的基础上重新組織起来。

但那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每个国家有完全的民主自决权这个原則所造成的，要让所有进步的和建設性的力量在每个国家之內能够充分表现；让民主和社会进步能按各族人民的不同願望来发展，不受阻碍。这意味着，欧洲的前景是：在这次国际战争以后，內战的威胁将减到最低限度，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完全消除。(桥港演說，《共产党人》，1944年1月号，第7頁。)

埃尔·白劳德还說：

不管其他国家的形势将是怎样，在美国，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前景：在战后即来的时期中，在現存制度的体系內，生产和就业扩大，民主加强；而并不意味着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

我們可以把实现德黑兰政策作为我們的目标，我們也可以把推动美国立即走向社会主义作为我們的任务。然而，我們显然不能同时兼取二者。

第一种政策困难虽然很多，但肯定是在可能实现的領域以內。第二种政策的确是沒有把握的，尤其是当我們記得，即使劳工运动中最进步的派別也是傾心于資本主义的；他們甚至不像英国工党那样具有模糊的社会主义意識。

因此，美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应当是：面对美国战后資本主义的复兴前景及其一切后果，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审查所有的計劃，并和国内最民主最进步的大多数积极合作，形成足够广大和有效的全国团结，去实现德黑兰的政策。（《德黑兰和美国》，第 20 頁。）

为了实行德黑兰的政策，埃尔·白劳德认为必須改造美国的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

在美国，無論是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集團，哪一個人，哪一個政黨，都必須使自己适应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給我們提出的政策中所体现的这个重大問題。至今为止，全国不过刚刚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無論是哪一个人都必须着手来从它得出結論，并使自己适应于它所創造的新世界。作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寻找我們的道路的指南，陈旧的公式和古老的偏見对于我們行将毫无用处。我們將不得不把具

有足够智慧而能看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能懂得我国的命运和全世界文化的命运都系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的一切人和一切集团都聚拢起来。

我们将不得不准备同任何拒绝拥护德黑兰协议和英苏美联合及拒绝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人决裂。我们必须准备对为实现这个联合而奋斗的无论哪一个人伸出合作和友谊之手。如果伊·普·摩根支持这种联合政策，并且彻底赞同的话，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紧紧同他握手，并且同他一起来实现这个政策。阶级的营垒或政治的集团，除了反映这个问题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方面以外，在现在已经毫无意义。（桥港演说，《共产党人》，1944年1月号，第8页。）

白劳德所说的涉及摩根的话，在美国共产党党员中引起了十分剧烈的反对。在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解释这种想法时，白劳德说：

……我并不是在绝口否认阶级的差别，我只是否认“阶级对抗阶级”这个政治口号在下一个时期中可以作为我们的政治力量配置的指南。我谈到摩根先生，是把他象征地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我是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德黑兰和美国》，第24页。）

白劳德指出，在美国要造成一个广大的全国团结，共产党人就必须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共产党组织必须和那些重要得多的力量结成一个长期的联盟。根据这种考虑，白劳德得出了结论：美国共产党组织应当改变它的名称，取消“党”这个字，采用另外一个更加确切地反映其作用的名称，一个他认为和

美国的政治傳統更加适合的名称。

埃尔·白劳德提議称这个新組織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美国傳統的两党制中，它不作为一个“党”来参与，这就是說，它不在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既不参加民主党，也不参加共和党，只在所有各党之内为形成一个广泛的进步和民主运动而工作。

白劳德在他向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所作的报告中，詳細談到了战后美国的国民經济問題，以及这些問題在各个不同階級的合作和团結的基础上求得解决的办法。白劳德指出，美国的商人、工业家、金融家、甚至反动的組織都不承认战后在美国有发生一次新的經济危机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他們都认为战后的国民經济能够保持和維持同战时一样的生产水平。

然而，問題是在于如何克服从战时經济活动轉到平时生产的困难，以及如何使国内和国外市場吸收現時由美国政府采购以供軍需之用的价值 900 亿美元的額外商品。在这一点上，埃尔·白劳德断言：德黑兰會議的决定使得有可能克服英美在对外輸出上的竞争，而美国政府在取得它的各大盟邦同意并在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参加之下，能够建立一系列大規模的經济联合組織，从事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个落后地区和被战争破坏的地区的开发。

在扩大国内市場来吸收价值 900 亿美元商品的一部分方面，白劳德提出要使一般消費者的购买力增加一倍，特別是用增加工資的办法。

馬克思主义者不打算用提出任何相反的口号去对抗“自由企业”口号的办法帮助反动派。如果任何人想把美国的現存資本主义制度描繪为“自由企业”，我們觉得也沒有

什么，我們坦白地宣布，我們准备实行合作，使这个資本主义在战后时期运用有效，人民的担負減到最小。（同上书，第 21 頁。）

其次，白劳德主張，我們再不能靠实行以旨在反对壟断組織和大資本的口号为基础的政策，去达到全国团結。

今天，认真地談論大大削弱壟断資本，以粉碎它的权力为目标，并且是違反它的意志来加在它的身上，这只不过是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种方式。（同上书，第 23 頁。）

在他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 年 1 月举行的全体會議所作的閉幕詞中，白劳德试图为自己找出“理論的”根据，来证明改变美国共产党的方針是必要的。他还表明了他的关于馬克思主义的看法及其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应用。

白劳德以为，通过宣布解散共产党和創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美国共产主义者是在遵循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在解决史无前例的問題，并表明馬克思主义理論应当如何应用于实际。

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是一系列的教条和公式；它从来不是一张禁单，列举我們不可以作的事情，而不問新的发展和新的形势；它沒有告訴我們不能作的事情是什么；它告訴我們怎样去作那些应作的事情，那些历史已作为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任务提出来的事情。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理論，而不是不要去作什么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創造的力量，而其所以是这样一种偉大的社会力量，正是因为，作为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論，它以活生生的现实作为它的出发点。它永远把过去的科学知识看作是处理現在和将来的新的和沒有前例的問題的基

礎。而今天最大的問題，從一種非常根本的意義來說，是一個新問題。

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使自己重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傳統，使自己完全擺脫用教條主義和三段論法來處理問題的殘迹。……

誠然，根據過去所有的教科書，我們是在脫離正統主義，因為我們的教科書沒有一本曾經預見到或預言過，在社會主義普遍降臨以前，世界上會有一個長時期的和平關係。（同上書，第43—45頁。）

白勞德所擬訂的新的政治方針，在美國共產黨的主要戰士中只有少數人反對。在黨的政治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激烈反對白勞德的是美國共產黨主席威廉·福斯特，和中央委員會委員、東賓夕法尼亞地區書記達西。

福斯特在兩個文件中說明了他和白勞德的分歧之處：即在他給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和在他對全國委員會1944年2月8日的特別會議所作的開幕演說中。

在這兩個文件中，福斯特批判了白勞德關於美國壟斷資本的性質已經改變和關於戰後經濟發展前景的論點，以及他在總統選舉問題上的立場。

在他2月8日的演說中，福斯特還抨擊了那些根據白勞德的論點，提出要在戰後時期正式放棄罷工的人。

但在兩個文件中，福斯特都沒有公開採取反對解散共產黨的立場。

白勞德同志企圖把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應用於美國，他在報告中描繪了這樣一幅全國團結的前景，不但在戰時，而且在戰後，包括美國財政資本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在內

的全国团结将会顺利实现；这种团结会使（引证《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中的话，他必首肯）“可怕的战争创伤得到迅速医治”，并且会在所有各阶级的和平合作下，在“悠久的年代”中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这幅图画里，美国帝国主义简直是消失了，阶级斗争的痕迹都很难找到了，而社会主义则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福斯特给全国委员会委员们的信》）

福斯特激烈地批评白劳德，因为后者在提出美国共产党活动的新方针时，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由我看来，白劳德同志对资本主义的相当乐观的看法是从两种错误产生的。第一种错误是，对战争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刻化估计不足。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中当面被质问时，白劳德同志同意资本主义已为战争所严重削弱；但他的报告倾向于包含一种相反的意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资本主义不知怎样已经返老还童，并且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扩大和成长的新时期。（同上。）

根据福斯特的意见，世界资本主义在战后肯定能够期望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但设想资本主义，即使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够使自己维持在战时达到的生产水平上，能够用工人阶级或多或少能够满意的方式来解决战后产生的复杂问题，那是错误的。

福斯特没有降低德黑兰会议的重要性，然而他认为，设想“德黑兰”已经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本性有任何改变，设想德黑兰会议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像从白劳德的演说中所看到的一样，那是极端危险的幻想。资本主义已学会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并结成联盟这一事实，远远没有意味着：美国壟断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进步起来，从今以后就能够把它毫无保留地包括在全国团结

之中，为实现德黑兰會議的决定而奋斗。

福斯特断言，帝国主义的資本主义的階級本性是反动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和它結成全国的团結。这些集团对民主的罗斯福政府进行凶恶的进攻——这不是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嗎？在这以后，对于美国壟断資本家集团是德黑兰决定的敌人，而不像埃尔·白劳德所想的那样是德黑兰决定的朋友，难道还有人会怀疑嗎？^①

这一整个观点的危險性是，当我们热切覓取“德黑兰”的支持者时，我們可能誤入圈套，企图和“德黑兰”的敌人合作，甚至墮入他們的掌握之中。尾随大資產階級之后乃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錯誤，我們必須对这一点加强警惕。（同上。）

福斯特还批判了白劳德对待美国制造商协会的态度，他认为这是美国壟断資本的最反动的組織之一。然而白劳德觉得他不得不贊同这个組織的某些經濟措施。他接受它的“自由私人企业”这个中心口号，这个口号在实际上是根本反动的，是和罗斯福的政策相反的。尤有甚者，白劳德指望战后的工人工資将要增加一倍，請求美国壟断資本家也来怀抱他的这个善良意图，并且对他们說：“〔你們〕必須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保持他們^②的工厂开工。”

引证了白劳德的这些話以后，福斯特宣称：

依我看来，如果劳工运动接受（即使只是暫时的）这样一个計劃或这样一种想法，对它也是一种灾难。从美国壟断資本主义能起进步作用这个臭名昭彰的錯誤观点出发，

① 这一段在前面福斯特的原信中没有見到。——譯者

② 也应改成（你們）。——譯者

白劳德同志对所有旨在抑制壟断組織的建議側目而視，然而共产党只能接受一种政策，即在現時和战后以控制这些大資本家为目标的政策。在号召各个階級合作时，白劳德在工会會員心中散播了尾巴主义的錯誤幻想。而工会的任务則是制定它們的政策，并向大企业主宣布执行。^①

关于战后的組織問題，福斯特擯棄了关于壟断資本自命为起进步作用的一切幻想。福斯特宣称，美国在战后将为一个世界强国，实业巨头們将趋向于独裁的行为而不会趋向于妥协；他还說，我們很难期望他們会提出一个进步的方案。

若就大部分的財政資本而論，它从战前的綏靖行为开始，在整个战争期間，一直追求暴利，常常公开地消极抵抗全国作战方案的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特别是国内部分。虽然这些分子显然不希望美国在战争中失败，但他們肯定地不是促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积极捍卫者。大体說来，他們設想的令人滿意的战争結局，是一种和德国反动势力协商取得的和平，一般地說，要造成一种情势，使欧洲的一切民主政府^②受到压抑。（同上。）

福斯特认为，当白劳德說，社会主义問題不是現在战时的爭論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只会使全国团結的体制受到限制时，他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苏联的成就将使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增加这一事实，共产党人必須向工人說明我們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不然的話，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自命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

要把德黑兰的决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完全付诸实

① 原文沒有注明出处。——譯者

② 前面第 11 頁原信为“一切民主发展”。——譯者

行，就要求有最广大的全国团结，在这个团结中必须有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小工商业主以及所有忠实拥护这个纲领的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同上。）

福斯特给全国委员会的信，和他在全国委员会 1944 年 2 月 8 日特别会议上反对白劳德路线的演说，引起了出席者的猛烈抨击。大多数发言人不接受福斯特的议论，拥护白劳德所定下的美国共产党的“新方针”。

达西在会上发言反对白劳德时说，依他的意见，福斯特演说的目的不在削弱白劳德的权威。像福斯特一样，达西激烈批评白劳德对德黑兰决定所作的解释，并且断言，不应当把参加德黑兰会议的三大强国的政治协议看成是关于战后主要经济问题的一种协议。

随后达西被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以福斯特为首的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开除出党，因为，如决议所说，他给党员们散发了一封诋毁党的领袖们的信，企图以此在党内造成分裂，还因为他把这封信交给了资产阶级的报纸。

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开过以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在地方代表大会中，以及在党的报刊中展开了关于白劳德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讨论。

根据《工人日报》发表的消息，党的组织和地方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之后，全体一致接受白劳德的建议。至于福斯特，他在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称，他不想使自己同白劳德的意见分歧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外的人知道。

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944 年 5 月 20 日举行）听取了白劳德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表明了他的关于美国政治形势的意见，并提议在美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中采取一个新的方针。

白勞德在提出关于解散美国共产党的決議时宣称：

1月11日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为了全国团结并使共产党人在已经变化的政治情况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对赢得战争胜利和获得持久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起见，曾建议美国共产党人应当放弃党派利益的目的和政党组织的形式。……

为了这个目的，我以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并经过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各个代表团协商，提请采纳下列动议：

我现在提议，美国共产党就此宣布解散。……（《会议记录》，第11页。）

接受了解散共产党的决议之后，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这次大会是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成立大会，并通过了—一个加在协会章程前面的纲领性序言。序言中说：

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是美国人的一个非党组织，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发扬华盛顿、杰斐逊、潘恩、杰克逊和林肯的传统。

作为美国人民中民主多数的一个先进部分，它有效地应用民主的原则，来解决今天的问题。

它拥护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拥护美国的民主成就，反对人民自由的一切敌人。

它是在全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斗争中形成的，它的组成是由于全国的战时需要；它认识到，自由人民对法西斯主义取得的胜利将造成新的更有利于进步的形势；它指望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联合所领导的自由国家大家庭将创立一个世界和平，生产和经济福利扩大，所

有人民不問其种族、信仰或肤色均能得到解放和平等的时代。

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馬克思主义的原則，这是人类思想精华和一百年来劳工运动經驗的遺產，这些原則已被证明为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独立所不可缺少的；它期待着这样一种未来：通过美国人民的民主选择，我們自己的国家将解决由于生产社会性与其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而产生的問題，用适合美国傳統和美国特点的方式和方法，把堪称整个人类最有用的成就的教訓体现出来。……（序言，《會議記錄》，第 47—48 頁。）

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一个主要的政治決議，“以胜利、安全和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全国团結”。

決議指出了德黑兰會議的决定对战胜侵略者和奠定持久和平的极端重要性。它号召加强全国团結，作为实行这些决定的必要条件。

全国团結指的是所有爱国力量的团結，从共产党人，劳工党党员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党员都在內。所有思想上的、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歧都必须服从于这个团結。決議強調 1944 年选举的极端重要性，国家的团結和命运全看这次选举的結果如何。決議承认工人阶级在全国团結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承认它的日益增多的活动和它的政治影响。

決議严厉批評了杜邦、赫斯特、麦考密克领导的那些集团所奉行的反动政策，指出这种政策是亲法西斯的和叛国的，并号召美国人民为反对这些集团而斗争。

決議其后說，美国大多数人民还不曾深信有必要用实行大企业国有化或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对社会和經濟問題作更

根本的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任务是在于，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内求得较高水平的生产。为此，私人企业主必须接受解决生产和劳动就业问题的一切可能的办法。并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和美国人民购买力最大限度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相关联的。如果私人企业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政府就必须负起责任来。

决议表示反对反犹太运动和对黑人的歧视，要求宣布“第五纵队”为非法，并禁止后者提出的同侵略者协商来取得和平的号召。

决议最后说：

因为由所有各阶级（从工人到资本家）的爱国力量所组成的全国团结阵营，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并依靠这个阶级的，后者是国家及其赢得战争胜利的联盟的骨干和动力。……它要求扩大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各个铁路兄弟会的劳工联合行动。它要求最坚决地扩大劳工的政治主动性和影响，使劳工充分地适当地参加政府。……

……作为爱国的美国人，我们共产主义者重新向全国提出庄严的保证：我们要使一切服从于取得战争胜利和摧毁法西斯主义。……（《决议录》，第7页。）

除了关于“全国团结”的决议之外，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成立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其他的决议：关于由战时生产过渡到平时生产的决议；关于国际工会团结的决议；关于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工资政策的决议；关于复员军人的政治生活的决议；关于妇女工作的决议；关于农民的决议；关于南方各州形势的决议；关于禁止征收人头税的决议；关于为反对反犹太运动而斗争的决议；

关于西半球国家团结的决议和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 25 周年纪念的决议。

大会一致选举白劳德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会长。

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成立大会发出了给斯大林同志和红军的信，其中特别说到：

在美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中，在我们伟大国土上的所有工厂和农场中，属于一切阶级的男人们、妇女们和儿童们都以惊奇和深深感激的心情谈论苏联及其英勇红军的英雄成就。自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野蛮的和背信弃义的共同法西斯敌人侵犯你们的边疆以来，每一天有更多的美国人开始了解和爱慕你们的领袖和你们的人民。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以及它的强大的红军不仅为我们伟大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所赞扬，而且为我们的工人、农民、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艺术家、科学家和青年人所赞扬。希特勒分子的绥靖者和我们共同胜利的敌人一直在企图以希特勒所谓“苏维埃妖怪”来吓唬我们，但他们并没有能蒙住我们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现实。你们的行动天天都在发出权威的声音，浸没了他们的恶毒言语。

当你们强大的部队举行无情的攻击，把纳粹驱逐出你们的国土之外，使你们对法西斯敌人的共同的和最后的胜利之日更加临近时，我们就越加意识到我们对你们，对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领袖、战士和人民负债之深重。你们已经解放的城市和乡村的名字每天都在我们的口边，斯大林的名字和你们的无数英雄的名字深深镌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人民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懂得，为什么是你们这个国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的艺术和科

学中向全世界作出了这样一种团结、英雄主义、个人主动性和一种新的纪律的史无前例的榜样。

所有富于爱国心的美国人都坚决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及其主要的联盟——我国、苏联和英国联盟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联盟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他们坚决要在未来的和平时期继续维持并加强这种联盟，并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扩大友谊，这将巩固我们两大强国的联合，作为胜利、民族自主和持久和平的支柱。（《给斯大林的信》，见《会议记录》，第13—14页。）

在举行成立大会之后，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解释协会的目的和任务的运动。

白劳德在他的一篇演说中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解散了共产党，放弃了所有促进党派利益的目的，并把自己重新组织成不带党派性质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并愿意同任何的和所有的把战争胜利放在第一位，并依照我们提出的解决我国战后问题的最低纲领而行动的美国人实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使自己和其他任何政党联合一道，而宁愿和所有政党中最富远见的人们联合一道。（《战争和选举》，载《工人日报》，1944年6月18日。）

在解释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作用时，它的组织书记威廉逊宣称：

关于协会的作用，我们强调：这意味着在全国、各州和地方组织的基础上，在政治教育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加倍地增加和改进工作。我们必须使人们了解我们是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对摆在人民面前的复杂

的政治問題能提供正確的答案。協會的會員隸屬於所有一切類型的群眾性組織——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友誼的，等等——并在其中積極活動，而協會則將以它自己的名義就所有的問題和政策勇敢地、主動地發表意見。（威廉遜，《會議記錄》，第 55—56 頁。）

自從開過成立大會之後，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實際活動是從屬於當時的主要任務：積極參加 1944 年的選舉運動。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國大會一致支持羅斯福先生為總統候選人。在他們的發言中，白勞德和協會的其他領袖以協會的名義擁護羅斯福先生當選為第四任總統。協會的各州區域組織和地方分會進行了積極的宣傳運動，擁護羅斯福先生以及贊成羅斯福先生的國會議員候選人。

在 1944 年 9 月 25 日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紐約分會召開的紀念美國共產主義運動 25 周年的大會上，白勞德說：

……每一個集團，不管它多么小，正像每一個人一樣，都有同樣崇高的責任來對勝利作出自己的充分的和無保留的貢獻。我們不僅必須貢獻我們的生命，而且還必須準備犧牲我們的成見，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我們的特殊利益。我們美國共產主義者已經率先奉行這條規則。

我們知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想要在共產主義和反對共產主義的問題上使聯合國陷於分裂；我們知道，敵人想要在这次選舉中就這個問題使美國陷於分裂，從而為我國退出戰爭和達到一個妥協性的和平準備條件。因此，我們以此作為自己的特別重大的任務：使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在这次選舉運動中不致直接地或間接地以任何方式成為一個問題。

为此，我們毫不迟疑地牺牲了我們在这次运动中的选举权利，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选人；我們甚至解散了共产党，直到无限期的将来；我們宣布，我們准备忠实地拥护美国絕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現存私人企业制度，不提出能以任何方式危害全国团結的任何根本改革的建議；我們走到工会和人民群众中去，直接痛快地、坦白地利用我們的一切影响来坚决树立这个全国团結的政策；我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抑制工人中举行罢工运动的一切冲动，并对工人进行工作，使他們在战后繼續維持全国团結。……

作为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发言人，我可以代表我們这个小小团体說，在这次拥护罗斯福和杜魯門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中，我們自己同我們的国家、同我們国家的利益以及同我国的多数人民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十分了解，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是一个資本主义的美国，而罗斯福的使命之一，也正在維持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我們知道，在可以預見的将来，只在我們国家遭遇到重大的灾难时，我国的这种前景才能有所改变，从資本主义的前景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前景。只在不能坚持作战到底以取得胜利时，或对和平笨拙从事而未能組織成功时，或使我国陷入另一場像胡佛时代那样的經濟灾难时，才能使美国人民轉向社会主义。

我們不想美国遭到灾难，即使它能导致社会主义。如果我們这样想，我們就会拥护杜威、胡佛、布里克以及他們的一派。我們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把軸心国及其一切伙伴从世界上消灭掉。我們想要有一个为了世世代代的和平而組織起来的世界。

我們想要我國經濟全部發揮作用，能够供应已經大大擴張的世界市場，以医治世界的創傷；能够供应已經大大擴張的反映國內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國內市場；我們想要在繼續維持全國團結中，有秩序地、合作地、民主地解決我們的國內關係和階級關係，這將減少并最后消滅大規模的國內鬥爭。……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共產黨人，甚至像我們偉大的共產主義祖先在 1860 年和 1864 年擁護亞伯拉罕·林肯一樣，要在 1944 年擁護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作美國的大總統。……

在對待蘇聯的態度上，白勞德對蘇聯在聯合國體系中的作用，對它在最后摧毀希特勒德國以及在戰后建立持久和平的工作中的作用予以極高的評價。白勞德不只一次地強調指出，由列寧和斯大林創立的蘇維埃國家是把世界從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來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號召要使所有的美國人懂得使蘇聯變成偉大和強有力的列寧斯大林主義理論的全部智慧。

從組織方面來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機構如下：基層組織細胞是各地分會，每月舉行全體會員大會一次。在會員大會不開會時，分會所計劃的一切工作由其委員會執行，后者由最積極的會員組成。分會隸屬於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地區總會。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領導機關為全國委員會，由協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任期二年。大會選出的協會會長和 11 個副會長組成協會的常設領導機關。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成立大會提出保持民主集中制為協會的組織原則。協會組織書記威廉遜對大會解釋協會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運用如下：

……虽然保存了同一个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协会性质相容的机构和最低的組織要求，我們却必須給予下級組織更大的自治权，強調民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路通行的孔道，消除一切組織上的硬性。（威廉逊，《會議記錄》，第58頁。）

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章程，其中規定，每一个願意加入协会的人要接受它的綱領和它的路綫。在解釋什么人能加入协会时，《工人日报》写道：

我們对新申請作为党员的人只能要求他忠于所有工人均已能够了解的原则，献身于今天行动中最基本的义务；再加上有研究綱領、历史和理論的意願和热忱，这些东西將使他們成为完全的共产党人。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在反对納粹奴役的人类战争中去战斗、去牺牲的意願，这是加入共产党的首要条件。（迈納尔，《工人日报》，1944年2月。）

据白劳德宣布，美国共产党在解散时有80,000党员，军队中的10,000党员尚未計算在內。根据大会決議，所有美国共产党党员都是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会员，并且必須在1944年7月4日以前进行登記。依《工人日报》报道，到1944年7月16日为止，已登記的不到45,000人。

人們不必对白劳德在解散美国共产党和創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上的全部立場进行仔細分析，不必对这种立場作全面的批評，就可以从它得出下面的結論：

1. 在白劳德领导下实行的方針，已經在实际上使美国工人階級的独立政党归于消灭。

2. 虽然他們也宣布承认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人們从白劳德及其拥护者方面看到的却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丑恶昭彰的修

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下述的观点：美国会有长期的阶级和平，有可能在战后时期制止阶级斗争，并建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协调关系。

3. 在将同盟国政府的一个外交性质的文件德黑兰宣言变成美国战后时期阶级和平的政治纲领时，美国共产主义者根本歪曲了德黑兰宣言的意义，他们正在散播危险的机会主义幻想，如果他们不遇到必要的回击，这种幻想将予美国劳工运动以不良的影响。

4. 根据迄今已经得到的消息，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并没有赞同白劳德的立场，有些共产党（例如南非联邦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已经公开反对这种立场，而有些南美洲国家（古巴，哥伦比亚）的共产党则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正确的，并且一般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要点，可以根据来判断美国共产党的解散问题。法国的共产党人不难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方法，来考查用以证明解散美国共产党为必要的那些理由。人们可以肯定，像南非联邦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人一样，法国共产党人不会赞同白劳德所遵循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已经危险地背离了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后者的严格的科学应用只能引导到一个结论，那不是解散美国共产党，而是在顽强斗争的旗帜下，努力使之加强，以击败希特勒德国，并在所有的地方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扩张。

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不会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内全部自动进行登记，这一事实表明共产党的解散已经引起了不安，这是十分正当的。

在美国，万能的托拉斯已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例如，大家

知道，美国前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已经斥责他们的罪恶行为和他们的违反国家利益的政策。

在法国，我们也是全国团结的坚决拥护者，我们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表明了这一点，但我们的渴望团结，并不曾使我们有一时一刻忽视：必须整飭自己的队伍，去反对托拉斯的人。

其次，人们可以注意到，在白劳德关于壟断企业国有化问题和他所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声明中，是有某种混乱存在的。

同某些人所轻信的正相反，壟断企业国有化事实上决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成就。不，国有化只不过是一种民主性质的改良；不预先夺得政权，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不可设想的。

每一个人都能了解，美国共产党人是想要为达到他们本国的团结而工作的。然而比较不容易了解的是：他们所想见的全国团结问题的解决，竟是在于得到托拉斯的人的善意支持，并且在一种仿佛牧歌式的情况下，似乎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奇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能够改变它的本性。

说老实话，我们的意见是：解散美国共产党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白劳德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不是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适当应用。关于美国阶级矛盾消失的预言，同对形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毫无共同之处。

至于说因为有必要不直接参加总统选举就必须解散共产党，这种理由是经不住严格审查的。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一个共产党使它的选举策略适应于一定政治形势的要求。美国共产党在上届选举中拥护罗斯福总统为候选人显然是对的，但是这决不需要解散共产党。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共产党不是自行解散，而是尽一切努力

去加强它的活动，制訂出全国反法西斯激烈政策，那它就可以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大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与此相反，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只能使工人群众心中感到忧虑，前景一片模糊。

在法国，在为“抵抗”而团结的借口下，过去几个月中或多或少随意地流传着某种取消党的建议，但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认真考虑这种建议。我们不是通过取消党来为全国团结出力。与此相反，我们是在通过加强党来为全国团结出力。就美国共产党人而论，很显然，他们为本国团结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愿望给自己提出了许多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是以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德黑兰决定之后，又有了雅尔塔决定，这表明了三大强国要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帮助得到解放的人民清除各国法西斯主义残余的意志。

这是用不着回忆而自然记得的：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托拉斯，而这次战争的伟大目的，消灭法西斯主义，只有在民主和进步力量不忽视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的时候才能达到。

在全世界进步势力和法西斯野蛮主义之间进行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人必须起特别重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共产党人不解散他们的党，而是尽一切努力去加强他们的党，使它成为集结美国广大民主群众的要素之一，去最后粉碎法西斯主义这个二十世纪的耻辱，那他们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来起上述作用，从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进步。想要掩盖这个事实是没有用的：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或多或少有着隐蔽的同情者，正像它在法国或其他国家

也有这一类同情者一样。

美国前任副总统，现任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说得对，人们不能在国外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战，而在国内则容忍一些有势力集团的活动，这些集团想用“旧暴政死亡和新暴政诞生之间只隔着一个呼吸的刹那时间”来谋取和平。

雅尔塔的决定阻止了这一类计划，但是敌视自由的人们是不会自动解除武装的。他们只在所有民主和进步力量的联合行动面前，才会退却。

很明显，如果埃尔·白劳德同志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看到了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在他们历史上这个时刻所面临的问题的这个重要方面，他就会得出一个同解散美国共产党完全不同的结论。

論修正主义問題

威廉·泽·福斯特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①

白劳德同志的“丑恶昭彰的修正主义”(用杜克洛的話)是从美国帝国主义的現行侵略計劃直接产生的。为了懂得这一点，简单地回顾一下共产党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反对自己队伍中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时的修正主义也是美国帝国主义在我們党內的明白的反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上升。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从一个债务国变成了債权国，1920 年至 1929 年的資本輸出总額达到了在当时是前所未聞的 200 亿美元。它在全世界进行一种积极的运动，从已被战争削弱的其他大国手中夺取市場。通过它的“楊格”和“道威斯”計劃，它实际上对战敗的德国强定了經濟条件。对待拉丁美洲，它的态度是实行专橫統治和軍事压迫。同时，資本家在國內飽飫利潤，一往直前地发展他們用来促进大量生产的新方法，使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贊賞和羨慕。

像通常一样，在經濟周期高漲阶段的乐观气氛中，出現了头脑热昏的預言家，他們歌頌美国資本主义制度的光荣。而在这

^① 根据原书目次，这里刊载的是报告的摘要。——譯者

一次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他們說，美国已經最后克服了資本主义的矛盾。不会再有經濟危机或大規模失业了。大量生产和高工資就是魔术的符咒。他們的口号不是馬克思，而是福特。“新資本主义”就在这里，工程师和經濟学家从欧洲各处来到这里，研究美国的奇迹。

毫不奇怪，这种令人陶醉的資本家宣傳在工人队伍中，特别是在工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当卡弗教授解釋工人們怎样通过自己的儲蓄正在购买对大企业的控制权时，劳工組織的工作人員，包括进步分子在內，都張口諦听。而劳工“理論家”也多少构造一点他們自己的烏托邦。他們宣称，劳工前进的道路是在同雇主合作，增加生产。階級斗争已告結束，罢工成了过去的事情，社会主义成了破旧的教条。重要的东西是“更高的劳工策略”（不罢工政策，赶快政策），劳工銀行和每一个方面的階級合作。

自1923年起，这种資本家的无稽之談变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各铁路工会的正式政策。結果是，在战后大規模的反对工会运动中由于罢工的严重失敗而已被削弱的这些劳工組織，变成了只不过是替雇主們实行赶快制度的代理人罢了，它們可悲地忽視着劳工的利益。因此，工会的士气降到了零度，劳工运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在“繁荣”时期增加自己的會員人数。

这是我党历史最光輝的篇章之一：我們对这种階級合作的整个沉醉昏迷局面进行了勇敢的战斗（虽則常常是在一个过于狭窄的基础上），我們中間許多最优秀的战士因此被工会开除了，他們被解雇了，被逮捕了，或者受到了其他的迫害。可是，虽然我們采取了这种斗争政策，美国帝国主义的宣傳毒素依然設法渗入了我們党的队伍中。

它的主要代言人是賈埃·洛夫斯东，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叛

徒。洛夫斯东反映了大托拉斯的宣傳，同美国資本家一道唱着贊美歌。他在我們党内发展了他的“美国例外論”，其实质是：資本主义在我国已經变得如此强大和进步，它再不受那些制約着資本主义危机重复出現的一般經濟規律支配了。洛夫斯东修正主义的实际效果，是在帮助取消我們党的战斗性，在群众中散播虛妄的繁荣幻想，并使工人屈从于我国資本家在国内的飽飫巨利和他們在国外的帝国主义計劃。經過一場艰苦的斗争，洛夫斯东的修正主义被揭露了，他被开除出党，然后他开始发展成为一个痛恨苏联的人，成为臭名远揚的馬修·沃尔手中的一个工具。

至于将要使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得到新生的美国“新資本主义”，它在1929年10月轰隆一声就爆炸了。根据卡弗、蔡斯、特格威尔、洛夫斯东以及其他許多资产階級理論家的意見，美国被认为是已經克服了資本主义的經濟矛盾的，而在1929—1934年这次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机中，实际上却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遭到了更大的破坏。

美国帝国主义力图統治全世界

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也像洛夫斯东的修正主义一样，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虛幻和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大資本家中間就发出了强大的声音，叫嚷着美国要統治全世界，一个臭名远揚的例子就是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紀”理論。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力爭由美国帝国主义統治全世界的企图就日益增长，到了現在，它显然是美国大資本的基本决心。

大体說来，我国大資本家支持了战争——依他們自己的方式。但設想他們在支持战争时曾經抱着和美国人民，即或是和罗

斯福政府相同的民主热望，那是愚蠢的。他們大概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可以打倒一两个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竞争敌手，从而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們是随时乐于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苏联以及世界的民主力量，同希特勒协商来取得和平的。而现在希特勒已被粉碎了，他們的帝国主义企图就变得日益露骨，这从他們在联合国家旧金山会议上的行动看得出来。这些分子看到，和美国的强大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已经削弱了，他們想要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来实现他們的企图，使自己可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包括对苏联在内。

正如全国委员会的決議所指出的，美国财政资本畏惧欧洲的民主潮流，想要自己控制全世界，它正在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如果不由世界的民主力量加以抑制，这种政策就可能造成最不幸的后果，不但对大资本本身是如此，而且对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所定的偉大目标也是如此。

虽然美国财政资本力图以美国将利用其世界权力从事利他目的这种借口来掩盖它的帝国主义野心，然而这种野心是摆得明明白白的，不但从大资本的实际政策上看得出来，而且从它的許多代言人——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劳工中的——的著作中也看得出来。例如，托馬斯·杜威在馬启諾共和党会议上提出贊成美英联盟的引人注目的要求，显然是建立对苏联、并从而对全世界的統治的一种企图。埃里克·約翰斯頓的《不可限量的美国》一书，就在論述如何夺取世界貿易，在财政资本权力扩张面前从思想上麻痹美国人民。华尔特·李普曼的《美国的战争目的》一书提出了由結成联盟的美英两个帝国再加上所有中部和西部欧洲国家构成的偉大的“大西洋社会”这个概念，显然是一个美国統治全世界的計劃。苏联的工会刊物《战争和工人

階級》在 1945 年 3 月 1 日一期中有下面的話，它不但正確地表述了參議員范登堡的帝國主義本質，而且也正確地表述了他的伙如胡佛、塔夫脫、杜威、蘭敦、麥考密克、派特遜、赫斯特之流以及其他的大資本代言人的帝國主義本質：

范登堡演說的全部內容……是一種假面具，掩蓋着他的狂妄要求，就是要建立起一個大國對所有其他國家的獨裁，不問這些國家是大國、中等國家還是小國。

像在二十年代一樣，美國帝國主義現行的積極擴張主義政策在勞工運動中引起了反應，不過這一次形式不同罷了，這可從馬修·沃爾一類人物的態度以及從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許多政策得到證明。此外，諾曼·托馬斯、戴維·杜賓斯基和其他社會民主黨人對蘇聯的激烈攻擊，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計劃中亦有其根源。

白勞德和美國帝國主義

我們的黨不是生存在一個政治上的真空裏面。它暴露在資本主義的全部幻想和壓力面前；因此，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美國帝國主義現在奪取世界權力的運動在黨的隊伍中有某些反應是不足為奇的。目前情勢的悲劇是在於：恰恰是白勞德同志在我們黨內表達了這種帝國主義的幻想，特別是關於戰後的形勢。而他在這樣作的時候，又是處心積慮地利用一種眼光銳敏和變通自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借口。

戰後時期將面臨工業復興和發展的巨大問題，美國以其十分豐富的經濟資源，在這個時期中必定要起極為重大的作用。然而，白勞德同志沒有看見，如果美國的作用是在幫助實現莫斯科、德黑蘭和雅爾塔的綱領，這就只有在美國廣大群眾、特別是

工会运动十分提高警惕，注意使我們政府和大資本家的帝国主义傾向受到抑制，使民主政策能够实行时，才能完成。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定下的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取得持久和平的偉大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但也只有在全世界的联合民主力量永远提高警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与此相反，白劳德却十分情愿让这件事情完全听凭大資本家的“明智”和“开明的”自利之心去处理。

帝国主义者所能要求的，也不过是白劳德这样轻易給予他們的放手行事。很难設想还有比白劳德多次表示的下列信念更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利的情况：我們能够倚靠这些資本家有遵循一种建設性的和民主的世界政策的“开明”。这种倚靠的一般結果将会是：美国帝国主义受不到任何的群众約束，它将瘋狂地为所欲为，不久就会把整个世界攪得比現在更加一塌胡塗。自然，白劳德同志并不希望这一类情况出現，但列宁早就教导我們，政策的客观效果同提出政策的人的主观願望之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实际效果是在使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便于推行，这是毫无疑问的。让我简单地举出他的一些主要建議及其帝国主义的含义，来指明这一点。

1. 当白劳德同志提議美国在战后时期应着手建立每年400亿美元的出口貿易，像他在《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中所說的那样时，他事实上是在要求美国帝国主义进行一种大的推銷，来实际上壟断全世界的市場。

2. 当白劳德說（他的《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第79頁）^①，“我完全願意帮助自由的私人企业家去实现四百亿美元的国外市場，这是由于他們自己选择的方法而完全需

^① 本书第241頁。——譯者

要的”时，他是在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使美国人民听凭帝国主义者的支配。

3. 当白劳德提議美国大资本家可以放手实行战后“全世界一切被破坏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计划时，他事实上是在提議要使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成为世界霸主。

4. 当白劳德說“英国和美国从前希望苏联有朝一日行将消失不見，它們現在已經把这种希望最后地永远地放棄了”时，他是在蒙蔽我国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他們看不見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危險的阴谋詭計——这正是这些貪得无厌的人“虔誠地希望得到的福音”。

5. 当白劳德不肯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危險性时（并且他否认存在着任何这一类帝国主义的威胁，虽然这似乎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他是在使美国人看不見将来的世界和平和进步中的这个最大的危險。帝国主义者很难要求还有比这个更便于他們推行剝削和統治计划的東西了。

6. 当白劳德进行斗争，反对美国人民削弱壟断組織的权力时——他是在这样作——，他实际上是在使民主的最凶惡的敌人，使制造经济混乱、帝国主义压迫、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人摆脱一切束縛。

7. 当白劳德在工人中散布幻想，大意是說，在战后会有一个阶级和平的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們保证不罢工准沒有錯，說雇主們會自願地从根本上改进工人的实际工資时，他是想要在大资本家对工会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实行挑衅性进攻的面前，来麻痹工人阶级。

8. 当白劳德（《工人日报》，1944年4月8日）为“劳工和經理宪章”欢呼，沒有一个字的批評，只叹息美国制造商协会不是宪

章的参加者，认为这是“不幸之事”时，当他（《工人日报》，1944年4月14日）提議在战后时期的美国工业中普遍实行奖励工资制时，他是在为加快和加强对我国工人的剝削敞开大門。

9. 当白劳德解散美国共产党、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时，他是在削弱工人所具有的用来对抗本国和外国大托拉斯反动活动的最强大的动力。

只有政治上的瞎子，才看不出白劳德的所有这些修正主义理論和提議都是和大資本家的利益完全吻合的，实际上都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計划的反映。同白劳德的相信大資產階級相反，我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势力将不得不利用自己联合的政治力量去取得完全的胜利，建立民主的和平，爭取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的生活改善。

从理論上来看白劳德的修正主义

被美国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的强大力量、被它的龐大的工业扩张和生产、被它的巨大的政治威信、被資本家在罗斯福政府下（被迫）向工人所作的許多让步弄得眼花繚乱之后，白劳德同志在他現时的著作和政策中，特别是在德黑兰協議之后，跳到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結論：美国資本主义及其資本家階級，包括反动的財政資本在內，已經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变得进步起来了。

在这个虚妄的基础上，白劳德同志进而在他的《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中建立起一个資本主义的烏托邦，在这个烏托邦中，他看到我国“开明的”大資本家按照“他們真正的階級利益”而行动，领导我国和全世界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民主、工业扩张和群众福利的时代。心中怀着这幅乐观的图画，他号召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和衷共济地携起手来，求其

实现。他企图把战后的全国团结扩大到包括反动的财政资本在内。这一切妄想对我国工人们来说，自然不外是实际上使他們屈从于国内更为加强的剥削，屈从于这样一个世界，它在不久就会被拖入一次法西斯主义的新的增长和一場新的世界大战。

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違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这些思想同埃里克·約翰斯顿的资产阶级想法相近，而不是同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原理相近。如同我在1944年1月20日給全国委员会的信中所說的，“在这幅(白劳德的)图画里，美国帝国主义簡直是消失了，阶级斗争的痕迹都很难找到了，而社会主义則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虽然同社会民主党人使工人屈从于资本家統治的一般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实际上却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

白劳德企图通过对战后时期工人同他們的阶级敌人——大资本家之間虛妄的利益和諧的說教，来取消阶级斗争。因为，如果白劳德所說屬实，资本家会自願地从根本上改善工人的实际工資，那末阶级斗争的基础就很少了，或者根本沒有了。白劳德的想法，认为美国大资本家为了他們自己的“真正阶级利益”，实际上不仅必須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必須同苏联像朋友般地和睦共处，这也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和阶级作用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的。沒有一条馬克思主义原理說，社会阶级“必須”依照“他們真正的阶级利益”行事。历史上的确充滿了这样的例子：在直接的經濟、政治或思想的压力下，有些阶级違反了他們“真正的阶级利益”，替自己造成了悲慘的結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英国的統治阶级实行綏靖希特勒的政策直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苏联被卷入战争之中，那么英国的世界地位就会遭到破坏，不能恢复了。为了綏靖大资本家并从而确保他

們會依照他們“真正的階級利益”行事，白勞德同志不僅解散了共產黨，而且也準備取消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甚至還要放棄我們的共產主義思想，如果他能辦得到的話。

白勞德還企圖在理論上迴避美國帝國主義不談。事實上，他的《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一書是在企圖證明：帝國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是處在世界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實行友誼合作的時代；白勞德認為這種合作不是基於蘇聯的力量，殖民地國家的力量，從戰爭中新誕生的民主國家的力量和世界勞工運動的力量（如果合作會存在，那必然是基於這些力量），而是基於大資本家、特別是美國大資本家的善良意願，他們的“開明”、“高度道德責任感”和“真正階級利益”將向他們指定這條合作主義的道路。的確，白勞德企圖在美國和蘇聯的關係方面抹殺美國帝國主義，他還描繪一幅牧歌式的圖畫，說明美國大資本將要在我國政府倡導之下，怎樣在全世界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化和民主化運動。依照他的意見，我們的資本家將使其餘的世界得到自由和繁榮，不管後者願意不願意。因為，白勞德說（第79頁）^①：

一旦美國說清楚所有有關方面將要得到的好處時，在資本主義或殖民地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會敢於拒絕參加或敢於退出這種合伙。

白勞德還企圖取消列寧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的理論，並且這樣一來，他甚至想把關於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的全部馬克思主義思想束之高閣。從他的論證中不能得出其他的結論；因為，如果世界資本主義可以在美國的領導之下，特別是在“開明的”美國財政資本的指導之下克服它的總危機，並且進入

^① 本書第242頁。——譯者

一个繁荣和长期继续的经济扩张的新时期，那就沒有可能在任何可以想像的前景之下建設社会主义。这样，馬克思和列宁也許錯了，而白劳德則是对的。有真正的理由可以得出結論：当白劳德在1944年1月把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一个教育問題）擱置一旁时，他不只是把它收藏起来，等到贊成它成为最方便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他很可能是在想，他已經永远和它告別了。在他的能够克服自己的基本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理論中，即使从最遙远的意义來說，社会主义也是沒有地位的。

白劳德同志在企图使我們党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采取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綱領，这是无可爭辯的。在他十八个月以前所作的桥港演說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說：“作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寻找我們的道路的指南，陈旧的公式和古老的偏見对于我們行将毫无用处。”白劳德警告我們說是毫无用处的这些“陈旧的公式和古老的偏見”，究竟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关于階級斗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所有这一切白劳德自己已經放棄了，而他企图使我們党也这样作。

从实践上来看白劳德的修正主义

白劳德同志特别是从亚特兰大回来不久，就开始发展了他的机会主义思想（虽然这些思想的根子能够从更早的时候找到）。当时党有着一个健全的战时政策，这是当他在監獄中的时候党制定的，这个政策包括全力支援战争，以批評的态度拥护罗斯福政府，拥护所有一切贊成战争的成分的全国团结，包括贊成罗斯福的資本家在内，使战时生产达到最大的限度，实行工人不罢工的保证，并积极捍卫群众的經濟和政治权利，作为战时的需要。

白勞德几乎是立即开始在这个基本上正确的战时政策中注入他的机会主义。他这样做的最初征兆之一，就是他对战时經濟集中化問題的烏托邦式的处理。他在《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中进一步發揮了他的机会主义立場。而他的修正主义观点最后在《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中就全部表現出来了。

在这些书中以及在白勞德同志的其他著作和政策中包含的修正主义思想，不仅造成了我們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而且也妨害了我們支援战争的实际工作。我在6月10日的《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列举我們在战时的許多比較重要的缺点和錯誤，这些都是由白勞德的机会主义造成的，这篇文章所列举的，除了上面已經談到的各点之外，还有对罗斯福政府的批評不够；沒有提出成立有劳工正式参加的联合政府的要求；拒絕国际劳工应当在各大强国一切战时會議上派出代表的要求；提議在全国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提出候选人，这个提議如果被採納，就会取消罗斯福的候选人資格，如此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許多其他的錯誤和缺点，差不多包括我們党的一切工作部門。例如，在战争初期有一种傾向，忽視了战斗地坚持黑人权利的主張；由于我們渴望实行奖励工資制度，有一个时候低估了提高工人工資率的必要性；沒有把下面这件事在劳工群众和一般公众中作为主要的問題提出来，即給予我們的武装部队以关于战争的原因和目的的完全民主的教育应当是政府和工会运动的重要工作。

在白勞德同志的全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錯誤中，貫串了这样一种永远存在的趨勢：倚靠大資產階級作为全国的領導，綏靖反动的財政資本，低估劳工及其他民主力量，特別是我們党，在全国反法西斯陣綫中的独立的、民主的作用。誠然，共产党人在

他們的作战努力中不落后于任何人，他們所創造的記錄是党很可以引为驕傲的。但我們必須承认，从当前存在的机会和責任来看，正是由于这些机会主义的錯誤，我們在許多方面还感到做得不够。

白劳德同志的錯誤政策在战时是有害的，如果搬到战后时期，那就更会造成灾难。一旦美国財政資本家的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竞争敌手均被打倒以后，这些財政資本家将感到有一切可能在联合国家的組織之內更加自由地玩弄反对苏联、英国和在战争当中将要诞生的新民主国家的手腕；他們也将在我国加强对工会的进攻。这从战争的欧洲阶段結束以来的事变进程可以看得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必須紧紧联合起来去实现德黑兰和雅尔塔的目标。白劳德的关于美国长期階級和平和关于美国大資本会同我們的战时盟国和諧地一道工作的幻想，对于民主群众和人民的这种必要的斗争会是一种牵制，并且会恰好替美国帝国主义造成方便。

即使杜克洛的信^①沒有来到，我們党在战后緊張局势的压力之下，也很可能自行拋棄白劳德的修正主义，找出自己的实行正确政策的道路。誠然，已經有了許多趋势朝着这个方向走。然而，只有对白劳德进行斗争才能對我們党的政策作出这种糾正，这从他現在抗拒实行这样的改变就看得十分明白。杜克洛的信如此迅速地為我們党所贊同，其基本理由之一，正是因为战争的欧洲阶段結束以后，大家的注意集中到了白劳德机会主义政策的破产上。

① 福斯特同志这里所說的信，可能指的就是前面杜克洛的《論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一文，并不是另外还有什么信件。參閱福斯特在《政治月刊》1959年6月号发表的《白劳德又在企图破坏共产党》一文。——譯者

我們的修正主義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白勞德同志的露骨的修正主義、他的為美國帝國主義所作的辯護在我們黨的思想造成了混亂，削弱了黨的實際工作，阻礙了黨的發展，在廣大群眾中損害了黨的威信；他怎麼能夠使我們黨採納他的這些東西作為自己的政策呢？

第一，我應當說，這是因為我們領導方面所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訓練不夠。雖然在我們黨內有許多同志反對白勞德的路綫，並且一般地表現了猶豫和不安，可是領導上卻沒有能夠洞察他的資產階級詭辯，沒有能夠揭露這種詭辯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在整個戰爭期間，甚至在更早的幾年中，我們黨曾經同資產階級中擁護羅斯福的少數派合作，這就為白勞德同志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跳板，使他能夠企圖讓我們同整個資產階級，包括它的堅決反動部分在內，進行合作。我們黨沒有能夠看出這種機會主義的耍弄花招，這就積極證明了我們迫切需要加強我們的基本理論訓練，需要向白勞德想要我們作為過時之物予以拋棄的那些“舊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和“陳舊公式”中重新學習。

我們黨之所以成為白勞德同志的修正主義犧牲品的第二個和極其帶決定性的理由，是黨內缺乏政治討論和民主。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讓自己遠遠地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我們給與了白勞德過分廣大的權力，這種權力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事實上他的話在黨內就是法律。他習慣於徑自定下政策，很少人敢於對他所獨斷地宣布的政策進行爭辯。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討論、自我批評和集體領導在我們黨的各個最高委員會中差不多完全不存在了。除此之外，黨的領袖和黨員們對白勞德表示了令人不能容許的大量的阿諛和頌揚，這就把他差不多完全置

于我們的批評領域之外。

在此種情況下，當白勞德同志在 1944 年 1 月全國委員會會議上出人意外地提出他的全部機會主義路線時，他的關於德黑蘭的報告並沒有經過真正的政治討論。我當時給全國委員會抗議白勞德修正主義的信從來沒有到達黨員們的手中，這就是由於黨內缺乏民主。在我的信被政治委員會 1944 年 2 月 8 日擴大會議拒絕接受之後，如果我企圖把我的信分送全黨，其結果可能是我立即遭到開除，也可能造成黨的分裂。白勞德同志在那次會議上把這一點表示得十分明白。因此，為了黨的團結，我不得不把我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反對限制在全國委員會之內進行。

在估計我們黨所犯嚴重錯誤的責任時，我以為整個最高領導，特別是政治委員會負有重大的責任。因為，雖然白勞德掌握了過分的權力，如果政治委員會的委員們，即或是其中有力的少數人，採取了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立場，他是可以被擊敗的。然而，不幸的是並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政治委員會的責任是重大的。

但是錯誤的絕大部分責任應由白勞德同志本人來負。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是由他倡導的，他從理論上發展了這種政策，他利用他在黨內作為一個長期的國際共產主義領袖的全部權力和威望來使它得到通過。而現在，他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投票並寫信反對全國委員會的糾正他的錯誤的決議。這樣說是毫不過分的：如果白勞德同志以外的，黨的任何其他領袖向我們黨提出了關於德黑蘭會議的這樣一種歪曲的解釋，那是會被作為極端的机会主義而不予接受的。但是白勞德以其巨大的威望和過分集中的權力竟能使它通過了。

所有这一切，着重指明了在我們党内有发展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需要。在从这种情况下将要产生的新的领导中，决不能有个人控制一切，而必须是真正的集体努力。还必须重新确立自我批評和自由的政治討論。只有在这种正确的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才能使极端重要的共产党人的純洁、团結和紀律得到发展。

矯枉过正的危險

当一个共产党由于过去的錯誤或由于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而大大改变政策时，总有一种对政策糾正过分的危險，即是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糾正过分的情形，在我們党的历史中，以及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中，都发生过不只一次。这就是我們現在面临的主要危險，必須十分小心地加以避免。

在各地分会以及在即将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我們党将以压倒多数批准全国委员会的決議，这在实际上是肯定的。全国委员会的投票——53比1——是一个明白的信号，表示整个党对于这个決議的反应如何。白劳德同志在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中为他的机会主义辯护，他是完全孤立的。就全党來說，差不多完全只有那些入党不久和觉悟較低的党员还在給他一些小量的支持。至于我們党内受过訓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员和党的領袖，他們差不多是全体一致地拥护全国委员会的決議的。

然而，由于我們同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的这样一番接触，在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意識形态上的伤痕。必須通过一次列宁主义的教育去消除它們。但在肃清这种修正主义的殘余时，我們必須加倍警惕，不要墮入宗派行为的陷阱中。我們决不能犯

下企图以宗派“左”倾主义去医治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极大錯誤。

这意味着，我們党必須十分仔細地研究全国委员会的決議，十分广泛地利用这个決議。如果得到正确的了解和系統的应用，这个決議就会为我們提供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我們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广泛的群众联系。因此，我們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进一步加强我們的路綫并重建我們的全国领导机构之后，它的巨大任务，即在着手动员全党去进行全国委员会決議所定下的、在击败法西斯日本及建立一个自由而繁荣的战后世界中的广泛的群众工作。

我們的政策和任务的若干方面

尤金·丹尼斯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我怀着深深的自愧代表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报告。因为，虽然福斯特同志对我的立场作了肯定的评价，我认识到，对于我们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政治委员会所犯的主要错误，我是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的。

一般说来，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德黑兰和克里米亚的目标可以不要群众最积极参加而就会自动实现的人们之列。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之一，他们把为了反对那些亲法西斯的反动势力而必须进行的坚决斗争减到最小限度，或是低估劳工和人民的独立作用与活动。

然而这是事实：我曾经怀抱并助长了关于垄断资本中反轴心部分在战后所起作用的某些机会主义幻想。这样一来，我就参与并赞助了我们全国领导机构所犯的主要错误。此外，在取消南方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这一类特殊问题上，以及在不正确地估计“劳工经理宪章”的意义上，我负有特别的责任。

况且，就我们协会的集体领导上所犯的一些个别错误我虽然曾经提出争点并表示反对，应当承认，我并不曾从这些得出全

部的結論，也不曾像应当作的那樣有效地和一貫地進行鬥爭。同我們領導中其他大多數同志一樣，我总是盡力像保護我們的眼珠一樣來保持我們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但在這一點上，我有時不免忽視這個重要事實：要達到共產黨人的團結，決不能在原則問題上作任何的讓步，哪怕是“細微的”或“暫時的”讓步。

因此，我願意再一次強調，我在提出這個報告時，是怀着深深自愧的心情，並深刻認識到在我們政治委員會所犯的錯誤中我自己所應負的責任。

說過這些開場白之後，我現在就來作報告。我相信所有的同志都能体会到：在這個報告中不僅體現了我個人的看法和深刻的信念，同樣也體現了政治委員會大多數人的一般看法。

* * *

作為我們討論的根據的主要報告和文件已經發給大家。這就是政治委員會6月2日通過的決議草案，杜克洛同志的文章，福斯特同志向這次會議提出的報告，以及福斯特同志在1944年2月向我們全國委員會提出的極端重要的政治信件。

從這些可以看出，下列事實是十分明白的：

第一，在反希特勒戰爭的過程中（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共產黨人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我們協會犯了一些帶基本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開始脫離了並修改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原則。我們在削弱並取消我們共產主義運動作為工人階級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種先鋒隊的作用。

犯下這種機會主義的錯誤，責任不僅在於白勞德同志，雖然他對我們的丑惡昭彰的修正主義是負有最重大的責任的。對我們所犯的錯誤，我們整個的全國領導機關，而首先是我們政治委員會，也同樣負有責任。

直到最近我們所作的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背离，对于实行我們贏得战争胜利的正确政策起了不良的影响，并且还使我們共产主义組織及其他反法西斯人士在对待現在（當我們进入战后时期时）发生的新的复杂問題上失去了方向。

第二，你們手边的报告和材料表明，政治委员会中大多数人現在已經了解到并正在設法糾正政治委员会以前的錯誤和偏差。借助于杜克洛同志聰明的和具有无比价值的劝告，从我們自己的經驗中以及最近的国际事变进程中学习，并且由于福斯特同志根本正确的立場的巨大帮助（他大約在17个月以前就警告了我們：我們正在走上危險的机会主义道路），我們已經开始克服我們的錯誤，正确地重新确定我們自己和协会的方向。全国委员会中的多数以及我們絕大多数党员都已經表明，他們坚决地热烈地贊成杜克洛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和政治委员会決議的主要路綫。

然而，这也还是事实：白劳德同志，以及比較少数几个繼續拥护他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理論和政策的同志，正在抗拒对我們过去錯誤所作的糾正。白劳德同志頑固地抱住他的虛妄的战后方針不放。他积极反对現在正由我們政治委员会和我們的党员一道制訂的健全的政治路綫。这样一来，白劳德同志就在加重他过去的錯誤，并开始走上一条甚至更加危險的道路——一种特殊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例外論。

* * *

在分析白劳德同志的錯誤、因而也是我們整个全国領導机构的錯誤的性质和主要根源，以及这些錯誤为什么能发生之前，考察一下白劳德同志在一系列关键性問題上現在的立場是值得的，是富有教益的。

看看美苏关系和合作这个主要問題，每一个反法西斯的和最爱国的美军人都懂得这是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基础。和政治委员会一道，白劳德同志承认，維持和扩大战后美苏的友誼与和平合作，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一部分和这个联盟的核心，是极端必要的，是有巨大的可能性的。白劳德也同意政治委员会的看法：在旧金山会议上，国务院和美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华盛顿和倫敦在实现雅尔塔协议时的行动迟缓和前后矛盾，在联盟中造成了紧张和裂痕，使三大强国的团结遭到危险。

但在如何防止美国在将来摇摆不定和离开雅尔塔协议上，在如何防止同盟内部的分裂上，在如何巩固并加强美苏团结上，白劳德同志同政治委员会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白劳德认为资本主义美国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我們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从建立持久和平与繁荣而互利的貿易这种共同需要产生的——预先决定了美国壟断資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在将来的美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所采的立場。白劳德首先依靠资产階級中最富“远見”那一部分人的“明智”作为主要“保证”：对于美苏友好和合作的绝对需要将或多或少自动地克服并超越現存的困难和分歧，将足以抑制美国財政資本中有势力部分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和政策，包括敌視苏联在內。

政治委员会相信：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是真实的，是强有力的和带强迫性的因素，沒有这种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有长期而友好的合作与和平的基础。同时，政治委员会也相信：这些利益本身，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既不能也不会自动地决定美国的政策。我們不能忽視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之間的矛盾。我們不能忘記国际联盟、慕尼黑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同苏联的友谊与合作，以及在欧洲和所有各处完成摧毁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依靠也不能依靠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壟断资本的“明智”。这首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我们国内的更加坚定和更加巩固的全民民主联盟的建立——这个联盟是以劳工和所有其他民主势力的力量和团结为基础的，特别是以劳动农民、黑人、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为基础的。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事实：还有某些有势力的资本家集团，它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拥护克里米亚的决定，我们认为劳工和民主力量可能也必须同这样的资本家一道为这些目标奋斗。但我们同样相信，劳工和人民不能信赖任何资本家集团或分子会保持不变的立场或者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我们现在比从前更加相信，在全国团结阵营的内部，在全国民主联盟的内部，劳工，同其他进步势力一道，不仅必须成为支柱和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必须起领导作用。

其次，在美苏关系这个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政治委员会还在两个其他重要方面同白劳德同志意见不同。不像白劳德，我们不相信美国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尾巴，或者是它手中幼稚天真的小卒。我们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在这次战争过后虽由于希特勒德国的溃败而已被削弱，且将由于帝国主义日本的溃败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却在变成战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

美国并不是英国狮子的驯服而幼小的伙伴。完全相反。并且，在战后时期，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一定会加剧，变得更加尖锐化。事实上，在战争以后，英美两国的竞争和矛盾将构成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定的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而在

反对它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敌手中，美国将起日益增加的侵略作用。

然而，我們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說一切没有希望了，說美国不可避免地 and 不可救药地在明天的世界中只能扮演一个反动的和亲法西斯主义的角色。国际力量的对比以及我們国内强大的进步潮流是这样：劳工和所有民主力量——如果他們根据一个反法西斯的綱領联合起来并且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可以有效地影响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方針的。

問題在于，不論是美国帝国主义还是英国帝国主义，都不会由于白劳德訴諸它們的“明智”和“真正的”阶级利益而有所削弱，它們之間的冲突和它們的反动目的也不会因此受到压抑；就是他的狂想的方案，用来緩和它們的矛盾、和平地分割世界市場、或是达到一种安排使唐宁街自願解放大英帝国的方案，也办不到这些。美国帝国主义正像英国帝国主义一样，在这样的時候才会受到削弱，受到遏抑；特别是当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团结和斗争，削弱和破坏了财政資本中最反动和最富侵略性的势力的地位，并同所有国家爱好自由的人民在行动上更密切更巩固地团结起来的时候。

此外，我們政治委员会的人不能同意白劳德关于世界发展未来趋势的宿命論的立場和他所武断地选定的方向。例如，我們确实相信，如果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背棄克里米亚協議，强使美苏英关系决裂，这就会造成新的侵略，給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痛苦、損害和不可言状的困难，对美国人民也决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必須尽一切的努力来保持并加强三大强国的团结。

然而我們不能同意說，与白劳德的“大联盟”概念相反的局

面，只能是混亂、無政府狀態和文明的末日。白勞德還沒有從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在這次戰爭中湧現了一個更加強大和更有影響的蘇聯，一個新的和民主的歐洲，和一個更加強大的世界勞工運動。這些歷史的發展肯定是現實世界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們是反希特勒聯盟的主要基礎和有機組成部分——是已經造成了世界力量嶄新對比，穩固地加強了世界民主和民族自主事業的部分和基礎。

在這一方面，不應當忘記：從這次戰爭中還湧現了一個強大的和更有影響的美國勞工運動。當前的最大任務，是要在各種地方和全國範圍內使勞工的行動統一起來，並且使美國勞工充分自覺到自己的先鋒作用和自己的當前歷史任務——徹底摧毀法西斯主義，和為此目的同所有的民主力量聯合起來，堅決地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這誠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勞工運動是四分五裂的，而格林、沃爾、杜賓斯基、赫徹森和劉易斯之流依然佔據着擁有巨大權力的位置。然而時機已經成熟了，需要又是如此的迫切，現在已經可以採取新的步驟，使勞工的反法西斯鬥爭統一起來。這是能夠做到而且必須做到的。

* * *

其次，看看政治委員會決議草案第一部分所規定的行動口號問題。除了作某些保留和一個根本分歧之點以外，白勞德聲稱他可以同意這個當前的行動綱領。

把他的“保留”權且放在一邊，究竟白勞德同志已經說明的同行動口號最根本的分歧是什麼呢？白勞德斷言，政治委員會忽視了他所謂的在戰後時期的任何全國團結方案中都起決定作用的問題，即“市場”問題。白勞德仍舊主張，在能夠吸收美國戰

时工业和生产水平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规模上来解决战后市場問題，特别是国外市場問題，依然是达到經濟繁荣的任何健全的經濟复原^①和战后計劃的關鍵与核心。

显然，市場問題，不論国外市場还是国内市場，并不是不重要，特别是由于它們对美国战后的生产和就业水平将有显著的影响。

那末，讓我們看看，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中，美国貿易扩大的希望怎样？

首先，德国的潰敗，和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潰敗，以及在战争爭中财产、工厂設備和資本財貨的大量破坏，将使美国和英国在世界市場中所占的份額比战前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恢复和复兴的初期——虽然必須着重指出，这将在英美竞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迟早还会在“蕭条”和周期性經濟危机之下进行。

然而，要使現在已經显露的在战后初期大大擴張美国对外貿易的巨大可能性——可能每年达70亿到100亿美元——变成现实，以及要使出口水平在較长的时期内大大超过1939年的战前水平，就必须像政治委员会的決議所提出的，实现下列条件：

1. 确保稳定的和长期的和平。
2. 保证解放了的欧洲沿着民主的、反法西斯的路綫进一步向前发展。
3. 促进自由的和民主的亚洲实现。
4. 扩大美国对所有民主国家长期的和低利的信用与貸款，供經濟复兴和工业化之用，并以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为

^① 經濟复原(reconversion)，指从战时生产轉到平时生产。——譯者

条件。

毫无疑问，決議中用来促进国际經濟合作和世界貿易的各项建議是能够实行并且应当实行的。同样，決議中关于經濟复原以及如何促进为 6,000 万人就业而进行斗争的部分，也許还須加以补充。

但是，政治委员会的坚决的意见是：在市場問題上我們不能接受白劳德同志現在提出的“修正案”和另外的經濟建議和想法，他的这些东西同他在《德黑兰》一书中所提出的基本上一样。

这是我們經過考虑以后的意见，因为白劳德关于战后經濟的看法特別包含了两个根本的缺点：

第一、白劳德还是被这样的想法纏扰着：改善美国人民的工資和生活水平的道路，在于試图解决壟断資本主义的一切市場和利潤問題，这就是說，試图使資本主义运行无阻，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出了一个为了壟断資本的、为了企图克服資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矛盾的、为了企图造成“免于”危机的組織高超的資本主义的經濟方案。

白劳德也被这样的想法纏扰着：在战后时期，工人們不必首先依靠他們自己的有組織的力量和斗争；他毋宁相信，工人們可以用对壟断資本家作出一个让步接着一个让步的办法，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然而，政治委员会相信：促进就业和社会安全与提高劳动人民购买力——我們认为这对扩大国内市場是重要的——的道路，特別在于我們怎样把劳工和所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集合起来，团结起来，为反对大多数雇主利用經濟复原时期来降低工資和生活水平、暗中破坏工会运动种种企图而进行有力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強調今天必須动员群众为改进联邦和各州的

緊急失業保險而斗争；为通过“莫萊充分就業法案”和“華格納—莫萊—丁格爾法案”而斗争；为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联邦和各州公共工程与住房计划等等而斗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們这样强调有保护工会、組織那些还没有加入組織的工人、和扩大劳工团结与独立政治行动的迫切需要。但这些同市場問題有着有机联系的关键性問題，白勞德却很少提到，或很少强调。

第二、在战后市場和經濟前景問題上，白勞德拒絕接受关于美国經濟危机——它的烏云甚至現在即已开始在空中朦朧地出現——已經萌芽或行将到来的任何看法。白勞德还在被他原来的机会主义幻想迷惑着，这种幻想是：在現存的社会条件下，战后可能出現一个扩大生产和充分就業的长时期，沒有冲突，沒有危机，也沒有大规模的失业。

但是事实怎样呢？

美国目前的国内状况的特点，部分地是由現在从战时經濟向平时經濟过渡和轉变所形成的。这种过程是在进行对日作战中和在大資本更大的积聚和集中的情况下发生的，伴随它的是經濟的大部脫节和失业的显著增长。这个困难的經濟复原时期可能要延續一年到两年。它可能和战后的經濟“繁荣”合在一起，也可能是在它之后才出現战后的經濟“繁荣”。

然而这个“繁荣”也将是一种特殊的繁荣。不問其期間长短如何，是两年、三年还是五年，它的发展将是不平衡的，主要是对最有势力的托拉斯有利，并且它将处于大规模的、长期的失业和严重的国内斗争的情况之下。其次，由于資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这个战后的經濟“繁荣”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周期性危机，引起严重的經濟危机；即使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中美国对外贸易会繁

荣扩大，这种危机也是要发生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不按照政治委员会决议所定的路线制定行动计划来捍卫人民的利益，那末，壟断組織在其最反动的集团的领导之下，就可能沿着法西斯的路线，顺利地利用这次危机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反动目的。

“决议”第一部分所体现的行动口号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白劳德同志所反对的。他认为我们关于抑制壟断組織的权力的建议是宗派主义的，如果不是烏托邦式的话。但事实恰好相反。只有坚决地动员人民去抑制托拉斯和卡特尔的权力，才能在更有利于人民的条件下大大扩展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只有抑制壟断組織，我们才能认真地阻止和击败那些赞成同封建法西斯的日本达成寬大的或妥协的和平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只有采取这种措施，我们今天才能够最好地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其他各处的民族解放力量的充分集合和团结，从而加速对日作战的胜利，加速亚洲人民和国家的自由和民主的进步。只有抑制经济上的“保皇党人”，我们现在才能够最有效地防止英美德各种卡特尔的“复辟”，或进行放肆的掠夺活动，防止对克里米亚决定和即将到来的和平解决进行暗中破坏，并有助于制止想要掠夺、搶劫或压迫已经得到解放的各族人民的那些人。

* * *

还有一个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小问题，即共产党解散问题。白劳德仍旧相信，关于这个行动是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他现在甚至敢于老着脸皮说（他在14个多月以前没有这样作），当作出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决定时，他已经认识到这可能会给其他处在民族解放斗争艰难岁月中的若干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同时，白劳德坚持，共产党的解散是保证1944年选举胜利的必不可少的行动，并且从美国共产主义者在将来所起作用的观

点来看，也是值得这样作的。

然而，事实怎样呢？正如杜克洛同志指出的，1944年5月共产党的解散给欧洲的若干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没有权利解散共产党。因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它的先锋政党的利益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所以，对一个党的损害就不可能不是对其他党的损害。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解散，加速了这种以往的、全部的趋势：使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和实体的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独立作用和地位宣告结束。共产党的解散，加剧了我们在决定性工业部门工人中的基础受到削弱的趋势。它助长了一切机会主义的观点，包括限制和否认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以及在其他进步的、有着广泛联合战线的政治和立法运动中所起独立作用的倾向。

就1944年的选举而论，事实是：共产党的解散帮助了全国团结阵营的敌人。我们共产主义者，以及我们在选举中所支持的人，均受到这样的指摘或斥责，说我们解散自己独立的政党组织，目的是在“夺取”或“控制”美国劳工党和民主党。必须承认，这种扣红帽子的攻击办法是被胡佛、杜威的共和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用之著有成效，带来了损害的。其次，虽然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这次选举中起过主要的作用，共产党的解散恰恰是在选举过程中减少了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威力和活动，使我们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显然，我们不能让这种状态永久继续下去。不管我们立刻会选择什么名称或形式，我们共产主义者现在，从今天起，就必须加强和扩大我们独立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作用。在我们的

名称或正式的选举地位正待改变的时候，我們能够而且必須在基本的产业工人中建立我們的共产主义协会，扩大我們独立的群众活动，包括我們自己独立提出候选人和进行选举运动。我們这样作的时候，自然要同时和所有其他反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力量一道，去組織最广泛的統一行动。但在現在以及在将来，不論我們是保持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地位，像現在大家承认的在选举的意义上作为一个非党性质的組織，还是改組为共产党，我們必須发展我們的組織，使之成为美国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义政党。

* * *

关于白劳德現在的立場我要提到的最后一点，是他对于理論的非馬克思主义的看法。当逼到无处躲閃时，白劳德承认“也許”他的某些理論过去是、現在还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至少說，它們同实际情况和我們的实践不相符合。其次，白劳德断言，即使我們在理論战綫上犯了錯誤，这些錯誤也不是怎么严重的，因为我們美国共产主义者在我們的群众工作中作出了真正的奇迹，如像在 1944 年的选举中一样。还有，白劳德主張，如果我們在理論上犯了錯誤，那也沒有关系，因为，根据他的意見，特别是自“欧洲胜利日”以后，我們对于当前国际的和国内的許多政治发展的反应一直是正确的。

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这种歪曲和蔑視，是危險的，是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就我們政治委员会和黨員們來說，我們深刻的信念和坚决的目标是要保证：对于我們共产主义者來說，現在要像从来没有过的那样，理論必須作为行动的指南。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必須是不可分的。二者必須互相证实，互相加强。

正是由于在白劳德的领导下，直到最近我們都在修改馬克思主义，所以我們的“新理論”把我們带到了陌生的草原，我們正在陷入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泥沼中。并且，自然，我們的“新理論”未能武装我們的协会和我們的朋友，使之預見到世界和我国事务中的新变化，及时应付。我們沒有能武装起来，去应付我們現在所面临的新任务。我們对某些事变（例如旧金山會議等等）的反应是支离破碎的，是孤立地局部地进行的，沒有先見之明，沒有看清全部局勢，沒有表现出必要的政治主动性。由于我們所作的錯誤的理論上的結論，我們沒有能把美国工人階級和所有反法西斯的人在政治上充分武装起来，去迎接現在产生的新任务。

然而，有些人說，虽然我們犯了机会主义的錯誤，我們或者能够对付并使自己正确地适应現在正在变化的形勢的許多方面，我們的實踐必然要引导我們去糾正我們的理論錯誤。不过，这依然是事实：由于在理論上的立場不正确，我們已經落在事变后面，我們只是自发地行动，缺乏那个重要的共产主义的指南針：馬克思主义的遠見和卓識。

但繼續說下去：我們应当問，不仅白劳德同志，还有整个中央領導机关，他們犯下机会主义錯誤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們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改，其根源主要是在錯誤地估計了和对待了壟斷資本，特別是大企业中拥护在軍事上击败德国的那些部分。

难道我們的錯誤是在于同大資本中爭取战争胜利的部分合作，以加速納粹德国和軸心国在軍事上的失敗嗎？这些錯誤是由于在广泛的全国选举联盟中，同願意重选罗斯福的那些資本家合作所产生的嗎？我們的錯誤是由于我們設法利用并加剧資

本队伍中的分歧和矛盾，从而试图孤立并击败以杜邦、赫斯特和麦考密克为首的那些亲法西斯的集团所产生的嗎？显然都不是！

那末，我們的根本錯誤是从何产生的呢？首先，我們錯誤的产生，是由于我們有点忘記了，为什么美国財政資本中的主要部分加入战争。我們忘記了，壟断資本家的参加反希特勒战争不是为了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根本消灭它的社会和經濟根源。毋宁說，他們参加反納粹的战争是在阻止德国对全世界的統治，也在消灭或削弱一个帝国主义竞争敌手。自然，他們拥护战争的立場和美国人民的当前利益是一致的，即使沒有理由假定这些大資本家会一貫地对希特勒作战，或是对希特勒主义战斗到底。

我們的機會主义錯誤的产生，是由于我們忘記了为什么罗斯福政府和丘吉尔政府以及拥护他們的資產階級达成了德黑兰和克里米亚協議。我們忘記了，美国和英国变成这些協議的合作者主要是由于軍事上的需要，由于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由于美国和英国人民强烈的和有力的反法西斯情緒、目标和决心。

同样，我們不曾考虑到这个事实：正如杜克洛同志已經指出的，德黑兰和雅尔塔協議是外交上的協議。显然，这些外交上的協議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和行动；它們具有历史的意义。可是我們忽視了这个事实：苏联虽然会在文字上也如同在精神上一样严格承担并履行自己的保证，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集团却只在劳工和人民——真正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力量——大声疾呼并进行坚决而有效的斗争时，以及在国际力量对比强迫这样做的限度內，才会执行这些協議。

我們的机会主义錯誤还由于，即使在战争期間，虽然我們为了取得胜利而同資本中爭取战争胜利的部分合作是正确的，我們却常常倾向于依賴資本的这些部分；我們不曾充分地批評或抵制他們的动搖；我們不曾不断地、足够尖銳地反对他們向亲法西斯的反动派让步；我們不會在有的时候保持我們自己独立的立場。我們受到了关于資本中所謂拥护罗斯福部分的“明智”和“遠見”的幻想的不良影响。并且，回顾一下，我們必須承认，我們最近的机会主义錯誤是有一段长远历史的，是受到了“罗斯福十年”、受到了罗斯福“时代”給予美国劳工和进步运动的自由資產階級影响的不小影响的。

最后，并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对壟断資本中反軸心部分在战时和将来所起作用怀抱的幻想，我們有点忘記了，美国財政資本，美国帝国主义，它本身就孕育和产生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在战后，美国資本主义会寻求并促进帝国主义的擴張——它会力图用武力或是用“冷战”的方法，成为世界的霸主。

由于此，我們共产主义者不知不觉地倾向于使工人階級的独立的和領導的作用、从而也使我們共产主义組織的先鋒作用变得模糊，受到削弱。由于此，我們对劳工和人民不曾尽早地警告他們，讓他們作好准备，使他們动員全部力量去应付新的复杂的战后問題。而我們現在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并不顾一切困难这样去作，以便——首先是——及时防止我們自己国家里面法西斯主义的成长。

* * *

必然要发生这个問題：为什么会容許这个根本的机会主义錯誤以及其他的右傾錯誤滲透到我們的战时工作中，并影响我們对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路綫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其所以弄到这样，是因为我們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干部生来就倾向于修正主义，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嗎？其所以弄到这样，是因为我們的领导已經破产，在同法西斯主义或反动派作斗争中很少贡献或者毫无贡献，或者是因为我們缺乏布尔什维克式的誠实、正直和热忱嗎？

提出这些問題就是要来答复它們。答复是：并不是！党员和我們絕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是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們为工人阶级当前的利益和最終的利益——社会主义而斗争。我們在贏得战争胜利上，在促进民主、和平、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事业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們已經证明了自己能够——虽然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捍卫和促进工人阶级、我国人民和我們国家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产生了在最近时期對我們的政策和群众工作起了不良作用的那些使人迷失方向和起麻痹作用的机会主义影响和錯誤呢，我們究竟应该怎样来解釋呢？这可以用下述理由和因素来解釋：

1. 在动员一切力量去击败希特勒德国和軸心国的时候，在这当中，我們不免由于胜利而有点疏忽大意，头昏脑脹。我們贡献自己的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去求得胜利，这是正确的，而我們在这样作的时候，也对这个目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这样作的过程中，我們变成了片面性的。我們使一切服从于粉碎希特勒主义这个偉大目标，为了有效地工作来实现这个目标，我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以清除我們工作中的一切宗派主义，我們这样做都是对的；虽然如此，但我們却完全忽視了把这样做跟对机会主义同样警惕地进行斗争结合起来。我們忘記了乔治·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正确忠告，他在 1935 年就警告所有国家的共

产党员；要胜利地实施联合的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綫政策，我們就必須

“……从我們队伍中根除一切自滿的宗派主义，这特別会阻塞我們接近群众的道路，妨害实行真正的布尔什維克的群众政策。我們要千方百計地加强反对右傾机会主义一切具体表现的斗争，認識到，正是在执行我們的群众政策和斗争的实践中，这一方面的危險将要增加。”

2. 在我們争取战争胜利和一般的反法西斯活动过程中，在参加广大的全国团结陣营时，我們对待我們的非劳工同盟者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毫无警惕的态度。我們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受到了資产階級中反軸心部分的影响。对罗斯福总统以及同他联合一道的那些資本部分，尤其是这样。这样，我們就常常尾随在罗斯福后面，不願去批評他的錯誤、弱点和犹豫。因此，我們沒有显出充分独立的立場。我們沒有充分保持我們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一致性和先鋒作用。并且，因此之故，我們对工人們和黑人的許多迫切的苦恼之事不免加以掩飾，有时甚至对他們的斗争澆冷水。

3. 还有，下述事实也助长了我們的机会主义：我們的全国领导机构还没有完全掌握馬克思主义，在竭力支持和进行这次民族解放战争中，我們常常把森林和树木分不清楚，不免把短期的战术和暫时的現象估計成或提高到策略和“新理論”的水平。在这一点上，列宁在他的《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所說的下述透辟的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

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弗·伊·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出版社，第77页。）①

4. 最后（虽然没有把这个题目说完），我们的错误产生，是由于在我们的各个领导委员会中，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我们还没有树立真正的民主和集体工作。我们不免堕入形式民主和自己奉承的陷阱中。我们把铸造坚固的、不可破坏的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跟创造一种人为的团结混淆起来了，后者是一种削弱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把领导和党员分隔开来的，不能把我们大多数工会干部和全体党员吸引来最全面地参加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的团结。这在养成和延长机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为了最快地纠正我们的错误，为了帮助防止在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这种情况的重演，为了使我们的组织能够迅速地、胜利地完成它的新任务和责任，我们现在必须作些什么呢？

显然，有许多步骤和措施必须现在就采取，这同时也是为了准备尽早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这些步骤和措施包括下列各项：

1. 必须加深和扩大我们协会内现在进行的民主讨论，把连

① 译文根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0页。——译者

續的、徹底的和建設性的批評同最大限度的自我批評與糾正結合起來。我們必須防止過分和歪曲，不論是右傾的還是“左”傾的。並且，在這樣作時，我們必須堅決保持和加強我們共產主義組織的基本團結。

2. 必須建立以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基礎的，到處都有的和充分發展的黨內民主。首先，必須停止這樣的做法：不經過協商，突然把新的和主要的政策提到我們會員面前，並且常常是提到全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面前，作為我們協會的路線和既定的決策。其次，必須把全國委員會，以及每一個州委員會，變成一個起作用的和負責任的政策制訂和領導機關。

3. 必須以經過最大考驗的工人階級幹部，以最忠誠最能干的馬克思主義者來刷新和加強我們全國和各州的領導機構。這將要求採取大膽的提拔政策，還要求把現有領導機構中最健康的馬克思主義核心同新的、廣大的、忠實而能干的無產階級幹部配合到一起。這將要求在我們整個領導、會員和群眾之間建立更加密切得多的聯繫。這還將要求我們全體會員和所有的領導委員會發揮最大的政治警惕性，不僅根據他或她的投票或政治聲明，而且要根據行為和表現來判斷每一個領導者和會員。

4. 迫切需要把我們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建立並加強起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作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不管我們會員關於我們共產主義組織的名稱和形式最後作出的決定將是怎樣，我們必須立即在最有決定意義的工業中加強我們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基地，實行重新配備我們的領導幹部去幫助其實現；我們必須在所有的戰綫上——在工業的、選舉的和立法的戰綫上，特別是在思想和理論戰綫上，擴大和改進我們獨立的共產主義者的群眾工作，發揮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主動性。

5. 現在特別迫切需要的还有：我們要在我們的全协会之內，从上到下，組織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有系統的研究，来掌握它。从对我们政治委员会決議草案的主要路綫、对杜克洛的文章、以及对福斯特同志1944年1月20日的信作有計劃的研究和应用开始，我們必須鼓励和开展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特别是对下列著作进行最广泛最深刻的研究：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和著作；《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还有同样重要的斯大林所著《論列宁主义基础》和《掌握布尔什維主义》。

6. 我們必須以我們的討論和“決議”为依据，立即开始审查所有一切部門的工作，审查由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领导的或受它影响的一切报纸、刊物和机构；这就是說，必須在所有的工作領域內和所有的群众組織中，审查我們的理論和实践，以及我們的干部。

7. 我們迫切需要提高我們整个运动的警惕性，根除并防止宗派主义，以及发现和驅逐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的敌人奸細。

8. 同样迫切需要的，特別在現在我們內部討論期間，是向最广大的群众阶层解釋清楚我們的政策和策略。我們必須对报纸上出現的对于我們的立場的一切誣蔑、曲解和顛倒黑白立即予以回答，如对在紐約《世界电訊报》和《紐約时报》的专栏和社論中最近所发表的一些东西。我們必須利用公共宣傳中的一切途徑來說明我們的立場，使得人人都能了解。

9. 最后，我們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必須坚决地把我們現在的

討論和審議同最大限度地動員我們的一切才能和力量，擴大我們同一切反法西斯分子和進步分子的聯繫結合起來，以求迅速實行我們決議中所定的行動綱領。

必須盡一切的努力，毫不遲延地把勞工和所有的民主力量集合起來，團結起來，首尾一貫地擁護一個進步的外交政策，一個健全的經濟復原計劃，並準備進行當前的市選舉和有決定意義的 1946 年國會選舉。現在就必須盡一切的努力，及時造成全國最廣大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團結，並加強英蘇美聯盟的友誼和協同行動。

必須盡一切的努力，去幫助杜魯門政府確定它的方針，這個政府在外交政策領域內最近雖然有些搖擺和首尾不一致，它卻還能感受群眾的壓力，可以影響它，使之沿着雅爾塔路線向着進步的方向前進，特別是——如果勞工和人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的話。

* * *

我也像政治委員會一樣，深深相信：我們的討論和審議將使我們的共產主義運動大大加強起來，將達到具有更大的獨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考，達到真正的民主和集體工作，達到更高類型的共產主義者內部的團結。從我們討論的初步結果來看，從在作出任何正式決定之前，我們已經在基本上開始改組我們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使之變為美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事實來看，這已經得到證實。這一切都是有利的。這是前途的吉兆。

就政治委員會的決議來說，我想要提出如下的意見：決議的主要路線和方法是正確的。但還有許多增加、改變和改進的余地。因此，我想建議，我們批准決議的主要路線，接受它作為一

个草案，选出一个小小的委员会去把全国委员会和我们会员所提出的全部修正纳入决议之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把已经修正的决议草案提交我们的会员去讨论，最后提交应尽早召开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批准。

为了重新建立我們 馬克思主义的先鋒队

約翰·威廉遜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18—20 日举行的會議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在主要的报告中和在討論中，我們已經确定了这里所要提出的一切問題的解决途徑——不論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組織上。我所要做的，是从我們最近的經歷中得出某些教訓，指出同作为工人階級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作用有关的一些問題的解决方向。我們要提出来的，并不是最后确定的或“不可改变的”提議。这些問題有待于这次全国委员会作认真的討論。

* * *

讓我們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取消主义的某些表現。

第一，关于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民主联盟方面的作用：虽然我們进行了斗争，就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作为促进和领导群众运动的一种有組織的力量的必要性、它的作用和效果問題予以澄清，求得了解，并且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反对想要把我們的組織只限制在教育活动方面的那些人，但事实依然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我們倾向于把我們組織的独立的馬克思主义先鋒队作用

降到最小限度。

以这样一个前提为根据来进行思考：在未来的长时期内，我們自己的利益和战时联盟所代表的所有一切階級力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就把我們組織的作用限制在这个联盟的範圍以內。我們忽視了一个基本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对工人階級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我們不論在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独立的立場，目的在于首先影响在全国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工人階級，同时警觉地批評和克服我們联盟陣营內部的犹疑和动摇。我們的立場又常常被这种思想所决定：“我們不应当也不能够作任何事情去危害联盟”。这被錯誤地解釋为：对于罗斯福政府和資產階級中拥护击败希特勒德国的部分所犯的錯誤进行批評，就会“削弱联盟”。我們倾向于使我們的特性消失在一般的民主运动之中，而不是坚决保持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的独立立場，作为加强——而不是削弱——全国團結的先决条件。这样，我們就不能解决在我們組織中經常表現出来的那种矛盾——我們一面和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同一面又保持我們自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特性之間的矛盾。

在选举运动进行中，我們取消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和无綫电讲话，停止了以我們自己的名义散发傳单，在分发文件方面以及在我們的报纸发行方面都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如此等等。在某些地区，以及在許多分会中，过去六个月到九个月內沒有准备和印发过任何一个文件，就具体的事件有所反应，并表明共产主义协会的看法和对群众提出的行动路綫。我們未能有效地反对和消除这种趋势：日益增长地低估我們自己的独立作用，基层組織在同各地民主力量合作时，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組織和展开独立的活动。我們未能有效地同这种趋势作斗争：把我們的

基层組織变成“討論中心”，而不是环绕当前的关键問題去組織群众斗争的中心。对于我們队伍中和許多工人中坚持要提出的这个問題，我們不能給予滿意的答复：“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同其他爭取战争胜利的进步組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我們所看不到的东西，即这一类問題与其政治根源之間的密切联系，工人們却直觉地比我們了解得更清楚。他們大多数不肯加入我們的組織，在地方工会选举中以及在其他許多場合不給予我們不断的支持，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我們看到，自从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成立以来，我們會員成分中的产业工人和工会會員的比例已經减少。从定义上我們知道，一个共产主义組織要完成它的先鋒队作用，“必須吸收工人階級所有的优秀分子，吸收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們对工人階級事业的无限忠誠。”虽然我們有了許多积极的成就（我們并不想减低其一絲一毫），我們能不能老老實實地說，我們的組織已經包括了可以吸收的和准备参加的一切先进工人呢？我不是在讲理想。事实仍旧是，今天我們只有316个煤矿工人，虽然十年以前我們成員中的煤矿工人超过此数好几倍；我們也只有1,427个鋼鐵工人和840个海員。我可以从其他的工业中，从各个州和城市里举出无数的例子。

和这些数字具有同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我們說服工会运动，包括产业工会联合会，使之相信我們政策的正确性的能力还远远沒有完全养成。我們沒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或是有組織的力量，使我們可以影响并繼續領導劳工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而不問工会运动內外任何一个領袖在重要关头如何行动。

我們知道，工人，特別是基本工业中的工人，应当更容易了

解我們的政策——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想法。可是，我們看到，在若干關鍵性工業中，我們的工人階級基礎正在削弱。在過去一年中，我們成員中的產業工人和工會會員人數已在減少，這是六年來的頭一次。非常明顯，我們應當從關鍵性工業和工業區域中吸收某些工人階級力量，但在此期間不曾作到。

顯然，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吸收新會員的能力不及共產黨。雖然我們有 63,000 個共產黨黨員登記為協會會員——占我們黨員人數的 82%（不算軍隊中的黨員），並且我們的會員人數新增了 25%，但這主要是由於在改變名稱以前所進行的大規模徵求黨員運動。1943 年上半年我們的平均每月入黨人數為 3,615 人；1944 年為 4,275 人；但 1945 年上半年降到 1,185 人。附帶也要說句公道話：今年是我們自己根據我們的一般政策，決定不從事任何大規模的吸收會員工作。

第三，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對待報紙的態度。在這一個錯誤上，我和另外的少數委員是不能算在內的。幾個月來，我們進行了鬥爭來樹立《工人日報》的編輯方針。從某些人看來，辦小報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萬應靈藥。又有人說，我們需要一種非常通俗的報紙——類似《共產主義下午報》的東西。我們在報紙發行方面也有同樣的表現。首先是取消了紐約的“白勞德小隊”。其次是結束了送到家裡的制度。然後是一種理論，認為《工人日報》和《工人週報》的分銷責任不應當放在會員和分會的肩上。可以通過賣報攤和郵局訂閱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從我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想中產生的。結果是否定了共產主義者和分會在報紙發行方面應起的積極作用。另外一個結果是，這在實際上使我們連偷着賣報（bundle sales）也做不到。這就使得我們完全依靠資產階級的分銷方式，如銷報機構和美國郵局，來把我們的消息

和领导意图传达群众。

第四，关于一个共产主义組織的成員的概念。我們形成了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組織成員的概念：参加分会开会不是重要的事；收集会費是例行的和不上算的工作，因此我們不妨每年收一次会費；分会每月开一次会也就够了。这样，在过去一段期間內，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同它的會員至少有 50% 沒有保持組織上的接触。还有这样的理論，說我們是在折磨會員，我們使得他們負擔过重，我們不能期望新會員都来开会并完成如此繁多的工作。所有这些看法根本上都是不正确的。我不是在这里說，我們沒有能够采用和应当采用的新工作方法，或是沒有我們大家都应当学习的新东西。自然是有的，但新的工作方法决不能削弱关于怎样才算是我們的組織成員这种共产主义概念，或是摧毁把我們同其他的人区别开来的东西。中心的問題是正确的政策，但我們需要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特点的組織来执行这种政策。这就要求我們同所有这样的企图作斗争：把我們的分会变成民主党或共和党类型的分会，或是变成只不过类似乒乓球俱乐部和討論会的東西。我們必須迅速克服所有組織上的渙散現象，并擯棄用来为这种現象辯护的全部理論。

第五，是会費繳納的大大减少。数年前，全国黨員繳納党費平均达到 85%，有些地区的比例还要高些。可是，在 1944 年下半年，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会员繳納会費的，平均只有 71%，而 1945 年头五个月又降到了 58%。更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头一季度在这一类关键性的工业地区如俄亥俄只有 44%，密执安 32%，伊利諾 45%，匹茲堡 58% 的會員繳会費。

第六，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論書籍銷售額的大大降低。我只有不包括紐約在內的全国数字。这些数字表

明：在1938年到1943年六年之間，我們每年平均售出了34,000册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可是，在1944年就降到了19,000册，其中还包括5,000册“列宁家庭图书室丛书”。我沒有紐約地区的数字，但他們告訴我下降的比例大致相同。

在这种情勢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种危險的局面。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威廉·泽·福斯特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1945 年 7 月 26—28 日在紐約市召开的
特別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大会重新建立了美国共产党。

在过去几星期內，我們从事于我們党的历史上最坦白、最深刻和最富自我批評精神的理論分析和实际政治討論。因而現在，我們党的絕大多数已經深信：我們在過去十八个月中的政策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丑恶昭彰的修正”。在南方完全解散了党組織，这表明白劳德同志和他的政策是在引向何处。……

—

我們党的修正主义錯誤：这种 錯誤的根源和趋向

白劳德带着他的修正主义，是在企图把一种右翼资产階級自由主义的制度加在我們党的身上；这种自由主义是如此的保守，以致在許多問題上它使我們远远处在罗斯福的右边，处在自由派报纸的右边，处在劳工运动中主要部分的右边。这种修正主义完全放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甲、白勞德路綫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否認。白勞德發展了資本主義周期和總危機已經消滅的資產階級理論；他否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工人被剝削的理論。這樣，在過去兩年內我們黨對資本主義這種人剝削人的制度沒有作過任何批評，也沒有對僱主們榨取血汗得來的利潤提出任何的譴責。我們反而聽到許多同志談到——白勞德未加駁斥——我們有所謂義務去保證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僱主們得到所謂公平利潤。這種可恥的胡說八道居然在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中聽到！當白勞德如此流利地沿用“自由企業”這個口號時，他實際上已經同時接受了大部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懷着巨大的信仰，他甚至超過了像蔡斯、漢森、約翰斯頓一流熱心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乙、白勞德路綫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原理的否認。白勞德同志這樣就否認了階級鬥爭：在工人中散播幻想，認為在戰後同慷慨為懷的僱主們會有一個長時期的和諧的階級關係；主張階級關係除非表現為贊成或反對“德黑蘭”，否則不再有任何意義；認為大壟斷資本家的“道義感”、“開明”、“進步主義”和“真正的階級利益”是確立他們同工人的階級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以這些唯心主義的抽象概念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原理。白勞德的階級合作和資本與勞動間利益和諧的理論同伯恩斯坦、累琴和康帕斯的理論是用同樣的機會主義材料制成的，不過白勞德的思想比起這些臭名遠揚的過去的修正主義者所曾經作出的任何東西來，是更加無恥的資產階級的東西罷了。

丙、白勞德路綫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具有進步的和革命的主动性這種思想的否認，從而也是對共產黨的先鋒隊作用的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正根基是：工人階級以共

产党为首，领导民主的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最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但是，白劳德同志把这个思想抛棄不顾了。他的《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特别是《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一个进步的资本家阶级，特别是美国的财政资本，领导我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去实现莫斯科、德黑兰、雅尔塔和旧金山会议所定的伟大目标，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繁荣的社会。白劳德看到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劳工和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只起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作用。

丁、白劳德路线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論的否认。白劳德同志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描绘了一幅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美国部分——的烏托邦图画，它不是气息奄奄的，而是生气勃勃的，进步的——一个将要进入空前未有的扩张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否认。白劳德相信，在他的“开明的”美国壟断资本家领导之下，我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将会和平地、自发地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调整他们和苏联之间、和欧洲获得解放的国家之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歧，而不必通过群众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它和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这个列宁主义原理是根本冲突的。

戊、白劳德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前景的否认。很显然，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在白劳德同志的仁慈的美国壟断资本家领导之下，能够克服它自己的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像白劳德所瞻望的幸福的和资本主义的进步世纪，那末整个社会

主义問題就变成只不过是抽象的东西罢了。白劳德接受这种邏輯，放棄了对社会主义的鼓吹，即使是从純粹的教育意义來說。在他論德黑兰的书中，他把我們党的最后的社会主义目标抛在一边，把关于我們的目前要求的綱領扩大为一种狂想的资产阶级的烏托邦，其中絲毫沒有社会主义的余地。

从所有这一切应当看得明白，白劳德宣傳的是反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像杜克洛所說的“对馬克思主义的丑恶昭彰的修正”。他是在对我們党作战，从而也是对他所称的“欧洲的馬克思主义者”作战。但像所有其他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他是在最新的馬克思主义这个虛伪旗帜之下来提出他的机会主义的。然而，他是認識到他正在对全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正面进攻的，这从他常常表示的对“陈旧書籍”和“陈旧公式”的嘲笑就可以明白看出，后者他自然指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和公式。白劳德想要我們拋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而代之以他的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把这个妄称为馬克思主义。他最近的两本书不能称为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书同埃里克·約翰斯东的思想类似而不是同卡尔·馬克思的思想类似。

白劳德的惊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是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对我們党所加压力的屈服。他的整个綱領的阶级受益人是我国的大资本家。当他散播关于他們的所謂进步主义这种幻想，掩飾他們的帝国主义侵略，侈談資本主义的烏托邦来使人看不见一切社会主义前景，以雇主們在战后时期会自願使工資加倍这种希望来欺騙工人，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从而使党遭到削弱等等时，他的路綫同我国大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擴張和統治世界的計劃是完全吻合的。这样，他就給了最反动的分子，美国大资本家以可乘之机，后者在战后时期将是制造經濟紊

乱、法西斯反动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最强大的世界力量。

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最危险的方面之一，是通过白劳德的著作的传播，这种修正主义正在渗入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这样，在本半球上，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我们若干兄弟党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因而削弱了它们对正在进攻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提防。有些欧洲和亚洲的党也感染了白劳德主义的取消作用。真的，白劳德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澳大利亚共产党，实质上告诉它应当作什么，不应当作什么——这种劝告被那个党愤然拒绝了。在杜克洛的文章刊行之前，白劳德也在考虑给英国共产党一封公开信，力劝它在当时迫近的议会选举中，在英国民主力量同保守党丘吉尔集团结成选举联盟来反对反动派（原文如此）的前景下，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今天从工党对丘吉尔已经取得胜利来看，这听起来是何等荒谬。白劳德的计划显然是，在他所能影响的那些共产党之间，建立一种大体上协同一致的合作关系，以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为新的世界核心，以他自己为它的领袖，以他的修正主义政策为它的纲领。杜克洛的文章粉碎了这个计划。

白劳德修正主义虽然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才突然完全表现出来，其根基却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他担任党的领导的时候。对这个较早的时期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没有获得更大发展的主要原因。白劳德的政策多年来对于我们党是一种损害。

我们党的讨论已经搞清楚了一点：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对我们的战时政策起了削弱的作用。我们有許多同志依然相信，白劳德的政策在战时是必要的。并非如此。这种政策肯定是对我们战时工作的一种损害，像我在《工人周报》6月10日一期所写的文章中详细谈到的一样。并且有不少的人相信，是白劳德

制訂了我們的全力支援戰爭、加強聯合國家的聯盟、开辟第二戰場、最大限度的戰時生產、不罷工保證等等政策。然而事實上不是這樣。當制訂這個正確的總的戰時政策時，白勞德還在亞特蘭大，他同這種政策的制訂是毫無關係的。可是，當他從監獄中一經釋放出來，他差不多立即開始以他的損傷元氣的修正主義來暗中破壞我們的正確政策。然而，除了修正主義的影響以外，他並沒有能完全破壞我們的正確的戰時政策。儘管有了他的修正主義，我們黨還很可以為自己的戰時記錄而自豪，為自己在一切戰線上全心全意地、忠實地為爭取戰爭勝利進行鬥爭而自豪。可是，如果我們企圖把白勞德的政策延續到戰後時期，就會感到他的修正主義的全部破壞作用。這就會給我們的群眾工作和我們黨本身造成重大的災難。杜克洛的糾正的文章對我們是來得正當其時。

過去的事實是，白勞德修正主義的腐蝕作用正在迅速地把我們黨引向一個主要的內部危機。他的親資本家的自由主義疏遠了我們黨的同情者，並在我們黨員的思想造成了混亂。他把我們的政策暗中破壞到這個地步，以致最後要用一個專家去向一個進步工會的會員解釋，為什麼他應當參加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或繼續作一個會員。我們會員的士氣迅速降低。會員人數的變動急劇增長，從而我們吸收新會員的能力降低了。我們黨內的工會會員所占比例急遽下降。我們同黑人的接觸已被削弱，特別是由於在南方取消我們的組織這種損害重大的行為。分會開會時出席人數驚人地減少了，而繳納會費的人數比例之低，為空前所未有。當一個共產黨受到修正主義的毒害時，這就是它所遭遇的一切。我們要进行艱巨的工作，才能克服這種正在發展的危機，並把我們黨重新引到一個健康地成長和發展的道路上。

我們党感染了白劳德修正主义之后的一个特别有害的后果是：由于使党失却了战斗性，这就不免把工人投入了托洛茨基派、路德派、托馬斯派、杜宾斯基派和刘易斯派等伪左的煽动家的掌握之中。

黨員們都莫名其妙，为什么党的領導差不多是全体一致地犯下了这个严重的錯誤：采納白劳德的露骨的修正主义路綫，特别是在过去 18 个月內。让我来試图說明这一点：

第一，在采納白劳德关于德黑兰的歪曲政策之前，我們党在白劳德的领导下，已經有好几年墮入了支持罗斯福而不作严肃的自我批評这种机会主义的實踐中。它从而开始采取了一种对待资产阶级的錯誤态度。我們对待资本家所采取的日益发展的机会主义态度又由于下述原因而更为增强：未能清楚地認識到，我国大资本家的拥护战争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不是为了促进美国人民的民主的目标。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綫是，把大资本家或多或少地当作民主势力的忠实战友来欢迎。以这一切机会主义的顛倒黑白作为党的政策的背景，在德黑兰會議以后，白劳德就不难主張我們同大资本家的所謂战时合作在战后时期将会繼續下去，并加强起来，从而最后完全陷入了机会主义。这种議論从許多人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既然世界的社会主义部分能够就“德黑兰”达成協議，在战时和平时同世界的资本主义部分合作，那末，美国的工人同资本家为什么不能在战时和战后时期也和諧地一道工作呢？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推論作基础，白劳德于是再添上了他的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的消灭、资本和劳动間利益的協調等等烏托邦理論。不幸，我們党的領導中其余的人未能揭露其显著的机会主义核心，从而把这种复杂的烏托邦結構摧毁。

第二，白劳德同志能够偷偷地把他的机会主义加諸我們的党，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因为在我們組織內盛行着过分的集中主义。由于白劳德的巨大的个人名声和他的过分擴張的权限，他的話在我們党内实际上就是法律。因此，他能够压制对他关于德黑兰的錯誤論点作任何分析性的討論。我的意見是：如果白劳德的提議能够得到真正的討論，那它們最后就会为我們党所拒絕，但这样的討論是不可能的。

現在我来談另一件使我們党和它的朋友深深感到困惑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党的領導机构在十八个月中差不多是全体一致地追随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綫，怎么能够突然轉到同白劳德完全相反的立場上来呢！

在答复这个一般的問題时，我想，不仅領導的意見，还有全党的意見都有突然的、几乎是惊人的轉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战争在欧洲将近結束时，白劳德的政策已由生活本身证明它破产了。此外，成千上万的党员在最初接受这种政策时，就有重大的怀疑和犹豫，已經准备有所轉变。

誠然，有过許多象征，表明党的政策即将改变。对德战争的結束，罗斯福的逝世，帝国主义对联合国家旧金山會議的襲击，美国制造商协会显然在准备战后向有組織的劳工进攻，許多次罢工的发展，如此等等，引起了我們政治委员会許多領導者的关心。丹尼斯、格林、湯普森、威廉逊諸同志以及其他的領袖們或是已經开始表示同白劳德完全相反的意見，或是提出了問題，这些問題白劳德感到根据他对德黑兰所作的曲解是日益难于回答的。在事变的压力下，即使白劳德自己也被迫拋棄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某些更为露骨的形式，他近来感到不得不写几篇同他的路綫显然矛盾的“激进的”文章。丹尼斯和格林已經提出建議，

要召开全国委员会會議，重新审查我們的战后前景和政策。这种审查是不可避免的，当最后經過审查时，我相信在党的路綫上一定会作出重大的改变。然而，正像我們从白劳德同志現在反对全国委员会的決議所能够看到的，这样的改变只有在面对他的頑强抗拒中才能产生。

如果杜克洛的文章早几个月发表，我們党在接受它时就远远不会这样一致。然而，它恰巧发表得正是时候。接受它的客观情势已經成熟，我們党的領袖和党员們也是日益如此。因此，一切已經准备好了，我們党的意見就突然发生了使如此众多的人感到困惑的改变。我們党突然回到了它的基本的共产主义原則上来。……

二

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下一阶段的任务

甲、进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运动：从党对全国委员会決議給予的占压倒多数的支持来看，显然这次代表大会是会坚决擯棄白劳德同志的資产階級自由主义的。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們現在可能造成的极端錯誤，就是由此得出結論說，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經完全胜利了，我們現在可以对之漠不經心，只顧自己的日常工作了。相反地，我們必須繼續进行并加强思想斗争。虽然在这次代表大会結束时，我們党的正式的一般討論将要停止，我們將要加强团结，共同一致地、有紀律地去实行我們所采取的路綫，然而我們必須进行在我們党内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最广泛最深入的教育运动。我們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教育我們的党，这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为此，我們必須审查我們所有学校的課程、教学人員和教科书。

我們必須重新審查我們最近刊行的全部文獻。我們必須準備出符合我們新路線的新的宣傳鼓動材料。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不僅要肅清白勞德的錯誤理論，而且要肅清在白勞德作為黨的領袖的長期統治中發展起來的所有一切機會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這種機會主義的方式和方法是如此的盛行，以致在各州和全國領導崗位上的許多同志都深深地受到了它們的感染，常常甚至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未來的時期，需要我們密切地認真地注意，才能把那些狡猾的公開和隱蔽形式的機會主義，那些白勞德主義的惡劣影響根本清除。同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防止“左”傾宗派主義的急劇增長，後者是我們黨內經常存在的危險，現在就已經有所表現了。我們必須避免過去當黨的政策急劇改變時我們曾經做過幾次的事情，即是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我們必須避免從公開的修正主義這個極端飛到狹隘的宗派主義這另一個極端。一件壞事是同另一件壞事一樣有害的。

乙、重新建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的意見是，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應當重新建立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首先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朝着解散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走了一大步，正像我們現在在南方看得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們在這裡不馬上把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改組為共產黨，我們就將重復過去的絕大錯誤。丹尼斯同志在他向我們全國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已經確實表明：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成立並不像白勞德同志斷言的一樣，有助於我們的選舉運動，而是嚴重地妨害了這個運動。同樣，威廉遜同志在向全國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毫無疑義地表明了：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繼續存在，對我們黨的工作和組織的每一方面都在產生取消的作用。從所有這一切得出的明白教訓

是：此次代表大会应当毫不迟延地重新建立共产党，特别包括南方的組織在內。

在我国的选举上并没有什么錯綜复杂的事情是共产党不能比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应付得更好的。保持现在的名称在政治上是无法辯护的。坦白地作为共产党来行动，我們在人民中将要有更大的声望。此外，每一个先进工人都知道一个“党”的意义，但是試問有什么人，即使是白劳德同志自己，真正知道一个“政治协会”的意义呢？只有有着一个党，我們才能完成我們面临的巨大任务。在这次大会上如果不能重新建立共产党，那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錯誤。这会使我們的党员失望；这会瘫痪我們的未来工作；这会給白劳德的反对以鼓励；这会是一个象征，表明我們看得不够清楚，不够坚决，以致不能采取根除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必要步驟。……

丙、刷新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我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几篇报告和論文中，我曾就我們党所犯的修正主义錯誤尖銳地責备白劳德同志。我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白劳德是这种修正主义的主要制造者；他把它理論化；他不經過討論，硬把它塞进我們党里；現在他又拒絕接受糾正，一直忙着企图对全国委员会的決議組織反对。可是有些同志却认为，在我駁斥白劳德时未免过于严厉。但这是一种温情主义，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不坚定。白劳德同志對我們党造成了并且还正在造成严重的損害。当他在一年半以前把他的荒謬的资本主义想法引进党内时，他使党处在一个可笑的境地，而当現在我們不得不从他的錯誤政策中改回来的时候，他又使党暴露在猛烈的扣紅帽子的攻击中。他严重地削弱了我們党的日常工作，使党员的思想陷于混乱。他也使我們党在其他共产党中的声望大大下降。

但是，虽然必須集中主要火力在白劳德身上，把他作为我們所犯修正主义錯誤的思想上的領導者，这并没有解除我們全国領導机关其余的人、特别是政治委员会委員所負的重大責任。我們的領導机关未能在理論上揭露白劳德的机会主义，从而使党避免后来在自己的工作上，在自己的声望上，和在自己的黨員人数上所遭受的損害，这是一个大弱点。

政治上的錯誤是严重的事情，是不能輕易放过的。在这反对法西斯的严酷斗争时期，这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自由，甚至还可能牵涉到他們的生命。因此，必須使犯了这种錯誤的領袖严格負責。所以，全国委员会決議中所作的提議，“刷新和加强协会所有負責的領導委員的人事”，是恰当的。党必須在它的領導机构中作出它可能作到的最好的保证，使这样一种損害重大的錯誤不致重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同志所断言的，“整个全国領導必須清除”。这样一种“左”的方針将会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道潑掉。

共产党不是永远不会錯的，即使是最好的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犯錯誤。共产党同其他的人民政党在这一方面的区别是：前者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武装起来的，它比任何其他集团所犯的錯誤要少得多，并且当它犯了錯誤以后，它就坦白地承认錯誤，改正錯誤。剛剛不久之前，斯大林曾說，苏联在进行战争中犯了許多严重的錯誤。在他1937年3月3日所作的《掌握布尔什維主义》的著名演說中，当他指出党的領導犯了沒有能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險这种严重錯誤时，他說：

我們的領導同志对于每一种反党的和反苏維埃的趨勢是具有丰富的斗争經驗的，而在这一次却是如此的盲目和天真，以致不能认出人民敌人的真正面目，不能看清披着羊

皮的狼，不能把他們的假面具撕下來，這怎麼解釋呢？

他們忘記了，蘇維埃政權只攻克了六分之一的世界，還有六分之五的世界是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掌握之中。他們忘記了，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

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正像所有的人都會同意的，而這是發生在世界上最先進的共產黨里。

當共產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時（而我們的錯誤是嚴重的錯誤），就要求對領導幹部加以審查；但這決不能解釋為一種象征，要對黨的領導輕率地大量撤換。這種大量撤換只有當黨落到了一群死硬的不可救藥的修正主義者手中時才會可能，而我們黨的情形不是這樣。因此，在我們的情況下，為了刷新和加強領導所要做的是，在下述基礎上來挑選我們新的全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的成員，即仔細審查各個委員的資格，包括他們的社會背景、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訓練、他們以前在黨內的历史、他們這次所犯錯誤的大小、他們同工會和群眾組織的聯繫、他們現在對待白勞德修正主義的態度、和他們有效地從事未來黨的工作的一般希望等等。顯然，在我們各個領導委員會中，特別是在政治委員會中，必須作出重大的改變。特別要使工會會員和退伍軍人參加到全國的和各地區的領導機構中來。現在黨的情況必將導致我們黨的整個領導的極其重大的改進。

丁、重新樹立民主集中制：我們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鬥爭的一個基本要點，是在把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重新引進我們黨內。在白勞德同志擔任領導的期間，黨離開這些原則很遠了，使自己受到了一種腐蝕性的官僚主義的感染，白勞德是這種官僚主義的中心人物和主要動力。

我們過去所有的是集中主義，事實上是一種過度的集中主義

义，而民主則很少。白勞德同志在几年当中，經領導上和一般黨員的默認，曾使得在我們当中对共产党的領導形成一种完全錯誤的概念。他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他的权威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他的話在我們党内变成实质上是不可爭論的。他的政策和著作最后由領導者們和一般黨員几乎毫无批評地予以接受。白勞德在他周圍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即他是永远不会錯的，他的权威是碰不得的。所有这一切，又为我們的領導和我們的黨員所經常向他表示的大量的的小資產階級阿諛、贊美和英雄崇拜而弄得更加厉害了。

白勞德同志被这种不适当的阿諛和他的独断专行的权力弄得深深自我陶醉起来。因之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权衡。他拋棄了共产党员的謙遜和列宁主义的自我批評，墮入了最狂妄的自吹自擂之中。这种自我吹嘘的态度給白勞德个人带来了巨大的損害，也給我們党造成了重大灾难。

經常貪得更多的权力，白勞德同志大大地取滑了党的各个領導机构的政治作用。他在决定政策时，习惯于繞过政治委员会。可以作为特征的是：他的关于德黑兰的臭名远揚的报告并没有全部提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事先所看到的，只是少数几个片断。这个报告是在有几百人参加的全国委员会上，被突然地哄动一时地以真正的白勞德方式提出来的。全国委员会也逐漸失去了它的全部的真正的政治权力。它开会；它听取白勞德的提議；它批准这些提議；然后它散会，委員們分別到各个地区去，把政策强加給黨員們。在全国委员会中，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討論。同样，我們最近召开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比起全国委员会的會議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正式批准白勞德的报告，没有政治討論，没有对領導的自我批評的审查。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气氛中，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不能存在，也并不存在。政治思维本身已经被阉割了。白劳德同志依靠自己在党员中享有的崇高威望，随心所欲地决定政策，其悲惨的结局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阻止政治讨论上白劳德究竟准备要走多么远，可以从他压制我在1944年1月给全国委员会的信上看得出来。我要使这封信达到党员面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冒被开除及肯定使党分裂的危险。即使那样，我的信也未必能真正提交全党讨论，因为那时候的问题就会是保持党的团结的问题，而任何试图讨论我的信的人，就会被白劳德称为托派。

党必须坚持：作为使自己摆脱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必须在各个地区和在全国范围内扫除这一整个官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起真正的集体领导。书记处应定期向政治委员会作报告，后者必须自由地讨论它的报告。全国委员会必须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力，它必须有最充分的自由来讨论由政治委员会提出的或由书记处各个成员提出的所有一切报告。政治委员会中重要的意见分歧必须报告全国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决不能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像在白劳德的领导之下一样，它必须在事实上同在名义上一样，成为我们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党必须坚持：党的领袖应实行自我批评，对于掩盖自己的错误、而不坦白承认并分析这种错误的领导者，党必须学会对他进行监督。对领袖们所作的小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也必须停止。我们应当尊敬我们选出的领袖，但不应把他们当作神来看待。我们必须坚持：从基层分会到最高的各个委员会，党的所有各级都要实行真正的政治讨论。然而，我们党不是一个辩论团体；我们需要作出决定，然后坚决地付诸实行。但没有集体的思维、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领导，我们既不能制定健全的政策，

也不能有效地付諸實施。只有實行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這種健全的原則，我們黨才能使自己的錯誤減到最小限度，並培養出頭腦清醒的統一行動和嚴格紀律，後者是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強大力量之所在。

戊、加強黨的獨立作用：白勞德同志的修正主義的中心是經常降低共產黨的獨立作用。這種對我們黨的政治主動性的削弱，以各種各樣的作資產階級尾巴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致命的機會主義至少在過去十年內在白勞德的領導中都可找到。它產生了便於托洛茨基分子和杜賓斯基社會民主黨人進行煽動的效果。

這樣，在白勞德的領導之下，我們黨照例地沒有去充分批評羅斯福政府的缺點，沒有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建議。在同樣的尾巴主義精神之下，白勞德拒絕尖銳地批評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反動政策，除了在最過不去的場合之下。但是最壞的例子是，他把美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美國銀行家協會及其他反動的僱主聯合會描繪為進步團體，因而它們有資格在國家經濟和政治方針的各个方面領導全國，這樣來企圖使我們黨無耻地直接跟在美國財政資本後面。這個尾巴主義的例子是對德黑蘭決定所作曲解的真正核心，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領導不得其人的最不光彩的一頁。

白勞德同志把我們黨的領導作用降到最低限度這種既定政策的另一表現，是他有系統地使我們黨不要露出光芒。這就是說，近年來白勞德不讓我們黨就所有的政治問題以自己的名義勇敢地表示意見，差不多總是設法使黨退到後面去，把主動權讓給其他的組織。這種有害的做法，曾經大大地削弱了我們在群眾中的威信，使我們黨蒙上一層莫須有的鬼鬼祟祟的氣氛，妨礙

了我們运动的充分合法化。

还有另外一种这样降低我們党的作用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形式：白劳德长期繼續实行把我們党的活动实际上限制在群众煽动的範圍內，避免所有一切的群众組織工作和斗争。白劳德对于說話有一种不可思議的崇拜。他是一个專門說說的人，而不是一个群众斗士。需要用行动来支持言語，他对这一点很少經驗，或者懂得很少。特别是近年来，这种趋势表现得很明白，因为白劳德中了我們令人作嘔的阿諛奉承的毒，对于他自己的演說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种日益夸張的看法。他最后达到了这种程度，他似乎相信，就某个問題所要作的全部工作，就是由他发表一篇演說，由党在全国将其大量散发，于是百事大吉了。白劳德大大低估了群众組織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几年以来我們党沒有自行組織过任何真正的群众运动，也沒有动員自己的力量，去支持其他正在为人民的权利进行斗争的組織。这种长期发展起来的取消党的群众組織工作的趋势，最后以解散共产党、組織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作为几乎純粹是一种政治教育团体而达到了最高峰。

党必須断然地同白劳德的长期的尾巴主义决裂，同他的把党的面孔藏起来、避免进行群众斗争的作法决裂。党必須恢复它的政治主动性和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尽管某些政府官員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領袖們也許不喜欢我們这样作。

現在有許多群众組織日益增多地就各种問題坦白表明自己的进步意見，这自然是好事，我們必須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发展这种趋势。但决不能用把共产党推到背后去，推到阴影中去，使工人看不见它有所行动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我們的党，如

果它要群众承认它是他們的政治領袖，必須就每一个重要問題迅速地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意見。自然，在这样提高党的政治作用时，我們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宗派主义的錯誤。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党必須重新获得它的这种技巧：尽可能最彻底地动員我們的党员、动員我們同它合作的那些組織去支持自己所說的話。

目前在这一方面我們面临一个巨大的任务，即在工人的工資运动中极其迫切地需要我們帮助来在战时不罢工保证的範圍內，組織一个广泛的和积极的政治运动。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我們將面临一个更大的任务，那时候反动派将拚命地企图来攆夺对国会的控制。我們必須运用我們的全部技巧去喚醒和动員工人与一切民主力量，击退反动派的政治攻势。

己、改进党的社会成分：要根除白劳德的机会主义，并建立一个坚固的隄防，防止其将来再度出現，党就必须根本改进自己党员和自己领导的社會成分。我們必須从基本工业部門中吸收日益增多的工人。我們尤其必須从工会會員和退伍軍人中吸收党员，并使之参加我們的领导机构。由于党現在的路綫改变，爭取这类党员的工作会容易些。

由于我們所采的新路綫，我們党员和同情者的士气現在正在大大提高。他們很高兴能从白劳德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令人窒息的迷雾深处解脫出来。因此，我們必須注意，使这种新的热情化为大規模的建党运动，使我們党增加数以千計的新党员，特別是在我們的集中地区，而这将会大大增加《工人日报》和我們的其他刊物的发行数量。我們对白劳德同志及其修正主义所能作的最好的答复将是：吸收数以千計的新党员到我們党内来——炼鋼厂、煤矿、汽車制造厂、铁路以及其他关键性基本工业部門的工人。

四

对某些問題的答复

我們的新政策的最高准繩是它在实际上应用于人民的当前要求和利益。只在我們有着成功的实际的群众政策和活动时，我們才能使自己一方面摆脱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另一方面避免陷入“左”倾宗派主义的陷穽。……我想对关于我們党的新政治路綫的某些一般的錯誤观念加以糾正，以此作为結束語。

第一种錯誤观念表现在这种議論中：白劳德同志贊成广泛的全国团结，而党的新路綫則趋向于使我們的活动范围縮小。情形正好相反。实际上，依我們党的經驗来衡量，白劳德同志的政策肯定是在削弱我們的組織和它的群众联系。这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明：他的取消政策使我們党迅速失去了活力，使它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中。这样，这个政策暗中破坏了我們一切工作的真正基础。此外，白劳德的路綫，連同其所謂进步资本家自願保护工人利益的无稽之談，正在破坏我們党在工人中的威信，使工人同我們疏远起来，在此期間在不只一次的重要工会选举中共产党人的失败，正是表明了这一点。

我們許多党员觉得白劳德的政策是如此荒謬，以致他們甚至不願试图在工业中去应用它。但有一位同志，布法罗的弗雷达·韦伯在一篇討論性的文章中曾表明，那些曾經试图在工厂中应用这个政策的同志所遭遇的是什么。

由于我們在当时所面临的是解雇問題，工厂中的討論自然环绕着这样的問題：我們被解雇之后遭遇将会怎样，我們将在其中生存的战后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有几个月我站在那儿，告訴每一个願意听我讲话的人：在战后的世

界中我們的購買力會大大增加，資本家會自願地給我們更多的工資，因為他們想要有一個繁榮的戰後世界。我可以附帶說說，許多人不是不願聽，就是聽了發笑。

如果我們堅持把白勞德的不罷工保證推行於戰後時期，那就會使我們在勞工運動中孤立起來。除了這一切之外，白勞德已經使得全國所有一切擁護戰爭的自由力量同我們疏遠了，使他們變成了我們黨的激烈的反對派。一個政策如果使我們黨喪失了最主要的東西，破壞了我們在工人中的威信，並且一般地使民主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對抗，那它就沒有什麼“廣泛”可言了。

與這一切相反，黨的新路線將要建立黨，並將鼓舞我們的黨員，使之具有無比良好的士氣；它將使我們在工人中正在低落的名望恢復起來，它將為同所有的民主力量實行真正的合作奠定基礎，它將為可能最廣泛的民主聯盟奠定基礎。

我要談的第二個錯誤觀念，就是白勞德現在正在散布的東西。這同第一個錯誤觀念有些類似，它的意思是說：白勞德同志是代表全國說話的，而黨以其新路線則只是代表工人階級說話。這也是對於實際的曲解。白勞德所代表說話的國家，是他想要由反動的財政資本領導的國家。這樣一來，他不是代表全國的利益說話，而是代表大資本家的利益說話。而在我們黨代表它來說話的國家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是起決定作用的進步力量。因此黨確是代表全國說話。例如，在現時工人為維持其工資率而進行鬥爭時，我們黨認為工人們通過防止他們的購買力的喪失從而防止整個工業機構的瓦解，事實上是在為促進國家的經濟繁榮而鬥爭。因此，我們主張，在工人們的所有一切工資鬥爭中，他們應當把這個事實擺在自己宣傳的最前面：他們維持自己的工資，就是在捍衛全體人民最重大的經濟利益。在

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其他領域內，同樣的原則也是適用的。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來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時，黨的確是在代表全國的真正利益說話。在黨為黑人、為農民和為各個中等階級進行鬥爭時，同樣是如此。

第三個錯誤觀念，是白勞德正在黨內散布，想要黨員們相信的：白勞德同志是“德黑蘭”的擁護者，而黨現在則是反對德黑蘭決定的。沒有什麼能比這更不真實的了。實際上，白勞德通過綏靖美國的財政資本，正在向“德黑蘭”最凶惡的敵人投降；而我們黨，以全世界民主力量的聯合鬥爭為其現行政策的基礎，則是在採取使德黑蘭所定偉大目標能夠實現的唯一方針。在這次戰爭中，可以贏得對法西斯主義的徹底勝利；和平可以維持一個長遠的時期，聯合國可以為世界經濟復興採取聯合的行動。然而，達到這些目的的道路，不是像白勞德所提出的，把世界領導權送給美國財政資本，而是要通過全世界的民主成分對壟斷組織，特別是對美國財政資本中最反動的部分進行機敏的鬥爭。

我想要提出來反對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錯誤觀念，是我們黨內抱着“左”傾宗派主義看法的人正在散布的，意思是說：黨現在的綱領只不過是暫時性的，我們正在走向對現在的國內形勢和世界形勢作更“左”的解釋。依這些同志的意見，我們將要，或者應當把對日戰爭叫做帝國主義的戰爭，譴責德黑蘭決定是不能實現的，拋棄全國團結的口號，號召成立工农政府，放棄我們戰時不罷工的保證，放棄為6,000萬人就業而進行的鬥爭，把社會主義問題提出來作為當前的問題，並且一般地採取階級對抗階級的政策。

但這些同志太喜歡憑主觀願望來思維了。我們的黨，如果我了解它的話，不打算採取任何這一類“左”的路綫。因為黨的

絕大多數人懂得，這一類“左”傾政策可能造成的損害，不會比白勞德的右傾修正主義更小。全國委員會決議所採取的路綫是一條正確的路綫；在它的分析上，在它对当前要求的表述上，以及在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处理上。我們必須按照这个決議的路綫行事，自然也要考慮作出必要的修正。我們不是在一方面擺脫白勞德的右傾机会主义，同时又墮入“左”傾宗派主义的泥沼。

現在，最后，我想要說：我們党現時正在經歷它全部历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有这样的人，他們希望它的黨員数量将要大为減少，它将陷入劇烈的、有害的派系斗争。但是这样的人，不論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一定要完全失望。党正以毅然決然的團結精神来作出这个重大的轉变。不会有派系斗争，我們党也不容許有任何的派系斗争，不論是从右的方面还是从“左”的方面。从这种情况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們党将是健康的、生长的，它同群众的联系将会扩大和加强，它的黨員和領袖由于更深刻地懂得了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将要精神振作，意志坚强。

工人的經濟状况正在恶化，失业人数正在增加，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及其他的雇主組織已經动手来削弱或破坏工会，联合的反动势力正在計劃竭尽全力来企图夺得 1946 年国会选举的胜利，政府对工人的需要缺乏适当的反应，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显然严重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正摆在我国面前。工人们将不得不积极捍卫他們的权利、經濟生活水平和工会。一般人民将不得不为德黑兰、雅尔塔和旧金山的目标而斗争。这种形势将把巨大的責任加在我們共产党人身上。但是，我們党已經恢复了青春，已經恢复了元气，而且正在起着先鋒队的作用，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来面对这一切逼在眼前的斗争。

共产党的重建

约翰·威廉逊

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1945 年 7 月 26—28 日在紐約市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大会重新建立了美国共产党。

党章委员会的目的，是在对党章作出一切必要的修正，使它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

就党章提出的修改建议如下：第一，我们建议增加 20 个新条款，这些条款明确地处理了我们认为为保证我们党的正常活动，特别是保证党员充分参加党的工作所必然要涉及的问题，明白地规定着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我们提议取消三个旧条款，我们认为这些条款同我们组织的有效活动是不相符合的。第三，我们就原有的五个条款有所增加。最后，我们就原有的八个条款予以加强，对原有的三个条款重新写过了。当我往下说时，这些你们都会一一注意到的。……

名称和目的

关于名称和目的的头两条显然是极端重要的。在提议的名称和目的中，我们的党章必须反映我们组织的根本特点——即它是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正像你们看到的，我们明白建议把组织的名称改为共产党。我们认识到，1944 年 5 月把共

产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根本是錯誤的。我們这样說，并不是因为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階級政党必須永远叫作“党”。然而，在1944年5月的情况下，名称的改变根本是不合理、不正确的，因为更改名称的緣由和动机，淵源于我們的修正主义政策。例如，埃爾·白勞德提出的解散共产党的理由如下：

共产主义者預見到，他們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內，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因此，我們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結的阻碍。（《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第117頁。）^①

这意味着对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必要性这整个概念的拋棄。这意味着取消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作用。正因为共产党的解散标志着我們的修正主义的錯誤，所以我們明确提出恢复共产党的名称。我們坚决相信：

1. 重新确立共产党的名称和形式的問題是同党的正常作用和活动有关的原則性問題。我們必須作出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必要糾正，肯定将由于恢复共产党的名称而得到帮助。

2. 为了恢复一个工人階級先鋒队政党的正确的馬克思主义概念和作用，就必须重新采用共产党的名称；其次，

3. 必須在所有一切方面完成本届代表大会所进行的工作，包括名称在內，这样就不会留下另外有所推測的余地和任何“未完結的工作”。

关于我們共产党的目的。这已經在全部重新写过的“序言”

^① 本书第282頁。——譯者

中明白确定，这个序言还在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手中，不久即可提出。让我单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某些必要条件重申一下。

1. 党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这样来起作用。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只要反映民主群众所想的，并使之具有更明白、更正确的形式，就能实现我们的先锋队作用。显然，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意味着给群众运动以领导，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尾随在群众运动的后面。虽然我们 must 经常同人民共呼吸，并成为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着重指出的，党“如果把自己限制在记录劳动人民群众所思维所经历的限度以内，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为了实现党的先锋队作用，我们必须能够提出群众常常还不能完全接受的或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想法，并且以这样一种令人信服的和有效的方式提出来，使我们能够影响劳工和人民，使之接受这种想法作为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必须经常力求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认识和觉悟。我们必须永远保持独立的立场，其目的首先在于影响全国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工人阶级，同时警觉地批评和克服在我们联盟阵营内部存在的犹疑和动摇。在我对全国委员会会议所作的补充报告中，我列举了共产党在公众关系领域内、在选举活动中以及在群众运动中进行的一系列的独立活动，这就以当前的实际事例说明了我們应当怎样起作用。

不应把我们对我们的党的独立作用所作的正确强调解释为意味着削弱我们同群众或他们的组织的联系。亦不应将其曲解为意味着拆散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和密切的工作关系。不应当将其解释为意味着用对一小群先进工人的自满的领导去代替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实现党的独立作用意味着加强我们同群众的

联系；因为，必須明白地認識，沒有我們的貢獻和活動，群眾就會受到非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思想的所有一切潮流和逆流的影响。發展共產黨的獨立活動意味着，激發起更多的共產主義者，使他們更徹底地投入群眾運動之中，并使非共產主義者有越來越多的人行動起來。

就其更廣闊更根本的方面而言，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這一個概念的實質是：我們在實際上以及在綱領上日益變成工人階級的黨，幫助工人階級擺脫所有的資產階級影响和思想，加強它的團結和組織，提高它的階級覺悟。

在過去，人們總是把我們作為一個先鋒組織——指路人——一個總在提出和捍衛工人階級的需要、同時加強同整個群眾運動日益密切的联系的組織而加以尊敬。人們把我們作為一個行動的組織、一個辦事的組織而加以尊敬。雖然個別的非共產主義的領袖可能歡喜我們把我們的活動限制在政治顧問的範圍內，人民群眾、首先是工人所看到的共產黨卻是一個鬥爭的組織。在未來的幾個月中，必須使這種看法完全重新樹立起來。

2. 共產黨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看來好像是老生常談，可是我們在過去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而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的。特別是在這十八個月中，我們迷戀於對馬克思主義作一種肤淺的理解。我們反復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需要加以豐富和發展”，但是我們忘記了，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首先意味着吸收它的實質。我們忽視了實質的東西，而死死地抱住文字的形式。沒有實質的指南，我們就陷入了修正主義，這就是我們昨天討論過，並且對它正式作出了決定的。在強調指出我們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時，我們決不可忘記這意味着：

甲、我們必須為工人和所有其他被壓迫人民的日常利益進行不倦的鬥爭；我們必須對全國黑人的鬥爭、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求解放的鬥爭給以一貫的領導；

乙、共產黨以之作為本身基礎的工人階級是民主、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屏障和最一貫的捍衛者，因此工人階級的組織、團結和獨立作用是合乎我們國家的利益的；

丙、在繼承我們國家的一切民主傳統和所有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傳統的同時，我們永遠在群眾面前保持社會主義這個目標，作為生產社會性同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私人經濟所有制之間的矛盾的歷史解決辦法。

努力懂得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不單是領導上的任務，而且是全體黨員的必要任務。我們必須懂得：我們黨員和幹部——不問他是黨的工作人員還是工會中的積極分子——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越高，他們工作和領導的結果就會越加有效。讓我們決不要忘記列寧所着重指出的，“先鋒隊的作用，只有由一個用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完成。”

然而，我們談到這一點已經不是頭一次了，而僅僅重複這一點，即使在今天的情況下，其本身也不會向我們提供保證，使我們組織能經受這種考驗。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求我們同歷史地低估馬克思主義理論真正重要性的態度決裂，這種態度近年來在我們隊伍中是表現得極其明顯的。其次，這意味着，必須採取實際的措施，幫助我們的黨員和領導在其日常活動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武裝自己。

3. 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共產黨必須懂得：在我們的全部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在鬥爭中努力來影響和領導工人与人民。組織工作不是什麼內部的活動，它主要是

以加强我們在群众的活动和斗争中影响他們和领导他們的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研究小组，而是要达到下列目的：以知識和經驗武装我們的党员，使他們懂得在所有的斗争中如何采取最有效的策略和战略；帮助工人們自己就涉及的問題得到正确的理解。鼓动工作就是这样一种能力：能說，能写，能提出在斗争中可以把群众集結起来的要求。訓練干部就是要使工人階級有可用的最有經驗的，經過考驗的，受过訓練的和忠实的領袖，以便有对工人和人民的敌人取得胜利的最大可能的保证。

4. 共产党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是：在工人階級中要有牢固的根基，要保证使产业工人构成其成員的大多数。想要有成功的领导和影响我們国家的方針的能力，首先要求我們維持和大为扩大我們同工人階級的联系，特别是在基本的工业中。我知道有些人提出了类似这样的問題：在白劳德的领导下，我們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并且影响了我們国家的生活，但是在福斯特的领导下，我們將不过是一个工人階級意見的傳声筒罢了。显然这是錯誤的。在白劳德的领导之下，由于我們的种种取消主义的做法，我們在國內的影响比从前小了，这正是因為我們削弱了同我国最重要的力量——工人階級的联系。实际上，我們受到了國內其他階級力量的影响。为了成功地影响全国的政治生活，共产主义組織的中心或重点应当放在大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工业中心。这就是說，我們最强大的根应当扎在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在鋼铁、汽車、煤炭、海运、电机設備、造船和五金工业中。今天的情形不是这样。我們未能迅速認識形势的变化，未能迅速地使我們的口号和我們的策略路綫适合于新的問題和新的条件，因此我們有許多次——即使只不过是暫时的——使領

導權落到了路德之流以及其他激進的愛講漂亮話的人手中。然而，黨在基本工業的工人中有着巨大的後備力量，如果我們工作得對，我們就能夠贏得他們的信任，重新樹立我們的領導。

黨員的權利和義務

為了這一切理由，我請求你們通過我們黨章的第一條和第二條。只有現在採取這個行動，我們才是按照我們黨員已經表明的意志行事：把現有的組織名稱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改為正確的名稱——美國共產黨。

現在我要來說明下面兩條，第三條和第四條。這是規定共產黨的黨員資格和黨員的權利義務的。我們不能滿足於僅僅糾正我們的綱領和政策。對我們所犯錯誤的了解也必須反映在共產黨員覺悟的提高上，這表現在積極性更大，分會開會時出席人數更多、參加範圍更廣，所有各處的黨員均在幫助擬訂政策並履行我們的新的責任等方面。

接受綱領和政策只不過表明有了成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意願。執行綱領的第一個條件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參加黨的日常工作。雖然認識到在服務和活動上不能有平等，共產黨必須力求在自己的隊伍中只能有真正積極的黨員。在黨的活動的整個畫圖中，每個黨員必須找到他或她的地位，不管貢獻是怎樣的小。這自然不應曲解為：把在群眾組織中積極活動的黨員抽回來，使之從事黨的地方群眾工作，儘管這是重要的工作；更不是要把他們抽回來，使之從事某些黨內活動。這種活動只要實際上可能，就應當溶合到一起。在群眾組織中積極活動的黨員必須參加他們黨支部的會議。擔任黨支部的領導將認為同擔任地方群眾組織的領導具有同等重要性。

虽然党员应具备的各种条件是同样重要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們却強調“活动”和“参加支部會議”这个新条文，因为在过去我們錯誤地鼓励了关于两类党员的看法——积极的党员和拥护的党员。这既是取消主义的表现，又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崇高的和唯一的作用的歪曲，以及对民主集中制的歪曲。

如果我們想要使党员們在有組織的政治指导之下积极起来，就必须使全体党员参加支部會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30%的人参加支部會議。这也要求我們糾正完全把重点放在支部的純粹教育活动上。我們除了参加地方或城市的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之外，同时要开展独立的共产党人的活动，这样我們將表明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使我們同我們与之合作以实现这种或那种当前目标的所有一切其他組織有所不同。通过支部所說的和支部所做的，我們將确实表明，共产党同其他进步組織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关于党员的其他条件也必须簡單說明一下。就拿閱讀我們的報紙問題來說。如果我們全体党员每天閱讀《工人日报》，我們在群众运动中的政治效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会增加好几倍。关于繳納党費問題——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时只有60%的人繳納会費，这表明組織松懈以及对我們政策的不滿，現在我們則必須重新以100%的人繳納党費作目标，至少要求全体平均达到90%以上。

我請你們注意两个新款——第4款和第5款。第4款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則重新申述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的期間，有进行毫无限制的討論的权利。第5款适应我們认为应当加以強調的一种需要，即是使党员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間参加主要政策的制訂，此时我們沒有审查和討論我們的全部政策和工作的同样不

受限制的权利，像在代表大会开会前 60 天中一样。

这并不像埃爾·白勞德同志昨天晚上所指的那樣，意味着在此次代表大会的有权威的行動以后，我們現在的討論还要繼續下去。我們的黨章在以后的條文中正确地重申了共產黨人的一種傳統的观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它的決議对每一个黨員均有拘束力。白勞德的看法是，在我們黨員参加了我們党的历史上一次最詳盡的討論以后和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審議以后，这一切都沒有意义，在这里还是不能作出決定——这种看法首先反映了他对我們的黨員資格以及对我們自己作为代表的資格的意見；其次，这也是白勞德的美國例外論的显著实例——面对世界各处共产主义运动已經确立的組織原則的一种例外論。

最后，关于这两条。你們看到，我們有了好些新款。其中有些是更明白地規定共產黨員的某些义务，但大多数是在努力特別強調黨員的权利。

組織形式

我現在來說明第六條，第七條和新的第八條。

对共产党的組織和活动必須結合我們所已經确立的黨員資格的概念来考慮。在組織机构上必須提供確保最有效地動員黨員的手段；保证全体黨員有充分的机会参加党的政策的擬訂和商討；启发黨員執行決定和政策的必要的責任感；創造条件，使黨員能够掌握党的原則和綱領；这样来使党實現它作为一个先鋒隊組織所应起的作用。

看到了我們过去所追隨的修正主义政策怎样在我們組織的性质和活動上也表現了出来，我們現在就必須迅速克服在此期

間發展起來的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的做法和方法，這些東西妨害了共產主義的組織，使它不能起先鋒隊的作用。我們的錯誤不在於曾試圖使我們的組織形式“流綫型化”或美國化。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我們組織的政治內容，而這正是我們的修正主義路綫的基礎之所在。但組織形式和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當我們糾正我們的修正主義政策時，必須同時在組織上作出斷然的改變。政治內容和形式的適當配合會增加我們作為一個美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影響和聲望。

“地方支部”(The Community Club)將保留為主要的和重要的組織形式。但既然現有支部的大小、做法和內容已經大大地破壞了黨的獨立領導作用，削弱了同黨員的聯繫，並歪曲了關於我們組織成員所應有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共產主義概念，那就必須立即採取步驟，使地方支部的組織適合於重新樹立黨的先鋒隊作用這個主要的目標。

地方支部的人數應當大大減少，使得有可能來建立組織更純一、職權更明確的支部，便於很容易了解自己的成員，並在執行其決定和任務上具有更大的機動性的支部。

建立較小的支部不能認為是回到多年前的組織單位上去。設立支部辦事處，發展更普及的形式，使共產主義支部的立場為當地人民所了解，在今天比在以往更加重要。但是沒有理由認為在此種情況下不能把地方支部的辦事處維持下來，由幾個支部共同利用中心辦事處，即在某一地區或市鎮中為當地所熟知的共產黨的辦公處所。其次，支部的公開的政治性必須大加發展，以便在當地群眾運動中贏得對於支部的承認。只有這樣一個支部：它就當時的迫切問題對當地的人民經常發表意見，制訂一個多方面的活動綱領，以便領導人民來解決這些問題；它作為

一个組織，加强自己同当地其他領袖和組織的联系；它通过演讲、傳单、文献和《工人日报》經常同当地人民保持接触——这种支部才能希望赢得当地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地方运动的公认参加者。

在过去一段时期內，取消工厂的組織形式〔the shop form of organization〕大大削弱了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同基本工业中工人的联系，从而实际上妨害了我們工人階級的成員对我們自己的組織和对劳工运动作出他們最大的貢獻，对我們赢得劳工运动使之采取正确政策的能力起了不良的影响。多年来第一次出現的一种趋势，即我們成員中产业工人的人数减少，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工厂的組織形式已經取消，而地方支部不曾为工会會員們提供必要的指导，去解决他們日常面临的复杂問題。虽然我們不应忽視取消工厂組織形式的緣由，即为了加强和維持我們同劳工运动中进步力量的联系，我們却必須同时加强我們在工人階級的起决定作用部分中的組織，并且建立一种中介，通过它，工厂工人能够参加来拟訂那些对劳工运动和我們国家能起影响的政策。因此之故，你們的委員會坚决相信，工厂支部应当重新建立，作为共产主义組織的一个基本形式。

依你們的委員會的意見，重点应当放在工厂組織形式上，而不是放在产业組織形式〔the industrial form of organization〕上。我們这样說，因为工厂組織形式的优点是：使共产党人能够影响和提高他們經常保持接触的同伴工人的工人階級認識和觉悟。而在产业支部中就不是这样。一个产业支部不能肯定有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它的成員不能同工人群众保持更为密切和更为有效的日常接触。自然，产业支部可以使某一个工业中的共产党员聚集到一起来交換意見，但一个共产党支部的全部作用和目

的远远不限于此。其次，工厂支部是在基本工业中实行集中的关键之一。工厂支部与产业支部不同，它还可以防止把地方支部中属于工会会员和工厂工人的党员全部抽光，后面这种作法只会进一步削弱地方支部作为对当地工人阶级的需要必须有所反应、必须予以捍卫这样一种组织的效果。我们将要考虑，特别要在基本工业的大工厂中建立工厂支部，这种支部在那里会加强工人的作用和活动，保证更加有效地动员我们的党员，保证我们的组织得到更稳定的发展，而在共产党组织特别弱因而必须迅速加强的工业中，也要组织工厂支部。

建立了人数较少的地方支部以后，在许多主要城市和地区中的支部数目会比以前加多。为了作出更直接的领导，各州的党组织应考虑重新建立以一个县、一个国会选举区或一个州议会选举区为单位的党组织。

为了建立同党员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有助于使支部的积极分子直接参加政策的拟订，各州党组织应认真考虑在各县或其他的分区建立支部代表机构——县代表会议——作为分区的主要领导机构。这种代表会议不能看作仅仅是一种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一定的时期开会来听取报告，而是应当变成一种工作的机构，代表们参加各个委员会，有机会讨论和决定政策，并就代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经常向他们的支部报告。

民主集中制

因为我们过去如此严重地忽视了共产党人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原则已经体现在第六条和第七条中。让我简单地重申一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概念。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方法，它把在政策制订和

所有领导机构选举上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同委员会权力的足够集中结合起来，后者是为了保证对问题即时有所反映，并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整个组织来实现中心的任务。这样，民主集中制保证了所有的领导委员会都由党员选举，所有的基本问题都经过党员讨论并作出决定。选举的领导机关有责任就较高的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和所作的决定有系统地向党员报告。但在较高的委员会一旦作出决定以后，这种决定就成为全体党员的行动路线。

民主徒具形式的集中制是决不能成功的。民主和集中的融合，只有在全员党员在支部中经常进行共同的活动和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在支部中，讨论并精心拟订一般的政策，来应付各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和问题。

我们承认，我们领导机关没有能在党内发挥真正的民主。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未能帮助党员们在理论上以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武装自己，从而能够在政策的拟订和执行中最有效地发挥主动性，积极参加。

我们必须警惕对民主集中制的歪曲，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是那种“世界产业工人”的工团主义的旧理论，说领导者的任期不能超过一年；抑或是一种单纯的工会理论，说在党的领导定出一个政策或发起一个运动之前，每一件事情都要交到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州的党委会就一个极端重要的主题对各个分会送出一系列的问题，等待答复，而并不表明领导上认为对这个主题应当采取什么政策，这就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领导方法，已经说了许多。这里只要再强调一下就够了：在我们提到大家面前的党章中，我们建议全国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开会三次，而不是像在194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其选出的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间一样，隔了十个月。政策的制订应当同有关的主要党员商量，即使他们不在委员会内。新的重要政策应交由党员讨论。应当通过同主要工厂、基本工业和决定性地区的党员有着密切联系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出不断的努力，来重新检查政策的正确与否。应当建立一种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包括全国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在内。为了改进一个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党员和领导的作用，自我批评是最重要的武器。只有共产党组织才能巧妙地使用这个重要的武器，而不损伤它自己。最好是温习一下苏联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必遭灭亡。^①

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本来很懂得并能有效地运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但也开始作出恰好是这段引文中警告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我想全党将会小心地注视每一个领导者，看他将来的行动是否和他的言语一致。

让我唤起大家的注意，在这个修改过的党章中，对于职员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旧党章规定，职员由各州和全国代表大会选

^① 譯文根据1948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40頁。——譯者

举。我們提議，各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不但要选出各自的执行委员会，而且要选出它們认为必要的所有职员。党章指出名称的只有主席这个职位，其他职员由全国委员会和各州委员会自行决定，虽則很显然，不論是哪一個委员会，必須有几个書記，一个财务。

这种关于领导的概念所强調的是：权力在于委员会，而不在于个人。这种概念是建立在集体的前提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个别职员的前提上面的。它使职员对委员会負責，而委员会有权更換职员，不必等候代表大会开会。这会造成一个更大的民主习惯。这是所有其他共产党的习惯。

最后，我們增加了一个新条文，称为全国监察委员会。这一条的第一款这样說明它的目的：

为了加强和监察我們干部的誠实和坚决，为了防止破坏党的原則，为了維持和加强紀律，为了监督會計帳簿的审核以及党的全国委员会的記錄，全国代表大会应选出全国监察委员会。

再加上这一点就够了：在过去这段时期內，在組織概念和組織活动十分松弛的时候，所有警惕性也变得完全迟鈍了。有許多的問題存在着，或者已經产生，可是从来沒有人去查問。加以适当的警惕，能够采取預防的措施来避免严重的后果。……

目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任务

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決議，1945年7月28日通过。

第一 部 分

納粹德国在軍事上的失敗是世界民主偉大的历史性胜利，是全人类偉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一划时代的胜利，是由于英苏美联盟的协同行动得来的——是由于紅軍給予的决定性打击、由于美英的进攻、以及由于各种抵抗运动的英勇斗争得来的。这种胜利，为在欧洲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处削弱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打开了道路。这已經造成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新的反法西斯的团结，其标志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组成了代表人民意志的民主政府，在英国选举中劳工进步派取得了胜利。

希特勒德国的被粉碎，也为彻底击败和摧毁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在这次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是在远东获得和平和安全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国达到民主团结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緬甸、朝鮮、菲律宾和印度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法西斯軍国主义日本的被击潰，对于帮助保证联合国家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同样是必要的。

所有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目标，对于美国人民的国家利益、

对于彻底摧毁世界各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都是极关重要的。现在，随着纳粹德国和轴心国的失败，由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削弱，以及全世界民主力量从而得到的加强，各国人民已经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造成新的民主进展和社会进步。

二

然而，为了使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进行尖锐的和持久的斗争。其所以是这样，因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还没有彻底摧毁。其所以是这样，因为美国和英国集中在托拉斯和卡特尔里面的极有力量的反动势力拼命要在反动的基础上重建已被解放的欧洲。其所以是这样，还因为美国帝国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集团正在力图使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全世界。

美国财政资本中起支配作用的部分之所以拥护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不是因为它憎恨法西斯主义，或是想要把受难的欧洲从纳粹专制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它认识到，希特勒德国是一个决心统治全世界的危险的帝国主义竞争敌手。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一开始，美国财政资本就对击败希特勒德国以后将要产生的民主结果心怀恐惧。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垄断资本家在战争还可以防止的时候，反对集体安全的思想，反而选择必然导致战争的慕尼黑政策。后来，即使在反希特勒的联盟已经形成之后，拥护战争的大资本势力依然还在踌躇和迁延，还在对美国 and 世界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作出重大的让步——对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希特勒主义的最亲密的伙伴作出重大的让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资本主义

义給佛朗哥西班牙以援助；为什么它宁願支持貝当和达朗之流以及反动的流亡政府，反对英勇的人民抵抗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希望苏联在欧洲战场上流血，为什么它企图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直到可能最后的时刻。

只有当这种政策遇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反対，遇到在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中战斗的、在军事生产中劳动的千百万有爱国心的美国人日益增长的反対而证明其已经破产时；只有当可以明显看出，苏联正是由于它对納粹主义进行英勇的胜利的全面战争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更有影响时，美国資本才勉强地迟迟地走向在三大强国間建立协调的军事策略和更密切的团结。

现在，反対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了，美国经济上的“保皇党人”，也像他们英国的保守党弟兄一样，被世界劳工已经加强的地位、被欧洲的民主进展和被殖民地和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吓了一跳。因此，他们企图停止民主的前进，企图抑制劳工和人民的力量。他们想在德国和欧洲其余各处保留法西斯的残余。他们正在试图组织一个反対苏联的新的“防疫线”，而苏联在反対納粹的战争中是首当其冲的，它是民族自主、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最忠实的捍卫者。

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欧洲，人民将有权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制度，而国务院最近的许多行动表明，它反対这样一个欧洲的反动倾向正在日益增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紐斯和康納利同范登堡——胡佛和美国财政資本中最富掠夺性的部分的代言人——已经携起手来。这就说明了在这次会议上，为什么法西斯的阿根廷占有席位，以及对拉丁美洲亲法西斯的力量予以援助，为什

么英国和美国不願在波兰問題上实践雅尔塔的協議；为什么美国代表团拒絕同苏联一道，保证托管地和殖民地有民族独立之权，并正式承认世界劳工大会的代表。

这些事实，反映了美国資本中迄今为止爭取战争胜利的部分現在已經轉到同壟断資本中最反动的和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更密切的政治合作。

正是美国大企业的这种反动立場，說明了为什么在华盛顿以及在倫敦的有势力的集团正在追求这种危險的政策，即企图防止一个强大的、团結的和民主的中国的产生；为什么他們支持反动无能的蔣介石統治；为什么他們怀抱同日本天皇达成一种妥协性和平的想法，希望維持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动堡垒。这也說明了重新开始的反苏的污蔑和煽动运动，这种运动旨在破坏美苏之間的友誼和合作。

在国内方面，大托拉斯和壟断組織正在阻止制訂一种令人滿意的計劃，来适应經濟复原的人的需要，来解决經濟脱节和严重失业的問題，这种失业的現象已經开始发生，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将变得更加严重。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制造商协会及其在政府和国会中的代表——已經开始进行一次新的“开放工厂”运动来破坏工会。他們也竭力想要剝夺黑人在战时已經得到的权利。如果我們国家想要避免困难的經濟复原时期所带来的极其痛苦的后果和在战后必然要发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机，政府就必须立刻采取措施，而这些反动势力則企图阻止采取这种措施。同样，它們正在大力准备，要在具有决定意义的1946年选举中贏得一次反动的胜利。

反动派已經在利用軍事訂貨的逐漸减少来降低工資和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在軍事工业中激起罢工。他們正在阻撓通过法

案，在联邦和各州采取必要的失业保險紧急措施。他們正在发起制訂恶毒的反劳工立法，如新的“鮑尔—伯頓—哈奇劳工关系法案”之类，并阻止“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FEPC）和反对征收人头税两种法案的通过。他們企图逃避对物价和租金的有效管制，并使富人和大公司不受主要的賦稅立法的影响。他們力图把全部战費負担和經濟复原的困难放在劳动人民的肩头。

如果对壟断資本的反动政策和反动势力不加抑制，不将其击败，美国 and 全世界将面临新的侵略和战争，面临美国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增长。

三

然而，击败这种反动威胁，并使我国在世界事务中依照美国人民的真正国家利益起更加进步的作用的条件和力量，是存在着的。首先，納粹德国在軍事上的失敗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經发生了有利于民主的改变。它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它正在造成一个新的、民主的欧洲。它加强了在我国和在別处爭取維持和巩固美苏友誼和合作的那些力量，如果要确保持久的和平，美苏的团結現在就必须扩大和加强。

这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证明：美国人民中的絕大多数，而首先是劳工运动——它已經更加强大，更加成熟——是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是拥护已故的罗斯福总统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这些政策体现在克里米亚的决定和“第二权利法案”的要点中。

这还从下列事实表明出来：“旧金山宪章”得到了广大的群众支持；美国人民有决心保证，联合国家安全組織一定要实现它的历史目标——必須增进美苏英联盟的友好和联合行动，来支

持德黑兰、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協議；在战后时期，还必须加强这种友好和联合行动，使之更加巩固，更加有效，来防止或制止新的侵略和战争的再次出现。

美国人民的这个多数现在必须直抒己见，表明自己的集体力量和意志。结合在一个坚决反对法西斯的全国团结之中的劳工和所有民主力量的联合势力，必须以明确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从而影响国家的方针，使之走向进步。

美国人民必须坚持，杜鲁门政府应继续执行罗斯福—劳工—民主联盟的关于美苏友好的政策，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重要社会目标的政策，关于公民自由的政策，关于黑人权利的政策和关于集体订约的政策。劳工和人民同样必须尖锐地批评杜鲁门政府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的一切犹疑，并强烈反对它对反动派作出任何让步，这个政府在壟断组织领导的反动帝国主义联盟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具有作出某些让步的倾向。

杜鲁门政府，像它从中演变出来的罗斯福政府一样，继续受到罗斯福劳工—民主联盟的支持，并对各种阶级的压力有所反应。虽然它寻求同联盟中的劳工和更加民主的力量保持接触和合作关系，但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一般方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倾向于脱离联盟中更加坚定的民主力量，并试图安撫某些反动派。因此，极端重要的是：要有系统地建立劳工、黑人和一般联盟之内的一切真正民主力量的政治势力和影响，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来对联盟之内愿意向反动派让步的一切倾向和集团进行斗争，加以制止。对反动阵营决不能绥靖。一定要孤立它，打垮它。

为了这个目的，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有必要来坚决加强全国的民主团结，来在战后时期造成这样一种全国团结，它既能

够在国外便于摧毁法西斯主义，又能够在美国防止法西斯主义当权。因此，必須使一切反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力量以及所有其他的拥护罗斯福反轴心政策的人结成最广大的联盟，并巩固这种联盟。

为了最有效地结成这种民主联盟，为了使它对国家的事务能够起决定性的影响，工人阶级——特别是进步的劳工运动和共产党人——必須加强自己的独立作用和活动，并表现更大得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主动性。迫切需要在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各个铁路兄弟会之间取得最大限度的统一行动，并使它们充分参加新世界工会联合会。必須使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们和下级工作人员振作起来，确信自己有能力对以格林、沃尔、赫彻森和杜宾斯基之流为代表的反动政策和领导进行斗争，将其击败。

在同所有各方面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合作时，劳工首先必須加强自己同退伍军人、劳动农民、黑人、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和小工商业者的联系，加强同他们的民主组织的联系。同时，在结成全国的进步的团结时，劳工应当同这样的资本家集团或个人合作：他们为了一种或另一种理由，有时在客观上是促进民主的目的的。但在这样作时，劳工首先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团结，依靠自己同国内真正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力量的联合。

工人阶级与全国的当前战争需要和战后需要，包括采取有效的经济复原计划和维持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内，也要求举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组织起千百万尚无组织的工人。如果有组织的劳工想要使自己获得充分的力量，并起到自己作为全国的主要民主力量所应起的作用，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在粉碎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日本的重大的斗争中，美国劳

工必須重申自己不罢工的保证,并作出必要的领导,来动员人民把战争进行到底,达到最后胜利和民族解放的目的。为此,劳工在进行对日战争时,必須同贊成并支持对日本帝国主义取得彻底胜利的一切民主力量合作。

然而,劳工和其他的反法西斯力量必須認識到,在希望对日本取得軍事胜利的大企业集团中,有一些有影响的势力,其中包括国务院的某些人,他們在寻求一种妥协的和平,这就是要在战后牺牲中国和远东的其他人民来保持天皇的权力,目的在反对苏联。同样,还有一些有势力的資本家集团,包括許多政府方面的人在內,他們計劃利用即将到来的日本潰败来达到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中国支持国民党反动傀儡政府,使美国能在远东实行帝国主义的統治。

劳工和人民应当而且也必将继续尽他們的一切力量,来加速取得对日本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为此,劳工和群众力量必須为一个一贯反法西斯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斗争,并把人民集結到这个目标之下去进行斗争;必須首先依靠人民和他們的民主組織与願望。

四

为了結成最广泛的民主联盟、达到全国最有效的反法西斯的团結,由劳工极力拥护这样一种行动綱領是十分重要的:促使法西斯主义彻底毁灭,加速取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抑制托拉斯和壟断組織的权力,并从而增进人民的經濟福利,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民主。

共产党的意見是,这样一种綱領应以下列行动口号为基础:

一、加速击败法西斯軍国主义的日本!

坚决进行对日战争，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驅逐和击败贊成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軍閥达成妥协和平的人。抑制那些想要使美国帝国主义控制远东的人。

加强联合国家的合作，以保证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战后和平，确保一个自由民主的亚洲，所有殖民地和附屬国的人民均有民族独立的权利。

力促实现以共产党人同所有其他民主抗日力量的团結为基础的統一和自由的中国，从而加速胜利。給予由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軍所領導的中国游击队以充分的軍事援助。

繼續进行不間断的軍事生产，在此期間維持劳工不罢工諾言。制止雇主的挑衅。

二、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建立持久和平！

加强美苏友誼和团結，以促进持久和平，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

全部实现三大强国在德黑兰、克里米亚和波茨坦所作的決定。

毫不延迟地惩办战争罪犯，包括德国和日本的軍事參謀人員和壟断资本家在內。对所有法西斯战犯处以死刑。使德国和日本負全部賠償責任。

加强“世界劳工大会”，作为各族人民和自由国家团結的支柱。允許世界劳工大会加入“世界安全組織”的“經濟及社会理事会”。

拥护“旧金山宪章”，成立一个以三大强国的团結为基础的有效的国际安全組織。

保证所有的人民有权自由決定他們自己的命运，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形式的政府。停止英美对希腊、比利时和意大利等

国人民的政治和軍事干涉。接受意大利加入联合国家。

給予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以自决权。支持波多黎各人民和菲律宾人民提出的立刻实现完全独立的要求。

同法西斯的西班牙和阿根廷断絕外交关系。对为重建西班牙共和国而斗争的民主力量給予充分的支持。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将国务院中亲法西斯的和反动的官吏一律撤职。

帮助在饥饿中的、为战争所破坏的欧洲得到粮食，得到复兴。拒絕建立在反动的财政抵押和政治干涉基础上的胡佛计划。

为了联合国家的利益来利用“布列頓森林协定”，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并扩大世界贸易。按低利率給予广泛的长期贷款和信用，供复兴和工业化之用。揭露壟断资本把这种财政援助变成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控制的手段的一切企图，并为之进行斗争。

三、推进为六千万人就业的斗争——满足经济复原中人的需要！

使工作权和“第二权利法案”的民主目的变成我国的法律。支持“莫萊充分就业法案”。

提高购买力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当不再加班时，每周的净工资不许减低。

修改“小鋼公式”，增加工资，以适应生活费用的上涨。通过“佩珀 65% 的最低小时工资法案”。支持西曼的“权利法案”，即众议院第 2346 号议案。捍卫黑人工人战时在工业中已经得到的利益。

规定工业中有保证的年度工资。

規定較短的工作周，但因此会妨碍战时生产的地方除外。

对妇女实行工作权和工作地位平等权。为了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应規定充分的訓練、提升和年資上的权利，并建立日間托儿所和幼儿园来帮助所有从事劳动的母亲。保护和扩充現有关于妇女——作为劳动者和母亲——的社会立法，取消歧視妇女的一切立法。

拥护杜魯門總統提議扩大和增加現有失业保險金的紧急联邦立法，作为应付目前大規模减产和裁减工人的第一个必要步驟。在失去工作时，立即发給失业保險金，直至找到新工作为止。对被裁减的工人給予足够的遣散費。

为了防止經濟复原和战后时期人数日益增多的失业，应着手制訂大規模的联邦、各州、各市和地方的公共工程計劃（乡村的和城市的）：貧民窟的清除，低租住房的建筑，农村电气化，水道工程（例如圣劳倫斯和密苏里流域），新学校、医院、公路的建筑等等。

不許拋棄政府所有的工厂。保证这些工厂全部开工，从事平时的生产。

建立軍需工业、动力工业和公用企业的公共所有制，使之处于民主監督之下。

拥护一切保证农場充分生产的措施。击败那些贊成减少产量的。扩大并加强維持农产品价格的計劃。举办低利信貸和充分的农作物保險。保障以戶为单位的农場。帮助佃农变成自耕农。廢止南方半封建的分成制。

維持并严格执行租金和物价的管制与定量配售。加强物价管理局执行法律的权力。消灭黑市。

处分发战争財的人。不許对百万富翁和大公司减少公司

稅、超額利潤稅和所得稅，或退還這些稅款。減少納稅能力最低的人的賦稅負擔。

通過華格納—莫萊—丁格爾社會保證法案。

四、對為勝利而戰鬥的人保守信用！

大大提高軍人的家庭和親屬的贍養費。

擴大和改進軍隊中的民主指導和討論制度。從勞工隊伍中吸收更多的人來參加指導工作。取消軍隊教育工作中的一切反勞工和反民主的教材和教導。

保證所有退伍軍人和軍事工作者的就業、機會和安全，不問其種族、信仰和膚色如何。

擴大“士兵權利法案”的範圍和好處，清除退伍軍人管理局的一切官僚作風。保證每一個退伍軍人得到充分的醫療照顧。

力促加速通過法律，按服役的年限和性質，發給相當數額的遣散費，其經費從高額的個人收入和公司收入課稅中支付。

保證黑人退伍軍人享受有關退伍軍人立法所規定的全部好處。

五、捍衛和擴大民主！

實行使每一個美國公民均有平等的權利，不問其種族、膚色、信仰、性別、政治黨派或原來的國籍如何。

終止歧視黑人。設置各州和聯邦的永久性“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取消人頭稅和白人優越制。在軍隊中取消一切形式的差別待遇。保護歸化公民的權利。

宣布反猶太主義為非法，反猶太主義是最惡毒的、最有破壞性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武器之一。支持猶太人提出的由英國政府立即取消帝國主義的白皮書的正當要求。支持在自由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同阿拉伯人合作，在三大強國關於遠東的協議的基礎

上，重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保障并扩大劳工权利，特别是关于组织、罢工和集体订约的权利。取消像“史密斯—康纳利法”一类的所有一切反劳工的法律。击败鲍尔—伯顿—哈奇反劳工法案。

宣布所有的法西斯组织和活动以及每一种形式的种族和宗教歧视为非法，加以禁止。

取消一切反对共产党人的立法。

抑制垄断组织和托拉斯的危害国家福利和世界和平的权力与政策。对所有违反反托拉斯法律的行为一律提起公诉，加以惩处。要求政府解散所有犯有企图恢复英德美卡特尔制度之罪的垄断组织和托拉斯。取消它们的专利权，对它们的职员提起公诉。通过新法律，使垄断组织处于更大程度的公共监督之下，所有行使这种监督权的政府机关均应有劳工、农场和小企业的代表参加。

保障并扩大联邦对小企业的援助。

六、保障美国青年的前程！

保证所有的青年均有受教育和就业的充分和平等的机会。

制订经济复原期间的新技术和高深技术的训练和重训的充分的计划。

对青年男女工人规定充分的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同工同酬。

重新建立并加强在战时已经松弛的少年工人最低工作标准。取消童工。

通过法律，特别对南方的学校和学生给予充分的联邦津贴。规定充分的和平等的入学机会，包括大学教育在内。保证充分的学术自由。

通过联邦立法，保障青年的健康和福利。在学校和地方举办旨在培养民主公民的适当的娱乐、文化和社会活动，作为防止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一种手段。

由各州立法規定年滿 18 岁即有选举权。

設置一个联邦的政府机构，有青年和劳工的代表参加，来开展并协调计划工作，履行国家对青年的责任。

采取特殊措施，保证黑人青年有受教育、受专门职业训练和就业的机会。

* * *

这个纲领符合于美国人民和国家的最迫切的当前利益。这是一个行动的纲领，今天所有进步的美国人都可以在它周围团结起来。这是一个行动的纲领，它将促进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毁灭和消除。它将有功于为持久和平、为人民群众的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民主自由创造条件，提供保证。我国的反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力量占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种力量能够变得足够强大，来抑制并击败帝国主义反动派，实现这个行动纲领的伟大目标。

作为具有阶级觉悟的美国工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帮助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同时，我们要有系统地向人民解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得到的实质上的好处必然是靠不住的，不稳固的，并且只是部分的，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最后地、彻底地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祸害，包括经济上的不安全、失业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

然而，这个行动纲领将帮助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去满足他们迫切的当前实际需要，一般地加强他们的力量和在国内的影

响。在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业与安全的目标而斗争中，将造成有利的条件，使我们的人民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有必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最后来改造社会。

我们将用一切可供利用的教育方法来促进这一过程，充分认识到：美国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对于苏联人民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经验日益感到兴趣，这个社会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和轴心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广大群众相信：在美国最后取消了利润制度和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和一条不受限制的、稳定的社会进步的自由道路，因为通过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就将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和国家对国家的剥削。

虽然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作为最后的目标，美国人民今天已经同意：法西斯主义必须摧毁，不论它存在什么地方，不论它在哪里抬起头来。美国人民已经准备捍卫并扩大“权利法案”以及一切民主自由。他们有决心为更大的和平与民主而斗争，为工作权利、更大的就业机会与社会安全而斗争。

因此，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所有进步的 and 反法西斯的人，都能够集结起来，支持上述当前的行动纲领。因为这个纲领符合美国人民的当前愿望，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大多数美国人今天能够团结起来，去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确保1945年市选举的胜利和具有决定意义的1946年国会选举——现在就必须着手组织和准备——的胜利。必须在每一个工厂和产业中，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州中，通过劳工的政治行动，通过劳工在各地的联合和同时行动，通过广泛的工场管理会议和联合的地方运动，以及通过其他广泛的联合的人民民主阵线活动，来拥护这个纲领。

第二部分

五

上述綱領要求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动派将要拚命設法来分裂人民的队伍，挑起一个集团来反对另一个集团：使退伍軍人和农民反对劳工，使非犹太人反对犹太人，使白人反对黑人，使耶穌教徒反对天主教徒，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产业工会联合会。他們将要拚命破坏英苏美联盟，并挑起激烈的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党派斗争和地区斗争。为此目的，他們将要利用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白人优越論”和反共产主义，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戴維·杜宾斯基和諾曼·托馬斯的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派，以及約翰·刘易斯和馬修·沃尔之流。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人民需要大大地加强自己的每一个进步組織，特别是劳工組織——工会。他們需要有忠誠的、勇敢的和誠实的領導：把卓識远見同在原則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这种品质結合起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們尤其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强的、更有影响的和更有效力的群众性的共产党。

共产党人对劳工和国家比在他們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負有更大的責任。而这些更大的責任是能够由我們光荣地完成的，因为我們具有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事业献身和服务的长期記錄，因为我們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满怀信心地面对着将来。我們为自己多年来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一贯的和英勇的斗争而自豪。我們从自己促进对納粹野蛮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作的

努力中吸取力量，并特別感到自豪。

在戰場上，在國內戰綫上，我們共产党人都是站在战斗的前列，来保卫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人民。在为建立反希特勒联盟、开辟第二戰場、击败法西斯軍国主义的日本而进行的斗争中，在争取全国团结和罗斯福再度当选的斗争中，在捍卫黑人权利的斗争中，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和进步的劳工运动的斗争中，在維持不間断的軍事生产和达成国际工会团结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贡献是重大的，是不亚于任何人的。

六

我們認識到：劳工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前途，从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将在不小的程度上随我們共产党人政策的正确性，随我們的独立作用和影响，随我們的群众活动和有組織的力量为轉移。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們共产党人，不仅必須从我們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学习，而且必須从我們的弱点和錯誤中学习。在最近这个时期，特别是从1944年1月以来，这些錯誤是在于：从德黑兰協議的历史意义中得出了一系列的錯誤結論。这些錯誤結論包括了这样的想法：在軍事上击败德国以后，大資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会参加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且会同劳动人民合作，来維持战后的全国团结。財政資本的反动階級本性使这些結論变成了虛幻的。最近許多透露托拉斯和卡特尔的战后目的的事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它們要牺牲人民来达到帝国主义的擴張目的，求得互額利潤。

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壟断資本作用的理論的这种修正，

还产生了其他的錯誤結論，例如关于經濟前景的烏托邦式的看法，可以通过各大强国之間的安排来使殖民地和附屬国获得民族解放等。这种修改还产生了这样的趋势：使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性质含糊不清，怀抱关于社会进化的錯誤观念，对階級斗争的根本規律作出修改，和将工人階級的独立的領導的作用減到最低限度。

結果，我們共产党人开始以一种不能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經常可以判然区分的方式，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義、爭取民主和民族自主的历史斗争，忘記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民族主義的階級性和局限性。最后，这种右傾机会主義的背离还傾向于忽視、修正或实际上不重視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錯誤地宣称：这些矛盾的已經改变或正在改变的表現形式表明，在資本主義总危机时期，这些矛盾已經不再发生作用了。

其次，解散共产党和組織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是我們所犯修正主義錯誤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事实上取消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的先鋒队作用。結果，我們在产业工人中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又进一步使共产党人的活动一般地被削弱了，使西半球其他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和政策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共产党的解散远远未能帮助执行像支持罗斯福再度当选一类的正确政策，而是削弱了民主联盟，因为解散共产党就削弱了共产主义先鋒队的主动性、力量和貢獻。

这种取消主義的惡名昭著的表现，就是在南方取消共产主义組織，将其改成非共产主义的、反法西斯的組織。这种行动，損伤了为南方群众、特别是黑人的需要和願望而进行一貫的和有效的斗争的基础。这是从我們的修正主義錯誤产生的合乎邏

輯的結果，这个明显的例子，表明了我們的政策在引向何方。解散美国共产党和組織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事实上就是取消工人階級的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

为了糾正我們的修正主义錯誤，要求立即重新組織共产党，并保证它的綱領、政策和活动重新具有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們过去的修正主义錯誤的根源，必須追溯到对工人階級經常起作用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影响的压力。由于在我們方面未能对这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响保持警惕，坚持斗争，就让它渗透到了我們自己的队伍中，斃丧了我們无产階級的元气。这种資產階級影响所造成的对我們組織最有害和最具深远意义的結果之一，就是在多少年内，形成了一整套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这表现在未能以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評精神，去經常地分析和重新审查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未能以群众的階級斗争經驗去审核我們的政策；未能訂出一种正确的干部政策；以及未能吸收所有的党员来参加基本政策的拟議和修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压住福斯特的信，使党员們都看不到。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的另一个例子是：前政治委员会取消南方的共产主义組織的方式。

官僚主义也促进了修正主义的发展。虽然官僚主义制度的主要責任首先要由白劳德来負，前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对于所有一切党組織內盛行的官僚主义工作制度必須負重大的責任。前政治委员会接受了白劳德的领导制度，这就树立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榜样，它不曾进行斗争，在組織內建立真正的民主。前政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未能作出充分的自我批評，也表明了这一点。

即將選出的全國委員和政治委員會必須以身作則，並由黨員們積極幫助，進行一次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鬥爭，根除官僚主義的一切殘迹，並經常注意防止舊的官僚主義工作方法和機會主義作風的故態復萌，官僚主義工作方法和機會主義作風只能妨礙最迅速最徹底地糾正我們的修正主義錯誤。

七

我們從前的一般政策中的機會主義錯誤使我們共產黨人關於黑人問題的工作未能充分發揮效力。這特別表現在：我們掩蓋了黑人問題的全民性；我們懷抱了毫無根據的幻想，認為大資產階級本身在歐洲勝利日以後，會把黑人在戰時所得的權利維持下去。

誠然，我們繼續宣布我們堅決要求黑人有充分的民主權利，並且在許多場合下，我們為反對歧視黑人的作法進行了艱苦的、有效的鬥爭，特別是為了有利於作戰的努力。然而，我們常常看不見，黑人的民族解放鬥爭在根本上是同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整個鬥爭相關聯的。

並且，我們的修正主義政策使這種鬥爭範圍變得狹窄，氣勢受到削弱，有時甚至使我們把在軍隊中取消歧視黑人的鬥爭暗中壓下去。

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太明顯了。我們未能使勞工運動和黑人群眾充分準備起來，去同反動派為在勞工隊伍中製造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尖銳衝突、取消黑人在戰時取得的民主權利的當前企圖進行鬥爭。我們在黑人社會中所進行的工作雖然也有一些收穫，但有嚴重的弱點和不一貫，未能使成千的新黑人黨員穩定下來，成為堅定的黨員。我們在南方完全取消了共產主

义組織。我們未能发展一支受过馬克思主义訓練的黑人工人骨干队伍,去担任劳工运动的領導。

我們現在有义务对所有一切战綫上为黑人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給予战斗的領導,特別是要在白人工会會員中加强我們的教育工作。我們必須在南方重新建立共产主义組織。我們必須在全国各大工业中心发展并提供一支坚强的工人階級的黑人共产主义者干部队伍。

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加深所有共产党员——黑人和白人——对黑人問題根本性质和深远意义的理論認識,并进行有力的斗争,根除我們自己队伍中白人沙文主义的一切公开的和隱蔽的表現。为此,应采的步骤之一是:我們应当設置一个特別委员会,結合今天美国和全世界广泛的社会、經濟和政治运动,来从事黑人的状况和趋向的基本研究,并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指导,拟訂出共产党人关于黑人問題的政策和綱領的詳細的綱要。

八

我們所犯的机会主义錯誤給了我們在战时的工作不良的影响,减少了我們的反法西斯活动的效果,并且使我們共产党人和进步劳工运动在战后时期失去了方向。

我們共产主义組織曾經是在走向危机,这主要是由于它不能应付从現在的世界形势所产生的日益复杂的問題。如果不完全承认并糾正我們以前的修正主义政策,这种发展着的危机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因此,在这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认福斯特同志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可靠的領導和重大的貢獻。同样,我們能够体会法

国共产党主要領袖之一雅各·杜克洛在他最近的文章中所发表的健全和友誼的馬克思主义意見的基本正确性。

生活本身，特别是我們最近在国外和国内这两条战綫上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势力的斗争中——在工会中，在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在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所得的經驗，完全证实了杜克洛同志的批評和福斯特同志再三提出的警告的正确性，充分暴露了自从1944年1月以来美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基本上是犯了修正主义錯誤的。

在确定最近时期所犯机会主义錯誤的严重責任时，必須指出：虽然白劳德同志作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主要領袖，比其他任何的个别領袖或黨員所負的責任要大，但上届全国領導机关，而首先是前政治委员会，对这些錯誤必須而且确实負有重大的責任。

九

显然，我們要能在战后时期有效地尽到我們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階級和全国利益的先鋒和战士的責任，唯一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迅速地、坚决地克服我們的錯誤，特别是要根除我們的政策和群众工作中的一切机会主义遺迹。

为此，整个共产主义組織必須立即对所有的政策和領導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評的审查。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整个組織內树立真正的內部民主和自我批評。我們必須对組織內所有負責的領導委员会的人事予以刷新和加强，并在所有党的委员会中建立真正的集体領導制。为此，我們必須对所有的派系活动的傾向、曲解的傾向和削弱我們共产党組織基本團結的傾向进行斗争。

同时，我們共产党人必須避免一切宗派主义的傾向，并且勇敢地、有力地扩大我們自己的馬克思主义工人階級和反法西斯的群众活动，最积极地参加到广大的劳工和民主运动中去。我們必須坚决地加强我們共产党人的独立作用和群众活动。我們必須定出一种一貫集中的政策，特别是在产业工人中要建立我們的共产党組織。我們必須在理論战綫上进行一次坚决的思想斗争，提高我們整个組織和领导的馬克思主义理解。

我們共产党人重申我們的保证：我們要尽一切力量去摧毁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促进美国和世界的民主事业，促进民族自主和社会进步的事业。我們决心同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力量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来完成这些偉大的目标。

为了一个战斗的共产党!

威廉·泽·福斯特

在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 1945 年 11 月 18 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丹尼斯同志、威廉逊同志以及其他的同志已经向我们扼要地说明了主要的政策路线。全国委员会完全同意了这个路线。我代表书记处想要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在迎接我们面临的许多任务中，党所应起的作用。

在战后的混乱局面中，我们看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众多的复杂而迫切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巨大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其中有許多问题真正具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都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即必须对反动派进行斗争。

首先，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教育问题，即我们必须帮助美国人民群众懂得：美国已经开始实行一种帝国主义的政策，其目的在统治全世界。美国人民完全没有这种观念，要给予他们这种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极其重要的，就是要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说明，杜鲁门政府的真实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并表明这种政策对我们国家和对全世界的危险性。我们还必须向群众说明，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上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在实质上也是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没有别的事情要作，单只教育人民使

他們懂得什么是美国帝国主义这件工作就足以使我們这个小小的政党費尽力气了。

但是，自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巨大而迫切的問題，如为充分就业，为 6,000 万个工作崗位而斗争。用不着我来强调这个斗争是多么重大，它所需要作出的努力是多么艰巨。在平常，如果我們沒有其他的事情要作，单只这个問題就足以耗費我們所有的每一点精力了。

* * *

其次，还可以提到組織那些沒有加入組織的工人的問題。这里有些同志已經指出，现在是組織千百万尚未加入組織的工人的极其有利的时机。这是对的。我要再說一遍，如果我們党沒有其他的事要作，我們可以把这个問題作为我們党的中心任务。

还有巨大的工資运动，它像要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基本工业中集合千百万的工人来反对美国那些最大的托拉斯。这是我国最根本和最具有深远影响的运动之一。这个运动如果掌握得正确，就能够为我国工人造成巨大的胜利；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犯了錯誤，工人們就可能吃亏。在这个巨大的斗争方面，我們有許多事情要作。事实上，工資运动确在要求得到我們的领导和支持。工人們面对着許多危險，必須組織起来，应付这种危險。最严重的危險，是低估局势的严重性，和低估工会将要面临的抵抗的激烈性。还有对杜魯門政府的危險态度的低估，这表现在：有一种像在过去的时期依靠罗斯福政府一样来依靠杜魯門政府的趋势。也还有一种危險，就是还没有明确認識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是怎样在暗中打击工資运动。教育工人們認識这一切的危險，需要在我們方面从事很多的活动。如果我們党有它現在的十倍那样大，这个任务也会大得足以占去我

們全部的注意力。

但是除了我已經提到的這些問題以外，我還必須加上其他的重要問題。有着重大的 1946 年選舉——國會選舉，這不僅關係我們國家的命運，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關係整個世界的命運。如果反動派在這次選舉中能夠贏得勝利，這對其餘的世界也和對我們一樣，是一種凶兆。因此，準備進行 1946 年的選舉運動要求勞工方面作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動員，這自然把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非常重大的任務加到了我們黨的肩上。

* * *

如果我還沒有向你們提出足夠的任務，我可以再加上幾個。還有使原子彈國際化這個大問題。我們知道，在我國，事實上是在全世界，對這個原子彈問題正在進行激烈的鬥爭。這裡我可以用自我批評的精神來說，我不認為，不論是在我們的總報告中，或是在我們這次全國委員會會議的討論中，我們對原子彈問題給予了足夠的注意。

最後，舉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世界重大問題，即美國干涉中國內戰的問題，這種罪惡行為威脅着全世界的和平，要求我們黨在每一個行動領域內作出最大的努力。

還有整個一系列其他的十分迫切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可以提到下面的一些：為世界工會的團結而進行的運動，為抵抗我國政府在德國和日本以及在巴爾干的帝國主義策動而進行的活動，為取消有關巴勒斯坦的白皮書而進行的活動，為歐洲被戰爭破壞的國家組織大規模救濟的運動，對政府要求實行普遍軍事訓練進行鬥爭，捍衛黑人的受到威脅的利益，為反對生活費用上漲而進行鬥爭，為反對蘭金委員會無法無天的親法西斯活動而進行鬥爭，在工人和退伍軍人之間建立實際的工作關係，處理在

工人和农民之間建立更好的关系这种根本問題。

单是把这种数量龐大的問題列举出来，立即表明了在我们現在生活着的这个时期內正在发展着的激烈的斗争。这也着重表明了我們党作为人民民主力量一个最重要部分所負的艰巨任务。我所提到的这些任务，没有一个是可以忽視而不致使我們冒着重大失敗——如果不是实际上的大灾难——的危險的。

这种形势，連同所有这些迫切的問題，应当使我們学到两个根本的教訓，这两个教訓在丹尼斯同志的报告和威廉逊同志的报告中都已經提到了。

我們应当領会的第一个根本教訓是，必須把我們的努力集中在我們面临的許多問題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我們一定要像列宁教导我們的那樣，抓住能使我們調动整个鏈条的那些关键性的环节。在国内方面，像我們剛剛通过的決議所表明的，我們面临的关键問題是为增加工資而斗争。我們的主要注意力必須集中在这个問題上。……

在国际范圍內，如同丹尼斯同志的报告所着重指出的，关键的問題是制止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这个由美国军队参加的中国战争的威胁性正在日益增长。在今天的报上，我們看到引述魏德迈將軍的話說，除非中国共产党人遵守美国在中国的軍事首領所定下的規則，否則美国現在已經准备好向他們开火。中国的战争是国际方面一切問題的关键，正是在这里，比在所有其他一切地方都重要，我們要給予反动派最重的打击。

有千百万的工人，在各个階級中有千百万的美国人，他們准备就这些重大問題采取行动。但是从过去的經驗中我們都知道，人民的斗争大多随我們能給予这些广大人民群众的領導

的程度为轉移。在我們的注意集中之点的中国問題上，如同丹尼斯同志所指出的，我們要在全国举行 500 次大会，来动員我們所能够动員的一切人民力量，制止对中国的干涉。我們党必須利用自己的每一分力量、技巧和組織能力去使这 500 次大会得到成功。

* * *

这些斗争对于我們党在我們現在面临的一种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能力将是一次最大的考驗。我們必須清楚地記着，如果我們集中注意工資运动和美国干涉中国这两个关键性問題，作为我們面临的一切任务中最紧急的任务，这并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忽視我所提到的其他許多重要問題，我們可以不管它們，或者等到我們对这两个主要的集中注意的运动取得成功以后，再来注意它們。这样作就是我們的重大錯誤。例如，如果忽視反对原子彈的斗争，那不是一个大錯誤嗎？相反地，恰恰是在动員人民去对付这个重大問題上，我們必須找出办法，做比我們現在所做的还要多得多的事情。我們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全面参加 1946 年的选举。当集中注意这两个关键性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問題——工資运动和干涉中国——时，我們必須学会如何把我們所进行的其他一切斗争結合起来。

* * *

在我們党的全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要求过它来使用这样的策略。它必須像从来没有过的那样来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它必須找出日益有效的办法来使自己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联合，并使这些群众行动起来。这是对于我們党的成熟程度的最大的考驗。

从这种形势中我們必須領会的第二个根本教訓是：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和发挥作用更好的共产党。我們現在处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們必須有一个更加强大得多的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历史不容許答复个“不”字，因为考虑到美国人民現在所面临的一切重大問題，和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共产党的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威廉逊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扼要地說明了建党工作中的許多最重大的任务。我只想強調其中的几个。首先，而从我看来这是一个出发点，我們必須加强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必須在我們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而我們正在树立我們党的民主。这从我們剛剛結束的关于退伍軍人問題的討論得到了很好的說明。我想，当时在場的每一位从这次討論中必然已經意識到，在我們党的生活中已經有了一种新的精神。

* * *

在我們党内正在发展着一种新的民主，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民主。其表現之一，就是我們已經在开始形成一种真正的集体領導。在这里提出来的报告不是由什么人躲到乡下去在象牙之塔中写出来，然后硬逼着我們接受的。它曾得到充分的討論，政治委員會的每一个人对它都有所貢獻。报告的大部分是由丹尼斯執筆的，并且依我看来，許多的主要之点是出于他的貢獻。我要重复一句，我們正在形成一种集体領導。我們的政治委員會現在是一个民主地發揮着作用的机构。

我們也已經开始在党内培养一些新的干部，新的領導干部。我认为，这从这次全国委員會會議中所发生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在正在形成的集体領導制的一般領導之下，我們在中央已經在所有一切活动領域內設置委員會，各个地区也在开始

这样作。这种委员会制度代替了我们过去所有的一人制，它对我们党内真正民主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同志们，实际上，我们在中央对党十分熟习的人也一样，对党在最近的过去因被机会主义政策折磨而造成的损害感到震惊。自从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实际上是在从平地开始来重新建立党，并且我们不得不面对从每一个方面向我们堆积起来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问题来进行这种重建工作。

除了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之外，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纪律。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诚然，没有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就不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民主。

在这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我们有一个必须用纪律来制裁一个同志的例子。我指的是当琴同志的案件。我希望同志们不要把我们所实行的处分解释为：因为当琴敢于站起来批评政治委员会，或批评书记处的成员，所以就给了他某种惩罚。这个案件的意义并非如此。当琴如果只不过是批评了政治委员会，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反对。如果费拉特尔费亚地区委员会自动地发表了对政治委员会的批评，那是党内民主的合法表现。但当琴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同。他的行为，既违反了党的民主，又违反了党的纪律。他谴责政治委员会、特别是其中某些委员故意伪造代表大会的决议，目的在使自己逃避过去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责任。当政治委员会不同意这种看法时，当琴不是向全国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是有权这样作的——，而是回到本地区去，着手发动宾夕法尼亚东部的党员来反对政治委员会。

这是派系活动，不是民主。当琴以为他挑起一次派系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全都知道，在党的路线和领导作了根本改变之后，党是何等地不安定。我们知道党是在经历自己生命中

一个最严重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責任使党恢复元气，使它安定下来，而当琴却开始来打击它。因此他应当受到紀律制裁。显然，这样一个同志在我們的全国委员会中是沒有他的地位的。

我們必須有一个紀律更加严格的党。我們正在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而这这就要求有一个坚决的、团結的和有紀律的党。

* * *

为了加强我們的党，我們必須作的第二件事情是克服我們队伍中的被动性。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我們党员中积极进行我們的运动的人所占比例很小。这种被动性是我們从白劳德修正主义时期所得的特殊遗产之一。自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有很大的被动性，但特别是在修正主义时期养成了这种被动性。我們必須作出最认真的努力来克服它。我們必須提高我們党的士气，使全党工作起来。如果我們能够作到这一点，如果我們能够真正以战斗的精神和工作的精神鼓舞全党，我們党的效力就将增加好几倍。这不是例行故事。我們必須使我們党动員起来。我們不能容忍我們队伍中的被动性。我們必須进行强大的思想运动，必須有系統地动員我們党员来完成我們面临的巨大任务，从而使我們的同志明白这一点。我們必須使我們整个的党行动起来。克服党內的被动性是我們現在必須作的最根本的事情之一。

我們必須要作的第三件基本工作，是吸收更多的党员，特别是基本工业中的工人，进党内来。我們要像从来没有做过的那样着手来做这件事情。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我們以前这样說过好多次，但是我們現在必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发展，我們也必須发展。自然，我們发展的条件不及在

歐洲的有利，但是我們全都知道，在美國，我們黨的發展是有着許許多多機會的，我們必須設法使黨發展起來。有鑒於我們所面臨的無數問題，在我們的建黨運動中，必須以一種新的更加急迫的方式來進行登記運動。我們還必須對正在歸來的退伍軍人黨員予以特別的注意。我們決不應假定，所有這些同志是會自動來恢復黨籍的。讓我再說一下，我們必須找出辦法來擴大我們黨的財政基礎。這是一個主要問題。我們工作的財政方面被過於低估了。忽視黨的財政是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顯著方面之一。

在建黨問題上我想要強調的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是我們要把黨變成一個戰鬥的黨。一切的事情都決定於這一點。白勞德修正主義最惡劣的表現之一，就是消滅我們黨的戰鬥精神，傾向於把它變成僅僅是一個宣傳或鼓動組織。他的關於共產黨行動的一般看法似乎是：他自己應當作一大篇演說，而黨則應當在全國大量地散發這種演說詞。自然，我們決不應減少我們的鼓動活動，但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使我們黨投入戰鬥。

正是在這個削弱黨作為一個戰鬥組織的問題上，遠在十年以前我第一次同白勞德發生衝突。白勞德不是一個戰鬥的領袖，他並沒有培養一個戰鬥的黨。也許白勞德修正主義的最初根源，正在於他的削弱黨的戰鬥精神。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點，並認識到我們必須有一個戰鬥的黨，工作的黨。我們黨現在已在開始重新變成一個戰鬥的黨。但是還有許多的被動性和躊躇。在我們的關於工資運動和充分就業鬥爭問題的東部會議上，當我們審核黨在前幾個星期究竟作了些什麼時，我對黨的許多部分在處理如何展開這種鬥爭的任務時所表現的碰碰試試和生疏情形感到驚奇。這表明我們黨在同我們的聯盟者一道實際進行積極的群眾鬥爭上是多么實踐不足，表明白勞德修正主義把我們黨

的共产主义战斗性破坏到了何种田地。

现在来看看干涉中国的问题。我不知道同志们你们怎么想，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个地区的领导者们怎么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局势发展下去，而不立即采取行动，着手召开大会，和我们的联盟者取得联系，设法通过决议来提出抗议，如此等等。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党中央的领导是相当好的。我们很早就表示了态度，提出了正确的口号，而在纽约这里也举行了一次人数很多的群众抗议大会。但是许多地区对于这件事情似乎完全没有注意，没有表现丝毫的主动性。这种懒惰的心情必须根本予以克服。我们必须重新唤醒全党，使之迅速变成一个群众斗争的党。

关于使我们党变成一个战斗的党这种迫切需要，我无论如何加以强调都是不够的。通过改进我们党的活动，我们能够大大增强它的力量，吸收大量的新党员进来。看到我们和民主联盟中的其他力量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种增强的力量对于我们党是迫切需要的。

最后，让我说，我们这次的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得很好。这次会议表明党是团结的，它基本上贯彻着我们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路线，它正在重新积极地投入群众斗争中去。现在让我们各自回到我们自己的地区，以这里所通过的正确政策为基础，环绕我们已经弄清楚的问题来动员我们的党，不断地加强我们同我们的同盟群众的接触，把我们党真正建成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它应当是这样，它必须是这样。

附 录

德 黑 兰：

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埃尔·白劳德

目 次

前言	169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172
第一章 德黑兰勾銷了慕尼黑	172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178
第三章 德黑兰的保证	182
第二編 战争决定着战后的世界	190
第四章 英苏美联盟	190
第五章 欧洲的复兴	199
第六章 亚洲的民族解放	207
第七章 非洲和近东	214
第八章 在美洲的好邻居	218
第三編 战后的全国团结	226
第九章 战时的团结要求战后的团结	226
第十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231
第十一章 经济计划的纲领	236
第十二章 全国团结中的工会	246
第十三章 民主和全国团结	254
第四編 1944 年的选举——赞成团结还是赞成分裂?	270
第十四章 党派斗争是昂贵的奢侈品	270
第十五章 我们应当反对谁?	275
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组织的改变	281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贡献	286

前 言

历史以飞行的速度在前进。自本书于三月終写毕，到付印前，在若干重要方面事情又已經有了新的变化。我決定不作最后一分钟的修正，来使本书及时。就让它像原来所写的那样，当作今天历史发展速度的证明吧，因为它到达大多数讀者手中以前，許多变化还会发生。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写作当时的个别事实的記載，而在于它处理迅速变化过程中的事实的态度和方法。变化的本身，及其日益加速的步伐，乃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事实。

我們可以略为提到在四月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僵局已經打开，成立了以体现六党联盟的“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新內閣，这样就最后实现了去年十月莫斯科外长會議所定的目标。在中国，由于孙科博士公开要求着手使重庆政府民主化，长期酝酿的内部危机在国民党最高統治集团間已經公开化。在墨西哥，暗杀卡馬卓总统的企图幸已挫敗，这种企图像閃电一般暴露了希特勒通过阿根廷和玻利維亚的法西斯独裁向西半球进攻的威胁，而墨西哥反革命的辛那基运动就是这种法西斯独裁的一个分支。在国际劳工局的費城會議中，根据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和一个联合的拉丁美洲工人代表团的提議所作的，把作为法西斯主义代表的一个阿根廷“劳工”代表开除的決定，乃是支持国务卿赫尔的政策の生动表现；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罗伯特·瓦特对于这个提案的反对，却可耻地暴露了劳联领导的破产，它随时可以为了狹隘的、局部的和反动的考虑来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胡佛和塔夫脫所操纵的机

器表明了它对党的预选会的控制以后，威尔基先生已退出总统竞选，这样就使选举运动中所有的问题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全部变得尖锐化起来——而且出人意外地使威尔基先生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如果他有意这样做，而不恋恋于个人的当前腾达的话。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发展，均足以证实本书的主要论点。我的期望是，事变的进程将会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明。期望中最重要的一项，自然是等待已久的开辟反对希特勒的西方战线，这在本书普遍流传之前，必然已在进行了。

极度紧张的日子，巨大的事变，以及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们的智能加上了一种沉重的负担。长久以来似乎能对许多人提供充分的指导去应付生活中的问题的陈旧偏见，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是不够的，是只会造成混乱的。旧的指路标已经倒下去了，或者已经歪曲了，朝所有的方向乱指一气。老的地图已经发现不再符合实际。世界正在惊涛骇浪中航行，而单凭经验得来的航行技术帮助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人类必须找到某种固定的明星，来指引自己的进程。

德黑兰会议对世界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方位指标。本书系对我们的若干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考察，根据德黑兰的前景对它们重新估价。

我以前的那本书，1942年10月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只对战后的世界问题略加窥测。本书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它们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看到，只在我們能够开始绘出胜利将要带给我们的那个世界的面貌时，美国才能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战争，早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世界正在雷霆万钧的暴力锤炼中形成。由于对希特勒的兴

起未能及时制止，这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主义是树立以暴力为最高生活准则的一种企图；只有用更大的暴力去对付它，才能将它消灭。但在希特勒主义被从地球上清除了的时候，各种更为深刻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力量就会作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重新处于显著的地位，甚至当它们还是军事斗争本身的决定性背景时，就已经是这样。这就是为征服自然、为解决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问题而斗争的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力量。暴力，以及暴力的工具，并不像希特勒所梦想的那样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则就不能合理地解释由铁托元帅率领的强大的南斯拉夫解放军从一个被解除了武装和被粉碎了的国家中的兴起，他们赤手空拳，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用来击败敌人。我们也无法了解伟大的中国解放运动、八路军军的兴起，和使用从日本人夺来的武器、担负对日作战一大部分责任的游击队。

是的，在人类事务中的确有一种潮流。这就是民主的潮流，是人类负责处理它自己的事务的潮流，这种潮流把那些藐小的、装模作样的自大狂人和特权阶级的种种借口抛到了一边，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神圣的权利通过暴力和破坏活动来把人类当成一群乳牛和役畜那样统治。

本书即是帮助扩大这种历史的民主潮流的一种苦心之作。

虽然本书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错误，必须由我个人负责，但从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来说，本书并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在美国和全世界中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产物，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对于苦心想出书中各种看法的千千万万个未列名的贡献者，我必须表示感谢。最后我还必须提到，我的妻子雷莎·白劳德为本书出版分担的劳苦不是我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于此我只有表示我的爱情和感激。

埃尔·白劳德 1944年4月27日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第一章 德黑兰勾銷了慕尼黑

1943年11月末和12月初，领导联合国家的英苏美联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一次全体會議。三大强国的領袖們，同他們的軍事參謀人員和外交人員一道，研究了战争时期的世界問題。他們得出了共同的結論，这体現在一个联合宣言中。

德黑兰宣言明明白白地代表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轉折点之一。

德黑兰政策(如果把它看作表里一致的話)确实地、永远地勾銷了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的政策，在那次會議上，英国首相張伯倫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把欧洲断送給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們訂立条約，使世界陷入今天的水深火热之中。

“德黑兰”的政策同慕尼黑相反，它在軍事上保证从欧洲消灭希特勒主义，在政治上保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持久的和平，它将为未来的世世代代消除战争禍患。因此，我們对所有一切国内問題和世界問題的答案，全視我們对于“德黑兰”的判断如何为轉移。

“德黑兰”仅仅是无止无休的国际會議的又一次嗎？德黑兰宣言仅仅是又一个外交文件，記載着无法調和地互相敌对着的列强間一种暂时性的妥协嗎？抑或从冷峻的现实來說，“德黑兰”如同它所意味着的一样，是签字的三大强国所共同怀抱的根本的长期的政策，这种政策将为子孙后代締造一个新的世界呢？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必须自己首先作出答复、然后他对公共生活中其他任何問題才能作出理智的判断的根本問題。

本书从头至尾是对德黑兰協議以及从而产生的后果的一种評价。

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引述德黑兰宣言的全部原文。我知道大多数美国讀者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即跳过有关公文书的长篇引文，特別当这些引文出现在书的开头时；他們认为自己已經熟习这些了，想看点新东西。所以我必須首先警告讀者：絕大多數的人只看过这个宣言一次，或者全未看过，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草率从事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来討論“德黑兰”的。

因此我严肃地請求本书讀者在这个时候来讀德黑兰宣言，并且要重讀几遍。如果不这样作，那末繼續花在本书其余部分上的時間大半都将成为浪費。

宣言全文如次：^①

“我們——美利堅合众国总統、大不列顛首相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过去这四天中，已在我們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集会，已經拟定并且认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

“我們表示我們的决心：我們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們的軍事參謀曾参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拟定了关于将德軍消灭的計劃。我們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軍事行动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協議。我們在这里达到的共同默契保证胜利一定是

① 这是由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于1943年12月1日在德黑兰签字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的全文。譯文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407—409頁。——譯者

我們的。^①

“关于和平方面——我們确信：我們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认我們以及所有联合国負有至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許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災难和恐怖。

“和我們的外交顧問在一起，我們曾檢討了将来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我們將欢迎他們，听他們抉擇，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我們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們的潛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們的兵工厂。我們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②

“从这些友誼的會議出来，我們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凭着他們多种多样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們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們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这就是德黑兰協議。

① 根据《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第408頁，这一句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2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② 根据《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第409頁，这一句話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3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然后試圖了解必然隨之而來的一切具有深遠影響的後果。或者我們可以拒絕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我們可以開始作出這種或那種保留，這樣作時我們也必須試圖了解具有深遠影響的相反的後果。

當我們在對待“德黑蘭”的兩種態度之間作出這個根本的抉擇時，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在德黑蘭會議之後幾個星期內，希特勒也對世界講了話。希特勒對“德黑蘭”的答复是怎樣的呢？

在他的新年致詞中，希特勒不再企圖否認在英蘇美聯盟的手中掌握了摧毀他和他的全部工作的力量。他拿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他希望還可以用來取勝。他恫嚇世界說，他的毀滅不僅會導致“一次自從民族遷徙以來最為不幸的社會崩潰，”而且會導致“一次範圍不可想像的經濟上的大災難”；當他的統治消逝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發生，不是在英國和美國之間，就是在英美兩國和蘇聯之間。

對希特勒的唯一答复，就是把它作為一個能夠實現而且一定要實現的、會帶來它的全部後果的現實行動綱領來看待的德黑蘭協議。

對於完全接受“德黑蘭”作為現在歷史時期的鎖鑰如有任何的保留，只能有一個後果，那就是為希特勒重新開門，加強他而削弱我們，延緩我們的勝利並增加取得勝利的代價，歸根到底就是重新提出勝利是否可能的整個問題。因此，絕對地擁護“德黑蘭”，把它作為一個現實的前景和行動的綱領，就是不再回到慕尼黑唯一的辦法。

必須把德黑蘭宣言看作是表里一致的。它的意義和字面完全一致，並不包含什麼另外的意思。任何想要在這個歷史性文件的直率而坦白的文字背後去尋找什麼神秘的或隱藏的含義的企

图，只能得到落入希特勒的圈套、退回慕尼黑主义老路的结果。德黑兰协议会产生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但这些后果要能够为我們所了解，就只有从这样一个毫无保留的前提出发：即“德黑兰”的文字和意义完全是一致的；它并不包含什么另外的意思；我們必須整个地接受它，我們不能只接受它的一部分而拒絕它的另一部分；任何其他的途徑都是向希特勒主义投降的道路。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就对“德黑兰”所作的“右翼”保留来说才是真实的，但必然还有“左翼”的保留，这不仅是許可的，这甚至还是必須有的。

这类“左傾幼稚病”（列宁是这样称呼这种思想的）的晚近表现，比普通一般的各种保留甚至更加有害，更加危險。这些人虽然自命为最不妥协的反希特勒派，但在他們的“左傾”、“激进”甚或“革命”的画皮背后，他們却实行着希特勒演說中所提的职能。

对“德黑兰”来说，无所谓“左与右”这种分歧。只有接受或者拒絕德黑兰綱領，而所有各种形式的保留，不問作为其根据的思想动机如何，都是希特勒手中的武器。

在这种“左的”保留中，最典型的是这样开始的，譬如說，是呀，自然，我們都贊成“德黑兰”，但是宣言說到“我們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軍事行动的規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協議”，决不能认为是解决了第二战場的問題；不，不，除非我們都来比以前更加大声疾呼，根本就不会开辟第二战場！

甚至在少数共产党人中間——我談到这个是感到最不愉快的——也表现了这种对第二战場問題的庸俗化的看法，完全体现了最腐敗的报纸专栏作家的心情。我們的一个地方組織的書記在德黑兰會議之后，突然发现了有展开一个要求“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場”的群众运动的迫切需要，幸而，整个組織自动地拒絕

了这样一个政策，立即集会，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整个的“保留”路线。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保留”只是一个大动物的尾巴，这个大动物就是同完全否定“德黑兰”相等的整个保留方式。

試想在柏林的希特勒的宣傳机关将会何等高兴，如果它真正能够向欧洲广播，說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对于德黑兰协定沒有信心——不相信它的軍事方面，不相信它的政治方面，或者不相信它的战后經濟前景!!! 但是希特勒是得不到这种快乐的。不仅共产党人，还有全国大多数人，都是相信德黑兰協議的。

“德黑兰”代表着在那里开会的領袖們之間、他們的政府之間、他們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之間、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堅固的和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

希特勒狂妄地企图使全世界相信并不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就有也并不是强固到足以消除分歧和旧有的矛盾的。柏林电台对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公众說，“德黑兰”代表着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大投降；同时，它又轉向苏联、各殖民地以及劳工和中等階級中的“左”翼，狂呼斯大林为了一点点不可必得的軍事援助，向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革命”。

在英国帮助希特勒的，同样是这样一些国會議員，他們新近譴責丘吉尔“对斯大林投降”，因为“德黑兰”使得对波兰和南斯拉夫問題必須立刻采取一个新的共同的态度；还有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他們譴責斯大林“出卖革命”。

在美国帮助希特勒的，就是国会中罗斯福的恶毒反对派的領袖們，整个反苏煽动者陣营，反对英国的鼓动者們，以及所有叫喊对德黑兰協議怀疑和不信任的那些“左派分子”，包括由于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懶惰而可能墮入这种陷阱的脱离正道的共

产党人。

“赞成还是反对德黑兰”——这就是下个时期内美国和世界政治的試金石，直到“德黑兰”的原則完全实现为止。

德黑兰協議提供了一个綱領，能够而且必須用它来团結所有各个階級中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一切往前看的男女們，把所有其他的考虑都服从于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結成一个坚固的和有效的人民多数，指引全国和全世界沿着“德黑兰”的道路前进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在德黑兰，就英苏美联盟在东方、西方和南方反对希特勒德国采取軍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达成了完全的協議。这种联合行动一向被所有严肃的人們认为是胜利的唯一保证。从純粹的軍事考虑来看，这样的共同联合作战自从1942年以来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然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代表强大国家的强大军队从“純粹的軍事考虑”来行动的事。强大的軍事力量是为服务政策而行动的。当这些军队代表一个联盟时，只在下列場合它們才能协同一致地行动：即当每一个組成联盟的强国为共同的敌人所直接攻击并且联盟制定了一个共同的政策时，所謂共同的政策就是关于共同胜利将要采取的形式協議，因而代表着联盟每一成員的根本利益。

从对希特勒主义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迅速的軍事决定的观点看，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已在1942年由正式的宣言承认为“迫切的需要”。但只在两年以后，这才开始实现。

全面联合战争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与其說第二战场所等待的是军事的准备，毋宁說是军事的准备在等待共同政策的制訂。

关于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在德黑兰已經达成完全的協議，作为关于全部世界政策的協議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沒有关于军事行动的完全協議，共同的世界政策是决不可能取得同意的；但同样，如果沒有关于战后世界面貌的全盘協議的主要之点，共同的军事政策也决不能定出来。

这样一种共同的政策显然必須和三个主要强国各自单独定出的政策不同。它必須有可能容納每一国所认为絕不可少的东西，同时規定在战略关键上采取共同行动，以便为战后的国际秩序定出一个全面的輪廓，足以吸引人类的有效多数的合作。总之，一个共同的世界政策是一种妥协。在德黑兰采取的共同政策的各个要点将在以下各章討論。此刻我們只研究这是一种妥协这个問題，以及对共同军事行动的稳定性来說，这意味着什么。

在事理上，关于德黑兰的军事協議的詳情细节，只在它付诸实施以后我們才能知道，在此以前，那只是最高指揮部的专有物。在政治上一般感到关切的唯一問題是：已經达成了協議，協議是有效的；除此以外，可以正确地应用“把它交給专家们”这个口号。军事協議是胜利的保证。那是在战争中、在以最强大的现代毁灭武器武装起来的大量军队的生死冲突中实施的。

有没有这种危險，即由于军队所执行的政策是一个如上所述的妥协政策，以致全部军事力量不能發揮出来？

依我的意見，並沒有这种危險。本书整个用来说明“德黑兰”在其所有一切方面的健全，以及威胁德黑兰政策全部实现的那些危險，和怎样才能一定战胜这些危險。为了避免这些危險，

我們必須注意它們，我們不應裝作看不見它們，我們必須準備同它們鬥爭。為此，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不凭空製造出幻想中的危險，我們不把自己的力量花在跟風車搏鬥上面。

我相信英國和美國在 1944 年將從西面真正把它們的全部聯合軍事力量投入反對希特勒。我完全相信德黑蘭的全部協議必將執行。這種信仰的基礎是簡單的，可以一下子說明的。英國和美國的国家利益，從兩國的統治階級來看，要求全面執行德黑蘭協議，包括它的軍事方面。在這整個問題中，沒有必要為一種不甘願“作些事情幫助蘇聯”擔憂。戰爭的這個階段早已過去了。今天英國和美國的最高需要就是行動起來，幫助它們自己。

戰後世界的性質大半將為在戰場上贏得勝利的人們所左右，這是人世生活中的基本事實之一，沒有一種意識形態能夠限制它，也沒有其他的因素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它。

英蘇美關於戰後世界的共同政策，是完全以這種協議為基礎的：通過聯盟的全部力量的共同軍事行動，使戰爭勝利結束。蘇聯長時期以來即在使用其全部力量。英國和美國必須在 1944 年把全部力量投入戰鬥，不是因為蘇聯要求這樣作，而是因為它們自己的利益要求這樣作。

全面聯合作戰的問題對蘇聯已成為縮短戰爭的問題。對英國和美國來說，這依然是一個贏得戰爭勝利的問題。

因此，對於在今年內以全部力量投入西歐，不作片刻稽延，英國和美國也具有同蘇聯完全相同的利害關係。英美兩國有迫切的理由渴望執行德黑蘭協議，正像蘇聯一樣。實現德黑蘭協議已經變成一件毫無掩飾的、十分明顯的有關切身利益的事情，不僅對英美的人民群眾來說是这样，就是對大小資本家來說也是这样。

和“德黑兰”走不同的道路，必然使英美的賢明領袖們躊躇，不問其階級或意識形態如何。因為這是一條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造成混亂和无政府狀態的道路；這的確是希特勒在新年致詞中所恫吓的前景。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像現在這樣組織起來的英國或美國是沒有地位的。英國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實現“德黑兰”的願望，否則就只有面臨一種或另一種方式的无情的失敗。

只有像麥考密克上校和他的朋友們那一類熱狂的、不理智的、魯莽的、不顧死活的人們才敢於公開地向“德黑兰”挑戰，並且歡迎走另外一條國際无政府狀態的路。他們敢於這樣作，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混沌的人，在心靈上是法西斯主義者，在性質上是細小的暴君並且有野心成為強大的暴君，是些藐視“人類”這個字本身的人，對他們來說，意想只不過是用來打倒他們的同伴的棍棒，這些人是這一類真正的納粹分子，他們說：“當我聽到文化這個字的時候，我就伸手摸我的槍。”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德黑兰”代表着他們的希望和企求，這是絲毫沒有疑問的。可能有疑問的，只是能否把問題盡量明確地、清楚地提到他們面前，使他們心中能夠消除那些妨礙他們理解的混亂和偏見。

必須承認，大多數美國報紙沒有設法將德黑兰綱領清楚地擺在人民面前。必須承認，麥考密克上校之流揮舞着蒙昧主義的强大武器。

必須承認，美國還未能使自己完全擺脫本國產生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必須承認，那種認為事情一如往昔和政治一如往昔的心情和趨向正在展開開來，削弱了美國對作戰的努力，使美國人的心

灵陷入矛盾。

所有这些留在美国为履行其根据德黑兰协议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而作出努力的道路上的问题和困难，都是能够而且一定会被解决的。美国人民身心健康，他们对诚实而勇敢的领导是一定有反应的。美国的士兵同世界上的任何士兵一般好，他们的技术领导整个说来质量很高，在行动中还会变得坚强起来。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黑兰协议的军事方面，在争取实现这个历史性宣言的希望的大斗争的现阶段，并不是主要的危险。美国的武力充沛，质量很高。这些武力可以和运用它们来求其实现的政策一般强大有力。单是武力并没有力量，当它们为有害的或愚笨的政策所指导时，还可能对运用它们的国家本身成为一种致命的威胁。

第三章 德黑兰的保证

德黑兰协议决不是能够自动实行，丝毫毋须乎我们去忧虑和工作的。相反地，“德黑兰”要求国家和个人在物质上和智慧上作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它在美国和全世界面前所提出的崇高目标的话。要实现“德黑兰”的前景，只有一个保证。那就是使全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去支持一整套为“德黑兰”的目标和精神所鼓舞和支配的规定的政策。

正确的政策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解释。只有正确地判明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我们的朋友当朋友看待，把我们的敌人当敌人看待，然后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

这听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并且过于简单，但这是面临我国的

許多最困難問題的真正核心。這樣說並非言過其實：如果美國在過去十年間清楚地區別了自己的朋友和敵人，並且按照這種區別來行動，我們就能夠完全防止現在這次戰爭。

當一個國家為不正確的政策所支配、走到了邏輯的和痛苦的結局時，就像意大利今天一樣，它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種艱難的境地，只有歡迎外部的力量，把它從一個合伙的鐵臂之下強制地分裂開來，在這個合伙中它曾耗盡了自己的資源。或者像曼訥海統治下的芬蘭一樣，它發現自己變成了一伙罪惡的伙伴們的奴隸，它會邀請他們到自己家裏來，執行一個共同的罪惡目的，但即使當它最後了解到“罪惡不會帶來好處”時，他們仍然拒絕退出這種冒險。或者像德國一樣，已經完全向它自己的罪惡的地下世界投降，即使面臨着整個民族被消滅的命運，也不能找到從事反抗的內部力量。

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曾經逃脫了“喝干這杯苦酒”的命運。但是許多年來，我們也在飲不正確的政策毒汁。我們深深糾纏在整個慕尼黑勾當的令人嫌惡的和悲劇性的回憶之中，我們還有待於完成使我國的實際的和詳細的政策擺脫慕尼黑主義的過程。

這些都是極其不愉快的追憶，我們只在這樣的限度以內提到它們：即在為了肅清至今仍在毒害我們的政治生活的某些過去的危險殘迹所必要的限度以內。

這次戰爭對美國提出了它的一些最困難的問題，即把朋友和敵人繼續混淆。讓我們略為考察一下，這樣的一些混淆在一般報紙的態度上是如何反應出來的：

1. 把曼訥海的芬蘭說成是“朋友”，我們為了“不幸的權宜之計”犧牲了它，對它的處境我們應有“深厚的同情”。

2. 把深深卷入同納粹合作中的波兰流亡政府当作英美的被保护者看待，而把波兰国内正在兴起的民主陣营說成是一种“斯大林的离間”。

3. 把对南斯拉夫铁托元帅所作的拖延已久的承认和援助不是解釋为对我們的政策的糾正，而是解釋为一种对苏联所作的不幸的、也許是必要的“让步”；对于納粹代理人米哈洛維奇，即使在丘吉尔正式地把他埋葬在历史的死尸灰缸中的时刻，我們还称赞他是另外一个这样的朋友，由于战争的无法解釋的灾难，逼得我們違背自己的願望拋棄了他。

4. 他們繼續拖延对意大利实行在莫斯科會議所商定的政策，同时对巴多里奧—維克托·伊曼紐尔影子政府恋恋不舍，这是意大利人民差不多像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深恶痛絕的；把意大利各民主政党的联盟——解放委员会依然看作是和我們敌对的力量，不予信任，而不是让它参加政府，作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5. 在西班牙，他們繼續支持希特勒的傀儡佛朗哥执政，而他的国际組織“长枪会”正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活动，构成希特勒的諜报网，对亲联合国家的那些政府組織顛复活动，已經在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建立了两个明目張胆地拥护納粹制度的政府。

6. 最后，但决不是最末一个例子，还有中国的局势。他們依然贊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原来的借口，即所謂“鎮压共产党”的必要性，这就是要控制中华民国的国家生活，并冻结住最大的、訓練和装备最好的中国軍隊，从而让日本人在大陆上可以相当当地放手行事。

对于国际政策上所有这六个主要問題，国务卿赫尔十分显

然是在小心謹慎地擬訂一個同我們明顯的國家利益和聯合國家的概念更加明白地互相協調的現實的和可行的政策。但他被美國國內的重大阻力嚴重地阻礙着，降低了進度，這種阻力是通過美國大多數的日報表現出來的。

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產生這種混亂的根本原因，是有一點和希特勒共同的东西頑強地存在着：畏懼蘇聯，視為“布爾什維主義的威脅”，和畏懼所有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視為“革命風暴的威脅”。

德黑蘭協議為解決我國外交政策中的這個根本矛盾提供了基礎和起點。“德黑蘭”的保證是：我們要使我們一切的具体政策都同“德黑蘭”的精神和文字相符合，它們在國際關係方面，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同社會主義民主國家之間；在各國內部，在所有的民主政黨——包括共產黨——之間，提供長期的信任和合作。

達到這個目標的障礙，幾乎完全是由所謂爭執問題的雙方堅持陳舊的偏見和思想方法造成的。生活的現實絕對有利於德黑蘭政策，有利於它在聯合國家每一成員的內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執行。

“德黑蘭”提供了勝利的鎖鑰，不但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

在開羅舉行的丘吉爾、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會議具有異常重大的意義，這只有在“德黑蘭”提供的前景之下，才能充分認識到。這次會議規定了对日本的軍事政策的輪廓，並且保證中國在戰後世界中取得應有的地位，從而奠定了基礎，可以按照在德黑蘭為歐洲比較詳細地規定的路線，制訂一個遠東方面的政治策略。

可是在中國，我們依然面臨着在這個共和國內部沒有解決的一個主要危機，這對我們在世界的這一部分的作戰努力來

說，是最大的、无比的威胁。只有勇敢地实行同在德黑兰制訂的政策相类似的政策，才能以有利于整个联合国家的方式解决这个危机。

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还只是在形式上联合在蔣介石之下。事实上他們是两个不同的陣营，从1927年到1937年他們之間进行了十年的內战，只在1937年面临日本的大举侵略，他們才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比較地更像停战，但常被打断。即使这个形式上的联合也常有陷于破裂、重新发生內战的危險，自从1943年年中以来，这种危險已經特別严重。

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內战，这对于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无異是一场重大的灾难。这将是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它的势力在中国会得到巨大的擴張。如果美国和英国力所能及，它們必須避免这种威胁。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正在于避免这一类危害我們世界地位的威胁。

中国問題以巨大的規模代表着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問題的主要特点，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即：苏联并未直接参与远东方面的战争。对美国來說，这是一个如何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联合我們的一切朋友进行共同的斗争，并避免发生任何有利于我們敌人的事情的問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以促进和保证中国的全国团结、来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为其目的。

有人反对这样一种美国政策，說它会构成对中国內政的外来干涉。但这是曲意規避现实問題。中国和美国是在进行一次共同的战争，在作战过程中，美国有責任使中国相信，我們是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去击败敌人，并对中国本身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时中国也有責任使美国相信，它正在使用它的全部兵力，而不只是一部分兵力，而送到中国去的美国物资是为

所有願意打日本的中国人所利用，不是由某些中国人用来打其他的中国人。这样的問題必不可免的要在这两个强国之間来共同討論和解决。这不是它們任何一国的“內政和私事”。如果剛剛从十年內战中走出来就参加世界战争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如果是中国把物資送到美国来，那末中国人必定会要求美国保证我們全国的团結来为共同作战而努力，反对重新掀起过去的內战，那会使我們暴露在共同的敌人面前。

奇怪的是，这样的基本命題在美国还必须繼續討論。其所以如此，仅仅因为美国的輿論依然为这样的偏見所左右，这种偏見是同在中国制造內战的那些力量彼此相投的。在美国，在我們的法律和行政實踐中，我們依然保持这样的概念，即共产党人是一种顛复的力量，是全国的敌人，必須加以鎮压。这在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歪曲；但在中国，这就造成了永远存在的內战和破坏共同作战努力的威胁。显然我們不能令人信服地敦促中国人放棄我們在美国依然怀抱的偏見。

在中国有通过妥协来取得团結的絕對必要性，不随对分裂中华民国为两个陣营的那些問題的孰是孰非如何判断为轉移。其所以有这种絕對的必要性，是因为已經证明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团結，因为繼續的分裂使我們遭到被日本人取得胜利的威胁。蔣介石通过十年的努力，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积极帮助，有英国和美国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尙且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国，而說他現在却能够做到，那真是荒謬絕倫。重庆方面用武力扫蕩中国西北自治边区的任何企图，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結果，会是亲日各派在重庆取得权力。

可是，对美国人來說，當我們深入力量对比的赤裸裸的問題背后，用最簡單的民主原則去衡量两个陣营的相对价值时，主張

在中国通过妥协来达到团结的理由就更加充足了。在中国的所谓“共产党”阵营（因为它是由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的），比所谓国民党阵营更为接近美国的民主观念；在各个方面都要接近一些，包括在经济生活中给予“自由企业”以更大的活动范围。而那个阵营对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比起国民党阵营更要接近一千倍。

这类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简单事实已为每一个不怀偏见的美国见证人所证实，他们根据对两种地区的亲身观察写成了报告。其中最突出的是我们美国的陆军中校伊凡斯·卡尔逊，他写了《中国的一对明星》[Twin Stars of China]一书；在现在上演的影片《巩荷》[Gung Ho]——这是记录美国在太平洋第一次进攻的影片——中，能够感到中国英勇的共产党人对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所作的贡献。具有同一效果的最近一个证据，就是伊洛娜·腊耳夫·修斯所写的《鱼翅和小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这本值得注意的书，这个妇人去到中国时，带着一套先入为主之见和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背景，但当她在中国居住几年以后，她变成了作为中国民主真正代表的西北边区政府的雄辩的守护者。

在中国究竟谁是美国的真正朋友，这个问题的最后标准，可以从考察下面这个问题来得到：如果防止内战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迫在眉睫的战争终于爆发，情形将是怎样？日本能从哪一派补充新的中国同盟者，使之参加自己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呢？除了指出在重庆的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以外，没有人能提出其他的答复。能依靠什么力量去维持中国对日抗战到底，不问情况如何变化呢？没有人不能首先指出是八路军和西北自治边区。

这些人，美国在中国的最可靠的朋友，数年来一直担负对日作战的一半责任。但他们从重庆中央政府那里实际上没有得到金钱、武器、弹药或是医药供应。相反地，他们一直被封锁着，这种封锁使他们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隔绝，这种封锁是由重庆政府用最大的、训练和装备最好的部队全神贯注地实行的，而这些部队是应当用来打日本人的。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中，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送到了西北自治边区的部队手里，而许多的美国物资却被用来打他们！

如果我们开始应用德黑兰协议的原则于远东（终究我们必须这样作），我们就可以保全无数美国男儿的生命，并且使胜利更快地来到。我们要在中国西北自治边区设立美国的军事和领事代表机构；我们要把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一部分按照这些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比例送到他们手中；我们要以“德黑兰”和大西洋宪章的精神，敦促重庆政府响应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经常提出的全国团结和开始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吁。

德黑兰协议已经开始在解决欧洲的许多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在本质上和中国问题的性质一样。

德黑兰协议中所包含的胜利和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的保证是否有效，那就要看我们美国是否也用这个协议的精神来制订我们的全部实际政策和规范我们在全世界所有各处的行动。只有在我們自己国家的实际政策中，我们才能找到“德黑兰”的保证。

“德黑兰”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和阶级给予自觉的和实际的支持。它必须由构成一个有效多数的美国人来实行。否则它就会失败，它所带来的一切希望均将在日益高涨的混乱浪潮中化归乌有。

第二編 战争决定着战后的世界

第四章 英苏美联盟

空談战后世界的面貌是无益的，除非我们能够表明这个世界将如何从战争胜利之中出现。如果我们不承认必将从这种胜利中产生的那样一个战后世界，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含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使思想信仰极不相同的人和国家团结起来，实行合作。单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国才成为一个实际可行的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为联合国核心的英苏美联盟已经成为今天历史上的中心事实。

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觉得能够宣布，他们的政府决定“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可以认为，因为他们首先觉得有些必要，他们才觉得能够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种必要，他们多半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有许多人——甚至有一些脱离正道的共产党人——认为，当考虑如何最快地打胜仗时，却把战后问题牵涉在内，这三个大政治家是误入迷途，自讨苦吃。他们引证说，“一天的问题一天解决就够了”^①；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集中精

① 套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4节的最后一句，该节原文为：“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译者

神于贏得战争胜利，而把恼人的和平問題留待战争結束以后去处理。这种忠告之所以难于接受，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經被試驗过了，而經驗证明它是不可行的。

从珍珠港事件到德黑兰會議的两年中間，联盟曾专心致力于进行軍事斗争，沒有涉及关于較大的政治問題的協議。沒有理由怀疑，軍事計劃本身是准备得充分的。即使是关于最困难的联合作战即第二戰場問題，早在1942年6月軍事協議即已宣布于世。但在我下笔的时刻，即差不多是两年以后，第二戰場还有待于开辟。

为什么我們对在德黑兰宣布的軍事協議比对1942年的協議能够更有信心呢？

我們能够相信第二戰場决不会再拖延下去，其主要的理由是，在“德黑兰”中，軍事協議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关于从战争中产生的世界面貌所怀抱的共同政策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說，第二戰場的拖延主要不是由于軍事上的考虑，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阻碍，由于缺乏共同一致的意見；究竟开辟第二戰場将会得到的胜利用来干什么呢？

英苏美联盟作为一个純粹的軍事安排，还不够强大有力到用来取得胜利。在它的軍事方面能够充分發揮效力以前，它还必須在包括战后世界某些关键問題的共同政策、世界政策、长期政策方面得到加强，得到支持。

对于这种历史的既成事实加以嘲弄或抱怨，不論对我們自己或对世界都沒有絲毫好处：这就是我們所居住的世界，而我們的任务就在于認識；我們的国家怎样才能度过战争危机，尽可能多多地挽救我們战前的文化，使世界再度回到进步的軌道上，而以現在这个世界作为我們的起点。

从世界上清除希特勒主义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必须流血的工作。那是如此的困难，以致我们如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开始改变希特勒主义所从而产生的根本情况之一。

必须改变的这个根本情况，就是反希特勒阵营分成两个部分，它们对于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或看法——这就是反希特勒联盟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既然任何一方不能消灭其他一方，唯一的超出这种划分的办法就是每一方使自己适合其他一方，不是从它们自己的愿望和意识形态去求得一个共同的纲领和看法，而是从它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去求得这种纲领和看法，这种协议将保全每一方的最重大的利益，从而为重建整个世界各国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达成协议的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有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可以作证，他们在德黑兰共同宣称，他们“检讨了将来的诸问题”，他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而这种永久的和平，正如他们所下的定义，是将“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的和平。

美国人民中的有效多数能够像“德黑兰”那样高瞻远瞩，全心全意参加这个由罗斯福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一道，以他们的名义所作的宣言吗？

在美国，对“德黑兰”很少公开的反对。但不幸的是，暗中的反对甚至更加危险。美国报纸引导它们的读者把“德黑兰”看成“不过是又一次会议”，其主要目的只在使事务继续进行，直到有另一次会议来代替它为止。即使温德耳·威尔基——他的十分成功的《一个世界》一书曾使许多人对她期望更高——也对“德黑兰”表示了一个离奇的想法，他说这是一个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马贩子交易的地方，他设想自己如在那边，他能够比罗斯福从斯

大林和丘吉尔手中得到更多的让步！

威尔基先生的嘲弄，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对一个现任总统，根据古老的然而并不光彩的美国传统，所作的当然的、不假思索的、从党派出发的暗中狙击；这是够糟的了；它暴露了我国在1944年的选举运动中将要经历的某些严重危机。如果任何重要部分的有思想的美国人以此作为判断的基础，那就更糟。因为这样就把“德黑兰”要从希特勒手中夺取的武器交还给他，这个武器就是玩弄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在英国同美国之间的所谓不可调和的分歧。

如果“德黑兰”只不过是世界政治中一场激烈的马贩子交易，那末这本书根本就一文不值了——除非我们这样看：如果美国和世界想要逃脱前所未有的悲剧，我们所描绘的“德黑兰”还是必须出现的。

就我来说，我把德黑兰宣言看成是表里一致的。我反对对“德黑兰”作嘲弄的评价，不问其来自威尔基或任何其他的人。在怀疑“德黑兰”的效力的每一个声音中，我听到了希特勒新年致词的回音！

自然，参加德黑兰会议的政治家们曾经面临巨大的困难。而在实现这个协议时，自然还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但对德黑兰协议来说，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阻碍和最大的危险却在于不能提高到或拒绝提高到这样的眼界和认识：协议是必要的，是可能的，它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毫无例外！

甚至一些共产党人——人数不多——也落到了对“德黑兰”作嘲弄的评价的圈套里，这是可悲的，然而真实的。自然，他们对它有一种特别看法。他们夸耀斯大林是怎样一种“精明的人”，

他怎样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得到成功”；他們确有把握地辯解說，一个丘吉尔能够从“德黑兰”得到的全部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幸而不自觉这个事实；他們只是从反面重复托洛茨基分子的話，而这两种說法都是从希特勒抄来的。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所表现的偉大之处，在于他們都是在更高的政治家水平上行事，他們寻求并且找到了能够用共同行动去推进的共同利益，絲毫沒有怀疑任何一方会損人利己。

国际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自然是，正是由于“德黑兰”的結果，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处境，就它們的全部問題來說，已經大大改善了。因为“德黑兰”代表着那样一种因素，沒有它，整个世界就有毁灭的危險——这是在滔天变动中的可靠的方位，是普遍无政府状态中的世界組織的起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个人，如果他离开了德黑兰政策，就将发现自己茫茫然不知所之。为什么我們能够完全相信德黑兰協議的永久性，这就是最后的理由。

德黑兰協議所倡导的世界政策的輪廓，在一切有理智的觀察家們看来是明白的。而有名的和聰明的道乐賽·湯普逊却令人啼笑皆非：她在評論我的对德黑兰估价的小册子时，却發現它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是斯大林的声音”，透露着在伊朗會議場中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秘密消息。我可以向湯普逊小姐保证，就消息而論，我得到的肯定不比她多；我們之間的不同完全在于，當我們得到消息之后，各自如何来处理它。但必須說明，湯普逊小姐虽从完全錯誤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正确的結論：德黑兰會議达成了真正的協議，这种協議具有創造历史的意义。

要知道这个協議的一般政治綱領，肯定不必安置下通向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宮或白宮的秘密綫路。事实上，这样說是更为正确的；依靠“內部消息”的人表明他們不能理解众所周知的生活中的政治事实。“外部消息”才是有决定意义的。

一个協議的首要之点是：英国和美国以平等地位对待苏联，并且就一个共同的軍事綱領取得一致的意見，这在德黑兰會議之前是沒有作到的。然而，为了使英美作出这个重大的政策轉变，必須使它們相信：一支胜利的紅軍不会在它的刺刀上把苏維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带到英国海峽东面的欧洲其余各处。一旦互相作出了这种基本的让步，通过談判解决所有一切具体問題的道路便打开了。

科德耳·赫尔在莫斯科外长會議上率先表明有可能达成德黑兰協議。他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是开始走上这条新的道路的美国統治階級中最不願意和最抱怀疑的那些集团的选定代言人。当赫尔富有信心地前进时，美国最坚决和最保守的集团的立場便表明出来了。于是总统能够确有把握地去到德黑兰，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是包括所有一切階級和政党的最高負責人在內的團結一致的国家。

因此，必須把莫斯科會議看成是德黑兰協議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考察一下莫斯科會議的成就是具有永久价值的。莫斯科會議联合公报記載着：“首先，对于为縮短对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战争所应采的措施方面會有率直的和詳尽的討論”，大家认为这将为“三国間将来軍事上最緊密的合作建立一个基础”。公报繼續申述協議的內容，整段全文如次：^①

^① 下面和上面两处所引联合公报的譯文，均系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頁。——譯者

“仅次于迅速结束战争的重要性，就是三国政府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后期间内继续目前在进行战争时的紧密协作和合作，对于它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和平并充分促进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

在莫斯科协议宣布之后，我立即写了一篇评论，鉴于后来发生的争论，我认为必须在此地重述一遍，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曾用下面的话来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意义：

“莫斯科外长会议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议，为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主席的将来会晤铺平道路。在会议之前，曾注意到不要使人对会议工作的直接结果产生过高的希望，因为一般预期，重大的协议只有在以后的首脑会议上才能达成。

“和上述预期相反，莫斯科会议本身作出了基本的协议，这已经建立了领导联合国家的三国联盟的前进路线。它的成就是超出全部预期的。

“然而计划中的联盟首脑会议并不因这种成就而成为不再必要，也不会延期举行。正像红军的巨大胜利，以及英美在非洲和意大利的进攻与对德空中作战扩大了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一样，现在由于莫斯科会议对轴心国和绥靖者们在政治上的打击而得到增强的、加速取得的军事胜利，更加布置好了历史的舞台，使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晤能沿着同一方向进一步采取行动。……

“世界已经在它自己的历史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①

这样，莫斯科—开罗—德黑兰是一个连贯的系列，构成一幅

^① “莫斯科三大强国会议”，《共产党人》，1943年12月号，写于11月初。

整个图画，我們現在簡單地称之为“德黑兰”。

使協議能够具备形体和精神的政策綱領，可以归納于下：使欧洲人民民主革命放手进行，肃清专制主义，和动员联合的人民力量，同列强合作，求得他們自己的解放；对每一个被解放国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留待获得胜利之后再作最后决定，那时每个国家将要自由地决定它自己的运命，不受国外的任何干涉；对每一个国家內部的各个集团和領袖的支持，完全根据他們在反对納粹侵略者的战争中和在他們自己国家的解放事业中作出的有效的贡献，绝对不根据意識形态上的考虑，或任何預先决定一国战后命运的願望。

这种政策要求所有願意奉行它的人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反对納粹这个敌人及其奸細代理人，这也意味着在每一国的民族解放陣綫中尽量减少一切內部斗争，如可能时就完全消除它。在每一个国家中，必須建立一个广大的、无所不包的反法西斯陣营，在这个陣营內部，一切关系的确定，所有問題的解决，均通过自由討論、自由的政治結社和普遍选举制。在每一个国家內部的这种民主的全国性的联盟，必須向一切願意对納粹作战并在英苏美联盟的普遍世界领导下遵守共同紀律的人开門，不根据互相冲突的意識形态作任何的差別待遇。

这对美国提出了一个根本問題，它还未得到澄清和解决，这就是沒有差別待遇、沒有特別法律、在和对待所有其他政治派別相同的基础上接納共产党人加入民主力量的共同陣营問題。

这个問題就其國內的政治方面來說，将在本书下一編中詳細討論。但在这个时候，作为我們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問題，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它。提出这个問題的最好的方式也許是举出很具体的例子，連姓名和地址都有。

查爾斯·波勒提中校是美國在意大利的聯合軍事政府中的高級官員。他是一個原籍為意大利的美國人。在意大利，他是決定我們和意大利解放委員會的關係的人物，後者是所有意大利民主人士的六黨聯盟，從天主教徒到共產黨人都在內。他利用他在意大利的地位告訴意大利的民主人士：美國要求他們解散他們的聯合戰綫，他們必須把意大利共產黨人驅逐出去，否則就不和他們打任何的交道。他用他在美國所站的對待美國共產黨人的同樣立場去為他的這個要求辯護，這就是紐約勞工和政治運動中安托尼尼—波普—杜賓斯基派的立場。他說他不能用一種態度對待本國的共產黨人，然後又用另一種不同的態度去對待意大利的共產黨人。他拒絕在意大利實行莫斯科外長會議所通過的決議。這就是為什麼在意大利的美國部隊還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去動員意大利人民反擊德國人。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執筆時，意大利戰場還是在“凍結”中，我們人數眾多的美國和英國士兵，從千百萬迫切要求有機會同他們并肩作戰的意大利人民那里，只得到了有限的援助。

波勒提的朋友們，紐約社會民主聯盟，通過了一個特別決議，敦促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從自己的機關、特別是設在海外的機關中把所有的美國共產黨人清除出去，並且聲明這是為防止執行德黑蘭政策所必需的！！

在這個小小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實現德黑蘭政策的那種頑固的障礙，這種障礙是從我們自己的國內政治生活中直接產生的，它嚴重地削弱着英蘇美聯盟。

另外一個例子：緊接着德黑蘭會議之後，英國職工大會發出呼籲，要求聯盟各國和中立國的工會派出代表舉行國際會議，制訂勞工們在贏得戰爭和重建世界中的行動綱領。為了德黑蘭

協議的完全勝利，這樣一步顯然是必要的。然而，恰好是在美國，這種步驟卻被拒絕了——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所拒絕——，理由是不可能同意和共產黨人進行任何方式的合作，蘇聯的工會將要派出著名的共產黨人作代表，他們同時又是在蘇維埃政府中身居高位的!!!

很清楚，“德黑蘭”的道路，鞏固英蘇美聯盟的道路，爭取戰爭勝利和世世代代持久和平的道路，對我們國家來說不是容易走的道路。我們看到，不可能在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築上一條中國式的長城。我們看到，在我國國內生活中，許多仍然起支配作用的最呆板和最僵硬的政策，同德黑蘭的對外政策是根本不能協調的。

這只是意味着，德黑蘭的政策必須爭取，它不會自己從天而降。凡是梗在勝利和持久和平途中的障礙物，必須一一推開。“德黑蘭”跟美國的国家利益、跟所有一切大小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除了國際無政府狀態和混亂之外，再沒有其他可行的另一條道路。

第五章 歐洲的復興

蘇聯前綫以西的歐洲差不多全部還在希特勒主義的掌握中，必須用火和劍來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把它從血腥的魔掌中拯救出來。

戰後歐洲的面貌將為爭取歐洲解放的鬥爭進程所決定。

科德耳·赫爾在1942年就定下了這個基本原則，那時他在一個綱領性的演說中警告歐洲各國不要期望完全依靠外部力量的拯救，它們的權利也將為它們參加解放自己的鬥爭的程度所

決定。在莫斯科會議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中，又作了同樣的警告。

用更率直和更淺顯的話來說出這個原則就是：戰後歐洲的建築師將被從在殺納粹分子時表現自己有最大能力的人們中間挑選，大致比照他們執行這個任務的情況而進行。這是在美國常被忽視的、生活中無可逃避的事實之一；在那裡沒有一個報紙專欄作家是如此可憐，以至不能至少每月一次在自己腦海中勾出一幅歐洲新地圖，在那裡一個玩牌專家能够在業餘時間畫出一幅戰後世界地圖，贏得婦女俱樂部、辯論會、各種“知識分子”、以及《紐約時報》“書籍評論”欄的熱烈贊揚。

“德黑蘭”並沒有取消這個把權利和責任聯繫起來的原則，而只是達成了一種協議，這種協議包括了這個原則，使它成為在所有殺納粹的人中間達到政策上的一致“暫定條約”，以便他們不致把自己的力量彼此抵銷，並且最後弄到互相殘殺。“德黑蘭”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是從事於大多數納粹的三個主要強國之間的協議，為了一個共同商定的結果，去更加有效地殺納粹。

既然我們沒有野心去制定一張包羅萬有的藍圖，我們可以將我們關於歐洲復興的討論加以限制，只就現在解決問題的各種不同方式舉幾個例子來談談，先從波蘭開始。

戰前的波蘭政府瘋狂地拒絕同蘇聯實行任何合作，自己投入希特勒的懷抱，和他一道蹂躪捷克斯洛伐克，這就簽定了它自己的死亡判決書。在戰爭爆發之前不久，它又拒絕了蘇聯的援助。結果，當希特勒轉向他的波蘭“朋友”時，它在幾星期之內便被征服了。蘇聯進而干預，暫時保全了波蘭在1920年所攫取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土。直到1941年6月以前，在倫敦組織的波蘭流亡政府除了等待什麼事情會發生之外，既無奮鬥目標，亦

未发生作用。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西科斯基代表流亡政府同莫斯科签订了条约，从而在1941年即已达成协议，如果波兰人曾经忠实地执行它，必然已使流亡政府处于非常坚固的地位。

但是流亡的波兰领导表明自己不能忠实地履行义务。当它在苏联境内组织了一支由避难者和出狱者构成的波兰军队，用苏联的钱将它装备和武装起来以后，它拒绝把这支军队派到东线作战，将其经由伊朗调到近东，替英国人担任卫戍。它利用自己在苏联领土上的代表机关收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后来神秘地落到了希特勒手中；并组织失败主义者的和反复性的骚扰，由于这种罪状，“社会主义者”埃尔利希和奥尔特被枪毙了。未了，成为毁灭原因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它在卡通森林大屠杀中参加了希特勒的凶杀挑衅，这是波兰流亡者直接响应柏林而在苏联大门口犯下的一次希特勒罪行。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了一切关系。留在苏联的流亡者组成了波兰爱国者联合会，并开始建立波兰军队，同红军一道作战。

当红军长驱直达波兰边境即将解放波兰时，这个背信弃义的流亡政府对自己在波兰境内的追随者下命令，叫他们在红军来到时即予抵抗，虽然三年以来它一贯命令他们不要抵抗纳粹。从波兰境内得到了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些先生们一直和纳粹勾结，共同消灭在此期间一直进行游击战争、抵抗纳粹的波兰爱国者。

波兰流亡政府对苏联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它只要求红军赶走纳粹，把1939年解放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重新置于波兰暴政之下，并用红军的刺刀把这些流亡的先生们送回去重新统治波兰人民，以便他们继续在国际范围内从事恶毒的反苏活动。他们依靠英国和美国的力量，把这些“小小的”要求强加于

苏联，因为，他們虽然是盲目的自高自大，他們单独却是完全没有力量的。

“德黑兰”使波兰反动分子的这种恬不知耻的、危险的和有害的伎俩不能得逞。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宣布，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对波兰的政策是十分合理的，是以1919年早已宣布的英国公平的判断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华盛顿也会追随伦敦之后，不得不出此一着。反动的流亡者們被抛到了空中，看来他們頑固地坚持要留在那里，自作自受。

然而真正波兰的前途却日益光明。紅軍坚决地向前推进，在伯令將軍統率之下的波兰爱国軍隊同它一道。当它进入波兰国境后，波兰人民毫无疑问的会立即建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机关，竭尽他們的全部力量参加战争，全面参加他們自己的解放事业。波兰将从苦海中得到新生，肃清給它带来毁灭的卖国领导，在人民政权之下强盛起来，变成一个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发展过的民主国家。

倫敦的波兰流亡者們如果不是妄想离間华盛顿和倫敦一方同莫斯科一方，就决不会从事反对苏联的猖狂的和自杀的冒险。他們激烈反对德黑兰协议。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反希特勒联盟的分裂和解体，——总之，他們还在妄想希特勒主义会在欧洲胜利。像所有反对“德黑兰”的人們一样，他們是自寻絕路。

和波兰流亡政府刚刚相反，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建設性的，前后一致的。这就应当提醒我們，不要对一切流亡政府作任何普遍的結論。这个政府有它的弱点，并且还是严重的弱点，但它从来没有从事阴谋活动，去削弱或分裂英苏美联盟，也没有企图去利用各大强国間被推測的意見分歧。它一贯拥护团结，自从慕尼黑以来，它表明日益認識到，它同苏联的

密切合作是它对在这次战争胜利以后的持久和平的最好的保证。它是建立在所有民主党派的联盟之上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只在放松争取胜利的斗争和迟迟不肯拿起武器时，前途才会变得黯淡。

南斯拉夫为欧洲的解放和复兴过程提供了另一种样式。1944年春天，当作者正在执笔时，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紧跟着纳粹入侵的后面，在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民政府和一支人民军队，它在反抗侵略者同时又反击国王彼得的伦敦流亡政府的代理人中，取得了奇迹般的军事胜利。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铁托元帅的名字，已为全世界所熟知。最后，温斯顿·丘吉尔在议会中说话了，他坦白而豪爽地承认铁托元帅及其政府对联合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同样坦白地拒绝了叛徒米哈洛维奇。

只在几个月之前，这个问题看来是多么不同啊！

为了说明美国要制定一个关于欧洲问题的正确政策是觉得何等困难，我情不自禁地要打破我的一个惯例，来讲一个“内部消息”。1942年10月，纽约美国劳工党中的杜宾斯基—《新领袖》集团决定说服检察总长比德耳去镇压《工人日报》，以便拔去他们这个眼中钉。他们决定，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控告《工人日报》攻击“我们的盟友”米哈洛维奇将军，因而破坏了联合国家的团结。他们把这个计划提到他们的密友和同党助理国务卿小阿道夫·伯利面前。伯利热烈赞同，把这件事向比德耳提出，后者就这件事在司法部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某些参加者略为表示忸怩和躊躇以后，“会议”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伯利的提议，但决定在着手进行之前，先把这件事正式跟陆军情报局和国务院说个清楚；对《工人日报》很幸运，这两个机关

都回話，要把米哈洛維奇同希特勒的關係“透露”一下，一個下級人員說這是“新消息”。

然而，从那以後已經一年多，美國報紙一般還是繼續對米哈洛維奇大聲疾呼地支持，對鐵托元帥及其同伴同樣大聲疾呼地痛罵，稱他們為“共匪”。所有報紙關於南斯拉夫的报道都是在有系統地欺騙我國人民，只有《工人日報》（以及少數外文日報）是例外，雖然英國和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完全知道米哈洛維奇同希特勒、墨索里尼所干的叛賣勾當。只有路易斯·阿達米克在1943年年終出版的轰动一時的《我的故鄉》一書，以其具有摧毀力量的和無可辯駁的事實記載，才最後突破了關於南斯拉夫真實情況的新聞封鎖。在阿達米克的書出版不久，蘇茲貝格從開羅給《紐約時報》拍來了一個同樣轰动一時的電報，泄露他早已知道但以前從來沒有敢报道的事實。

很顯然，英國、蘇聯和美國在支持南斯拉夫鐵托元帥上的一致，以及米哈洛維奇和他的流亡政府是同敵人勾結的叛徒這一事實的揭發，是整個聯合國家的勝利。因此，當美國的大報繼續把棄絕米哈洛維奇說成是美國和英國的“挫敗”，是“斯大林的令人不安的勝利”時，我們又如何想呢？當我執筆時，當天的《紐約時報》通過它的軍事專家韓森·鮑德溫，把鐵托的興起說成是“許多使人困惱的趨勢”之一，這種趨勢正在摧毀“自從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以來對戰後世界所懷抱的遠大希望”。

韓森·鮑德溫和《紐約時報》真正把他們關於“德黑蘭”的希望放在這個想法上面，即各大強國應當聯合起來，在南斯拉夫支持米哈洛維奇而不支持鐵托嗎？由我們擔負起替破了產的和失去了信用的希特勒主義同謀者作戰的重擔，用美國的刺刀恢復他們統治本國人民的權力，把這作為我們推翻他們的老上

司——納粹的軍事行动的一部分，这样作果真是合乎美国利益的嗎？当欧洲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它能够联合所有的进步集团和党派，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美国真是感到害怕嗎？欧洲民主的每一个胜利真是英美政策的“挫敗”和“斯大林的胜利”嗎？

如果美国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問題，对韓森·鮑德溫和他这一流人的路綫大声說“不！”，那末“德黑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将要是轉瞬即逝的。因为鮑德溫和他这一流人的路綫将直接造成在欧洲的廢墟中燃起大規模內战的火焰，这种內战即使在希特勒主义被推翻以后，还会繼續和加剧。在这种战争中，鮑德溫要使英国和美国同所有的封建反动势力联合一道，把所有受人欢迎的民主力量都推到苏联的怀抱中去。这会意味着英国和美国最后要把希特勒沒有成功的工作担負起来——用武力消灭苏联。

德黑兰協議就是为了最后地、永远地消除慕尼黑的幽灵这个特殊目的而制訂的。“德黑兰”之所以成为必要，就是要取消作为欧洲各国内部分界綫的这种亲苏联的方針同亲英美的方針的对立，而代之以单一的亲英苏美的方針。

我們对欧洲复兴这个广泛問題所举的例子，已足使我們对整个欧洲体察出这个問題的中心实质（就其在政治上的表現而言），至于国与国間則只有細節上的不同。就对本书提供論据來說，不必一国一国地研究下去。

然而，从要在“德黑兰”体制內实现的美国利益着眼，还得說明一点，才能使欧洲复兴这个中心問題集中于一个突出的焦点上。这是与欧洲的經濟有关的。

战前的欧洲經濟已經紧紧地和一个国际卡特尔体系連在一起。这个卡特尔体系代表壟断資本同封建与半封建政治勢力的

溶合。这是战前納粹向其邻国渗入的主要渠道，在納粹德国征服欧洲以后，就把它全部接收过来，作为“新秩序”的骨骼。英国和美国資本中某些集团参与了这个卡特尔体系，从来也沒有割断它們的联系，希望在希特勒被打敗后把它接收过来，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去拯救它。

这是使英国和美国对維奇法国，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对塞佛埃王室，对米哈洛維奇和国王彼得，对希腊的国王乔治及其法西斯顧問們，对波兰流亡政府等等承担义务的主要影响。它是比溫斯頓·丘吉尔对君主政体和正統主义的原則在感情上的依恋更要严重百倍的一种影响。这是实现“德黑兰”希望的主要障碍。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会立即提出的取消卡特尔这个简单的、信用破产的綱領。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只要它还存在，其主要特征即将是形成卡特尔的壟断資本的各个巨大集团。唯一可行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在苏联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在希特勒失敗之后，这个欧洲卡特尔化經濟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已不能存在，不能由英国和美国資本原封不动地或者部分地接收过来。必須将其完全打散，而正在兴起的欧洲民主現在已經在打散它。因为这个欧洲卡特尔体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是完全由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殘余組成的，即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殘酷压迫，专制主义和权力主义，軍閥制度，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外力对整个国家的征服和統治。扫除这一切封建主义的殘余是欧洲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同时也是粉碎希特勒主义的必然結果，必不可免地要引起对欧洲資本主义經濟——包括卡特尔——在一个嶄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之内加以重建。

认为任何美国的利益，即使是美国壟断資本的利益，同欧洲这个必要的人民革命难以共存，那是最愚蠢的誤解。事实上，这是使欧洲能够变成美国經濟在資本主义基础上存在下去所绝对必需的有效市場的唯一方法。旧的慕尼黑欧洲必須送进历史的破产法庭中去，一个新的民主的欧洲必須代替它，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話——只有这个新的民主的欧洲，才能——和美国一道——按照为适应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所必需的方式和規模，在世界市場上进行买卖，并且付清帳款。

为了把这个問題說得十分簡單，使證券交易所中最忙的和最不开动脑筋的經紀人也能懂得，我們可以說，欧洲的問題好比两种債券，一种是米哈洛維奇发行的，虽有行市，但最蠢的美国人今天也不会出一文錢去购买，另一种是铁托发行的債券，它的价格漲落，全看證券市場对整个欧洲的命运如何判断。因为这很清楚，如果欧洲能避免半个世紀的混乱，在美国金融市場上铁托的名字就要比納粹占領各国任何其他的名字地位更高。这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方法，可以用来判断：就欧洲問題、它的解放和复兴而言，美国資本的真正利益究竟何在。

第六章 亚洲的民族解放

有了罗斯福、蔣介石和丘吉尔的开罗會議的联合宣言作保证，一个全面的亚洲政策的輪廓已經开始出现。

日本通过軍事侵略所占領的全部領土均将被剝夺；从中国窃取的領土将归还中华民国。朝鮮将得到自由和独立。“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項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忍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

作战。”^①

这就是开罗会议的实质。

这个协议从下列各方面得到了补充：美国关于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菲律宾的既定政策，英国和美国取消了在中国的全部治外法权，取消了长期以来阻碍和歪曲中国国家发展的“不平等条约”。

依然完全没有解决的，是大半个亚洲将来的地位问题，即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联邦，印度支那，它们的人口总计在五亿以上。

完全可以设想，开罗会议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策，足以在军事上打败日本，因为在德黑兰已经作出了粉碎纳粹德国的保证，从而使日本孤立起来。

但不可能想像“开罗”足以对亚洲提供作为“德黑兰”核心的那种持久和平，那种长期的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前景。

在日本被击败以后，亚洲绝不可能在以任何形式恢复起来的旧的战前殖民帝国体系的基础上稳定下来。一个稳定的亚洲要求有全洲所有主要各族人民的自由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把它们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纳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

在这个前景没有由各大强国共同提供以前，我们就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前景：从日本手下解放的亚洲各族人民又将处在旧的西方殖民制度之下；我们拒绝同亚洲人民在战后世界中结成伙伴，我们为要求他们帮助打败日本所提供的诱因只是这样一个可疑的许诺：用“好一些的主人”去代替“坏主人”。

这显然和美国的最高利益是不协调的。我国显然必须担负

^① 译文根据《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07页。——译者

在軍事上击败日本的主要責任；重建旧的殖民制度的前景使这个責任加重了許多倍；但是这样一种复活的殖民制度不会也不能对美国有利，即使对美国壟断資本也沒有利。

那么为什么我們要繼續担負这个不必要的和沒有利的負担呢？

既然对亚洲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最后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不現在作出这种让步，以便从我們肩上減輕太平洋战争的很大一部分負担呢？为什么不讓亚洲林林总总的千百万人民积极参加解放他們自己的斗争呢？就让东方各民族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贏得他們自己的独立，像中国現在所做的那样，不要迫使他們以后来同我們或联盟各国作战去贏得这种独立吧。

对这个問題有一个刻板式的答案：亚洲的民族解放問題是太复杂了，太困难了，在战争中不可能解决，必須留待胜利以后，才能够鎮靜地悠閑地去处理它們。这个答案对亚洲人民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与美国的处境更有关系的是：对美国人民來說，那也应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为了使这个問題变得尽可能的突出和清楚，我想直截了当地來談它的核心，这包含在美国和世界的經濟中，暂时不管这个問題的所有一切其他方面，这些方面由于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和先入为主的成見而弄得混乱起来。

使美国不能接受一种在亚洲重建旧的殖民帝国制度的政策的經濟因素是什么呢？主要的考虑是：美国有着至今为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資本主义經濟，它在战后必須有广闊的市場來容納它的产品，而亚洲就是提供这种市場的主要潜力。这种市場必須具有从前絕對梦想不到的規模，每年达数百亿美元之巨。沒

有这种市場，美国經濟就不能繼續維持下去；这种市場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中的迅速实现，对現行的美国生活方式來說，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必不可少的东西。

处在重建的殖民制度之下的亚洲，对美国需要的市場甚至连很小一部分也不能开始提供。因为一个殖民地的亚洲是贫穷的、落后的、农业的亚洲，是为其他市場儲藏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場所，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它是无法实现其成为美国必須要有的，每年能够吸收我們价值几十亿美元重工业产品的市場的潜在可能性的。能提供美国所必需的那种市場的亚洲，只能是一个使自己迅速工业化和現代化的亚洲。

在世界的經濟方面的經驗中如果有一个事实是摆得明明白白毫无爭执余地的話，那就是：殖民制度是现代全面工业化的死敌。除非建立在独立、統一和自决的基础上，沒有一个国家曾經实现工业化或者能够实现工业化。

因此，一个以把亚洲变成美国产品的广大市場为目标的政策，就必须以廢除殖民制度而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統一的國家制度为目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制度所提供的是狭隘的和有限制的市場，而独立的、自治的國家所提供的則是日益扩大的市場。

美国經濟利益还影响我們对亚洲各国内部政治力量配置方面的政策。尽管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国家在国内生活中有自治和自决权这个原則，这一点依然不可避免地是真实的；美国对于各个国家将有何种国内制度要感到关切，必然要据此来制訂自己的政策。在这一点上，當我們抱住存在于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場上的利益时，我們也会找到正确的道路。

从这个观点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內部問題。中华民国

截然地分成两个陣营，我們的报纸順溜地称之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或是“保守派”和“激进派”。这种称呼包含了这样的假定，我們資本主义的美国觉得它自己的利益是为“国民党”或“保守派”的中国所最好地代表着的，而它对“共产党”或“激进派”的中国就必须繃起眉头。我們在前面几章已經表明，这个假定在軍事和政治領域內是怎样的矛盾。經濟上的考虑更加有力地打破了这种陈旧的偏見和假定。

这是一个可以证明的事实：今天“国民党”中国特有的經濟政策的运用，正在摧毁美国的寄托在扩大的中国市場上的利益，而“共产党”中国的經濟政策則最有利于促进一个扩大的市場。“国民党”中国的反民主的、专断的内部制度是建立在这样的經濟政策上面的，这种政策鼓励地主压迫、投机、市場壟断、高利貸、以及所有各种不是通过发展經濟而是通过对經濟的寄生性掠夺的謀利。而西北边区即所謂“共产党”中国的民主的内部制度則是建立在这样的經濟政策之上的，这种政策限制和減輕地主剝削，禁止投机囤积和壟断市場，对生产領域內的經濟企业听任发展，取締高利貸行为，只鼓励通过扩大生产及采取提高整个社会經濟水平的方式的謀利。

那么，这真是一个中国的“純粹內政問題”，美国对之不應該有一个政策嗎？

美国正在供应中华民国以战争武器，供应的数量不久还要大大增加。如果这些武器不是全部用来打日本人，而是把一大部分轉用来打某一部分中国人民，而这部分人民的政策又最接近美国的經濟利益，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美国正在供应中华民国数以亿計的貸款，表面上是用来稳定中国的币制。当这些資金被轉用来从事粮食的囤积投机，从

事高利貸，从事通貨操纵，从而造成千百个新的大富翁，并使一切生产事业无利可图从而把民族資本排除在外，还把一种恶性的通貨膨脹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美国准备在战后对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工业化貸款。如果在中国政府中是这样的人占統治地位，他們否定工业化的整个概念，他們把古老的族长制的封建主义頌揚为“黄金时代”，中国必須回到这个时代去，他們认为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科学和民主的“外来”影响的“侵入”中国，这难道真的不干我們的事么？

毫无問題，如果美国同中国还要发生任何关系，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使这些問題也成为我們的事务的一部分；我們对之必須有一个政策。而既然能代表美国在中国的最高利益的政策同时又是代表着数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民主自治扩大的政策，这就更加是必要的。

美国政策問題的实质对整个亚洲都是一样；在对一个国家与对另一个国家間，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在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和印度尼西亚，基本的問題被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掩盖起来了。很显然，美国不願也不能仅仅为了重新建立那个古旧的、腐敗的、和已經完全衰朽的殖民制度，来把太平洋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取得胜利。并且这一点正在变得明显起来：不能把这个問題延到战后再行考虑，而不使胜利的代价倍增，超过任何可以忍受的限度。

印度是殖民地的远东大陆唯一沒有受到日本侵略浪头首先冲击的地区，它使基本的問題以其最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美国武装部队不只是直接用来驅逐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和准备收复淪陷的領土，同时还出乎意外地，并且同美国的利益

相違背，用來支持英國的殖民政府，使之繼續維持下去，這個政府是同日本人在新加坡以及遠東其餘各地一舉而將其擊碎的政府一樣的腐敗、過時和有害的。

不待研究英法荷屬殖民帝國問題的詳情細節，一望而知：在擊敗德國和日本以後，有秩序地、和平地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全系乎英美兩國的利益能否通過一個共同政策調和起來，這個政策同時又會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解放出來。

英國人這樣死死抓住他們已經過時的殖民制度不肯放手的主要理由，不在於所謂英國民族性格中固有的保守主義或不通權變。毋寧說必須從這個事實去看：英國人看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可以避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所壓倒。處在一個國與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的世界中，並且被剝奪了他們從前對殖民地的壟斷權利以後，英國資本家不能看到有同他們的美國敵手進行勝利競爭的希望。這是英國人一向就有的恐懼心理，而由於戰時美國工廠生產能力的驚人擴張，這種恐懼更是加強了百倍。除非英國資本這種確有理由的恐懼能夠稍稍得到消除，對亞洲制定一個長期的共同政策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因此，一個以穩定亞洲為目標的英美共同的政治路線必須建立在這樣一種經濟協議之上：這種協議將要在保證經濟上較弱的國家得到按比例的一定份額的限度內，限制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彼此自由競爭。沒有這樣一種保證，那個較弱的國家決不肯自願放棄其對殖民地壟斷的歷史權利，而沒有這種讓步，任何持久的和平時期是絲毫沒有可能的。

然而，即使這樣還不能單獨奠定亞洲穩定的體制。蘇聯沒有直接卷入世界戰爭的遠東方面，但它依然是亞洲的頭等強國。它對涉及亞洲關係的任何長期體制的積極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英国和美国对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綱領必須是这样的性质，即它是苏联贊成的，并且会参加来实行的。

这样一种政治的和經濟的協議，现在就拟訂出来并向世界宣布，对于世界会有一些不可估計的好处。它将夺去日本强盜的一个武器——他們使用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政治口号。

它将立即开始調动整个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成为我們在战争中的积极的盟友。

它将使英国同美国之間最尖銳的矛盾归于消失，这种矛盾妨碍在太平洋地区制訂出共同的战略和策略。

它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統一和民主化，使它們能在胜利的時刻立即开始实行有效的大規模的工业化計劃。

它将奠下基础，使苏联能积极参与远东的稳定工作。

它将在亚洲如同在欧洲一样，創造必要的經濟和政治前提，去实现“德黑兰”关于从世界上为未来的世世代代消除可怕的战争灾难的希望。

第七章 非洲和近东

就长期的世界政策來說，非洲依然是极其模糊之点。在它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情勢中，并不包含单一的、主要的因素可以使之获得稳定。不去探討构成非洲这幅画图的使人迷惑的細节，但看一看能否为美国找出一个以解决某些主要矛盾为目标的可行的长期政策，也还是有价值的。

非洲領土和人口的絕大部分处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制度之下。这个制度是和美国的利益矛盾的，它肯定得不到苏联的同情，它是中国所痛恨的。同时它压迫大約一亿五千万土著居民，

使一个富饒的大陆变成极端貧困，阻碍任何趋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发展。

在非洲的現狀上到处写下了“不稳定”的字样。美国从它在德黑兰協議体制內及其世界前景下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非洲，必須有一个非洲政策，但是現在还没有这样一种政策。非洲同其余世界的关系，非洲內部生活的組織，都必然要发生变化，关于这种变化的形式和內容的决定，美国肯定是能有所貢獻的。然而美国这种政策究竟如何，尙有待于确定。

美国自己也挤进英国和法国中間去一道参加非洲的殖民制度这一类想法的必須被擯棄，我认为是不必多費笔墨的。这是在二十世紀中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为加强了对世界的破坏。这同美国的利益和意識形态是如此明显地相反，可以不必去討論它。

一个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如果要切实可行，必須具有一定的特点，这种特点我們已經能够比較精确地加以說明。那必須是一个由于美国参加而变成可能的政策；这就是說，美国必須答应自己参加非洲問題的解决，作出其他国家所不能作的貢獻，从而把所有的非洲問題提到一个較高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在整个世界中，特別是在非洲，必須不削弱英国和法国在美国面前的相对地位。最后，这种政策必須能使非洲各族人民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立刻向前发展。只有适合这三个要求的政策，才能认为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美国政策。

美国能够貢獻什么，使所有的非洲問題出現新的曙光呢？美国能够担保实现一个大規模的非洲工业化計劃，只要战争一旦結束，美国軍事工业一經开始轉向平时生产，立即予以执行。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一个別的国家能够这样作，而在战后能够立即可以利用的这样广大的市場，正是美国战后最迫切的需要之一。

这样一个使非洲工业化的计划将立即提供解决千百个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基础，其中包括最重大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利益自然要被投入这样一个工业化计划的熔炉中。英国和法国就它们所牺牲的殖民垄断权利必须得到补偿；但工业化的果实是如此的硕大惊人，这显然是可能的。两国由于放弃它们的殖民权利，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能够增强起来。

归根到底，非洲的工业化，只在非洲人口都被吸引来参加这个过程并分享其利益时，才能成功。它必须使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照他们参加这个工作的情况，得到普遍的和不断的提高。非洲人必须有机会丝毫不受限制地担任经济事业中的每一个位置和职务，直到最高级。全体居民必须从一切封建和殖民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必须为居民大众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并使最合格的人受到专门的技术训练。必须立即施行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以非洲的每一民族最后实行完全自决为目标，并定出其完成的时间表。

采取了这些措施，就可以为一个工业化的非洲奠定巩固的基础，这种基础将保证非洲工业化的成功；不采取这些措施，整个计划就将受到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的阻碍，不能实行。一个殖民地的和隶属于他国的人民是不能够建立或维持现代的工业化经济的。

旧的殖民行政制度必须为一种新型的、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所有效地代替，这种组织的建立，是用来创造和维持顺利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条件的，它将把政府职能逐步交到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机关手中，最后它自己就不再存在了。

将允许南非联邦参加一般的全洲的工业化，其条件为，它在自己领土内也使非洲土著居民获得那种必要的平等地位，而现

在它是拒絕他們享有这种地位的。

由我看来,这些就是这样一個計劃的主要輪廓,这个計劃是美国,也只有美国,为了所有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能够促使非洲和全世界去实行的。

这个計劃将产生这种无法估計的好处:使非洲不再是国际竞争的角逐場所,并使它变成国际合作的實驗室。它将使一个偉大的和沒有开发的大陆参加到世界进步的主流中来,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經濟方面。它将为美国和英国开辟另一个这样的广闊市場,这种市場是在战争結束以后立刻需要的,如果要世界不再陷入又一次具有毁灭性的經濟危机,像1929—1933年那样的話。它将在联合国的大厦中建成另一个强大的支柱,只有联合国才能使世界免于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威胁。

在社会方面、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同非洲密切相联的是阿拉伯的近东各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主要的不同是,在这个地区,絕大部分的領土和人口已組成民族独立国家,或正在获得独立。这个地区和我們的整个主題有何等深切的关联,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說明:即关于打算用美国錢去装置通到地中海的輸油管計劃在美国引起的刺耳的和不体面的爭論,以及在英国和美国之間关于近东經濟发展各个方面的比較压抑的、比較体面的、然而同样是同样尖銳的分歧。在这里也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地区經濟发展計劃,能够通过国际合作来調和各国之間的竞争。在这里,又提出了苏联同資本主义国家一道在經濟上参加这样一个計劃的可能性的全部問題。

只有以这样一个关于近东的、为列强所支持而又完全适合有关各族人民的民族願望的經濟計劃为背景,才能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問題得到稳定的解决。这是肃清支

配近东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封建残余的必要基础。

在非洲，也像在其余的世界一样，这样一种战后前景的现实的希望会立即加强战争的进行，加速胜利的到来，并减少胜利的代价。它将动员一个大陆的强大力量作为我们的积极的同盟者，而不是听任它成为一大堆困难问题的展览厅。

时机早已成熟，美国应当就这样一种政策作出它的建议，征得其盟邦的同意，并进而采集在把“德黑兰”的精神扩大到全世界各处时自己表现的远见、勇敢和活力所带来的丰富果实。

第八章 在美洲的好邻居

这是一件相当惊人的事：在1944年的头几个星期里，当希特勒在世界其余各处都在被击退时，他却向西半球进攻，单单在美洲占据了新的权力地位。亲纳粹的阴谋家们加强了他们对阿根廷的控制，并进而通过政变夺取玻利维亚。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是：玻利维亚的亲纳粹议会会有理由相信它会为华盛顿所欢迎，因为它的代理人在美国政府中占据有势力的高位，受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支持。

没有疑问，曾经定下了计划，向另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扩大这种纳粹的进攻。甚至在墨西哥，臭名远扬的辛那基运动也受到美国天主教会一个高级领袖（他表面上是因宗教使命去到墨西哥）的公开鼓励，去推翻墨西哥政府。

当世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其余各处面临着失败时，在美洲这半边却能大胆进攻，显然在西半球的好邻居中不是百事大吉。如果不是由于两个人的机警和勇敢的反击，这种进攻还会得到更大的进展；这两个人就是美国国务卿科德耳·赫尔先生和拉

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先生。科德耳·赫尔在华盛顿这一端制止了这种阴谋，而倫巴多·托列达諾則通过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蒙地維的亚举行的特別會議，在美国代表团参加之下，集結了所有南方各国的民主和劳工阶层。

法西斯主义对美洲的进攻已經被制止，然而使这种进攻成为可能的情况并未得到改正。这种情况是我們的敌人活动的基础，我們全国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这些情况上，以便制訂政策来改善这种情况。

目前有利于納粹在西半球各国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这就是：（1）美国对其陸邻政策的不变性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政策还随我們 1944 年大选的結果如何为轉移；（2）美国未能勇敢地区分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例如，它容忍长枪会，它願意同与納粹維持关系、甚至支持他們当政的那些集团打点小交道，它对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民主和劳工运动采取冷淡的和保留的态度，而后者是美国最可靠的朋友；最后，（3）在英国和美国之間繼續进行斗争，希望在拉丁美洲的战后市場中取得优惠的地位，这种竞争使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問題和每一种力量安排陷入混乱。

我們并不是非要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来混过現在的世界危机不可，因为，只要美国倡导一种正确的政策，它完全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使之变成十分有利。

本章的目的就在指明这样一种政策的主要之点，这种政策会使法西斯敌人遭受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加速战争的胜利，并在我們自己这半个世界上为“德黑兰”的战后前景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

关于第一点，我們的睦邻政策的不_·变_·性，我們有力量立即采取这样一种步骤，它既能給予整个拉丁美洲以最深的保证，同时又符合我們自己的最高利益。全部要作的事情是：无条件地宣布美国在原則上承认波多黎各是一个国家，准备經過同波多黎各人民的代表协商作出有关的安排以后，立即承认波多黎各的独立政府。

在整个拉丁美洲，这样一个步骤对于所有亲納粹的阴谋巢穴会是一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迎头痛击，并且还会进而使对“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普遍恐惧归于消失，上述阴谋即是以这种恐惧心理作为滋养料的。在南方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心目中，波多黎各的命运已經成为美国长期意向的信号。如果波多黎各的两百万人还是美国的“子民”，而他們的土地还是美国的“屬地”（伴随这种情况而来的是极端的贫穷，困苦，落后，和前景的一片模糊），那么，大部分美洲人民将把美国的“睦邻政策”看成是一时的权宜之計，用来度过經濟危机和受到納粹与日本威胁的困难时期。

其次，这种步骤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它会消除在我們的大門旁边造成我們自己的“爱尔兰”的危險。在今日波多黎各生活的某些派別中，有显明的证据，证明有一种对美国怀抱的頑固的和不讲理的敌視态度产生，同瓦勒拉对英国的态度完全相同，而这同样引导到容忍甚至怀抱法西斯主义。在竭力設法同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集团进行合作时，我自己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发展的严重症候。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錯誤，对它单单加以斥責和鎮压，肯定不是美国的解决办法。我們的国家政策的任务，就在于消除产生这类“瓦勒拉”的情况，而且要作得及时。现在就毫不吝惜地給予波多黎各独立，将保证得到一个友好的波多黎各，一个真正的好邻居。

拉丁美洲人对睦邻政策如何反应，他们如何了解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的历史意义，从一个著名作家同时是波多黎各爱国者朱安·安多尼沃·科列哲在纽约发行的新报纸《西班牙的乡村》在整个拉丁美洲所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影响，可以得到最重大的证明。这个报纸的主要贡献是，它在说明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同联合国反对轴心国的胜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处理西半球团结的问题上，表现了清楚的理解和深刻的信心。

关于第二点，区别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朋友和敌人。这依然是事实：美国的官方政策在某些方面加强和鼓励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敌人，同时它使我们的朋友受到挫抑，感到沮丧。美国帮助佛朗哥，他是用武力摧毁西班牙共和国然后在西班牙当政的——我们拒绝履行对西班牙共和国所负的特定条约义务，当佛朗哥靠着希特勒的帮助去到马德里时，我们赶快承认了他；我们在马德里保留一个大使，他公开赞扬佛朗哥的统治，并为他的组织——长枪会辩护。

正是这个长枪会，它在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自己的国内作为希特勒的阴谋和间谍网从事活动。陶醉于作为胜利的希特勒主义的代理人而行动的想法，佛朗哥政府近在1940年还“张贴官方的标语，不仅提出对古巴和菲律宾的要求，而且提出对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要求。”^①面临着希特勒可能的失败，它正在挑起每一种对美国的潜在的反对，使之从事不顾死活的牵制行动，希望在1944年的选举运动中造成一个主要的危机，从而使罗斯福失败，这是挽救一种通过协商取得的和平以便为法西斯主义保存基础的主要希望。

事实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美国的官方政策仍然不肯把长枪

① 托马斯·汉密尔顿：“西班牙帝国的迷梦”，《外交》，1944年4月号。

会以及同情它的集团当成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敌人看待，反而坚持把它们当成是不可少的人，必须通过让步和有礼貌的对待，参加它們对正在兴起的民主力量的敌视，把它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差不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谈，然而又是铁一般的事实：美国对待拉丁美洲各国内部问题的官方态度同我們的直认不諱的死敌——长枪会的态度一般无二，即采取敌视民主集团、特别是劳工运动的政策，后者被认为是“共产党”，因而是“可疑的”。公开的长枪会会员和希特勒的同情者在美国进进出出、自由旅行、很少感到困难，其中一些人还被正式邀请到我們的大学去演讲，被授与“特殊勋劳奖赏”，如此等等，而最积极的反法西斯和反长枪会的人士却被列入官方抵制名单，不允许他们来到美国。我們至今仍然把我們的敌人当作朋友看待，把我們的朋友当作敌人看待。

例如，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美国在古巴的外交和領事人員十分公开地談論在未来选举中他们对格劳·圣馬丁所领导的反对集团的同情，和他们對巴蒂斯塔总统所领导的民主集团的厌恶。但这同样是人所共知的：格劳·圣馬丁和他的朋友們同长枪会一道工作，为后者所支持。对我們美国的頑固分子來說，巴蒂斯塔政府集团是十恶不赦的，因为它包括古巴共产党人，并且在內閣中还有一个共产党人；至于这个民主联盟也是拥护联合国家的，在这些美国人看来却不重要。

华盛顿制造的这种官方政策的最荒唐的例子，是对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所进行的报复。这件事走到了这样的极端：美国政府雇用的人員利用他們的职位使一个阴谋具有半官方的色彩，这个阴谋是要取消托列达諾

担任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主席，希望代之以他们自己选定的人——智利的伊巴涅兹。此举未成，他们就要使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分裂，在拉丁美洲另外成立一个受华盛顿支配的新的劳工联合会。在高级人士中以托列达诺是一个“共产党人”为理由庄严地为这一切辩护，这同纽约美国劳工党中杜宾斯基—罗斯—康茨集团把党内的悉尼·希尔曼及其同伴们叫做“共产党人”的方式和证据一模一样。

幸而，至少就托列达诺来说，有日益增加的迹象表明：我们政府的真正领导者们迄今为止已制止他们下属的这种疯狂行为。但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中，我们还远远未能认清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并把他们区别对待。我们国家在对待我们的邻邦上，还在心理上深深纠缠在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宣传的迷网中。

在睦邻关系增长中第三个深刻的扰乱因素，就是英美两国在拉丁美洲方面的日益剧烈的竞争。这个事实使所有研究阿根廷混乱局面的人不得不注意：英美竞争是一个造成损害的因素，其严重性只次于纳粹的渗透和得势。如果不是英国和美国彼此齟齬，那些纳粹代理人是决不会掌握政权的；两国都要求那些亲纳粹的集团依附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只在一点上彼此一致：使真正代表阿根廷人民的民主和劳工集团受到挫折。

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对它们假定是要谨慎地保守沉默、避免去公开讨论的。既然这种缄默政策在阿根廷方面遭到了如此严重的失败，也许现在已经是时候，可以用一些公开讨论的清新空气，来把英美在拉丁美洲竞争的整个事态加以澄清，看看这种竞争对一切有关方面的最高利益是何等有害。

英国人耽心他们对拉丁美洲市场的控制会被美国夺去；他

們对美国企图迫使他們将在阿根廷的投資轉让美国以供应他們战时的財政需要一舉，特別表示憤怒。美国的利益集团把拉丁美洲看成是他們自己的特別保留地，在这里他們的英国穷兄弟只是闖进来的外人，必須將其排挤出去，为美国战后大規模的市場擴張让出一条路来。某些拉丁美洲人似乎满足于有两大强国彼此角斗来爭夺他們的归附，而不願只有一个强国，它会以“非取則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条件。

这个三角形的每一个角都幻想当它使竞争更加剧烈时，那就是促进它自己的利益。冷酷的事实是，他們这样一作，只不过是三敗俱伤。英美利益集团是为軸心国阴谋敞开大門，同时是用各种各样的壟断办法限制着总的市場。拉丁美洲人发现，他們的内部政治生活由于各个反动集团在这个或那个强国庇护之下的兴起而受到歪曲，而所有这些集团和强国全都阻碍着他們的經濟发展；但另一方面，缺乏任何一种公认的、有組織的共同利益或計劃就使得有巨大可能性的政治和經濟成就不能实现，这种成就能使英国、美国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时得到好处，远远超过在无限制的竞争情况下任何一方单独所能得到的好处。

必須十分坦白地說，改变現存关系的責任完全落在美国肩头。这是責任和权力相連的原則的必然結果。美国不仅是西半球的最有力量的唯一因素，而且也只有它能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的計劃，其規模和范围之大，足以将一切特殊的既得利益包括无遺。

当前的情势所明白要求的是，美国須率先提出一个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經濟的共同計劃。这个計劃必須立刻設計，并在战后立即执行，其規模之大，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和拉丁美洲的巨大的土地、原料与人力資源相称，和英美供应資本与創造重工业产品市場的能力相称。

为了使这样一个計劃变成真正共同的东西，它必須調和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角的利益。对拉丁美洲国家來說，它必須保证它們的民族独立得到謹慎的保护，同时能使它們的經濟福利水平迅速提高，并在每个国家发展一种平衡的經濟，避免旧殖民制度下单一經濟和极端专业化的坏处。对英美資本來說，它必須提供一个巨大的和可靠的市場，肯定能实现合理的利潤和分期还款計劃。在英国人和美国人間，必須消除他們的不受約束的競争，其办法为略为比照他們过去的期望和現在的能力，在共同計劃中分配給他們一定的份額。

这样一个計劃的全部物质前提無疑是存在的，使它达到随时可以执行的藍图阶段的技术能力亦复存在。依然缺少的条件，是精神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准备。在詳細的藍图能够制出之前，必須創造这些条件。

这样一个計劃对一切有关方面可能造成的好处真是十分巨大的。对拉丁美洲來說，它为一种巨大的向前跃进敞开了大門，这在五年或十年中会超过以往的一个世紀。对英国和美国來說，由于可以利用的市場的空前扩大，这个計劃能使它們之間的毁灭性競争得到調和。特别是对美国，它对那个重要性压倒一切的問題提供了大部分答案，即在战争以后，我們能否在类似战时达到的規模上，使我国国民經濟繼續运轉。

对美国的經濟学家和政治家來說，这要求有一个嶄新的思維尺度。我們每年要計劃的对拉丁美洲的工业品出口不是几亿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美国所需要的市場，或者說拉丁美洲的发展潜力，不用几十亿美元是不能計算的。

美国如果不能用以籠罩这种偉大前景的廣闊的眼界和勇敢的精神去回答这种历史时刻的挑战，那我們国家就得浪費一个世代去寻觅新的道路。

第三編 战后的全国团结

第九章 战时的团结要求战后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把战后的问题延缓解决而又能动员美国的全部力量去尽快地赢得战争胜利，那么在想像上这也許是比较好的办法。然而，正像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关于战后世界面貌的某些基本协议已被证明是充分展开联合战争所必需的一样，在美国国内生活中，战后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保持战时全国团结的因素。为了维持美国的战时团结，就要求把这种团结扩展到战后时期。将来的问题在现在已经起作用，要求提前作出某些解决。

要知道这种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举几个粗浅的例子。某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在研究它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一个老董事发言，要求经理部门终止它的“绥靖”劳工的政策，解散工会，重新“成为它自己屋子里的主人”。经理回答说，在此战争紧急关头，必须依从公共政策，同工会打交道；但他应允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一定不再做所有这样的蠢事”。大约在同一个月，工会执行委员会也在开会。一个性急的委员要求立即举行罢工运动，就已经积累了多少个月的不平之事采取行动。工会主席答复他：“不，当战争进行中我们不能罢工，但只待战争一停止，你可以相信我是头一个带头来对某某进行一场真正斗争的人。”从这时以后，公司和工会都为一个思想所支配——为战

爭結束之日即將爆發的那場攤牌的鬥爭作好準備。

把這個例子擴大到幾千起，然後追溯這同一原則在充塞我們社會的所有各種矛盾和衝突中是如何發生作用的；這就看得很明白，為什麼在整個美國正在產生一種不可忍受的緊張氣氛，甚至在嚴肅地承認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戰爭勝利的人中間，也是一樣。

除此之外，根據我們美國的憲政制度，1944年又碰到是一個全國選舉年，須選出一個今後四年當政的美國總統，以及全部眾議院議員和三分之一的參議院議員，更不要談許多州和地方的選舉。所有對政府施展壓力的特別利益集團都在警覺地和積極地促進它們自己的目的。所有黨派的和個人的政治野心都被刺激起來，達到狂熱的地步。對他們來說，團結似乎是沒有好處的，只有在選舉中通過傳統的美國式的“打倒他並使他屈服”、自由公開的權力攫奪，才大有好處。

這種情勢似乎是替希特勒在美國的伙伴們預先定制好的。他們竭力設法製造各種各樣的牽制和內部糾紛，以便暗中消除和削弱由於在西歐开辟第二戰場而即將給予希特勒主義的打擊。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美國從德黑蘭聯盟中拉出來，取消決定了希特勒主義滅亡命運的長期聯合和持久和平的前景。他們一定要破壞美國的全國團結，一定要使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彼此鬥爭，以便使他們不能把反對希特勒的戰爭進行下去，直到勝利。

在這1944年的春天，這種分裂的勢力在美國已極端狂獷，絲毫不受約束；他們正在欣享着一個真正不可多得的時機。他們威脅着我國的將來和世界的將來。必須制止他們，約束他們。

直接鎮壓美國的分裂勢力，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是控制情勢

的最重要的手段。事实上失败主义者和亲纳粹分子正打算利用这种镇压来增加国内的纷扰和混乱。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在所有真正爱国的美国人中间加强团结和信任的精神。如能作到这点，对故意的分裂分子就能够加以处理，不致造成损害。

赢得战争胜利的考虑就这样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现在就决定把战时的全国团结政策推广到战后时期，在时间上永无限制。从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平的“德黑兰”前景来看，也同样有力地要求这样作，因为一个为内部斗争所震撼的美国是不能充分坚持它在战后世界中的英苏美联盟目标的。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最好一开头就把它当作一个很难达到的目的，它将要求我们施展道德方面和智慧方面的全部力量。但同样必要的是：排除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一切失望情绪和宿命主义，充分下定决心，认为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而且一定会解决的。这样来对待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能够找到而且一定会找到行动的路线，只要一貫坚持下去，它就将逐步解决我们的问题。

现在的所谓战后计划大多数与我们提出来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无关，其中许多还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拥护这种或那种争论最大的想法。因此，从这样一条规则出发我们将要看到是最有好处的：我们的战后计划就是以实现在德黑兰所定下的前景为目标的全國團結。

这对所有为计划而计划的人们以及有着图谋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计划的人们来说，是不惬意的。可是，我们必须冒着引起他们不快的危险，希望以后取得他们的同情，其办法是帮助他们在更大的团结中找到一个地位，“这种团结是他们的计划能为之服务的，但不是他们的计划所能帮助造成的。

美国的全国团结不能建筑在一个预先定好的计划上。这种团结必须通过找出行动中的一致之点，一步一步地达到，这种一致之点要能够调和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和各种倾向此互相冲突的观点和利益，它们迄今还是习惯于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的。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在民主进步的大多数美国人中间，由于各种互相冲突的计划造成的混乱，团结的实现行将受到阻碍，而反动的少数人则将攫得政权，因为他们团结在这个单一目标之下。任何计划如不能在自己背后团结全国有效的多数以促其实现，是分文不值的。

在可能破坏进步民主多数阵营的团结的所有各种分歧中，最不能和解的是在两种前景之间的分歧：一种是美国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去的前景，一种是美国将要继续维持它现有的制度而不转到一个根本上崭新的基础上去的前景。

在美国生活中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基础的行动纲领，现在并不能把一个已有的或可能有的多数团结起来。即使我们把彼此冲突的社会主义概念都堆在一块，其拥护者也只构成一个很小的少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地、确实地声明：能够把美国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去拥护“德黑兰”的那种实际可行的计划，将接受现存的经济制度作为其运用的基础和起点。

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判断是：美国人民在主观上对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任何深刻变化是如此缺乏准备，以致以此为目标的战后计划不会使全国团结起来，只会使之进一步分裂。这种计划恰恰会使民主和进步阵营分裂和削弱，同时却会使全国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更加增强。这种计划的实际效果是：它

們將幫助反“德黑蘭”的勢力在美國當政。

因此，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為了在廣大的民主陣營內作為團結的支持者而積極發生作用，就必須清楚表明：他們決不以危及或削弱這種全國團結的方式和方法去提出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們必須在一切實際問題上使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服從於大多數人的共同計劃。

對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來說，這個問題決不是一個新問題。自從希特勒在德國當政以後，在集結願意從地球上消除這個威脅的各種力量時，這已經日益成為中心問題。我在1942年夏已經預見到這個問題將以其現在的形式出現，當時我寫道：

“美國如能勝利地經受住這次戰爭的嚴峻考驗，並對勝利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它差不多肯定會作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重心進入戰後的世界。因此，它在國際大家庭中將起異常重大的作用。

“這個戰後世界的中心問題將是：在聯合國家中建立起來的戰時合作在戰後能否繼續和擴大，以便集體處理世界的經濟復興和政治建設問題。所有關於戰後世界的性質的進一步決定，全看對這個問題的答復如何。

“如果作為世界合作中心的聯合國家能夠繼續存在並擴大範圍，那就可以期望這樣一種現實的前景：迅速醫治驚人的戰爭創傷，並大踏步地前進，使所有的人民達到‘大西洋憲章’中列舉的在文化上和經濟上獲得提高的目的。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國際戰爭進程中所孕育的、在戰爭結束時即將爆發的騷亂和內戰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可以為所有的國家帶來最大程度的和平的和有秩序的發展。”^①

^① 埃爾·白勞德：《勝利和勝利以後》，第251頁，國際出版社，1942年。

我在 1942 年只能当作一种值得想望的可能性去对待的前景，现在经过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以后，已经变成世界的实际行动纲领，有着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签名。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纲领是现实的和值得想望的，那么，我们的一切计划就将以促其实现为目标。

不管在其他国家的情势如何，在美国，“德黑兰”造成的后果意味着这样一种前景：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以及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在现存制度的体制内，生产和就业的扩大，民主的加强，——而不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

这就是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全国团结计划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因此，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社会主义信徒的政策，就是正视战后世界复兴时期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前景及其一切后果，在这个基础上估计一切的计划，积极地同国内最民主和最进步的多数合作，在一个足够广泛和有效的全国团结中去实现德黑兰的政策。

第十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我们所研究的美国全国团结，必然而且必须包括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大资本家在内，这些就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直接的和有效的控制的人。这个事实预先决定了国民经济将在它下面运行的那个计划的许多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美国资本主义及其领袖们的一些特点，就可以把许多问题弄清楚。

首先，最好是对一种造成了许多混乱的似是而非之论加以解释。这种似是而非之论可以表述如下：美国资本主义是世界

上最先进的，但不是最成熟的。它是最先进的，因为它是最强大的，它把生产技术推进到了自己的最高已知点，而它所继承和保留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是最少的。它不是最成熟的，因为它的内部固有的发展趋势还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它还保存着一种年青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在自知和自觉方面还落在后头。

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相对不成熟的性质的典型表现是：它紧紧抱住“自由企业”的口号不放，就像野蛮人对他所崇拜的偶像一样。对“自由企业”稍稍表现不尊重的态度，就会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更快地、更充分地使美国资本家集成为一个坚固的防卫集团。欧洲的、甚至加拿大的资本家都比较更无动于衷和更现实，在他们的计划思维中所受这个公式的束缚要少得多。但对全体美国资本家来说，“自由企业”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特别是在字面上和理论上，虽然在实践上的背离是可以默许的，如果掩盖这种背离的是一种适度的缄默，或是一种文雅的托辞，说这种背离其实并不是什么背离。

我们自然不能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中接受这种“自由企业”的拜物教。但在我们为包括一大部分美国资本家在内的美国民主多数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我们确有必要去充分估计它，并避免对它的正确性进行任何直接的挑战。这个问题有点像宗教自由和宽容的问题，它要求对任何的和一切的宗教信仰与怀抱这种信仰的人表示尊敬的态度，尽管人们没有义务接受其中任何一种作为自己的信仰。

在美国，德黑兰计划的敌人正在捍卫“自由企业”、家庭、母道、宗教和国家主权的口号下集结他们的力量。他们依靠来把资本家集结到他们一边去的口号就是“自由企业”的口号。他

們希望这样来在民主进步陣营中引起混乱，因为对这个陣营的大多数参加者來說，“自由企业”也具有和家庭、母亲同样神圣的性质，他們在母亲怀中吸奶的时候就吸收了这种观念。“自由企业”是資本主义的一个亲密的爱称。既然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我們是具有确信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利益，必須在一个长时期内实行合作，来使資本主义在美国运行，如果我們禁止談論有对它的爱称“自由企业”抱着尊敬的听取态度的必要性，那是相当愚蠢的。因此，我們預先申明我們的諒解：我們所屬的民主进步陣营将实行捍卫“自由企业”，我們把这个名詞作为我国現存的資本主义的一个同义語来理解，我們既不去反对它，也不提出任何相反的口号来。

既然这是圍繞着德黑兰綱領来团結一个有效多数的必要步驟之一，我們就要尽一切力量来在1944年的整个选举运动中消除“自由企业”这个不成問題的、引起混乱的問題。

其次，必須注意，某些美国資本家一方面对他們自己的制度的一个較早的时期抱着怀恋（表现在对于“自由企业”这个口号的恋恋不舍上），另一方面他們对进到資本主义經濟形态的任何較高阶段也抱着强烈的憎恶。他們不能区别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是他們自己心爱的制度的更强的組織形式，而后者則是廢除資本主义。他們反对前者的激烈程度差不多和反对后者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在1944年的选举中，如果民主进步陣营提出一个即使是很温和的关于銀行、铁路、矿山、公用事业等等归政府所有的計劃，它是不能得到全国拥护的，虽然这种措施会大大促进資本主义的效率，使它更能应付它自己的問題。

战争迫切地要求政府更加有效地干預經濟生活，使之合理

化(这种需要已由下列文件表明：众議院托倫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議，参議院基戈尔——配珀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議，由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合在两院提出的法案)，然而即使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也不曾认为在这一方面行使他的权力是适当的，国会也不曾采取行动。即使是总统的温和的防止通货膨胀的“七点计划”亦为国会所拒绝接受，其代价为冒着经常的和破坏性的劳工危机和国民经济中一个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的成长。也许总统这样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一方面任何进一步的压力会使资本家的偏见受到损伤，使他们不满，放松对战争的努力，这对战争带来的损害会比增加经济效率带来的好处更大。

然而，对民主进步多数的有效团结甚至更加危险的是这样一种趋势：某些自由主义的和中等阶级的人士过于拘泥文字地、过于热心地把“自由企业”的口号当成一个行动的口号，并提議付诸实施，作为解散托拉斯和壟断組織及取消卡特尔的綱領。其結果肯定会把所有的资本家投入反动的和失败主义者的陣营，就像否认他們的“自由企业”的口号一样。前者損害他們的物质利益会同后者損害他們的心灵一样地厉害。他們对待他們的“自由企业”，很像他們对待他們的基督教一样——他們不願它受到怀疑，但那只是为了紀念日和节日，而不是为了在普通工作日的实际应用。因此，民主进步陣营的綱領中任何爭取信任的标志，必須在实质上显然是徒具形式而不发生作用的，不仅因为不可能把炒熟了的鸡蛋恢复原形，回到从前的发展阶段中去，还因为当前更实际的理由，即不然的話，资本家将要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它，而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我們是不可能于1944年选举中取得胜利的。

冷酷的事实是：“自由企业”今天在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資本

在日益扩大的单位中，在托拉斯、联合公司和卡特尔——这些是壟断組織的最高发展——的形式中使自己积聚和集中的自由。

这次战争过去之后，美国資本主义的壟断性将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大規模軍事生产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操在一百家最大的公司手中，大約有一半是由十个領头的公司生产的。在国民經濟的积聚和集中中这种惊人的大踏步前进是不会也不能被取消的，提出并討論中止这种发展只是空談家們的事情，只是喜欢听听自己的声音、除了談談以外別无他事可做的懶人的事情。

了解資本集中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意味着我們要向大托拉斯和壟断組織所表現的一切发展趨勢的自由运用投降。同給予壟断資本以力量的較高技术一道，寄生性的趨勢也在发展，它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牺牲技术进步以加强剝削，以强盜般的掠夺行为吞嚥小資本，把自己想像的狹隘的利益駕凌于全国利益之上，如此等等；这种寄生性趨勢如不严厉制止，就会把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推向更加迅速地重复出現的危机。必須保护小企业并給它們以发展的机会，特別是在托拉斯化資本不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技术进步的那些領域內。

在壟断資本起着統治作用的社会中，要对壟断資本加以調节和限制，不是一件简单的和輕而易举的事。如果大資本联合它的力量来反对社会的其余部分，并为爭取不受限制的統治而斗争，那么，倘若不經過一次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斗争，和一次会造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現存制度的結果的危机，是否能成功地調节壟断資本是极可怀疑的事。

然而，如果在資本的行列中有着足够数量的具有眼光和理解的人，他們認識到，如果不使他們自己的制度的运用严格

服从于一个設想广闊和設計明确的从全国和国际上扩大所有的人的幸福の計劃；对这个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种自行毀灭的結局——那么，这些人倘能納入民主进步的人民陣营之内，或者同这个陣营一道工作，就能够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大資本領袖，以最大限度的自己所加的限制去配合最小限度的政府所加的調节，有效地抑制大資本的反社会和反国家的趋势，足以使它参与全国的团結，支持德黑兰計劃。

有着日益增多的证据，证明在大資本的行列中是有着这种有眼光和有理解的人的。只要把下面的事情說明白，他們的人数将要增加，他們的主动性和领导作用将要变得更加强大：存在一种实际可行的綱領，环繞着它，他們能够并且正在同广大的民主进步陣营联合起来，包括有組織的劳工运动在内，这种綱領是促进全国的一般利益的。我們必須大家学会欢迎他們的出現，并在实际生活中证明：以全国团結的精神所作的这种合作的努力，既是可能的，又是有益的。就美国而論，沒有比在劳工和我国民主的自由派方面对大資本行列的人采取一律对待和不加区别的敌視态度更有害于德黑兰前景的了。这只会把那些明智的資本家赶回他們最反动的伙伴的怀抱中去，使美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集团紧紧地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进步。

如果不把能为德黑兰計劃奋斗并在他們整个集团方面至少能贏得某种最小限度参加的大資本家包括在内，在美国就不能造成有效的全国团結，去保证和实现德黑兰計劃。

第十一章 經濟計劃的綱領

政治計劃归根到底必須以經濟为基础；而經濟計劃必須在

一个政治体制內表现出来。生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极其密切地互相联系着，一方面的任何变化差不多总是会引起另一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为了那些侈谈德黑兰协议的“纯粹政治”性的庸夫俗子们打算，必须把这个浅显的道理重述一下。

美国必须订出一个能适合它作为德黑兰协议主要参加者所起的作用的经济计划。这样一个经济计划不能凭空制订出来，也不能由一个关在屋子里的天才凭着卓越的想像“创造”出来。它必须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经济的现有因素为基础，包括我们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政治制度，并和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它必须找出全国团结中所包括的不同阶级的一个共同利益之点，并从这一点出发来制订。这种方法在各个集团和阶级——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商业家（工业和金融资本家及其经理们）和劳动阶级（产业工人和农民）——中将赢得最大限度的赞同，引起的反对将减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共同利益在公开讨论中已经发现，即各方面所要求的，美国经济在战后时期必须继续充分运行。

这同我国正统的经济思想肯定是背道而驰的。为了认识到这真是一种崭新的想法，值得我们回忆一下，近在1942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还采取与此刚刚相反的看法，它声称关于战后经济的一切想法，必须以这个无可辩驳的原理为基础：“国民收入差不多立刻会落到其战时高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在1944年，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为这种论点公开辩护。今天，除了要求保证美国经济在战后时期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的人的声音以外，所有其他的声音都沉寂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能否用很简单的笔墨来在我们面前画出这个�问题的主要轮廓，使我们在其详情细节的广阔森林中不致

迷失方向。

根据最低估計，我国国民經济在战后的充分运行意味着，以物品和劳务的生产来計算的国民收入將維持在战时达到的水平上（这在1943年为1,880亿美元，1944年預期將超过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在軍队复員將使可用劳动力的淨額增加这个限度內需要加以調整，但可以认为大体上是一个最低的近似值。

中心問題是这个总数中的一部分，即价值850至900亿美元的政府軍事定貨。战争结束后，这个市場將要驟然地和自动地消失，除非作为一种救济措施，人为地予以延长。因此，我們的問題主要是：立刻找到平时的貨物来代替这种軍事市場。所有的思考和設計如果不引向这个中心問題，那就只具有次要的意义。虽然“巴魯克—汉考克报告”談到这个經济复原問題的幅度是价值500亿美元的純粹軍用物資，但据我看来，为了我們的目的，必須依市場的性質而不是依貨物的性質来决定这个問題的幅度，因为貨物的性質只能衡量經济复原的技术問題，而市場的性質——整个軍事市場——則可以衡量真正的經济問題。在代替供軍事用途的消費者財貨市場时，其經济問題和代替武器与彈药市場完全相同。

这个問題引起我們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数量极大。这次战争为美国造成的特別市場，約为1932年我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两倍。要代替这个特別的軍事市場，我們必須找到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未想到过的嶄新的市場——約为經济危机达到頂点时整个美国市場两倍之大。

在哪里能找到这个惊人的新市場，又怎样能找得到呢？

我們要着手来解决这个規模空前的問題，不能仅仅依靠加强我国战前解决市場問題的方法。很显然，为了实现这个非常

的市場，我們必須尋求非常的方法和方式。

如果我們把問題分成几个主要部分，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潛在市場的两个主要領域——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的一些特点。

由于許多理由，國外市場要求我們首先予以注意。战后世界的头等重大需要，即受到戰爭破坏的各国人民的食物供应和重新安置，和他們被破坏的經濟的复兴，就美国經濟同他們的关系而論，都是对外貿易問題。在我国經濟中，重工业产品、机器等等最迫切需要的銷售市場問題显然必須首先在国外得到滿足，因为战争本身給美国带来的，不是像在他国一样的破坏，而是固定資本投資的空前跃进。在工厂生产能力方面，我国經濟将要面临的是相对过剩而不是不足。单只这两个因素，已足以使國外市場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战后經濟前景中占居首要的地位。

在我們必須寻找新市場的大約每年 900 亿美元总数中，必須由國外市場来貢獻多少呢？一提出這個問題，就表明所有流行的关于這個問題的正統想法是极其不适当的。因为看一看对美国战后貿易的一般估計，就发现平均都在四十亿美元左右；最乐观的也不超过每年六十亿美元。

針對这种被傳統束縛的关于這個問題的想法，我毫不迟疑地断言：作为他們的現行制度繼續存在下去的条件，美国的实业家和經濟学家必須把他們的國外市場概念扩大十倍。他們必須开始对最少是四百亿美元而不是流行的平均估計数四十亿美元作出现实的計劃。

在前面討論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各章中，我已竭力对它們在解决美国國外市場問題中能起的作用預先作了一些提示。因此，讓我們在这个时候来看看，我們能否画出一个初步的、大致

的輪廓，当分布到这些新市場以后，美国每年四百亿美元的出口計劃会是怎样。

姑且假定我們的对外貿易計劃将包括世界人口的半数，其分布将大致与人口成比例，那么，每一个有关的地区按人口平均的份額将为 40 美元左右。其次，再假定我国对外貿易包括亚洲和欧洲的各一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全部，以及苏联的一小部分，那么，我国对外貿易額在主要各区的分配大致如下：

拉丁美洲	6,000,000,000 美元
非洲	6,000,000,000
亚洲	20,000,000,000
欧洲	6,000,000,000
苏联	2,000,000,000
新市場共計	<hr/> 40,000,000,000 美元

对这一切，最容易和最明显的答复是：它从头到尾是根据主观假設的，說来容易做起来难。

依照一般接受的經濟思想标准，不难证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們最后证明这是不可能时，他却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尷尬的境地，他证明了：关于美国战后充分就业的一切希望都是幻想，我国注定要遭受毁灭性的經濟危机，“德黑兰”的希望不能实现，除了追随苏联之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国家或其余的世界都是沒有前途的。如果美国真是不可能实现类以上述想像的对外貿易数字，那末世界上就只有苏联一个大国能在战后給予它的人民以充分就业。

我們不能靠把更多的負担推到国内市場方面，来使这个問題的国外市場方面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因为当我们这样作时，我們会发现，在所有的正統經濟思想面前，国内市場的扩大甚至更

加困难。

然而，我不能安于对市场问题的失败主义者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美国经济学家的特色。由我看来，许多最使他们感到困惑的障碍只存在于或主要是存在于他们的思想方法中；这些障碍是他们自行作出的限制。资本家和他们的经济学教授们必须作出真正的努力来超脱这些自行扣上的枷锁，以便使美国经济不致被投入危机之中。

实现广大国外市场的需要的最严重的障碍，是不许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任何主要作用的教条。一旦承认美国政府在获得国外市场中应当像它在赢得对外战争中一样起那种勇敢的作用，那末问题看来就会完全不同。

让我在此重述一遍：我并不是在向“自由企业”和私人创办企业的制度挑战。我完全愿意帮助自由的私人企业家去实现四百亿美元的国外市场，这是由于他们自己选择的方法而完全需要的。但当他们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办不到，那我就拒绝和他们在悬崖边缘一同策马，我坚持：如果他们不能用他们自己选择的方法创造这个市场，他们就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如果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做，其他的人必须告诉他们怎样去做。主要之点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我所指明的那种规模的国外市场必须实现，对美国战后经济来说，这个市场是绝对必需的东西。

在私人创办企业和“自由企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限度内，美国政府必须负责来做这件事情，并且要像它在取得战争胜利中表现的那样用全部决心去作。如果“自由企业”不能应付这种挑战，无法担负这种任务，政府是能作得到的。

我国政府能分别地同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政府合伙创设一系列的大规模实业发展公司，并使之在全世界所有的被破坏地区

和不发达地区內实施铁路和公路建設、农业和工业发展以及全面工业化等等大規模的計劃。美国有熟练的技术人員，他們能在作出決定之后六個月以內提出这种工程的設計圖紙，足以使其立即興工。一旦美国說清楚所有有关方面将要得到的好处时，在資本主义或殖民地世界沒有一个政府会敢于拒絕参加或敢于退出这种合伙。需用撥款的数量不会比战时已經达到的規模更大，其結果却不是生命和财产的毀灭，而是立刻带来生活的巨大改进，并使新財富的洪流在全世界滾滾流出，不久就会远远超过原有的投資。就全世界的范围來說，全部規劃能在一个世代的时期內自行得到清償。它們会变成美国資產階級在其全部历史中从来沒有作过的最好的投資。除了金錢的好处——这对美国資本家会是直接的动力——以外，这样一个計劃会提供另一种不可估計的好处：在“德黑兰”所約許的世界中为无数后代获致和平与幸福。

把国内市場的規模扩大到大致同預期的国外市場一样，也必須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做到。这个問題比国外市場問題要困难得多。

首先，在我們資本主义的美国，已經沒有余地可以作出任何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計劃，使生产經濟每年扩大几百亿美元，像我們在国外所預期的那样。战争本身已使我国工厂生产能力扩大到远远超过我們現在看到的市場所能容納的范围以外——一旦軍事市場不再存在的話。“公共工程”和公路建筑計劃等等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就我們对市場的需要來說，也不过是滄海一粟。在新的固定資本投資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事情，都远远不能弥补由于軍事市場消失以后所留下的漏洞，同时由于会进一步增加生产能力，还将使問題更加严重。

國內市場所受的限制是居民購買力的限制。顯然有一部分居民的購買力是不受財源限制的，因為根據政府專家計算，有770億美元的“游資”存在。^①但擁有這一大筆游資的人們無疑地已經達到他們的消費能力的極限。只有作為投資人來起作用時，他們才能提供額外的市場。擴大已經應有盡有的人們的購買力並不能絲毫擴大國內市場；必要的是擴大那些目前需要多買、也想多買然而力不從心的人的購買力。這些人是不難找到的，因為他們構成美國人的絕大多數。

並不缺少“一般的”購買力，來使國內市場無限制地擴大。唯一的困難是如何刺激現有的購買力，使之活躍起來，因為擁有這種購買力的人由於這種或那種理由，已經失去了他們使之活躍的動力。閑置的購買力，閑置的金錢，是威脅着要扼殺國內市場從而扼殺我國整個現存經濟制度的因素。購買的願望已和購買的力量分离開來，如果想要使國內市場稍有擴展，就必須使二者再行結合起來。

既然在生產企業中顯然沒有作出國內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投資的余地，——至少是在現有工廠的產品未能找到更穩定的市場以及我們工廠的多余的生产能力沒有被利用以前，生产性的國內投資另外就只有一個可能性。這就是投資在生產的人的因素上，這是一種提高從事生產的居民的質量和能力的投資。有兩個主要的渠道，通過它們能夠作出生产性的投資來提高從事生產的居民的水平：一個是通過政府的大規模的教育、衛生和一般環境改善（包括整個的帶社會保險性質的制度）政策；另一個是更易于為傳統的思想方式所接受的，即採取提高各個生產者

① 參考“參議院文件”第106號，第78屆國會。

的收入的措施，提高的規模要盡量的寬大，大致使習慣于立即將購買力完全用盡的那個居民階層的每年購買力大約增加一倍。

我武斷地把國內市場問題的另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置于考慮之外。那就是，由在手中擁有有效購買力的那個階級將不能用別的方法找到市場的全部剩餘產品購買起來，干脆把它毀掉。從嚴格的經濟觀點看來，這會像戰爭一樣提供一個同樣有效的市場，而其一般的經濟結果亦復相同。但這在政治上會是很危險的，差不多像讓幾千萬人閒着沒有職業一樣的危險，而且會成為醞釀各種各樣的社会和政治騷亂的根源。不，看來似乎更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使美國經濟繼續運行，除非它能找出一個辦法，把它的產品在生產者大眾中更普遍和更慷慨地進行分配。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倫理和政治的範圍，侵入了最切實和最冷酷的經濟學領域。

這個目標，即將那部分會使用其購買力的人口的購買力大約增加一倍，是不能通過“自由企業”的普通運用去達到的，即是說不能靠把各個私人企業家自己作出的決定累積在一起去達到。在這個基礎上來經營，任何私人企業是無利可圖的，除非等到所有的企業都那樣作。只在一般的社会規模上這樣作才有利可圖，但在單獨一個企業跟其他不遵守同一原則的企業競爭時，則顯然無利可圖。因此，這只在作為公共政策而能夠普遍實行、有政府的力量作為後盾時，才能實現。這能夠在“自由企業”的形式之下達成，但不能倚靠私人企業家的主動性。

公共政策必須通過它來實施的主要渠道顯然就是提高工資水平，因為在就業的成年人口中，占壓倒多數的是工資勞動者。首先，必須認識到，較高的工資水平並不是勞工運動的特殊利益，而是全體居民的国家利益。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决普遍提高工資水平的任务，这三种办法使用起来都有好处，而它們所引起的創始的困难是最小的。这就是：(1)在所有工业部門中提高規定的最低工資的“基数”；(2)在每一个具体領域中，把所有处在标准以下的工資率提到最高标准，从而实现“同工同酬”的原則；(3)打破工資标准現有的最高限額，其办法为普遍实行年度保证工資和奖励工資的原則，不仅适用于各个产品，而且适用于整个工厂和整个工业部門。这些措施如果在一个“工資署”的領導之下，得到經理上和有机織劳工的合理的合作，用力推行，那么，在推动和刺激全部过程上将会大大发生作用。

关于如何使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加倍的問題，我不打算作出任何詳尽的和全备的答案。只要确定了下述事实，我当前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这对国内市場的扩大是絕對必要的；不扩大国内市場，我們現存的經濟制度就注定要灭亡；因此，这样作是合乎国家利益的，合乎一切階級的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利益的。一旦作为合乎国家利益的全国事务去处理，問題就会在全国共同發揮的聪明才力之下得到解决。

这还只是国内市場問題的开始阶段。为了看到这个問題的主要特点，我們現在也必須注意到：我們的国外市場只能暂时分荷替代軍事市場这个負担的一半，即使我們能够完全实现上述規模的計劃。国外市場暂时地和部分地解决了我們的問題，但只在通过美国国外投資和美国长期貸款来进行的限度內是如此。在这种投資和貸款得到利潤或分期偿还时，还需要用从国外进口貨物的形式来由我們国家接受这种收入。美国实际从国外接受自己对外貿易出口及其所得利潤的付款数目是多少，我們也就必須把国内市場在上述規模以外扩大多少。既然我們的

經濟制度完全系乎对所接受的价值之支付行为之上，国外市場問題不可避免地会和国内市場問題混合在一起，只是延緩支付的条件推迟了一些，又因交易中获得的利潤而使数目大了一些。

那么，从长时期看，代替軍事市場的問題完全是找出办法来使美国人民自己能够消費相当于我国国民經济生产的全部产品的問題。归根到底，美国人民所能生产的不能比他們所能消費的更多。我們有这样惊人的生产能力，若干年来它阻塞着我們国家的咽喉，有使全国窒息的危險。战争暂时救了我們，使我們不致因多余而悶死，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我們的生产能力。归根到底，我国战后經濟問題只不过是：把美国消費的咽喉扩充到同它的生产能力一样大。我們必須做到这点，不然的話——。用比尔茲利·腊姆耳先生——不会有人怀疑他对“自由企业”会有任何的顛复意图——的話來說：

“今天大多数工商业者都同意：消灭大量失业是战后时期的首要之急。許多人甚至同意：除非大量失业能够在私人企业經營的制度下得到消除，否則私人企业經營即将为某些其他的关于貨物和劳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安排所代替。”①

第十二章 全国团結中的工会

在战争和战后时期，工会是民主政治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也像它是全国团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样。在美国，工会还未获得它們必要的和应有的地位。加强全国团結的工作也包括加强

① 在美国零售商联合会年会上的演說，1944年2月29日。

工会的工作在内，要进一步联合它们，使它们参加一切公共事务，直到并包括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制订与行政管理。

其所以是这样，因为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稍稍同工会所做的相比拟，使靠工资生活的那一大部分人口——这在美国占绝大多数——能从个人孤立的一筹莫展和政治被动状态中走出来。工会是使工资劳动者变成积极公民的主要工具。工会成长的程度及其参加公共生活的程度，是衡量任何一种民主的生命力的确实尺度。

在美国，在原则上我们是这样承认工会的，但在实际上我们远远落在——例如——英国的后面，更不要谈苏联了，苏联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因而不是可以那么直接比較的。

我们必须欢迎资本的领袖们中间所作的每一种这样的表示，即承认必须赋予工会以永久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在许多最重要的例子中，我特别注意到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约翰斯顿先生的言论。在1943年4月27日的一次演说中，约翰斯顿先生说：

“日益得到承认：劳工组织如果在其组成和管理上具有一种公共责任感时，是能够成为使国家的生产机器更有效率的一种有用的合作因素的。从一种意义来说，劳工正在经历经理上所业已经历的同一成长和适应过程，它能够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约翰斯顿先生近来已把他的这个论点在一次引起广大注意和评论的演说中加以发挥。

约翰斯顿先生表述的最积极方面，在于他把工会和经理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放棄了传统的“从上面看”的态度，后者不幸地使人想起旧日的“主僕关系”，为了反对它，劳工不得不斗争这

么几十年。在約翰斯頓先生的态度中，默认了劳工与經理部門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把这种态度普遍确立起来，就会使我国的全国团结前进一大步。

他着重指出工会的公共責任，对这一点也是不能有任何反对的。一切真誠的劳工領袖，以及工会會員們，已經在日益联合起来，以全国团结为指导，对他們的言論和行动的全部后果担負公共責任。約翰斯頓先生能否证实經理上和资本家过去的言行更要好些的主張，这是极可怀疑的事，但我們决不试图作任何只会激起爭論的比較。工会——只有少数例外，主要是不負責任的約翰·刘易斯及其敬慕者——作出了十分庄严的榜样：面对着雇主們的不可忍受的挑畔、国会的怠工和一些政府机构的許多拙劣行为，仍旧維持不罢工的政策。如果約翰斯頓先生对他那些对待劳工采取不負責任的态度的资本家伙伴们也表示公开反对，那就大有好处了。然而，虽然要作这些批評，我們依然必須強調：劳工們同意約翰斯頓先生的劳工必須負担更大的公共責任的要求，这一点第一流的劳工領袖菲利浦·莫萊已經十分明确地提出敦劝并实行了。

和約翰斯頓先生发生爭执的严重可能性是从这里产生的：他把劳工的作用謹慎地限制在“使国家的生产机器更有效率”的範圍內。这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約翰斯頓先生对他的表述作狹义的解釋，把劳工也要起积极的政治作用的权利和义务排除在外，那么我們属于劳动陣营的人就必须和他辯个明白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这样的趨勢，即对工会的利益和活动两者的範圍所加的限制，超过对全体公民所加的限制以外。

劳工在全国团结(这是在战后世界中必須予以发展的)中所起的作用之所以具有新的特点，是因为对待提高工資标准問題

采取了新的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从其一般的经济背景加以叙述。那就是：整个国家必须把提高居民购买力的计划作为它自己的计划，这种计划对大多数人即工资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提高工资标准。这件事过去主要单单是工会方面的特殊事务，只是有时偶然从政府得到一些帮助，而资本方面通常是反对的；在战后时期这件事却必须变成全国的目标，所有的阶级和组织都要用我们现在进行战争这样的决心去实现它。

设想美国在战后会把工会的中心任务——普遍提高工资标准变成全国共同担负的任务，从而赋予工会以在全国团结中一个新的、高的地位，这果真只是白天作梦吗？

纽约的自由派报纸《下午报》因我讲到这样一种前景而责备我“叛卖”，并且争辩说，美国资本家生来就是这样的反动和愚蠢，除了在一次总的斗争中打败他们以外，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说我是在提议，“有人冲着打你一个耳光，你也不要回手，这样来避免冲突”。其他的人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杜宾斯基集团，路德之流，以及约翰·刘易斯。

自然，我不能提供任何保证，说在战后的美国，工会将被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我不能肯定地应许任何人，在这次战后不会有一次新的“开放工厂”和“美国计划”运动去粉碎工会，像在1919—1921年发生的情形一样。归根到底，那将由资本家自己去作出这个决定。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劳工必须准备保卫自己。我不是圣雄甘地的信徒，他对邪恶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在劳工队伍中也不会找到真正的皈依者。

然而我坚持这是值得去作的：劳工为了他自己的开明的私利，要对这个问题采取负责的立场；劳工不要被动地、宿命论地

在趋向这种主要冲突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劳工必须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楚，使人毫无疑问，即这种冲突并不是劳工运动的愿望或目的；劳工将公开地尽力之所能及，避免这种冲突。如果一次主要的阶级斗争在战后的美国真是不可避免，使我们的和平和繁荣的希望归于破灭，让这一点在世界面前清楚地确定下来：责任不在劳工，而在劳工的敌人。

依我个人的愚见，这条道路既是避免冲突（如果这是可能的）的最好的办法，又为在斗争（如果这证明是必要的）中取得胜利作好了准备。

能否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资本家集团是在带着这样一种普遍提高工资标准的计划，朝着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全国团结的方向前进，或者能使之朝着这种方向前进呢？

有着大量的这种象征。我只想引证其中之一来作批判的考察，这也是从上面已经援引过的埃里克·约翰斯顿那里得来的。在同一篇演说中我择取下面一段：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生产的艺术。现在还有待于我们来掌握大量分配的艺术，以便使我国雄壮的工业机器的产品可以日益广泛地分配到我们全体人民中去。这不再是一个虔诚的愿望了。这是一个具体的需要。我们已经可以生产出产量空前庞大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为了吸收这样数量庞大的产品，工商业、劳工和农业必须合作来维持充分就业、高工资和最大限度的购买力。”

出自美国商会会长之口，出自“自由企业”和私人创办企业的主要十字军战士之口，这是一个一般的纲领性的目标，跟从一个劳工领袖那里看到的東西同样好。由我看来，这是够好的了。只是在选择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的方法上，可能同约翰斯

頓先生有不同的意見。

約翰斯頓先生和他的伙伴們說的果然是真心話么？

已經知道的考驗真誠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看行動如何。就讓勞工運動接受約翰斯頓先生的綱領，來考驗一下吧。如果能見諸實行，那就好極了。如若不然，再來採取恐嚇的手段；勞工們這樣作，至少要比不加思索地聽從《下午報》以及其他類似的淺薄見解，在戰略上和道義上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我自己，我不猶豫地接受約翰斯頓先生的話，作為他的意圖的真實聲明。

勞工們難於和約翰斯頓先生以及與他有同樣想法的人取得一致的，是關於達成大家同意的目標的方式和方法。但在這一方面，分歧也不一定不能解決的。因為這些有思想的資本家雖然把他們的獨斷主義限制在一般的論斷上，在具體措施問題上卻表現出一種高度的和日益增長的思想靈活性。這可以再引證幾段約翰斯頓先生的話來說明：

“我們中間太多的人把資本主義說成好像是一種絕對的東西——在今天就像在昨天一樣，在明天還會像在今天一樣。我們中間太多的人把競爭說成好像是一種絕對的東西，沒有程度上和深淺上的差別。沒有比這更容易引起誤會和更有害的了：在我們對基本的自由企業概念作熱烈的辯護時，我們必須對這種繼續的演進作理智上的體會。

“只有故意裝作瞎子的人，才看不到原始掠奪時期的舊式資本主義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這種資本主義是靠低工資和在最低限度周轉期中得到最大限度利潤繁榮起來的，它拒絕集體訂約並反對對競爭過程作合理的公共調節。”

在他以前的一次演說中，約翰斯頓先生提出了战后充分生产和就业的必要性，并請求資本家們負起这个責任来，他以如下的警告作結束：“不然的話，政府会那样去作，”他要求“在政府、經理、劳工和农业之間建立一种新的合作秩序”。

在类似約翰斯頓先生所作的这种宣告的基础之上，劳工运动能够很容易达成一个大家同意的实际可行的綱領，它給予資本家最大的主动性去依他們自己选定的方式解决分配問題，如果資本家能够同意在綱領中也包括一种規定，使政府参加进来，去弥补綱領中所留下的任何缺陷。約翰斯頓先生已經表示同意这样作了。他說：“沒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再让美国公民失业了。他們将为工商界所雇用，否則他們就将为政府所雇用。”关于劳工的地位，他說：“我所說的合作，既不是工商界向劳工屈服，也不是劳工向工商界屈服。”

工会运动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能力必須具有信心，以便着手来在这样一种全国团結之內解决自己的問題，一般不求助于試圖通过斗争来解决爭执。因为爭执自然还会很多，认为只要同意合作就能解决一切問題，那是极端愚蠢的。剛剛相反，只在某些基本協議开始形成时，真正有意思的事才开始。

劳工要找到自己在全国团結中的适当地位，前途还籠罩着这种漆黑的烏云：我們在战时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成就是如此的不能令人滿意。一般說来，劳工并未被欢迎去参加这次作战的政策决定或行政工作，而工資問題的处理又是令人极不滿意的。虽然劳工对此要負一些責任(主要是由于它的不团結)，主要的事实依然是：資本行列中在找出这些問題的适当答案上表現的抗拒极大，給予的帮助很小。

如果約翰斯頓先生，以及具有和他一样見解的資本代言人

和領袖，真想在战后世界中同勞工保持合作關係，他們就應當採取比迄今遠遠更為堅決的行動，在現在，在戰時，就去實行。因為在勞工進入战后時期時，戰時經驗對於他們的心情和態度是有嚴重影響的。

必須十分坦率和十分尖銳地對政府和工商界所有的領袖們說：勞工一般都感覺到，在這次戰爭中，資本家對勞工實行了綁票和劫掠；關於全國團結和合作，他們口里說得多，實際做得少；就勞工來說，在戰時紀律的壓力之下，這實際上是只有接受命令，不能開口，這真有點太不好受了。當戰爭進行時，工人的愛國心深刻而強烈，可以接受這一切，沒有太多的怨言。可是我們最好能夠了解，這樣做是在使緊張的情況日益嚴重，對於战后的有秩序的合作是沒有好處的。

工商界和政府現在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改進這種情勢。可以和勞工進行更多的嚴肅的協商。特別是可以用許多事來改進戰時對尖銳的工資問題的处理，這會加強作戰的努力，在傷亡必然很大的西方戰場即將開辟的時期提高士氣，並在許多方面杜絕像約翰·劉易斯及其朋友這一類全國團結破壞者的活動。

戰時工資政策的處理，表現了獨斷主義和僵硬。

勞工們是把自己當作一支生產大軍來行動的。他們感覺到，這支大軍的需求在對軍營中和戰場上的部隊作了供應以後，需要作尽可能周到的供應。他們感覺到，使生產大軍在食物、衣服、住宅和社會服務方面感到任何缺乏的唯一合法的理由，是這些東西在國內異常缺乏，不能由於有組織的照顧而得到補救。勞工們感覺到，他們沒有得到用這種精神所作的照顧。這種忽視特別表現在工資政策上。

需要對我們的戰時工資政策加以檢查，並採取措施使工資能跟物價保持某種經常的聯繫；保證不斷地糾正不公平的工資待遇，爭取做到同工同酬；使工資的增加同生產的擴大保持某種合理的和穩定的聯繫。目的應當是在使每一個工人和每一個集團相信：他們並不是在他人的獨斷任性和不假思索地應用一種空白公式之下的犧牲品；政府和經理方面經常在努力把現有的商品和勞務提供出來，使普通接受的公平補償標準大致見諸實行。必須確實表明：這個目標的所以不能達到，乃是由于戰爭造成的短缺，而不是由於組織得不好，政策的僵硬，或缺乏誠意。

如果從這些方面作出認真的努力，勞工隊伍中的不滿就會很少，在勞工、政府和經理部門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會很少。而對於我們用合作的精神面對戰後時期的問題來說，這也是可能有的最好的序幕。

我認為不必重述工會的已經確定的任務，包括組織那些尚未參加工會的人以及為團結而鬥爭。隨著我們在此提出的戰後前景的實現，工會在所有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第十三章 民主和全國團結

許多互相衝突的觀點和利益必須學會如何在妥協的基礎上靠攏起來，以便維持全國的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民主的運用方式。但有一條界綫，超過了它妥協是不容許的。這條界綫就是基本的民主原則，對這些原則如果也實行讓步，就只能產生虛偽的團結形象，在它後面團結的一切可能性都在遭到破壞。

希特勒並不掩飾他的希望：美國的分裂會使得他能夠戰勝

我們，正像法国的分裂曾使他能够战胜法国一样。

因此，任何全国团结计划的主要部分是用来克服希特勒期望为他效劳的那些分裂因素，这种因素现在已经在起牵制作用，来削弱预期不久即将开辟的第二战场。对于战后时期，在希特勒被消灭以后，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那时候团结是同样必需的。

希特勒用操纵和煽动被他击溃的国家内已经存在的分裂因素的方法，制造他的“第五纵队”。他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是种族优越论和“反共产国际”。

希特勒那些理论的思想线索就像导火索一样，它将使美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埋藏下的地雷爆炸。现在只防止希特勒去使这些地雷爆炸已经不够；我们还必须把从这些地雷上卸下所有的导火索并且清除这些地雷作为我们的任务，使它们以后不致爆炸开来，破坏我们的战后计划。

希特勒的“Herrenvolk”〔高等民族〕原理，或种族优越论，直接导向美国的三种具有爆炸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根本上是破坏我们的民主的，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同它们斗争，直到将其消灭为止。这就是：（1）歧视黑人制度〔Jim Crowism〕，即执意否认美国黑人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种态度也推广到对待其他民族上，例如对美国籍墨西哥人；（2）人头税，即对选举权课税的制度，存在于南方的八个州中，用来剥夺大多数选民的选举权，包括白人和黑人，虽然主要只是用来对付黑人的；（3）反犹太运动〔anti-Semitism〕，即对美国的犹太人采取敌对、歧视和隔离的制度，其根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现在由于希特勒一类势力的积极培植，在我们的花园中就像野草一般日益滋蔓。

在1943年中間，在美国有一些令人震惊的例子，表明歧视

黑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情勢具有損害極大的爆炸性。底特律的暴行是最嚴重的例子，有三十五個黑人被暴徒屠殺在大街上，一個巨大的軍事生產中心被破壞了，整個國家陷入惶惶不安的狀態。不久在哈倫又提供了另外一個例子。在洛杉磯，接連好多天在大街上到處發生反對墨西哥人的鬥爭，由於他們的服裝式樣而把他們嘲弄地稱為“穿阻特裝的匪徒”。在北部和南部的幾百個地方，都發生了小規模的騷亂。據報道，真正有幾千起反對穿制服的美國士兵的暴行，就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的。直接產生這一切的土壤，是一種在法律上已經確立並得到社會贊成的否認公民具有平等權利的制度，雖然美國憲法在一個特別修正條文（這一條從未實行過）中保證美國全體公民都是平等的。

歧視黑人制度的毒惡的策源地顯然是在從前的南方蓄奴地區，在那里“白人優越”的原則是以法律形式表達出來，在文字上和希特勒所曾經用過的同樣大胆和無恥。

然而，對這個問題略加研究即可發現，南方蒙昧主義者之所以能夠維持他們的類似希特勒的制度，僅僅因為他們從北方，甚至從表面上反對這種制度的人中間得到支持。歧視黑人制度作為一種思想和實際行動的制度，已經從它的南方生長地滲透到全國，使全國受到危險的感染。

我從穩重的、保守的和可尊敬的《紐約時報》——它在美國報紙中也許是聲望最高的——的一號找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是如何發生的。1943年8月3日，剛剛在底特律和哈倫的暴行發生以後，這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頗為有力的評論，用下列口號為美國的黑人辯護：“如果因為種族和宗教而對任何一個人有所歧視，那就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這是十分令人敬服的，如果《紐約時報》和它所代表的所有一切集團都能一貫遵行，就會很快地

医好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全部病症。

但是在《紐約时报》的同一天中，在同一版上，由它的明星作家之一阿瑟·克罗克先生执笔的，却是直接采取反对立場并为整个种族优越論辯护的一篇署名的文章。克罗克先生无条件地为歧視黑人制度辯护，說这只不过是对于“自然界的事实”的承认。他說，所有的麻煩都是由于反对这个制度产生的，他认为这是“两种肤色的政治煽动家們”造成的。他指斥宪法中規定的平等公民权的原則，认为那是“有害的和帶破坏性的原則”。他表示意見：美国人中的“大多数”是“坚决反对”給予黑人公民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他宣称，这个制度不能用政治行动去修改，而只能这样去加以修改，即确实做到那是“在正义之灯的照耀下”执行的。

这个惊人的例子——在《紐約时报》的篇幅中为美国的希特勒种族主义辯护——却很少受到人們的注意，尤其是使人困惱的事。大家假定这是理所当然，是又一个“自然界的事实”。另外那位在同一天中写下“如果因为种族和宗教而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歧視，那就沒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几句話的編輯，并不曾公开地对克罗克先生的文章提出抗議，至今为止也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人这样作。

发生了可怕的怀疑：也許克罗克先生既是社論的作者，又是他那篇署名的文章的作者！也許那篇署名的文章只是大多数听来公平的“正义与平等”呼声背后的真实事物的詳細說明，这种呼声並沒有現在就去求其实现的实际斗争伴随着！

克罗克先生关于歧視黑人制度的立場，正是德国对待反犹太运动的“溫和的”納粹态度的美国翻版。例如，多年来担任希特勒的財政部长的亚耳馬爾·沙赫特博士据說曾为納粹屠杀犹太

人的“过分”表示“悲叹”，他的話很像是阿瑟·克罗克的話的德文翻譯。沙赫特博士也解釋說，这种“可悲叹的过分”是由于民主的“有害的和带破坏性的原則”所造成的；他把犹太人居住区也看作只是对“自然界的事实”的承认；他也想要使納粹主义“在正义之灯的照耀下”执行。

正像沙赫特博士的“溫和的”反犹太运动只是为納粹最凶殘的屠杀犹太人的劊子手提供一个可敬的面貌一样，克罗克先生的“溫和的”歧視黑人制度也只是为在美国城市大街上組織暴行的所有的人、为由于把我国人口十分之一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所造成的美国全国团結中的深刻裂痕提供一块遮羞布。

当人們竟指摘沙赫特博士这位沒有罪过的君子和人道主义者对褐衫党的“过分”多少要負一些責任时，他总觉得是被侮辱了。同样，当我们揭露克罗克先生同美国的私加死刑者及德国的屠杀犹太人的劊子手有密切的关系时，他也会抱怨他是被誹謗了。但在两种場合下这都是极端真实的：公开的罪犯从这些“可尊敬的”人們获得了自己犯罪的勇气和力量，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而每一个公开宣揚种族优越論的克罗克就会使千万个人习惯于这种看法，认为它是“正常的”，是可以不加詰难便于接受的。

我們所处理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我們所处理的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形式，是战争和战后时期全国团結的經緯，或者是这种团結的破坏。在我們的軍事力量中，在我們同战后世界国际大家庭的关系中，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对民主的一种非常粗淺和庸俗的理解是，自己满足于对种族主义的最坏的表现作“人道主义的”否认，但完全沒有看到，整个种族优越制度是破坏我們国家的武器，我們必須像歼灭希特勒的軍部一样无情

地将其击败。

只有战争的严酷需要，才开始使美国不再自鸣得意地接受种族主义的毒害。由于军事生产中缺乏人力，总统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才不得不着手破除一些对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墨西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雇用和升迁所加的最坏的障碍。由于我们军事参谋人员所肩負的組織两种分开的部队而不是一种部队这个任务繁重得不可忍受，最后才开始在军队中破除歧视黑人制度。我们的一切崇高理想，在沒有受到为生存而作战的严酷逼迫因而加强其力量以前，都是十分軟弱无力的。

我们的参谋本部在开始建設我国一千万人的部队时，并未过問部队中已經建立的歧视黑人的傳統。它不久就发现，这种隔离办法是建立一支有力部队的最大的、无比的障碍；它使每一个現有的問題翻一番，并且还造成了許多新問題。它使应当成为統一的軍事組織分裂为二，而涉及的問題是同軍事实踐或理論毫无关系的。我国人口中十分之一的黑人并未使我国的軍事力量按照这个比例增加，反而使我們的困难增加若干倍。黑人沒有取得士兵的地位，而是取得了“問題”的地位。

使黑人部队担任“劳动兵团”的职务来和所謂低劣相适应，从而賦予隔离制度以职能的基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增加了困难的程度，使之达到沸点。

在特种部队和軍官的訓練中，战争的需要首先使歧视黑人的制度被打破了。保持两套訓練軍官的制度是十分愚蠢的，这使歧视黑人制度在战争初期这个作战阶段便已被擯棄。白人优越論的最頑固的辯护者，也不能繼續为这个带着破坏性后果的、明显的軍事上的愚行辯护。现在长时期来，我們訓練特种部队和軍官一直是不把白人和黑人分开的，在各方面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是歧视黑人制度的彻底的道义上的失败，因为如果种族优越论还有丝毫基础的话，它首先而且特别会在高级技术训练领域内表现出来。

在两种公民资格——头等的和二等的——的基础上要建设一支有力量的部队，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有二等公民，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排除在部队之外。一支部队只能在平等公民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我们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则和道德，过去曾被以它们自己作为理由而拒绝适用于黑人，现在却作为军事需要而重新出现，这样就雪除了自己的耻辱！

同时，由于我国原来违犯了原则，由于它对大部分的黑人部队继续实行政视，它已经受到了惩罚。占我们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由于自己的人部队中所受的待遇而愤怒到了极点，虽然军官和特种部队的训练情况有所改进，并未能将这种愤怒消除。全国团结已经遭到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胜利的代价已经增高。尤其是，由于它的长时期的影响，美国在我们盟邦——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的心目中已打上了“白人优越论”的烙印，打上了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没有区别的种族主义的烙印。在现在和战后，对美国所加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

人头税法律是从种族主义滋长出来的，后者已扩展到——可能是有计划地，但无论如何是最有效地——剥夺五百万以上白人公民和数目大约相同的黑人公民的选举权，这构成了盛行人头税的南方八州的绝大多数人口。如果宪法是我国的有效法律而不只是善良愿望的宣言，实行人头税各州的任何一个和每一个联邦法院就会对因此被剥夺选举权的任何公民提供直接的

救济，因为这是对宪法的无可掩飾的破坏。然而，联邦各法院所持的立場是，在这一方面宪法的执行要看国会是否已通过特别法律，指定必須这样去作。因此，最簡單的公民民主权利即选举权，对实行人头税各州的絕大多数公民來說，还在等待国会的行动。

我不想在此处多費笔墨来細談人头税这个題目，談它怎样歪曲和破坏了我們整个国内政治生活，它怎样使我們全国处在壟断南方政治权力的相对很小的集团的摆布之下，給予它們的影响和权力远远超过了它們在全国所处的相对地位。我只是想要立刻来談人头税的另一个特点，过去对它的注意比較少，而它却是如此重要，以致牵涉到美国在整个世界中所处的地位。这就是人头税和种族主义同美国在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在联合国家中的威望和领导权的关系。

大多数的国家，以及它們的人口的大多数，都不是白人，而是有色民族。亚洲、太平洋島屿和非洲几乎完全不是白人，拉丁美洲大体上亦复如此。“白人优越”論对世界的这些大多数人來說，就是他們自己被奴役的象征。在“白人优越”的名义下，他們多少世代以来遭受着难堪的痛苦。日本在太平洋用来反对我們的唯一重大的政治武器，就是主張它是在为反对这种为一切有色民族所畏惧和憎恨的“白人优越”論而斗争。此外，白人人口最多的地区，次于美国的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已經在絕对平等的制度下使它的白人多数和它的有色民族少数联合起来，并极端鄙視一切种族主义的理論。世界力量的均衡已經不可抗拒地和无条件地使“白人优越”論处于不利的地位。将要締造战后世界的那些力量，絕大多数都是奉行种族和民族平等与人类兄弟友爱的原則的。

在这个偉大的世界运动中，美国有可能参加并且起巨大的领导作用。但当美国继续肩负南方的“白人优越”論及其歧视黑人制度、人头税的一切后果时——特别是当在国会中、在军队中以及在我国的外交人員中，都是由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狂烈拥护这种主义的人占統治地位时，它就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如果美国想要在这个新世界中起领导作用，它必須着手使所有中了“白人优越”論之毒和在任何方面应对人头税这个半封建制度負責的人退出公共生活，特别是使他們不和联合国家中美国的伙伴們发生任何接触。我們的联合国家伙伴将感到簡直无法同有着这种心理的人共事，也不能信任一个由这一类人领导和統治的国家。

近来遍及美国的反犹太的騷动和无賴行为这种浪潮的恶兆性的升漲，表明美国的公共心理对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多么准备不足，表明歧视黑人心理对我們国家品格的毒害是多么深刻。因为今天在我国表現出来的反犹太运动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直接輸入，来为希特勒反对我們的战争服务的，而在这种进攻面前，我們作为一个国家，表現了可怜的笨手笨脚、結結巴巴、困惑和无能。

关于把犹太人当作一群人來敌視、或由于他們的种族和宗教而加以敌視的每一种表現，在今天就是这么一个人的标志，他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按照希特勒的征服世界計劃来行动的。希特勒从过去的廢墟中掘出了这种古老的社会毒素，而美国过去所受这种毒素的影响，除苏联外，可說是最少的。然而当美国在进行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时，它受到希特勒的代理人所輸入的反犹太运动的影响甚至比被希特勒的奸細統治的一些国家更大。在德国以外，在哪里还发生过这样大規模的对犹太墓地的褻瀆、

对犹太会堂的毁坏、和对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进行的无赖的人身攻击呢？这样的事情能在这里发生，美国必须深深地感到羞耻！

“白人优越”论及其后果——扼杀民主的人头税、歧视黑人制度和反犹太运动，以及其他的变种如“反天主教运动”，是对美国的全国团结、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领导权的主要的和破坏性最大的进攻之一。

希特勒的最大的外交胜利之一，是他的“反共产国际”在美国的成功运用，把“赤色恐怖”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提到了统治的地位。将来的历史家将要看到，在美国准备应付世界危机中马丁·戴斯所起的作用，是支配一个大国的政治上的歇斯底里的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例子之一。马丁·戴斯在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路綫中攫取了武器，使他变得强而有力，足以支配国会和报纸，藐视和诽谤美国总统，向常识的基本原则挑战，并且由于极端荒谬而赢得尊敬。无怪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相信，希特勒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秘密武器”！

毫无疑问，“赤色恐怖”——即对共产党人的畏惧，它为轴心国家的征服世界的企图铺平了道路——在美国差不多是完全和对苏联的恐惧与憎恨混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问其优点和缺点如何，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对现存秩序构成任何的威胁，并且许多年来甚至在它所作的公开声明的语气中也不带威胁的色彩。因为美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赞成我们国家应当和苏联发展友谊和结成同盟，所有对苏联的恐惧和憎恨便都集中到了美国的共产党人身上，认为他们是所谓“一个敌对的外国的代理人”。

既然“赤色恐怖”还决没有消失，十分重要的是要懂得它为

什么能使人相信，它包含什么东西。究竟为什么美国人感到对共产党人比对美国其他小的政治派别（对这些党派的存在总是认为当然的）要害怕一些呢？

让我们回到1938年导致慕尼黑投降的那些有关命运的月份里。那时候“赤色恐怖”的沉重负担是什么？我从自己的贴报簿中找到了完全的答案，那就是头等的给人扣红帽子的人罗伊·霍华德的报系所刊登的一幅漫画。这是从1938年7月2日《纽约世界电讯报》剪来的，著名漫画家罗林·克尔比以这样的形式来描述他的“纯然无耻”^①的概念：埃尔·白劳德站在克里姆林和华盛顿中间，手里摇着苏联和美国的国旗，高呼“为红的、白的和蓝的三呼万岁！”^②

除了应当承认漫画家的歪曲和作画动机的敌意之外，这幅漫画相当正确地说明了我和所有美国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为它努力的主要东西，即要求美国和苏联建立友谊，结成联盟。在1938年7月，这就足以把鄙视和憎恨招到我们身上，把我们说成是纯然无耻的人。

我们在1938年提議建立现在已经实现的这种联盟，究竟有什么错处呢？这个联盟如果早几年实现，就很可能已经防止了这次战争。

在1944年仍然在掀起这个陈旧的“赤色恐怖”的人，也就暴露了他们反对英苏美联盟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想要尽快地把它结束。如果他们不再公开这样说，那只是因为此刻是不利于他们这样坦白地作的，所以他们找出了一千个其他理

① 纯然无耻(unmitigated gall)，又可解释为十足的勇气，此处语意双关。
——译者

② 白劳德把这幅漫画在本书封面的背后刊了出来。——译者

由来代替这个真实的理由。他们今天甚至否认有这种动机，可是这种动机依然存在。

把隐藏在“赤色恐怖”后面的真实动机掩盖起来的企图，造成了一些奇异的心理歪曲。可以举本届政府中“反共产国际”这个题目的主要代表人——检察总长比德耳的情况作例子。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在施奈德曼案件中所作的决定，因为这使他的臭名远扬的“布里奇斯决定”完全失去了根据；后者是最典型的纳粹形式的赤色恐怖为基础的。他坚决拒绝允许把共产党对他的布里奇斯决定的反驳提请法院考虑，要求各法院同意他的裁决，根本不给予这个案件的最重要的一方以申诉的机会。据报道，他在3月5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对他自己的态度作了如下的奇怪的辩护：

“美国共产党人对于政府在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案件中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深为愤慨的。他们承认不能理解，我们怎么可以和俄国并肩作战，赞扬它的惊人胆略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可是我们肯定不会反对俄国在它自己伟大的国土上防止美国的政治思想的传播；我们会认为那是俄国自己的事情。……

“难道俄国会告诉它的人民说，它和美国的联盟也包括它对民主政体下的自由、对自由竞争企业的理论表示忠顺吗？难道俄国会告诉它的人民说，它和大不列颠的联盟也包括它自己要建立一个立宪君主政体吗？自然不会。……那末，在这里并没有矛盾，也不可能有矛盾，除非是在共产党人的心中，他们对于我们为统治我们自己的社会所作的决定表示愤慨并且会继续表示愤慨，因为这类决定也可能影

响到他們的有些不明不白的地位。”^①

我要在比德耳先生的哲学、他的法学、他的邏輯学和他的政治学方面来对他进行詰难。我要证明，比德耳先生在他反对美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中不仅仅在和我們发生爭執；他已經从根本上对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所闡明的哲学提出挑战；他已經对最高法院所解釋的美国法律提出挑战；他已經違反了每一个公认的邏輯体系；他已經对美国政府的根本世界政策提出挑战，使全世界的美国敌人心中感到痛快。我要提出和比德耳相反的論点，那就是：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見解而对他們加以迫害，这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所关心的特別事情，就像由于犹太人的宗教而对他們加以迫害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事情、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不仅仅是天主教徒忧心的事情、对黑人公民实行歧視不仅仅关系到黑人一样；剛剛相反，这类对少数人的有系統的进攻，每一次都是在否认所有公民均有民主权利，是在歪曲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是在威胁战争的胜利进行。

比德耳先生說，在美国容許那些贊成和怀抱共产党想法的人存在，对美国人來說就意味着失去了我們的“統治我們自己的社会”的权力；那末，根据同一理由，他对于所有贊成不列顛君主国的想法的人也应当驅逐他們出境并取消他們的国籍——但是他沒有这样作。他只是提出要取消共产党人和納粹分子的国籍。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很清楚的——比德耳在他自己的裁决中也作了詳細的說明——比德耳是根据这样的假定行事的：在外国，由共产党领导的和由納粹领导的国家同样是美国的敌人，任何同情二者之一的美国人都是內部的敌人，应当作为敌人对

^① 《紐約时报》，1944年3月6日。

待。他下的“共产党人”的定义是：任何人，不問其在政治上如何，如在 1941 年 6 月 21 日以前曾公开表示对苏联怀抱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并贊成苏美联盟，那他就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在假定：虽然美国現在同苏联結成联盟，虽然德黑兰宣言說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联盟，然而这种关系不久就会变成一种敌对的关系；而对于那些对苏联长期一貫表示友好的美国人，是不能相信他們会忠于自己的国家的。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美国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用杰斐逊的話來說：“虽然多数人的意志不論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占优势，这种意志若要是正义的，它必須是合理的；少数人有着他們的平等权利，这是平等的法律所必須加以保护的，而破坏这种平等权利就会是压迫。”按照比德耳先生的意見，如果这个少数是一个共产党的少数，它就沒有平等的权利。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美国的法律，像最高法院在它关于施奈德曼案件的決定中尖銳地提醒他的一样；这个決定是对比德耳先生反对共产党人一事的唯一明白的判断标准，它推翻了比德耳先生以及追随他的下級法院所作的決定，譴責了他們的理論。

比德耳先生这样就破坏了每一个邏輯体系，因为他用他自己个人的对共产党人的憎恨和偏見代替了合乎理性的論证。他为对美国人的区别对待辯护，理由是：既然如果苏联对于贊揚美国的俄国人区别对待，我們沒有权利反对，那么，对于贊揚苏联的美国人加以区别对待，美国人也是沒有权利反对的；当他假定我們要么就必須迫害共产党人否則就必須实行共产主义时，他違反了邏輯。

比德耳先生声称，我們的盟国苏联实在是我們的根本的和

終生的敌人，因而他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現在也許真的像比德耳先生主張的那樣，苏联沒有权利过問比德耳先生如何在美国执行他的职务，但苏联作为它自己的情报，肯定是不得不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美国的檢察总长在其法律裁决中写下了一个理論：任何美国人所持的見解如和苏联領袖們的見解相符，那他在事实上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叛徒。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必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們自己的檢察总长对苏联所持的态度，正同使布立特和伯利这两个名字在全世界臭名远揚的那种态度相同。比德耳先生同布立特和伯利在私人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亲密的朋友，这不是偶然的事。这三位名字都用B字起头的人，是美国反苏主义的“三劍客”，他們向美国共产党人开火只不过是他們向英苏美联盟的一种掩护的进攻。

每一个维护杰斐逊(他取消了不名誉的“外国人和阴谋叛乱法”)傳統美国人，每一个认为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釋比比德耳先生的解釋好的美国人，每一个不欣賞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中以蒙昧主义代替邏輯的美国人，每一个要建立“德黑兰”所保证的长期和平和友誼的美国人，——每一个这样的美国人必須大家来駁斥我国的所有一切形式的“赤色恐怖”，不問其来自比德耳先生，麦考密克上校，赫斯特，抑或来自希特勒本人。

总结起来：全国团结计划要求在基本上捍卫民主，多数人有绝对統治权，多数人也有绝对义务保护所有各类少数人，他們加在一起就构成美国人中的大多数。它要求廢除歧視黑人制度，使美国黑人获得宪法所保证的绝对的平等公民权。它要求廢除人头税，以及限制选举权的所有一切其他的方式。它要求宣布反犹太运动以及所有一切形式的种族优越理論和实践为非法。

它要求击败新近兴起的“反天主教运动”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純亚美利加党”运动^①中，曾一度在我国造成了那样的損害。它还要求从美国生活中最后清除希特勒的“反共产国际”和“赤色恐怖”，取消所有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例外立法。

这些就是捍卫民主政治的一些简单的和初步的措施。在这种捍卫民主政治的措施方面如果有所妥协或者予以放棄，那就意味着，当我們在国外从事粉碎納粹主义时，在国内却实行向它让步。因此，这些要求是美国所有爱国人士共同关怀的事情，是任何全国团结计划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① “純亚美利加党”运动 (The Know-Nothing movement): 1853 年发生于美国的秘密結社运动，以排除所有外国人及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为目的。——譯者

第四編 1944 年的选举——贊成 团結还是贊成分裂？

第十四章 党派斗争是昂貴的奢侈品

当全国选举正待举行时，美国进入了战争的最严重的决定时刻，我們的士兵将要第一次大量地参加战斗。

我們是唯一的有着这样一个刚性宪法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須举行选举，不问当时全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也像在許多其他的事情上一样，我們必須迁就现实，但要尽可能的做得好些。我們肯定不能从战争中分出时间来修改我們的宪法，这比进行一次全国选举要繁重得多。

然而也毋庸諱言，必須在今年进行选举一事，对于胜利所要求的全国团結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負担。

如果 1944 年的选举是在美国通常的不顾一切、任所欲为和不負責任的精神下进行，当作一次疯狂的权力爭夺，那对早日胜利和长期和平的一切希望一定要造成十分悲惨的后果。党派斗争在 1944 年的选举中如果变成支配一切的精神，那它就是最昂貴的奢侈品；我們无力負担。

因此，美国国内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如何去控制和压抑那种危险的、放肆的党派斗争的精神。这就是如何以全国团結的精神来进行全国选举的問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和非常困難的問題。

我國在 1864 年，在內戰的最後階段，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林肯只是剛剛開始作為克服種種令人傷心的戰時困難的主人而出現；他面臨着國會中一個敵對他的聯合，這種聯合使他自己的政黨陷於分裂，並把所有的特殊利益、偏見、失敗主義、未能實現的貪欲和被挫敗的個人野心結成一個憤怒地反對總統的密集隊伍。他的反對者要求他退出公職，作為任何一種國內和平的代價。林肯必然曾經痛苦地想要聽從反對派的話，回到私生活去；他身體疲憊，精神憂傷，他看到繼續戰鬥的結果，對他自己來說沒有別的，只有無限的痛苦。但他也看得很清楚，他的退休對於全國團結是絲毫沒有裨益的；相反地，他的退休會使南方的反叛者產生新的希望，會增加作戰的困難，會使他自己的政黨處於彼此衝突的野心和利益所造成的大混亂中，因而會嚴重地危害戰爭的整個目的——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維持“聯邦統一”。

林肯不顧他自己個人的利益和意願，決定接受 1864 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使選舉運動從全國分裂的根源變成了重新團結全國的方法。他承擔了這個任務：不通過黨派鬥爭，超出于黨派界綫之外，但在原則問題上對反對派不作一寸的讓步，來贏得全國的選舉。他把非黨派鬥爭的原則推進到如此之遠，以致用擁護“聯邦統一”的聯盟代替了共和黨，並選定擁護“聯邦統一”的南方人安德魯·約翰遜作為他的副總統候選人，這使所有贊成黨派鬥爭的共和黨人非常憤怒。他對抗了每一種特殊的利益和每一個壓力集團，使它們驚惶失措，這是求得全國團結和全國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他勝利了，他採取了唯一可能勝利的方法，因而也在我國歷史上贏得了特殊的光榮地位。

1944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所面臨的問題，和林肯所面臨的

問題異常相像。

許多讀者只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經开过、选定了它們的總統候选人并且确定了它們的綱領之后，才能看到这本书。我現在提出来討論的东西，到那时必然有一些初看起来会像古代历史一样，今天我国和全世界的前进速度是如此之快。然而依我看来，到九月或十月的时候，使我們回想起在三月終选举問題看来是怎么样，似乎是有一定价值的。

当我执笔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罗斯福是否接受提名。这不是總統自己所能决定的問題。他既不能自己去追求提名，即使在他接受提名后，他也不能积极参加竞选。他肩上負荷的是任何人从来不曾負荷过的最大的重担之一；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殘酷战争的危急存亡时刻，他是世界上最大强国的总司令。他知道国家最經受不起他自己扮演一个失败的候选人的角色，他在贏得选举中能够作出的貢獻，只是宣布正确的政策，并集中精力于贏得战争的胜利。在他能够下定决心接受提名以前，必須給予他令人相信的证据；全国需要他，全国将要选举他，并不要求他忽視自己的战争責任而去竞选總統。如果他必須去追求这个职位，他就不能接受提名。在1944年，只在人民真正表明——用一句老話來說——“职务在找人”时，罗斯福才能成为候选人。

对于这样的一种发展，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若干年来，罗斯福行使了这样一种主动的領導权，以致在国内，在總統的朋友和敌人中，养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在决定对任何問題作出正确的反应之前，先等待他率先倡議。如果要罗斯福当候选人就必须打破这个习惯，現在率先倡議必須来自下面，而不是来自上面。

也許我們应当考慮一下：既然羅斯福不僅在共和黨內有着那樣惡毒的敵人，就是在他自己黨內也有着那樣惡毒的敵人，在他自己黨內表現了對他的極不忠實，那末，為了求得全國團結，也許最好由他自己宣布退休？

稍稍考慮一下，就會看到，這種道路對於國家是多麼有害。得到的結果不是團結，而是把我們國家拋向無邊無際的派系鬥爭的茫茫大海之中。

沒有羅斯福這個舵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會變成無法調和的各派所形成的打不開的僵局，從中產生的領導，將類似在1920年控制了變成僵局的共和黨代表大會的“俄亥俄一幫”！

擺脫了羅斯福充當民主黨候選人的壓力之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會成為政黨政治狂熱表現的大好時機。胡佛—塔夫脫—范登堡—伙會大大得勢，而溫德耳·威爾基的希望就會像俗話所說的地獄中的雪球一樣消逝。即使是杜威，現在是政黨機器的白頭老手，也會發現他的力量無形消失，變為許多派別之一。從這種混亂中產生出來的候選人，將為現在的出人意外的競選者，參議員塔夫脫，甚至是赫伯特·胡佛或范登堡——而且勝利的希望是很大的！

如果羅斯福總統退出選舉時，必然的結果大致將會如此。

由於早在1943年夏就已經承認這些事實，於是勞工運動中最有遠見的派別當時便提出了大家歡迎的要求：讓羅斯福當1944年的總統候選人。這在勞工方面並不是一種狹隘的、黨派性的態度，因為由於進行戰爭，它所感受的不平之事是十分急迫的，而各種各樣的煽動家又向它求助，他們允許它得到心之所欲的一切東西，把這些東西包在透明的玻璃紙里，打上一根藍帶！不，這表明了勞工能夠負起它作為全國團結的支柱和代表的責

任。劳工正确地理解到，这不是让罗斯福个人去作决定的问题，这是一个为国家服务的问题，国家提出了要求，个人便必须承担国家需要他担任的职位。

人民必须为罗斯福竞选。这次选举运动应当是不进行党派斗争的运动。它应当是一次争取全国团结的运动，为了赢得战争，为了实现德黑兰的长期持久和平的前景。决不能让这次选举运动落在旧的政治机器手中，它只知道如何按照旧传统去进行竞选；刺耳地冒骂对方，对一群职业的政治活动家怀抱狂烈的党派心理。这次选举运动不应挑起和加剧陈旧的派别分歧和偏见，应当超越它们，使之归于消失，并把爱国的公民团结起来，打破陈旧的传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分界线，打破明显的阶级区分的意识形态，打破“旧政与新政”的宿仇，打破实现全国团结途中一切其他的障碍。

我国所处的非常紧急的局面，要求用非常的方式来进行1944年的选举，以便使这次选举从对全国团结的威胁变成在更高的水平上把我国团结起来的手段。

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民群众就必须学会如何使极端的党派斗争对表现这种精神的人来说无利可图。人民群众必须找出办法来打倒大声叫嚷的煽动家，揭露一切阴谋诡计，使掌握旧式政治机器的政治活动家退到后台去，开始提出一种新型的领导。

为了这个目的，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即“劳工”，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从事政治行动的組織，先从近邻和区起，扩大到县、镇和市，扩大到州和全国。这种組織须是非党派性的，就问题提出主张，对人和候选人的判断，要看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张是否明白和直率，而不去评价他们所插的政治党派的标签。

占大多数的独立公民必须組織起来，使民主党和共和党的

政治机器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这些陈旧的机器本身已经变成一种既得利益，脱离人民，没有一个人民所能信赖的。

遵从这些路綫，人民能够最有效地影响那两个大规模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们将要选定两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征用罗斯福作为候选人之后，他们就确有把握地使失败主义者和反动派不能控制民主党代表大会。从而他们也就确有把握，至少使失败主义者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不能为所欲为。他们能够从国会中清除两党的不負責任的分子和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曾经伙同一起反对总统和他的争取胜利与持久和平的计划；他们能够在两党中提拔出新的更好的人民代表来，这些人将恢复国会的威信，使国会团结起来，作为团结一致的人民的代表。

德黑兰计划的命运决定于1944年的选举。所有愿意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的人，不管以前的分歧和矛盾是怎样，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那些对于这个争取胜利和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世界的计划表示反对、从事暗中破坏或有所怀疑的人。

第十五章 我們应当反对誰？

超出政党分界綫以外的、不带党派色彩的争取全国团结的斗争，归根到底依然是赞成和反对某些候选人的斗争。我們怎样来認識，誰是我們应当反对的人呢？

讓我們立刻开出姓名和地址，就我們必須反对的那类人举一些显著的例子。

在国会的民主党方面，蒙大拿的参議員惠勒和得克薩斯的众議員戴斯是头号例子。在更为众多的共和党例子中，俄亥俄

的參議員塔夫脫和伊利諾的眾議員杰西·薩姆納是我們應當選擇的典型的一對。

他們是對英蘇美聯盟和德黑蘭協議深懷敵意的人。他們總是覺得美國應當和希特勒達成某種妥協，我們能夠有利地同他“打交道”。他們下定決心，如果他們能夠破壞時，就不讓我們和蘇聯“打交道”，並且他們只願意按照他們定下的條件去和英國發生關係，這種條件包括英美聯合反對蘇聯。馬丁·戴斯長時期來就是希特勒的“反共產國際”在美國的主要代理人。杰西·薩姆納曾在國會提出決議案，要求取消英美侵入西歐。他們都是激烈的大聲叫嚷“赤色威脅”的人。他們在國會中都投票去挫敗總統軍事計劃的關鍵性措施。他們都認為羅斯福的“專政”是對美國和對全世界的最大威脅。

把鑒認進一步推廣：他們是南方贊成人頭稅的民主黨人和北方的一些共和黨人，他們在國會中聯合起來拒絕我國士兵在1944年選舉中有通過“聯邦政府投票”——這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辦法——來實行的選舉權，而代之以一種欺騙的措施，這將取消十分之九的武裝部队的選舉權。

在新聞界，這個希特勒主義的朋友們組成的陣營的突出的代表是：麥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論壇報》，J. M. 派特遜的紐約《每日新聞》，“錫西”·派特遜的華盛頓《時代先驅報》，以及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整個報系。這些是最壞的，但必須指出，它們的毒素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滲透了全國大多數的大城市日報。它們是林肯在他那時候必須對付的“柯柏赫報紙”^①的現代翻版，林肯有時候覺得必須用軍事權威去加以鎮壓。它們是陰

① 柯柏赫報紙 (Copperhead Press)：美國南北戰爭時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報紙。——譯者

謀叛亂和失敗主義的承辦人。

當溫德耳·威爾基在威斯康辛進行預選運動時，他宣稱：他以樹立麥考密克上校和赫斯特作為自己的敵人而自豪；如果共和黨指定這兩個寶貝所能接受的人作總統候選人時，它肯定是要失敗，也是應當失敗的——威爾基在這裡表現了根本上健康的美國人的天性。只要威爾基毫不妥協地堅持這種路線，並以自己不能得到麥考密克和赫斯特的支持而使這種路線達到其邏輯的結局，那他就必須算作是全國團結陣營中的人，不管他在其他問題上可能有什麼錯誤。對麥考密克和赫斯特來說，除了威爾基的名字外，其他提作共和黨候選人的名字都是可以接受的。

失敗主義者陣營的喪心病狂的一翼，表現在杰勒耳德·史密斯（屬於“美國第一”和三 K 黨組織）和他的新朋友——宗教界法西斯分子科格林神父和柯倫神父所領導的那些組織。它們是“突擊隊”的變種，公開進行希特勒式的騷擾，採取它的一切形式，掩蓋得也最少。只要看誰是他們的朋友，就容易找出失敗主義陣營的更多的潛伏代表人物，把他們加入我們必須反對的名單中去。

在勞工運動內部，失敗主義和納粹一類想法的主要代表人是約翰·劉易斯，聯合礦工協會的頭子。劉易斯是勞工隊伍中“第五縱隊”的總司令。美國的作戰努力在 1943 年所經歷的最嚴重挫敗，是要由劉易斯負責的。他在礦工們的不平之事上操縱，使之不能和平解決（本來是完全可以和平解決的），實行了一系列不必要的和破壞性的罷工。這對於勞工事業所造成的損害之大，僅次於對戰爭的努力、對國民道德所造成的損害，僅次於它對希特勒所給予的鼓勵。

我們決不可忘記 1943 年劉易斯給我們的經驗，因為他在

1944年的选举中正准备作为“劳工代言人”出现，企图再一次来破坏团结，帮助失败主义阵营和帮助取得协商的和平。因此，回忆一下1943年同刘易斯进行斗争的基本问题，现在是适时的。

关键性的问题是劳工同战争的关系。刘易斯主张劳工对战争没有基本的政策，他的主张在一个时候获得了具有威胁性的大量拥护。他争辩说，不罢工政策只是对雇主们和政府的让步，只有他刘易斯如果觉得这样作方便时，才能支持它——这就是说，赢得战争是雇主们和政府的目的，实际不是劳工本身的事情，劳工心中另外有别的事情。这种立场主要是一种失败主义的立场；因为，如果劳工不懂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不把战争当作自己的事情，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果，劳工必定把战争的困难和牺牲看作是违反它的意志加在它身上的毫无意义的负担，因此战争是劳工应当反对的东西，要加以抵抗，加以破坏，不管胜利与否，使之结束。而这就是约翰·刘易斯所做过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的逻辑，也是他在1944年选举中将要做的事情的逻辑。

劳工支援战争，是因为它知道，只有胜利，才能使劳工在我国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奴役。如果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所破坏，那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工会运动以此作为其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作为对他人的让步：在战争紧急期间，不使用它的自然的和合法的武器，罢工。即使政府是反劳工的，只要它进行战争以取得胜利，劳工也不得不遵循这个政策；但既然反劳工的力量只控制了国会，而行政部门——战时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肯定对劳工是友好的并且是和劳工联合的，那末执行这个政策就要容易得多了。

刘易斯的失败主义的和反战的政策，远远未能做到牺牲战争以促进矿工的利益，它实际上是既违反矿工的利益又反对战

爭的。政府在 1942 年所提出的政策为刘易斯和矿主們所拒絕，那种政策实质上是和在 1943 年进行几次有害的罢工之后最后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同的，而刘易斯却說后者是一种胜利。如果这是胜利，那是在一年以前由刘易斯本人拒絕給予矿工們的！但刘易斯的主要目的是罢工；他所认为胜利的，是他在制造罢工上得到了成功，并不是指的矿工們得到的东西，因为他們可以不必罢工而更早地得到这些东西。

刘易斯和目光短淺而又貪婪的煤矿主們串通一气来行动，后者利用他来破坏政府的物价管制措施和利潤限制。在最具破坏性的罢工正在进行中，刘易斯从他假定是以罢工来对付的雇主方面得到了最热烈的公开贊同。反动矿业資本的代言人《旋轉通訊报》在 1943 年 6 月 1 日一号中写道：

“在我們方面，我們宁願看到是約翰·刘易斯而不是任何別的人当美国劳工的領袖。他的魄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认为他不但是最强有力的而且是最可靠的国内劳工領袖。”

所有国内失敗主义的和亲納粹的报纸都集結起来支持刘易斯。它們把他当成“劳工的英雄”，把他捧上了天。《芝加哥論壇报》是劳工和战争的死敌，它对刘易斯非常滿意。劳工全体受到了打击，那些贊揚刘易斯的报纸也挑起武装部队因为刘易斯的罢工而产生的对劳工憎恨，在国会通过了反劳工的立法，使整个情势更为困难。

当約翰·刘易斯走向 1944 年的选举运动，作为一个“劳工領袖”来繼續他的工作时，讓我們提醒劳工运动和整个国家注意一下这些事实。

劳工运动中所有一切不健康的和带破坏性的势力都被吸引

到了約翰·刘易斯的周圍。正是妇女服装工人协会主席戴維·杜宾斯基提議让刘易斯回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去，而胡佛的朋友沃尔和赫彻森則积极加以贊助，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杜宾斯基和刘易斯之間有着自然的吸引力，虽然当刘易斯領導产业工人联合会时，杜宾斯基背棄了他，虽然刘易斯所抱的反犹太主义是臭名远揚的；这种吸引力就是对战争的共同看法。杜宾斯基是直认不諱的抱着和苏联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并且公开表示希望美国帮助摧毁苏联政府。他的朋友錢宁在1942年1月作了如次的声明，杜宾斯基在1943年4月公开表示贊同：

“最后一枪还没有打。那一枪还是要打的。最后一枪将要从自由的美国打出——从这一枪斯大林的制度也就会被打得粉碎。”^①

所有怀抱把“斯大林的制度”“打得粉碎”的强烈野心的人，必然会去同在这一方面作最大努力的希特勒制度結成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杜宾斯基及其环繞在《犹太人前进日报》和《新領袖》周圍的政治集团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因为它也想要把斯大林制度“打得粉碎”；这就是为什么他們拥护南斯拉夫的米哈洛維奇，而誹謗铁托为“共产党匪徒”；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們认为科德耳·赫尔是在反对苏联时，就把他捧上了天，而当他領導締結莫斯科协定时，就变成了他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他們对“德黑兰”憤怒如狂；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問題上他們都在进行反对罗斯福。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劳工党内真正拥护总统的希耳曼势力在预选会上获胜，并选出了它的“国家委员会”这个控制机构时，他們由于盲目的憤怒，就想要分裂美国劳工党。

^① “工人集团”刊物，《朋友》，第33卷，第1期，1942年1月。

勾画了一个在 1944 年痛恨苏联的人，你也就可以找到一个痛恨英国的人，一个已經站在背叛美国边缘的人。这是另一个很好的指南，可以用来找出在 1944 年的选举运动中必須加以反对的人。

是的，有着許許多多的国内敌人，举不胜举。

但是我們必須提防，不要根据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资本家、壟断资本家等等陈旧的标签来判定誰是我們的敌人。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既有朋友，也有敌人，如果我們向整个一群进攻，就只会加强我們的敌人，削弱我們的朋友。而且这也忽視了存在这样的敌人，他們披着“劳工”的外衣，但和本身是一个“资本家”的那种敌人同样的恶毒和不可和解。

1944 年选举运动的号令可以从我国独立战争的傳統中得来：“在你看到他們的白眼珠以前，不要开枪。”在你發动枪机之前，要看清楚你的枪前确实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不要对空中乱放枪。在美国这次战争中，我們要对着正确的目标确实地、穩当地瞄准。

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組織的改变

我国組織起来了的共产主义者，或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黑兰協議所开辟的前景和提出的任务是如此带根本性，如此之新，以致造成了这样的結果：要求在我們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作某些重大的改变。最后决定尚有待于在五月初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但是在全国範圍内展开的討論已經表明了这样一致的意見，将要作出的决定的主要輪廓可以事先明确地加以表述。

美国共产主义者将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放棄为促进作为单独一个集团的本身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个政党的主要特征。共产主义者預見到，他們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因此，我們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结的阻碍。

因此，共产主义者要解散他們独立的政党，并找出一个新的和不同的組織形式和名称，更确切地适应当前的任务以及必須通过它来实现这些任务的政治結構。

在美国将不再有共产党了。

一向大叫大嚷要求共产党应当解散的人，現在看到他們的要求将要实现，却感到出奇地失望；他們現在說，这样作一点也沒有区别，既然还会有共产主义者，而他們将用另一种形式自由地联合起来，从事共同的工作。显然，这些人过去所要求的，以及現在还在要求的，是共产主义者应当自杀！有一位康茨博士，他仅仅在几个月前还刊行了一整本书来证明共产党应当解散，現在忽然改变了他的主意，沒有作任何的解釋，他同样大叫大嚷地要求，不管共产主义者願意不願意，他們一定得有自己独立的党！也許，如果历史不曾这样提供它自己的喜劇性的慰藉，那就未免过于严肃，非人性所能堪了。

自然，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将要有一个組織。但那将是非党派性的。

我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道怀抱的政治目的，我們要試图通过我国現有的政党結構去促进，这現有的政党結構主要是美国特有的“两党制”。

在我 1942 年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中，我曾詳細分析两党制及其运用。我曾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变成了半官方的組織，为法律和习惯所保护，使新的主要政党的兴起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美国政治生活中复杂的和永远在变化的潮流都被納入这种傳統形式之中，这些形式是在以往的时期內形成并且是为了适应現在早已过时的問題和政治关系的。結果是，今天的政治問題不是在这两个政党之間，而是在这两个政党之內去决定雌雄的。政党的参加人是由于傳統而不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当前的一致看法联系到一起的，有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人口，現在占三分之一以上，认为他們是独立于两党之外的，他們在两者之間作出選擇时，不是一个总的選擇，而是就提出来要作决定的每一个职位和每一个問題来重新作出選擇。

沒有人还能够預言哪一个党在國內居于多数，因为沒有一个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稳定多数的。独立的选举人“分散他們的选票”，并不是完全和某个政党一致，这样的人日益变得具有举足輕重的力量。他們的作用由于实行“直接預选”制而更为加强了，在实行这种制度时，許多州的政府自己进行政党領袖和公职候选人的选举，任何公民均可参加（有时候在某一党登記，在其他場合下就只在他进入选場后，才选定他所要用的选票）。

我們不必去辯論這個問題：这是不是可能有的最好的选举制度。这就是我們所有的选举制度，最近看不出有作任何根本改变的希望。我們的任务就是力所能及，使它的运用合乎全国的利益。

在現代，有过几次雄心勃勃的嘗試，要打破这种两党制的政治束縛，这是当这种制度过于明显地和过于剧烈地歪曲國內政治关系的时候。这种嘗試就是 1912 年的泰底·罗斯福的“公

麋”运动^①和1924年的拉弗勒特运动^②。这些反抗行为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并曾促使在两党制的实践上作出许多修正，但它们在组织上并不是成功的，对两党制并未作出永久性的重大改变。

明尼苏达的“农民劳工党”从该州的民主党分裂出去，曾有过一段成功的然而短促的生涯；但在1944年，该党几乎全体一致决定再度合并于传统的民主党内，因为发现在他们州中，三党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团结的障碍。威斯康辛的“进步党”经历了一段颇为短促的成功生活，但不久就在菲耳·拉弗勒特的模仿纳粹的领导之下解体了。

在纽约，“美国劳工党”能够兴起，产生重大的作用，是因为纽约州的选举法同大多数其他州的不同，允许打破两党界限，就某一个职位提出共同的候选人，最后计算时，把在两种选票上所得的票数加到一起。因此，美国劳工党能够在全国选举中同民主党保持联盟，在本州某些职位的选举中同共和党保持联盟，而在其他职位的选举中则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为独立选举人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组织武器。然而它的处境是多么不稳定，可以从一次事件中看得出来，就是当在阿尔巴尼提出了一个法案要修改州选举法律，禁止把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列在不只一种选票上，即只能列在他所登记的那个政党的选票上的时候。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但如果立法机关中的共和党多数曾认为这是

① “公麋”运动(“Bull Moose” movement): 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与共和党分离，曾组织进步党，党员别号“公麋”。——译者

② 拉弗勒特运动(La Follette movement): 拉弗勒特和康明斯等曾于1924年组织进步党，后来西奥多·罗斯福担任了这个党的领袖，但在总统竞选中未能当选。——译者

完全合乎他們利益的，那就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把它變成法律，從而使美國勞工黨不能像它現在運用得那麼有效。這樣，美國勞工黨就永遠處在控制州立法機關的任何其他政黨的威脅之下。

共產主義者不是作為一個集團或一個組織去參加任何現存的政黨。他們是參加到這樣一群獨立的選舉人中去，這群人從所有各黨提出的候選人中選定最好的人。各個共產主義者有自由去在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政黨名稱下登記，採取他們習慣地與之聯系的獨立進步人士可能認為是最好的方式。

共產主義者為進行他們共同的非政黨活動而建立的新組織，將接收並繼續共產黨過去所進行的所有一切政治教育活動，拋棄政黨選舉的性質，那是體現促進黨派利益的鬥爭的。

新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名稱，在本書付印時尚未商定。大家同意，名稱將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類。將要考慮的另外一個提法是非黨政治協會。這兩個名稱之間的問題是：“共產主義”一詞是否應當繼續採用。這是一個怎樣最為方便的問題：在它的名稱上強調這個組織的長期的政治性質好呢，還是強調它和美國人民中廣大的民主進步多數一同工作的方法好。無論如何，美國公眾將毫無疑問地知道：在我國，誰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想些什麼，他們在哪裡，以及他們在做些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共產主義者是會習慣地或有意地消散得無影無蹤的人。

在某些方面曾經有一種誤解，認為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作方法的改變會意味着，嗣後不會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參加競選。共產主義者不會這樣，正像我們將要與之一道共同努力的獨立人士不會這樣一般。然而，這意味着共產主義者不會僅僅作為他們自己一個集團的被提名者，根據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者綱領來競選。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被提名為某種職務的候選人，那

將是由廣大階層的獨立選舉人提名的，就像小本杰明·戴維斯
和彼得·卡其昂被提名為紐約市議會議員的候選人一樣，在此
種情況下，候選人所代表的團結的範圍，比只是一兩張候選人全
都列名的選票所代表的要大得多。當一個共產主義者能夠通過
接受提名來適當地代表並促進這種更大的團結時，他會毫不躊
躇地參加競選。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作方法改變的整個問題
總結如下：其所以要這樣作，是受一個思想的支配——使共產主
義者成為美國工人階級和全國團結的更積極更有效的參加者，
為了進步和啟迪、為了戰爭的勝利和為了繁榮與自由的持久和
平而鬥爭。

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以及根據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者對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將要作出一種
偉大的和日益增長的貢獻。

第十七章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的貢獻

許多別有用心的人評論家把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正要採取的政
策解釋為放棄馬克思主義。在過去最敵視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
也奔來捍衛它，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背叛”他們自己的主義。甚
至莊嚴持重的老牌《紐約時報》都說，它對背叛了他們自己的教
義的共產主義者，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信心。

這些以往對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曾經——至少說——可悲地
予以忽視的人，現在卻這樣對它表示傷心的關切，真是十分有趣
的事。這值得共產主義者作個答復。

美國共產主義者現有的政策的目標，是在一心一意地解決

美国在有史以来的主要危机中的問題。这种政策必須主要从这个观点来討論。如果它对这个目的能够有真正的貢獻，那它就是正确的，如果它对这个目的不能有真正的貢獻，那它就是不正确的。

既然本书已經就世界的形势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处境說明了我們的政策的优点，我們就能够对这个問題作最后的答复：“馬克思主义对美国能有什么貢獻？”在答复这个問題时，也就答复了那些說馬克思主义已經被放棄的人。

馬克思主义就是应用科学来解决政治問題。它把这些問題当作整个历史过程的具体之点来处理，它认为整个历史过程是遵循可以观察、可以表述和可以理解的某些发展原理和某些运动規律的。在对历史原理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更好地武装人类去控制和指导今天正在形成的历史，對我們來說，这种历史就是由美国就我們現有的全国問題所作的决定形成的。如果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一种意义的科学，那它今天就必須首先正确地答复战争所提出的問題。

最近有位先生对我說：“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政策是专为取得战争胜利而制訂的；但我不理解，执行这种政策的結果，馬克思主义变成怎样了？”我回答他說，我很高兴他能理解为取得战争胜利所必須做的是什麼，但我很遺憾，他把馬克思主义誤解为一种如何使战争失败的理論。

对美国來說，馬克思主义今天首先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指南。既然胜利对美国人民是最高的需要，馬克思主义能否站得住脚，就要看它对胜利的貢獻如何。如果馬克思主义对胜利不曾有所帮助，如果它甚至是取得胜利的障碍，那末我們誠然可以問：“馬克思主义变成怎样了？”但是，如果馬克思主义证明是能

提供最大的帮助的，那它就经过了最大的考验，它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不必为之忧虑。

在本书中为美国提出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训练和思想的产物；这个计划从头到尾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的。如果这个计划是健全的，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其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正统”的。

自然这也是实在的，即就其不是重述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情况下所使用的陈旧政策和公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不，这是空前未有的，因而不是正统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空前未有的形势之下，那就必然要得出结论：为应付这种形势所采取的在科学上正确的政策，必然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是正统的，即是说是按照一个已有的模型制订出来的，那就会证明它是错误的；如果它是空前未有的，那意味着它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究竟是不是正确，必须联系我们所看到的形势来考察它的优点何在，然后才能证明。而最后的证明必须从行动中、从它是否能成功地应用于生活中去找。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在指导空前未有的行动计划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套教条，而所有想要把它变成教条的人都在试图摧毁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本人在对他的某些信徒生气的时候，曾经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只就“正统的”形势定出正统的计划。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是那些空前未有的时刻，对于这种时刻，正统计划就意味着失败。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常

常是首先承认并正确地估計一种新的形势的人。

馬克思主义必須对美国思想作出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帮助它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在我作这个声明时，完全意識到大多数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将会对之嘲弄，因为我們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是他們有着自由的心胸，是共产主义者有着心智上的束縛。这个问题值得更深刻地加以研究。

在我同我国自由主义的报纸《下午报》的一位編輯最近进行的一次討論中，他对我抱怨說：“共产主义者一般的行为就像他們剛剛和上帝开过会一样”，这就說明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的人被共产主义者弄得忸怩不安，不願意看到他們在身边。我回答說，由我們看来，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是这种想法：自从他們在几个世代前接到最后的使命以来，从上帝那里竟还有什么話傳过来。这就用美国風行的“俏皮話”表述了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之間的哲学論爭。馬克思主义者相信真理是可以察知的，而当真理被发现以后，即应努力将其傳播，傳播得越广越好；自由主义者相信，对每一个問題有两个到一打的同样正确的答案；我們所能办到的，最多也不过是不受特殊利益的影响，从中作出選擇；用抽籤的办法从可能的答案中去挑定一种，也能同用任何其他办法一样，达到同样高度的成功。自由主义者否定了权威主义的单一教条，但却之以相反的教条，即多数答案具有同等的可靠性。他們以为他們的心胸是自由的，因为他們在对人类各种問題的众多的答案之上任意翱翔，不受任何指导；他們可以自由地追随当时的任何一种非非之想。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純粹的幻想，因为它只是偶然地才能对生活的现实問題提供解决办法，失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同科学的方法截然相反的。

馬克思主义对美国生活必須作出的最高貢獻，就是把科学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用从旧的和已知的东西中得出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的科学理論方法，去代替盲目的碰碰試試的方法。这就是对运动中的世界的理解，对运动規律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有可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預測，以便使人类心灵不再面对一系列經常出現的意外，自己毫无准备。

美国公共生活中喜劇式的特点之一，就是报纸竭力把共产主义者描繪为永远是被事件的每一个轉折和剧变弄得惊惶失措的人，被每一件新事情弄得困窘不安的人。这种煞費苦心制造出来的口实，是用来掩盖制造这种口实的人自己的而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惊惶失措和困窘不安的，只有通过对共产主义者的真实立場同样煞費苦心制造出来的歪曲，才能維持这种口实。在美国，除了在共产主义者自己所办的刊物中，关于他們对任何重大問題的意見实际上不可能得到一点概念。所有其他的東西，报纸，杂志，书籍，演讲，无綫电等等，虽然时常地詳細地談論共产主义者，却总是煞費苦心地掩藏和歪曲共产主义者自己想要說的話。

关于这一点，我在1942年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一书受到的待遇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实际上沒有一个人企图去在报刊中分析和批判那本书的論点。在这方面所作的少数假托的东西（《美国經濟評論》，1943年9月；《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紀事》，1944年3月），也是使用那种老办法，即假定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写的——除了为苏联辯护之外，就不会有別的东西，于是，除了在这方面可能加以歪曲的东西以外，对于书中其他一切一概忽視。凡是談到承认苏联是世界上的主要因素的地方，一概拿来证明：共产主义者“对俄国的将

来的关切”，使得他們反对或看不见美国的利益。只要应用一下这个公式，就算最后地处理了我們的观点。

我已經能够預言，对本书的几乎所有一切評論的内容将是怎样。本书的明显的特点，是迫切要求美国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并說明如何在实际上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但是这个特点一定会被完全掩盖在这个公式之下：白劳德贊美“德黑兰”，因为斯大林曾經出席；他拒絕贊美“魁北克”，因为斯大林沒有出席；要說明的是，白劳德只不过是斯大林的替身，因此对于他說的話，絲毫不必注意。涉及到我們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时，美国公众討論就是墮落到了这种地步。

当这种方法支配着公众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时，不論对什么问题都不能有任何健全的輿論。这并不是主張共产主义者永远是对的，或者甚至說他們在任何一件具体事情上都是对的的问题。問題是在于，看待共产主义者所用的方法是这样，以致它曲解了全国思想的整体，歪曲了美国公共生活的整个过程。

不妨假想一下——可怕的想法——共产主义者也可能在一个重要之点上碰巧是正确的！即使根据那种理論說共产主义者通常是錯誤的，应当与之进行最頑强的斗争，但这依然是可能的：他們也許有一次是正确的。但按照美国通行的态度，这样做是損害很大的，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来，在这一点上整个国家就会自动地被排除在采取正确的立場之外。除非能改变这种情况，否則共产党人对他們国家的福利能够作出贡献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永远小心翼翼地采取錯誤的立場，希望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自由地采取正确的立場，如果偶然有別人能够将它提出的話！这是在美国理智生活中一个充分发展了的理論，以“死的接吻”得名并受到尊敬。即使是一件最有价值的事业，一

且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赞成和拥护，它就接受了“死的接吻”，变成了被诅咒的东西！一个新闻界微不足道的人，弗雷德里克·伍耳特曼，向美国一些最有势力的男人和女人发出了公开的命令——而他们就跳起来去服从他，其敏捷的程度是他们对待美国总统的命令从来不会表现的！

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们本身的存在，就对美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这揭露出存在着上面所说的能够摧毁美国的、理智方面的毒气。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存在，那末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创造他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万个其他的公民中，将由于其存在而确实地揭露出来：社会所受不讲理性和蒙昧主义两种崇拜——希特勒主义的根源——的危害达到何种程度，因为只要一经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它便全部激动起来，变成恶毒的明显的行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存在，这种毒气便只是静悄悄地和无影无踪地进行它的毒害工作，等到发觉它，为时已晚了。

当美国人一旦学会了理性地而不是歇斯底里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者，当考虑他们的观点时只看这些观点的价值如何，然后接受或拒绝，像对待所有其他公民的观点一样，不问其来源为何——这在我国和世界的进步上的确将要是一个用红字印上的纪念日。

在现在的情况下，即是只谈到“红字日”[“red letter day”]也是危险的，因为“红”字[“red”]就已经够陷人于罪，而“日”字[“day”]则是马丁·戴斯和他的国会委员会所要调查的。

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是这幅讽刺怪画的作者，就让我来请他们去参阅美国文官委员会关于如何找到颠覆分子以便将其开除公职的条例；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高度的爱国心”[“an

advanced degree of patriotism”]就足以使一个人招致怀疑。看来似乎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从“爭取生存的战争”中有系統地得出一切邏輯的結論，因此，任何其他的人如果也这样作，那对他們是危險的。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相像，在中国，被怀疑为共产党因而有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險的学生，只要不务課业，闲逛妓院，就足以祛除对他的怀疑，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使他們在中国的“联邦調查局”的眼中立刻洗刷清白，证明他們是安分和穩健的可敬公民了。

美国馬克思主义者所担負的是一項艰巨的任务：教育他們的国家，使之理解：共产主义者也是人，很像他們的所有同胞們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新的思想方法。

不管这个任务何等困难，它是必須完成的，因为——这比在国内政策問題上更严重更直接——如果美国一听到“共产主义者”就变得歇斯底里的話，那它就将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解决它的对外政策問題。共产主义者是現今世界图画中无可逃避的一部分，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起到重大的作用，我們將要看到，必須全国学会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面紅耳赤、尖声怪叫、两脚踩地板、晕厥、或表現其他无理性的恐惧。要开始学习这一課，沒有比就在国内更好的地方了，这里有着我們自己的本国种的共产主义者。

在清明地、客观地对待本国和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美国將要逐漸地、艰苦地开始消除其全部关于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的錯誤教导；我們將要懂得，这样一幅图画：怒目而視，感情用事，要走极端，意識錯乱，破坏成性，嗜杀，不容異見，以教条主义式的暴动从事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而不顾国家利益，毫无爱国之心——这幅图画是經過一世代的高压的、多方說服的宣傳而

深深鑄入他們的脑海的——是伪造的，是和真理截然相反的。

他們將看到，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是非常從容鎮定和神志清明的。他們不是感情用事的，而是富有理性的。他們不是愛走極端的，而是現實主義的。他們不是意識錯亂的，他們學會了如何在地震和風暴中保持自己的均衡。他們不是破壞成性的，他們學會了如何在混亂中從事建設。他們不是嗜杀的，他們的全部哲學和實踐是人類兄弟友愛的表現。他們不是不容異見的和教條主義的，他們已把忍耐提升為一種高度的藝術，把靈活性提到了原則的水平上。他們從來沒有玩弄過革命這個概念，把它當成是某種有趣的冒險或客廳中的遊戲；他們對政策的全部考慮永遠是絕對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除此之外，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套思維體系，這種體系對全世界所有各族人民的問題放射出一種新的和更為深刻的智慧之光，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怎樣思考，只要他們試圖正直地思考，就都可以分享這種明光。

在這個使每個國家經受考驗的世界危機時期，美國的最大的需要是學會如何正直地和迅速地思考。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政治思維繼續放在神話和偏見的基础之上，或者如果我們學習現代世界的現實過於緩慢，以致趕不上歷史前進的步伐，那就沒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所認識的美國從長期的災難中挽救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毫不畏縮地面對現實，並依現代的條件恢復杰斐遜、潘恩和林肯的偉大傳統，那麼美國就可以團結起來面對世界，在“德黑蘭”所提出的拯救人類的集體事業中擔負一個主導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德黑蘭”向我們指出了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沿着這條道路，不偏不倚，走向它的光輝的目的地。

統一書號：3002·76

定 價：1.00 元